

南京史志

国内外发行



少帅张学良四度到金陵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上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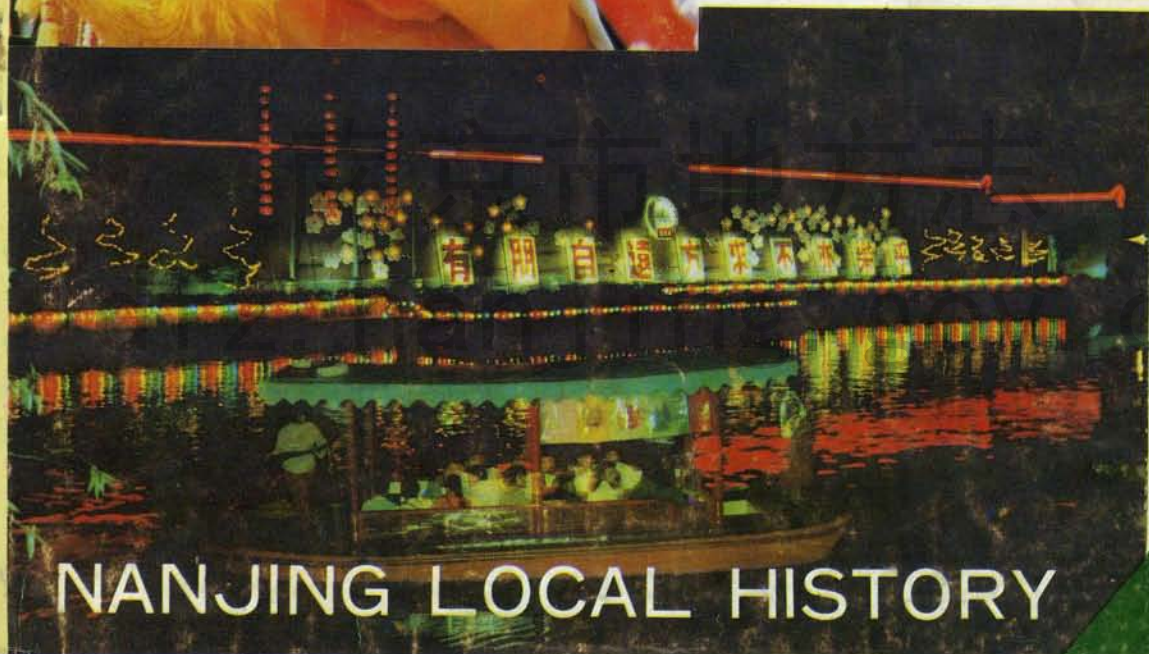
周镐策反孙良诚

建筑大师刘敦桢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一个谜

新四军里的「白求恩」罗生特

馨香四溢的「南京小红花」



NANJING LOCAL HISTORY

1992年1·2期合刊

南京市建邺区

园林绿化管理所

地址：三茅巷5号 电话：403329



新街口广场节日花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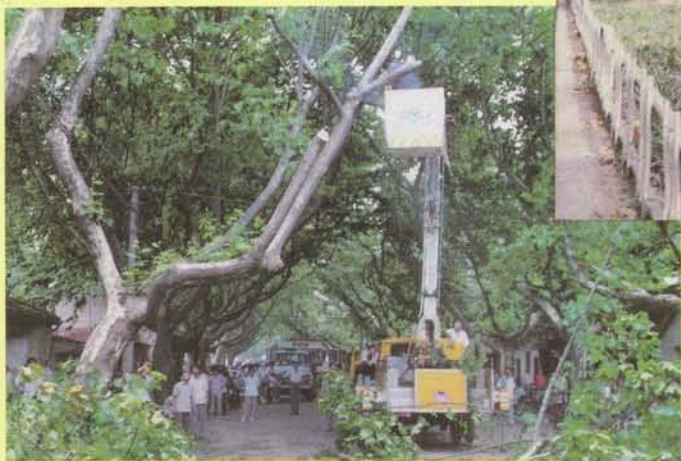


荣获“金陵市容杯”竞赛奖



干道绿化一隅

绿化
机械
操作



南湖小区绿化景点



莫愁公寓



△ 大会主席台



◁ 获奖代表发言



△ 市人大副主任
曹琬向获奖者
颁奖

隆重举行知识竞赛发奖大会

南京市地方志

dfz.n



▷ 会场一角

(丁卫 摄影)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一个谜.....	刘恩营 47
活捉“东陵大盗”孙殿英.....	尹 萍 42

• 秦淮杂忆 •	
双烈亭前忆曼陀.....	夏 蓓 41
南京古代廉吏.....	吴福林 52

回忆我的堂兄卢前.....	卢 素 51
中统局的惯用伎俩.....	强剑衷 44

• 史志论坛 •	
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	

——喜读《南京建材工业志》.....	申 遇 57
真实的写照 艰巨的工程.....	闻 靖 55

城市志指导组天津会议述略.....	王能伟 62
关于提高党政权志记述质量的问题.....	殷蔚然 58

读《楚爰金研究》.....	胡德维 60
• 古都研究 •	

六朝建康皇家苑囿综述.....	卢海鸣 63
从《儒林外史》看清南京的城市风貌.....	郭黎安 70

清代末年的南京.....	杨长春 74
千年前的长江浮桥.....	刘晓梵 78

宋代建康驿站.....	于 江 79
二三十年代南京的人口.....	陈国强 80

张 生

• 建康风情 •	
江宁的婚丧喜庆旧俗.....	彭年德 107

• 白门掌故 •	
孙中山的治学精神.....	谈嘉祐 111

康熙夜读燕子矶.....	陆正明 112
年羹尧轶闻三则.....	史明星 54

民国一件没有办完的文物案.....	王长喜 77
• 史坛信息 •	
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召开.....	小 宣 40

• 封 页 •	
封面：南京艺术节《金陵十二钗》中宝姑娘(丁卫)、 《夜泊秦淮》(朱平)	

封二：绿化古都的建邺区园林所	
封三：南京民俗馆展品选(郭金海)	

封底：微利行业 为民服务	
--------------	--

编辑部主任 庄淑玉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
副 主 任 汤惠兰	国外代号 BM 四一八六
责任编辑 董宁宁	国内发行 本刊发行部
卢海鸣	电脑照排 南京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电脑部
胡星侠	广告许可证 宁广字第五六号
李哲民	全年订价 7.20元 本期定价 2.40元
发 行 地 址	南京市政府大院
邮 码	210008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

顾问 郑凤翔 张治宗

南京史志

一九九二年第一、二期

(总第五十一、五十二期)

主编 姚文烈
王能伟

常务副主编 陈济民

·人物春秋·

张学良四度到金陵.....孙逊 平 涛 4

建筑大师刘敦桢.....梅 宏 9

新四军里的「白求恩」——罗生特.....程冠臣 12

周镐策反孙良诚.....吴雪亚 18

长征途中的彭德怀.....陈 靖 22

陶行知的报刊生涯.....吴奕宽 28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上将军.....许亚洲 新 芬 24

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黄炳蔚.....崔 征 30

辛亥元勋徐绍桢.....徐家阜 35

常败将军韩德勤.....戚厚杰 32

勋德不凡的丞相伯颜.....朱清泽 37

·神州风云·

我炮兵占领南京「国防部」.....王 彦 48

总前委机关何时进入南京.....陈广相 50

·白下艺文·

南京文化艺术节暨「92金秋联谊会」.....余安民 83

馨香四溢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叶 雷 86

陈铎及其《滑稽余韵》.....钱文华 81

·南京经济·

南京电力工业八十年.....谭恩荣 89

乐为古都添新绿.....建邺园林绿化所 92

振兴微利行业 乐为人民服务.....胡淑贞 93

·金陵文教·

民国元年的南京陆军军官学校.....虞晓波 94

南京善堂兴亡录.....周济宾 95

抗战前的南京贫儿院.....李清华 104

栖霞山下一所特异学校.....胡汉林 109

·三江揽胜·

明孝陵前神道石刻.....俞允尧 101

随园及其遗迹的新发现.....震 持 67

南京历史上有两处随园.....陶 恺 69

千古之谜说淹城.....管志怡 99

金陵古刹鹫峰寺.....王明发 98

·江东文物·

三绝碑前话古今.....徐 畅 105

青山太白祠与太白酒.....赵家云 110

太平天国金玺.....施善革 96

张学良

四度到

——追忆少帅

少帅张学良年轻得志，叱咤风云，成了近代史上的一位传奇式人物。自不说他的风流韵事，有多少传闻笔墨，引得人们称奇叫绝；更为他那“东北易帜”、“西安扣蒋”的果敢惊人之举，博得誉满天下，青史留名，至今仍为人们赞叹和情怀所系。

就是这位张少帅，曾经四次到达金陵，与古城南京结下荣与辱、生与死的不解之缘。

一、踌躇满志抵金陵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一声爆炸，张作霖命归黄泉。皇姑屯的爆炸声炸碎了少帅张学良心中对日本人存有的幻想，燃烧其心中复仇的火焰。当年年底，张学良幡然“易帜”，宣誓效忠南京国民政府。随着青天白日旗在东北的升起，蒋介石在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

1929年3月，蒋介石、李宗仁为争夺两湖，爆发了蒋桂战争。4月2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谴责桂系，声援蒋介石，很快桂系铩羽而归。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与铲除异己的威胁下，联合反蒋，于是爆发了旷日持久而又惨烈的“中原大战”。同时，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在这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张学良毅然挥师南下，入关助蒋，对中原大战实施“武装调停”，反蒋联盟迅速土崩瓦解。

张学良此举，令蒋介石感激涕零，钦佩不已。因而致书张学良，有“得友如兄，死无憾矣”之语。其后，蒋

介石对张学良竭力拉拢，授予少帅全国陆海空军副令职位，而且让东北军势力扩大到冀、察两省及平津两特别市，表示恩宠和信任，并邀请张学良到南京会晤。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达到鼎盛时期。

1930年11月8日，张学良一行由一百名卫兵护送，在天津乘火车沿津浦线南下，一路上，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津浦铁路沿线的车站遍贴欢迎标语，称赞他“促进统一，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12日，运载张学良一行的专列驶抵浦口站，张群、宋子文、何应钦、王宠惠、李石曾等七八百名高级官员早已恭候多时。张学良下车后，在张群陪同下，乘专轮渡江时，狮子山炮台鸣炮19响，本国军舰奏“迎上将乐”，外舰均悬中国国旗表示欢迎。登岸后，街道两旁彩旗飘扬，欢迎标语随处可见，气氛异常热烈。张学良的轿车在装甲车的护送下，直



左起：张学良、宋霭龄、于凤至、宋美龄、
蒋介石在蒋介石官邸相聚。

金陵

今与昔

驶国民政府官邸。张学良刚刚步出车门，身着戎装、肩扛上将军官阶的蒋介石便趋步上前，以西方式的见面礼节与之热情拥抱，此等殊遇，在以往国民政府的欢迎仪式中是绝无仅有的。当晚，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双重身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和张学良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其规格之高、礼遇之厚、气氛之热烈是罕见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举行了舞会，宋美龄邀请张学良翩翩起舞，堪称佳话。

在京期间，张学良下榻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的铁汤池官邸，其随行人员均住在当时南京最豪华的中央饭店（逸仙桥附近）。日常起居，除了随行卫兵护送外，并由卫戍团担任警戒。

张学良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谈论首次南京之行目的时说：“我此行到南京来，是为了看一看新首都，许多党和国家的要人，我以前还未能有幸结识，这次来可以进一步结识他们，以便把自己完全置于中央当局的支配之下。我期待着与蒋公介石总裁和其他政府官员会晤，以便使我在为国家 and 人民致力于和平和民族振兴的工作中具备更强的观念。”张学良在京出席了各种形式的集会，包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并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引人注目的是，蒋介石与张学良每次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总是并肩而行，宋美龄和于凤至也是形影不离。当时曾盛传蒋、张结为异性兄弟，这不是事实。但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与宋氏姐妹结为干姐妹却是实情。历史上曾留下一张照片，背景上是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合影者左起为张学良、宋霭龄、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于凤至站立中间，左右两臂各挽一宋之颈，亲昵之态，胜过亲生姊妹。

张学良于12月4日启程北返，9日回到天津后



着中将军服的张学良

对记者说，此次南京之行结果圆满，对蒋主席及中央政府增加了信赖。中国之完全统一，将为期不远。年轻气盛的少帅万没料到蒋介石盛情礼遇的良苦用心。

二、助蒋独裁负罪名

1931年2月，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地位，在戴季陶、张群等谋士策动下，决定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改做总统。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表示反对，被蒋介石软禁在汤山。蒋介石预料时局会有变化，遂令张学良迅速在北平成立副总司令行营，以便加强对北方的控制。

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的行动，引起很大反响。国民党元老林森、谷应芳等与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联合树起反蒋大旗，与蒋唱对台戏。为消除异己，蒋介石又邀请张学良到南京参加5月7日召开的“国民会议”。4月30日，张学良由北平先到天津，再由天津飞抵南京。此时，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写有“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字样的标语，欢迎盛况不减当年。张学良的行营仍设在铁汤池财长官邸。

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会议”如期在南京开幕。张学良被推上主席团成员的宝座。与会成员合影时，蒋介石特意在前排中央空出两个位置，与张并肩而立。5月16日，蒋介石亲邀张学良共同阅兵，并请张氏训话。国民会议期间，蒋介石经常到铁汤池看望张学良，而且多次召张学良到中央军校住所密谈。并曾设家宴款待张学良。6月，张学良返回北平。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根据蒋介石的“不抵抗原则”，将东北军撤回关内，拱手让出东北三省，背上“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界



张学良在台北与好友张群(右一)、张大千(中)等合影
的奚落和谴责。

三、“剿匪”不力遭冷遇

1935年9月中旬,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指导下,乘坐自备的博鹰(波音)飞机,带着赵四小姐飞抵西安,“围剿”红军。一到西安,张学良迅速调兵遣将,攻打红军。希望能够尽快打败红军,以实现抗日之举。结果装备最精良的第110师被全歼,师长何立中被击毙。军事上的挫败使少帅受到强烈震惊,他再也不敢轻视红军,轻举妄动。恰在此时,他要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下令各路“剿共”大军暂缓前进,原地待命。

10月下旬,张学良飞抵南京。由于张学良在西北战场“剿共”不力,南京政府对少帅颇为不满。张学良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机场上冷冷清清,只有蒋介石侍从主任钱大钧一人等候在机场,往日的热闹场面烟消云散。少帅想起前两次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身份来南京时的风光场面,不禁黯然神伤。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次礼遇的降格,意味着自己地位的下降。

11月1日,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100多人于早晨7点钟循例上中山陵谒陵,9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代表们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等候合影,因蒋介石借故推辞,汪精卫替代蒋介石与等候已久的中央委员们合影。9时半,摄影完毕。

正当代表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打算进入会议室开会时,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中掏出左轮手枪,对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现场秩序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慌忙钻进旁边的汽车底下……在一片慌乱中,独有与汪精卫同在第一排的张学良将军和张继临危不惧。张继一把抱住了刺客的腰,张学良奔上前猛踢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抵达南京,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到码头迎接

一脚,又狠击一拳,刺客手枪坠地,这才使汪精卫拣条活命。

张学良在千钧一发之际,挺身救汪,一时传为“美谈”。张学良并不清楚孙凤鸣刺汪出于爱国热情,而认为是党派之争所致,因此心里并不快乐。特别是11月下旬,接到第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身亡和第106师受到损失的消息后,倍感苦闷,郁郁寡欢。然而,蒋介石、何应钦这些党政要员都在忙着开会,对东北军的损失漠不关心,甚至连张学良向他们报告军情都不耐烦听,似乎东北军受损与他们无关,这大大地刺伤了张学良的自尊心。因此,12月份大会一结束,张学良就托故去了上海,秘密会见杜重远。启程时,在南京机场送行的只有上海市长吴铁城等少数党政要员。

四、委曲求全送“统帅”

1936年,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空前高涨,张学良心情激荡,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致电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蒋介石大发雷霆,10月12日,亲临西安督战。张学良苦谏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蒋介石大骂张学良无知。张学良见苦谏不行,决意“兵谏”,逼蒋抗日。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经各方调解,蒋介石答应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杨虎城担心节外生枝,悄悄地护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直驶西郊飞机场,4时整,张学良将军与蒋介石等同登飞机,飞往洛阳。在洛阳休息时,蒋介石有意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啊!”此话恰到好处,张学良动了感情,愈发坚持要送蒋介石回南京。他万没想到,此次南京之行,竟会沦入终生幽禁的悲惨境地。

12月26日下午,蒋介石返回首都,政府官员倾室出动,在机场迎接。40万南京市民涌上街头,看

个究竟。张学良也一同抵达南京，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南京。这一次他被安置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当天蒋介石通过宋子文暗示张学良应有来京请罪的书面表示，少帅不得已亲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负荆请罪”的信：“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愿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张学良原以为写一份请罪书就会得到蒋的宽恕，可是蒋介石却言而无信，将张学良的这封“请罪书”抄回原件分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此后对张的迫害接踵而至。

次日，张学良出门拜客，他的车子一出公馆，特务就尾随其后，寸步不离。12月30日，经过周密的策划之后，蒋介石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员，组织高等军事法庭。31日上午，在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当即宣布事先拟好的判决书，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退庭后，张学良以阶下囚的身份被宪兵押送到陵园孔祥熙别墅看管。平时无人居住的公馆，如临大敌，明岗暗哨，星罗棋布，气氛肃杀恐怖。当日下午，蒋介石假惺惺地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将军。新年过后，1月4日上午，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发布命令，宣布：“张学良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张学良将军一生的自由被褫夺，从此开始了他那漫长而凄苦的幽禁生涯。

五、少年夫妻伴白头

“一乘铁燕东飞去，不见将军再回还”。自从张将军被蒋介石背信弃义，下令军法审判、扣押南京，以至后来辗转重庆、湖南、广西、贵州、奉化，直至台北，几十年来，他除了一颗坚定的信念和非同凡响的铮铮意志支持之外，就是有两位令人钦敬的贤内助——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体贴入微，温暖心怀，而得以健在人间。

说起于凤至，这位能诗会画、品貌端庄的巨商淑女，与张学良结为鸾俦，可谓天造地设。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时，年仅15（张生于1901年旧历四月十七日，公历6月3日），而且互不相识，其中既为“父母之命”，又有“媒妁之言”。一天其父张作霖，在好友于文年（于凤至父）家中，见到算命先生写



1991年2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首次离台时

拍摄

给于凤至的挂贴上有“凤命”二字，联想到“凤命千金”与自家的“将门虎子”，便认定张学良和于凤至是天赐良缘，遂互换庚帖。可是张学良误以为于凤至是个不懂文理的乡下姑娘，对这门婚事态度颇为冷淡，于凤至得知后几次要求退婚。

详知内情的吴俊升，热情为其穿针引线，在安排双方见面时，他要张学良装成天益堂古画店的掌柜，然后带于凤至前来购买字画。张学良一见这位秀丽可人的大家闺范，便心慌意乱；而于凤至眼见这位“张掌柜”，虽说是商人打扮，但举手投足却流露出一股气宇轩昂的军人气质，判断这“张掌柜”八成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先拿出一幅竹兰古画，得意地说这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竹兰图》，是地地道道的珍品。于凤至凝视许久，然后才开口问价。张学良开价3000，于凤至轻盈地一笑说：“如果是真迹，3000太便宜，如果是假的，30也不值。”张学良心中暗自佩服，可嘴上却不肯认帐，并问她凭什么根据硬说这幅画是名人题跋的竹兰是伪作？于凤至笑着说道：“板桥画竹，挥洒奔放，草草几笔，趣味横生，乍看轻俗，细赏则暗藏风骨，这幅画空有枝叶，毫无神韵，伪造的赝品，怎值3000？”在旁的吴俊升连忙打圆场，才未出现尴尬的局面。于是张学良又拿出一幅苏东坡暮年被贬琼州的七绝墨迹：“规摹简古争人看，管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担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于凤至一看断定是真迹，但有意漫不经心问值价多少？张学良看她无意再买画，就信口说声800。于凤至马上掏出1000元放在桌上，买卖成交。当时这幅字少说也要值5000。

画店一别，19岁的于凤至（生于1897年旧历五

月初八，公历6月7日），才貌双全，终使这位小4岁的张公子深深倾倒。曾两次上门，于凤至托词未见，但芳心已被张学良真情打动，于是填《临江仙》词一首以回赠：

古镇亲赴为联姻，难怪满腹惊魂。千枝百朵处处春，卑亢怎成群，目中心无丽人。

山盟海誓心轻许，谁知此言伪真？门第悬殊难知音，劝君休孟浪，三思订秦晋。

张学良接获词笺，百感交集，心潮起伏，认定于凤至是风姿才气兼具、不可多得的佳人。即于1916年，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把于凤至接到大帅府。此时于凤至19岁，张学良15岁，学良在别人面前亲切地称凤至为“大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南京，于凤至人在英伦，曾致电宋美龄求援，未获回音，便万里迢迢赶回国内，请求宋美龄帮助她争取实现陪伴张学良。宋美龄觉得伴狱如同坐牢，劝她不要自找罪受。于凤至强调结发夫妻，意在分忧，不计代价。此后，她与赵四小姐轮流伴守，直到1940年，她身患乳腺癌，去美医治。愈后又带着张学良的一女、三子定居旧金山“多树城”。即使身处万里的异国他乡，两颗心仍时时连接在一起。

人说张学良一生不幸之中，又有大幸，除了遇着于凤至这位贤慧妻子之外，又巧遇了一位年轻貌美的赵四小姐，伴他度过了几十年难以煎熬的痛苦囚禁生涯。

赵四小姐名叫一荻，1912年出生香港，是国民党政府交通次长赵爱华六男四女中的最小的女儿，因排行第四，人们皆称其为“赵四小姐”，她的小名叫“香香”。她也是在15岁那年认识了比她大11岁的张学良。一个英俊潇洒，气度不凡；一个年轻粉黛、聪慧温存，从此一往情深，相濡以沫，到1964年正式办理结婚手续时已坚守了35个春秋。

于凤至赴美以后，赵四小姐即从香港舍离幼子，赴湘西伴学良过着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生活。1946年，抗战胜利后，各方援救张学良，周恩来也曾借旧政协开会的讲坛，发表讲话，称张学良为“千古功臣”，吁请蒋先生立即释放张学良将军。已历十年铁窗生涯的张学良也盼望获得新的生活。可是在1946年底，却被秘密押送台湾，关押在新竹市井上温泉。这里虽然风景优美，“一座平房，山峦环抱，树木葱茏。房旁有温泉可浴，环境十分幽静，根本没有居民。警卫森严，一如往昔”。但这美丽的环境并没有给张学良带来一丝欢乐，唯有赵四小姐时时

守在身旁及于凤至派女婿陶鹏飞赴台探望，给了他一点欣慰。赵一荻虽一度心脏不适，走路都头昏眼花，心跳不止，但她对张学良却表示：“只要能帮他精神快乐，只要能使他高兴，任何事情我都肯为他做。”为人豁达的“大姐”于凤至，为成人之美，决定离婚，使得张、赵二人在晚年结为秦晋之好。

1964年7月4日，他俩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位美籍人士的家中举行了婚礼。这极不寻常的婚礼，引起岛内外的莫大轰动。台湾《联合报》以《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己、白首缔盟》为题报道了这则消息。

结婚后，他俩移居台北复兴路新宅。当年他俩的儿子闻琳在美国已长大成人，并与粤系名将陈济棠的侄女陈淑贞结婚，生有两子。儿子、儿媳每隔一段时间返台，探望张学良夫妇。有时则把小孙子带来，张学良有时趴在地上，让孙子当马骑，为这座闭塞的幽室平添了几丝人间天伦之乐。平时则看看圣经，养养兰花，他家有兰花两百多盆。他说：“兰是花中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总觉得兰的境界幽远……”这大约也是一种寄托吧。

1991年，获准赴美探亲，这是他自幽禁以来第一次跨出国门，引起世人注目。有记者问张学良将军何时能够返回大陆？张学良回答说：“上帝会妥善安排的。”2月8日，国民党元老、著名“和平老人”邵力子的孙女邵黎黎女士从南京寄信给台北张学良，张于3月2日回信称其“邵小妹妹”。据邵黎黎说，从信中秀丽的笔迹看，可能是赵四小姐代笔，但信尾则是张学良将军的亲笔签名。可见，他俩仍记挂当年的故旧亲朋。

是的，他没有忘记南京，南京人民也十分怀念张将军，希望有一天能再度相见，那该是另一番景况吧。在本文结束时，抄录一首张学良将军晚年咏作的七律《无题》，或许能够更深的体味张将军的心境。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责任编辑 惠兰）



建筑大师

刘敦桢



● 作者：东南大学教授·梅宏·

1930年摄于南京卢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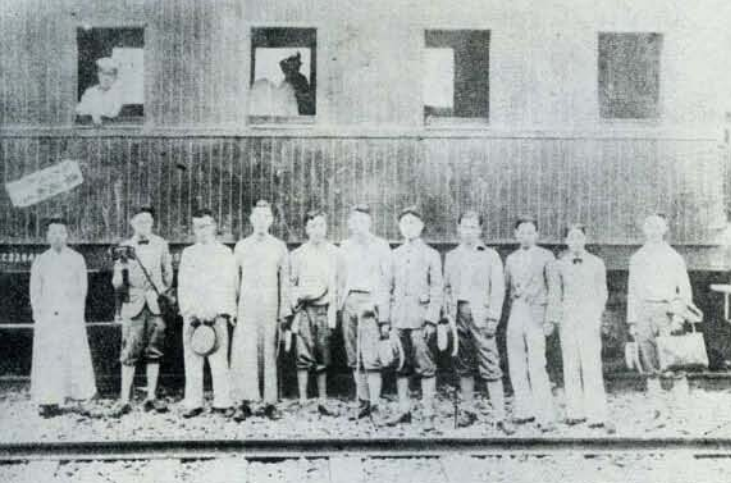
1968年5月1日凌晨，东方的启明星尚未升起，周围一片昏暗。一副蒙上白布的担架正从南京工人医院的某一病房，匆匆送往后面的太平间。上面静静地躺着的就是我国著名的建筑教育家、科学院学部委员、被学界公认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人和泰斗，所谓“南刘北梁”的刘敦桢教授。在经历了人世间甘酸辛辣的七十一个春秋以后，他终于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生命的道路。由于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天里，他已处于昏迷的状态，所以临终时没给人们留下片言只语。这位为人仰崇的学者，往日所具有的高深学识和智慧聪睿，都随着他生命之火的熄灭而消失。

首創建筑工程系科

南京，是老教授生命打上休止符的地方，也是他一生光辉事业的肇始与发展的所在。四十年前，作为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的一名教授，他率领了该校建筑科全体学生和少数教师，奉命来到南京中央大学报到。并和刘福泰、卢奉璋、贝季眉等，一同筹备并创建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这是我国高等学府成立的第一所建筑工程系科，为了办好这个新的专业，使之更好地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刘敦桢主张综合欧美和日本等国建筑专业所长，在环绕以建筑设计为中心的教育目标上，加强建筑结构和建筑营造等工程知识，以及我国建筑业的具体情况，培养既具有先进科学知识和较好的技术能力、又能解

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建筑师。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制定：学制四年，每年划分为春、秋两学期，课程依学分计算，培养目标是掌握建筑设计能力的建筑师，具有较全面的工程技术知识，良好的综合能力和表现手法，以及正确且周到地处理中国实际问题的技能……等等。这些原则，不但成为中大建筑系多年的教学依凭，而且还对日后其他兄弟院校成立建筑专业时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建系以后，各项工作纷至沓来，其中最突出是教师奇缺、授课乏人。刘敦桢不辞辛苦，先后担任过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史、西洋建筑史、建筑营造学、阴影法、投影几何、建筑测量、施工估价、甚至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木结构等多门不同内容的课程讲授。这使他得以较深入地了解系内大部分课程的内容及其间的联系，并为他日后担任系、院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除了上述备课、讲课占据大部时间外，他还尽可能抽空阅读有关我国古建筑的历史文献，以及外出参观踏勘各地建筑古迹。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当时我国唯一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并在1928年发表了首篇这方面的学术论述——《佛教对中国建筑之影响》。以后又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和田边泰的《“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两篇译文及自己的校注，都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此外，他还担任建筑师工作，在北极阁和城南



1931年夏,率中大建筑系师生北上作古建筑田野考察,于浦口出发时合影。

都设计了一些民用建筑,但多数已在抗日战争中被毁。值得一提的是建于中山陵前东侧的仰止亭,这是全由石构的一座八角重檐建筑,也是他“自习”中国古建筑以后的首次作品,就创作时间来看,它也许是国内这类建筑中最早的实物例证。

实地调查古迹

1932年秋,刘敦桢为了实现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夙望,放弃了南方优裕的生活条件和丰厚的收入,离开了中央大学前往北平,全力投入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为自己学术上的成就开辟了新的天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迁往祖国西南大后方,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西康等地居住和工作,直到日寇投降后,才又回到阔别14年的南京。

这时外患方息,内战又起,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由于长期积劳,刘敦桢和他的夫人陈敬都先后生了重病,加以生活窘迫,虽然他已经在史学界和教育界获得为人敬仰的崇高地位,但却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工作和生活。因为各方面条件的欠缺,科研工作早已无法开展。在教学上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应聘教师愈来愈少,教学秩序很不稳定。而建筑设计工作亦十分萧条,除了替南京图书馆设计了一栋阅览楼外,就是为中大建造了一批教师和学生的宿舍。至于在生活方面,则早已处于“苟延残喘,朝不保夕”的危殆境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东方古老国度的亿万人民带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刘敦桢也和大家一样,以满腔热忱和激情投身到工作与学习中去。这时的中大,已改名为南京大学,原有教职员工大多留任。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教学的内容和环节,也有了许多变化,加上各种政治运动和活动与自我思想改造,校内的工作明显增多了。此外,他还被聘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对南

京市内及其附近的文物古迹的考证与维护,作了许多工作。当时同在一起共事的,还有南京大学的胡小石、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等多位专家学者。他们曾先后对南京市的明清遗址,如城墙、孝陵、故宫、瓮城、水门、鼓楼、贡院、夫子庙、勋贵墓葬、无梁殿……以及附近的南朝帝王陵墓,进行了文献考证研究和田野实地调查,并对现有情况与保护措施写出报告,交转文

管会及市政府研究处理。

除了对南京地区以外,还对本省和省外的一些古建筑和遗迹进行了调查研究,例如苏州云岩寺虎丘塔、上海南翔真如寺正殿、山东平邑县汉阙、安徽歙县祠堂及民居、浙江延福寺大殿、吴县杨湾轩辕宫大殿等等,大多写出了专题论述,先后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及《文物》等专门性学术刊物上。

对南京市原有旧城的保护、利用和改造方面,他认为应集中保护并适当改造今日城南中华门及沿秦淮河一带地区,并基本保持低层砖屋(一般不过二层)和曲巷旧街的原貌。新市区的建设重点应置于城中及城北。城东的明故宫一带最好仍予保留,至少暂时不进行大规模建设。今中华门(明聚宝门)瓮城为国内现存孤例,必须妥善保护,将来可将两侧城墙修复一部,与其共同开放。其他如鬼脸城、台城、通济门水关等处,也可作相应处理。秦淮河要分期分段疏通,其他市内河道如珍珠河、进香河、北门桥河、青溪等,并须浚导,以达到顺利排除城内降水与改善卫生条件等目的。对市内产生污染及较大噪声的生产单位,也须按计划分批迁往他处,以免影响城市环境与居民卫生。……许多意见和建议,都得到先后任南京市市长的柯庆施同志和彭冲同志的赞同,有的现已付诸实行。

1952年起,学校(改称南京工学院)和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合办了中国建筑研究室,由刘敦桢教授主持工作。为了从根本上探索什么是中国建筑的真正民族形式,决定从调查民居着手。因为它不但面广量大,内容丰富,而且还是许多建筑(宫殿、坛庙、官署、寺观……)发展的依托,最富有民族特征和乡土气息。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调查范围几达全国各省及自治区后,于1956年发表了首期研究成果《中国住宅概说》。现已以法、英、日文译本,行销于国外。以后又指导研究室人员撰写了《徽州明代住宅》、《杭、绍、甬住宅报告》、《福建永定客家住宅》等著述多篇,对国内各地开展的民居研究

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设计瞻园 殚精竭虑

中国古代园林历史相当悠久，造园技术及艺术均有很高水平，但过去从未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刘敦桢教授在研究民居时，即已着眼于此，并且后来逐渐将重点转移到这方面来。在对全国现存古典园林进行了解后，发现目前园址最集中地点在苏州。于是集中人力物力，对苏州现存百余处园林作了多次普查，依其规模、特征、保存状况等条件，予以筛选评比，最后选出若干典型，详加分析（就其建园构思、设计特点、表现手法、局部处理等方面），于1957年发表了初稿《苏州的园林》，又一次引起建筑学界的震动，促进了在全国范围内研究我国传统园林艺术的高潮，其意义不亚于前述推动民居研究的重要性。此稿后经大力补充与修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厉批判。拨乱反正以后，由他的学生和后人整理，定名为《苏州古典园林》，于1979年由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于当年即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又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现已译为英、日版发行于海外。由于他的卓越贡献和高湛学术水平，刘敦桢教授已被公认为是此门学科的绝对权威。然而理论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予以证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南京瞻园的恢建和扩建工程中觅得。瞻园原为明中山王徐达家族的私园，至清乾隆时规模仍十分宏巨。但在解放时已残破不堪，面积也大部削失。1960年市人民政府委托刘敦桢教授主持此项工程。首期修建内容，是在现园基础上，新建园门、曲廊、小轩、花兰厅、水院、水榭等东侧一组建筑，改造南北二池石岸，新砌南池假山、石矶及北池东北水池、北山石壁。二期工程是新建目前旧园与太平天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间之堂、榭、亭、廊、楼、阁与庭院数区。现两期工程均告竣工，建筑设计及景物配置均获得中外人士好评，特别是南池假山备受赞扬，它全由小块湖石叠砌，构成的巉崖峭石和溶洞钟乳，构思别出心裁，造形雄健隽美，其石料纹理与交接缝隙，都经过缜密处理，因此在外观上能够浑为一体，宛如天成。这组石山看起来体积相当庞大，但实际上用的石料并不多，因岩石后堆积的是大量的土。这不但利用了掘池和修建中的废土，还有利于山上培植草木的生长，同时也大大减少了造价和人工。老教授在设计此假山时，除了多方面吸取了我国古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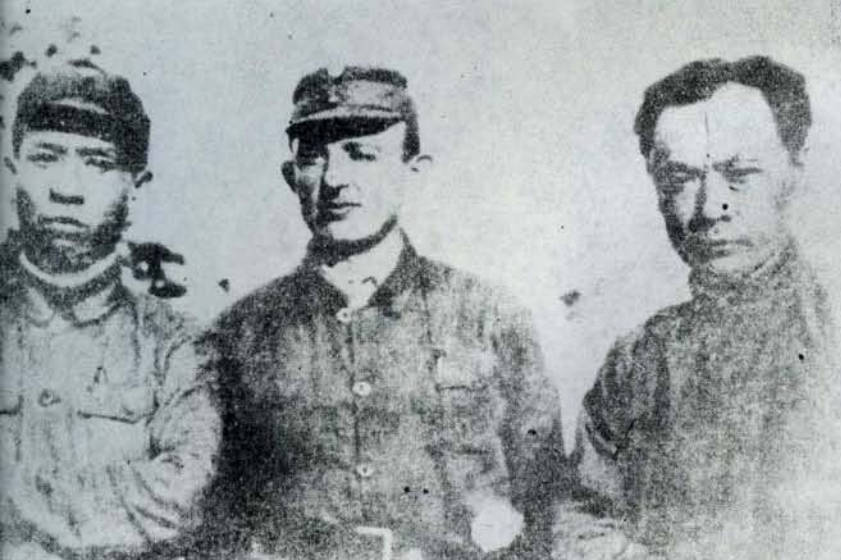


1951年，刘先生（右四）与胡小石（左四）、曾昭燏（左二）、蒋赞初（左三）参加南京市文管会元朝石刻调查。

造园中的传统优秀手法，还亲自绘出草图并制作了缩尺模型，又和有经验的石工匠师反复讨论，最后才决定了目前方案。施工中并常临现场，协助匠工选择石料，指导堆砌及尔后的绿化布置。可谓是他集思广益、殚精竭虑的精髓之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我国古典园林后的一次总结性的实践。

教书育人 堪称楷模

在他长期的教学生涯中，无论是担任教职或行政工作，他都将自己的精力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他一直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把教师学生当成自己的亲友、子弟。虽然身体欠佳，但从解放到1957年，他仍然每年坚持上课，课程有中国建筑史、中国营造法、西方建筑史等。直到后来因患严重的气喘病，才将教学担子次第交给青年教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博览群书，广集资料，并写出了详细的教学大纲和教案，逐年都予补充。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在他去世后的遗著整理工作中，就曾发现四种不同体裁的教案，每页都端正的笔迹密密麻麻地书写着，表明了他对教学工作的深思熟虑和一丝不苟。平时他很关心学生的学习并能提出严格要求，要求学生端正学习思想和态度、勤奋学习。自己也以身作则，不迟到早退，即使多年讲课，也要事先再备好课，讲课时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目的是使学生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获得最多知识。对于协助教学科研工作的助手和研究生们，更是悉心培养关怀，为他（她）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机会和条件，使能很快成长起来。又尽可能在生活中给予帮助和照顾，以减少不必要的干扰，使能全力投入本职工作。其中许多人，如潘谷西、郭湖生、刘先觉、章明、叶菊华、詹永伟等，都已成为我国建筑教学、科研和生产中的重要骨干力量和知名学者。



一九四二年,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和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在盐城合影。

程冠臣

新四军的“白求恩” ——罗生特大夫

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有一位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医师,为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动人事迹和光辉形象为世人所熟悉,也受到了人们的崇敬和爱戴。但是,还有另一位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也曾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著名的泌尿外科博士罗生特及其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了。为弘扬罗生特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现特将罗生特大夫在新四军中的传奇事迹介绍给读者。

一、鱼儿得水 海阔任鱼游

罗生特 1903 年 1 月 11 日出生于奥地利加里齐恩的莱姆贝格, 1923 年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系。1928 年 5 月 11 日,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综合医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并投身于反法西斯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罗生特,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民主抵抗运动。为此,罗生特遭到了德国法西斯的逮捕,被关押在德国的布痕瓦特集中营,备受法西斯暴徒的凌辱和摧残,满口牙齿被敲掉,肾脏被打伤尿血,腰脊骨被打坏。但他毫不屈服,坚持秘密斗争,并以自己的医学技术为难友们治病。后来纳粹分子找不到罗生特是共产党员的证据,只好将他释放,并勒令出境,终生不能回国。1938 年冬,在纳粹分子严密监视下,罗生特和难友威廉、戴克一起乘船离开了祖国,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的大商埠——上海。

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对罗生特来说,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但是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暴行,想起自己的祖国还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遭受着同样的苦难,从而激起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刻同情。他深深感到与中国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渴望更多地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以帮

著书立说 填补国内空白

解放以前,国内还未曾正式编辑和出版一部内容丰富的建筑史。1959 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而编辑的“三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稿》、《中国近代建筑史稿》、《建筑十年》,就是这项工作的肇始。刘敦桢教授积极参加并主持了它们的编写。在以后的《中国建筑简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辑工作也是一样,特别是后者,是一部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著作,它集中了国内建

筑史学界及部分考古学界的老、中、青学术精英,历时七年、改稿八次,终于 1966 年成书,至今仍被认为是从事中国古建筑学习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该书于 1980 年被评为国家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88 年再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现已译为英、日文本行销于海外。

高风美德 永驻人间

刘敦桢教授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学者,早在幼年就受到兄长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思想

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罗生特在上海定居后,为了生计,他开了一间小诊所。由于他的医术高明,赢得了无数病家登门求医。在上海定居的三年中,他结识了一位居住在上海而经常出入解放区的德国共产党员、著名的国际新闻记者希扑和他的夫人涂鲁德。罗生特在与希扑的交往中,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抗击日寇侵略者,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唤起民众奋起抗日,并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实行民主,建立政权以及根据地军民的艰苦生活,他们缺医少药、医治伤病困难等情况。所有这些激起了罗生特向往与同情的心绪,他渴望有机会到敌后根据地去,以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1941年初春,罗生特终于经希扑介绍,认识了在上海的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和吴之理同志。沈、吴二位向罗生特介绍了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形势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罗生特听了十分高兴,这正是多年他所向往的地方,于是当即向沈其震提出去新四军工作的要求。后来在上海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让罗生特乔装成德国传教士,沈其震为罗生特购置了专科器械,罗生特也将自己小诊所的器械带上,随同沈其震部长一行,巧妙地避开日伪的盘查,通过了敌伪的封锁线,顺利地到达苏北新四军军部——盐城。陈毅军长和刘少奇政委热情地接见了罗生特博士。陈毅军长真诚地说:“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地欢迎罗先生!为抗击日寇,搞好本军医务工作,深望罗先生贡献才华。”罗生特激动地对陈军长和刘政委说:“在上海欣闻军长大名,今日能和陈军长、刘政委见面,今后和新四军的同志们一道工作,我深感荣幸!”

在盐城,罗生特亲眼看到新四军部队纪律严明,上下团结,军民鱼水情深和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

抗日民主运动和富有生气的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景象,这一切深深地吸引着他。在内心压抑了很久的反法西斯的战斗激情有如海涛一样汹涌地翻滚起来,他深深地感到了海阔任鱼游的舒畅与快乐!

二、精湛的技术 高尚的医德

根据陈军长的指示,罗生特被安排在新四军军部直属医院里工作,崔义田、戴济民副部长积极地为罗生特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罗生特满腔热情地为伤病员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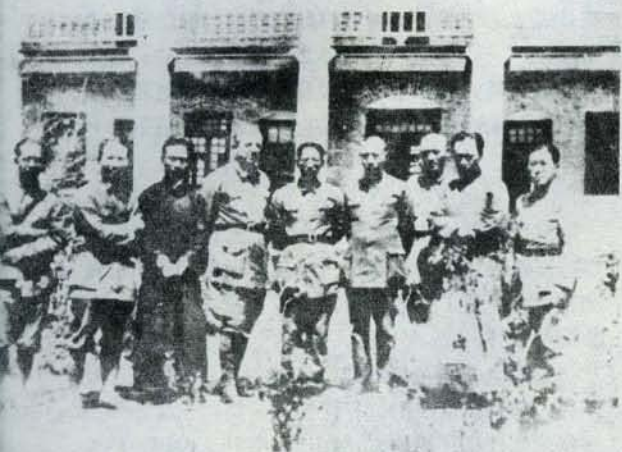
1942年,罗生特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越过苏北平原,来到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当时这里是华中根据地比较稳定的地方,在这里有利于发挥他的专科特长。在二师卫生部所在地——皖东安来县大刘郢,他受到宫乃泉部长的热烈欢迎。罗生特也很快熟悉了根据地的环境,提高了他对共产党、人民军队的认识。为了开展工作,罗生特还学会了不少中国话。

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里,由于战斗频繁,环境动荡不安,生活条件艰苦,许多女同志患了妇科病;结了婚的女同志也因敌后游击环境流动性太大,迫切要求结束妊娠,罗生特很同情她们的处境。在他所到过的抗日根据地里,罗生特都竭力主张凡结过婚有了孩子的,应进行绝育手术;如有不愿意手术的,罗生特就耐心地劝导她们实行避孕。无论是在苏北平原,还是在二、四师的淮南、淮北地区,他所到之处为军民所做人工流产和妇科检查治疗数以千计,保证了军民中妇女干部的健康与安全。

1943年春,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因患肾脏病血尿症,拟来新四军军部请罗生特医治。陈军长将这一消息通知了罗生特。罗生特当即表示:“我欢迎罗司令员来治病,我将尽力为他医治。”当罗荣桓同志到来时,他热情地接待了

鼓舞,立志要为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压迫、振兴华夏而奋斗,为此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16岁即考取官费到日本求学。后来学了建筑专业,在看到日本对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十分重视,而其“渊源所本”的中国,却在这方面毫无作为。不但大量古迹遭受破坏,就是少许调查研究工作,也都出于外人之手。于是他就确立了日后人生的努力目标和方向。半个世纪以来,他在教育和科研事业上的奋斗拼搏,获得了超出一般人所难以想像的成功,国家和人民为他创造了种种条件,也给予他许多荣誉:

1944年始任中学工学院院长兼建筑系主任。解放后,历任南京市、江苏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等等,并在1950年吸收他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在学术上的高度成就,是和他始终忠诚于自己热爱的事业,长期刻苦勤奋工作,以及一贯所持的严肃认真的学风分不开的。他反对浮夸虚假、华而不实、敷衍塞责、争名夺利的不正之风,提倡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踏实负责,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操,并以此劝勉别人,也以此要求自己。工作中能以身作则,带头完成任务及模范遵



戴济民、王兰西、罗生特、沈其霞、李一氓、陈毅、曹荻秋，1942年合影于盐城。

他，并详细征询病史，作全面的检查，初步诊断为良性肾脏肿瘤。经过对症治疗和相应的休息，病情得了控制。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恢复，罗司令员觉得大有好转并决定返回山东。临行前罗生特十分关怀地对罗荣桓说，您肩负重任，我不好留您，但目前您的病只是好转而不是痊愈，您最好坐担架回去，不要骑马，不然又会复发的。罗荣桓十分感谢罗生特的高明医术，激动地握着罗生特的手，欢迎他有机会到山东去。

鉴于新四军地区对敌斗争环境日趋艰苦，战斗激烈、频繁，为了罗生特的安全，军首长决定送他去延安总部工作。罗生特也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崇敬的周恩来副主席，便欣然同意了这一安排。二师卫生部长官乃泉同志

守章程制度；不独断独行，善于听取与接纳不同意见；不摆人师和专家架子，待人平易，大家都感到他是一位可尊敬而又可亲近的长者。他生前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在年节假日里，仍然伏案埋头工作。这种自外人看来艰苦和少变化的生活未免过于乏味，可对于他却是习以为常和乐在其中。而且也是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在科学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之一。

70岁的寿命对当前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时限。对于一位有成就的学者来说，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他作更多的工作和贡献。而达到这样一个水平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够企图的。因此，对于刘

负责为他北上作了准备：特地托人从上海购买了手提医用皮箱，用白漆写上“奥地利泌尿外科博士 Rosenfeld”字样，以掩护他经国民党统治区，取道重庆转赴延安。后来因为整个局势的变化，此一方案被迫取消，改为经由华北根据地去延安总部。为了便于罗生特开展工作，二师卫生部选派了几位精干的医生——手术室的李磊、病室的蔡和、化验室的夏汀三位同志组成医疗组，携带药品器械，随同罗生特北上。

罗生特一行于1943年6月离开淮南，乘坐小木船渡过波浪翻滚的洪泽湖，来到淮北地区。在途经四师时受到彭雪枫师长和卫生部长齐仲恒的热烈欢迎。师首长请求罗生特在四师留一段时间，以指导四师的卫生工作。罗生特接受了这一任务。1943年8月，四师召开卫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罗生特帮助他们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会议期间的一天夜间，驻地淮河堤决了口。报警的锣声，“河堤决口了！”的呼喊声，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眼看河水向村里涌来，人们奋不顾身地向决口的堤坝跑去，医院的人们到处寻找罗生特，谁知他早已跳入齐腰深的水中，和大家手挽手地筑起了一道人墙，堵住了堤坝的缺口。罗生特同志勇敢抗洪的行动，激励着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和当地的广大群众，并在群众中传颂着。罗生特同志救死扶伤的忘我工作精神，赢得了全体军民的崇敬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新四军里的白求恩大夫”。

1943年9月，在四师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正准备继续北上的时候，接到了彭师长传来的陈军长的电报，告知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同志肾复发尿血不止的情况，并请罗生特去山东为罗司令员治病。罗生特当即表示马上出发。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

老最后的际遇，不由得令人感到深刻的惋惜！1979年冬，为他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和追悼会，并将骨灰移送安葬于南京雨花台望江矶公墓。1987年又召开了《纪念刘敦桢先生九十诞辰国际学术报告会》，邀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参加。随后，又将他遗留的学术著作分期分批整理为《刘敦桢文集》四卷。全书收纳了除与其他学者合著的篇章，计有论文、笔记、调查报告、工作日记、书评、译文、信件等，共六十九篇，计一百万字，图片二千幅，现已经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责任辑 海 鸣）

一到山东军区司令部的当晚，就提出去看望罗司令员。他见到罗司令员时抱歉地说：“行军耽误了几天，让您多受折磨了，请原谅。”罗司令员感慨地说：“现在是战争环境，没有交通工具，只好两条腿辛苦罗！你们来得这样快，非常感谢！”经过几天的治疗和休息，血尿奇迹般地消失了。大家对罗生特的医术赞叹不已。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罗司令员必须回到司令部去，一边主持医区工作，一边休息治疗。罗生特一天几次去司令部看望罗司令员，保证了首长身体逐渐康复。后来根据上级指示，罗生特留在山东军区任卫生部顾问，一直到随同罗司令员进军东北。

在初到山东时，省参议会有一姓彭的女参议，因患乳腺癌前来找罗生特医治。经检查确诊后，决定为她进行根治手术。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此复杂的大手术，谁也不敢想象。但罗生特同志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甘愿承担风险。在黄农部长的配合下，成功地为人切除了癌瘤，并取得了伤口的第一期愈合。这一手术的成功，对当时参议会的统战工作影响很大。同年秋天，山东军区召开了庆功大会，罗生特应邀在主席台上就座。会议正进行时，有一位驻地的村长气喘吁吁地跑到会场，说要找一位外国大夫去救救一位难产妇女的性命。罗生特得知后，二话没说，带着随员飞快地来到产妇家中。这时产妇已呈现出严重休克的状态，胎儿的心音已听不到，但炕上找不到任何一件干净的东西可用。罗生特急中生智，把庆功会上发的奖品——一条白毛巾垫在产妇的臀下，很快地将死胎取出，终于保住了产妇的性命。当他清洗手臂时，突然感到头痛。原来在他急于挽救产妇性命时，由于行动急促，一头撞在门框上，当时也顾不得这些，后来才发现额部撞开了一道口子。

由于根据地环境艰苦，物质条件极差，这对罗生特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新四军首长对罗生特的健康很是关心，尽可能地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当时最好的伙食是馒头干和菜汤、鸡蛋等。为照顾他吸烟的习惯，给他增加了几块钱的津贴费。但罗生特对这些总是婉言谢绝，他说，我到新四军是为着消灭法西斯，不是为了享受。大家都能过，我为什么不能过！他始终坚持和指战员同甘共苦。在行军中，他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骑。部队发给他的津贴费，他节省下来给伤病员买营养品。由于工作劳累，生活艰苦，他那魁梧的身躯慢慢地消瘦了，但他却常说：“在新四军这支伟大的部队里

工作，为中国同志服务，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三、走向先锋战士的坦途

在盐城，罗生特亲眼看到新四军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团结紧张的战斗作风；根据地人民艰苦奋斗，生产自给，军民团结的朝气蓬勃的局面，使罗生特感慨万千。他在为军民服务的同时，还热情投入各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活动。他先后应邀参加了抗大五分校举行的“纪念‘五·卅’惨案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参加盐城参议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1941年5月，苏北文化协会在盐城成立，罗生特在会上作了《关于欧洲文化》的报告，他介绍了欧洲各国文化的兴衰史，赞扬了苏北文化协会成立的意義，他说：“我所见到现在的德国、意大利的文化，那是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文化，是腐朽没落的文化。在我的祖国奥地利也有一个叫盐城的小城市，虽然它很小，但却是世界有名的文化城。在那里，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文化活动，是世界艺术家活动的中心。但是被德国法西斯侵占后，那个城市随之冷落下来。”“而今天，苏北文化协会在盐城成立，新四军和苏北地区文化工作者、艺术家、名流从四面八方赶来，聚会一堂，共同讨论民主、文化、艺术发展的方向与措施，将盐城建设成苏北的文化中心。欧洲的盐城衰败了，中国的盐城在兴起，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苏北根据地的一切，使罗生特的心情无比舒畅，精神焕发，激情豪放。他作了许多歌曲和诗歌。在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晚会上，他兴致勃勃地演唱了自己创作的反法西斯进行曲《挺起胸，冲上前》：“莫要再彷徨，去把敌人消灭光！团结、勇敢、奋斗牺牲，流血莫回头。”

曲调活泼明快，铿锵有力，很受大家欢迎。在根据地的报刊上也曾发表过他的诗，其中一首《我们是中国青年》写道：“我们的血染红了中国大地，使这神圣的大地得到自由；多少年来我们曾和敌人搏斗，对着这联合进攻中国、消灭中国的法西斯国家，我们不依赖祖先的遗产，我们不怕死，我们是中国青年。”

罗生特的诗，他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歌声，激励着抗日根据地军民，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之中。

在新四军工作的三年中，罗生特与陈毅军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常在一起谈论新四军的斗争史，谈论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谈论欧洲革命和当前世界局势，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

方针、政策……。陈军长对局势的分析和精辟的见解，使罗生特深受教育和鼓舞，他常说：“陈军长是我最尊敬的好老师。”陈军长送给他一支比利时的马牌手枪，这支枪是1901年制造的，与陈军长出生年月是一个巧合，罗生特对此厚礼特别珍爱。在军首长的启发与卫生部领导的帮助下，罗生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经过两年多革命的实践，罗生特深深体会到，做一个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必须不懈地学习，提高政治和思想觉悟，从而产生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愿望。

经过几年敌后斗争的实际考验，1943年春，党组织根据罗生特同志的申请和他的实际表现，经陈毅军长和钱俊瑞同志的介绍，批准罗生特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从此，罗生特获得新的生命源泉。

四、壮志未酬身先逝 英雄业绩神州传

在与新四军指战员相处几年的日日夜夜里，罗生特充分地理解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人民军队，他常对人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象新四军这样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军队。”他曾计划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把新四军的一切告诉世人。他把自己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陈毅军长，很快地收到陈军长的复信：罗生特同志：

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奋斗为你所亲见，所身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

你计划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我渴望你的著作出版。我感谢你对新四军的帮助，更愿以同志的身份帮助你完成这本有意义的著作。现在我来答复你的要求，将我自己的历史简单地叙述如下，……

亲爱的罗生特同志，上面所说，是我四十一年来的全部生涯的概括。你如果问我有些什么经验体会，我总的答复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当他在党的领导下，与广大群众密切取得联系时，他就具备了无比的勇气与力量，坚定地与国内外的敌人斗争到底，去完成他担负的革命事业。

亲爱的罗生特同志，我的历史已经讲完，请你指教。

敬礼！

陈毅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于苏北盐阜区亭子港

1949年春，平津战役结束后，早被调到第四野战军工作的罗生特，经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体格检查，发现他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并有陈旧性心肌梗塞。医生告诫他要多加注意，以防心肌梗塞复发危及生命。多年来他明知自己有病，却一直隐瞒着，而始终保持着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完成党交给他的每项任务。面对罗生特这样严重的心脏病，四野首长决定让他随罗荣桓政委一起去天津疗养。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罗生特万分欣喜，他想，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战争结束了，建设一个新中国更是一桩不容易的事啊！我的祖国也已从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下解放了，我可以回奥地利去，动员我的老师、同学和友好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时也想和自己分别十几年的亲人见面，全家欢聚一场，罗生特在心里盘算着。一天，他终于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罗荣桓政委，罗荣桓同志十分赞同他的想法，并将他的愿望转报党中央。

在这即将远去的时刻，罗生特的思绪又回忆起战争的年月。自从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他随罗荣桓司令员北上。在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里，他被任命为总卫生部顾问。1946年下半年，罗生特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作为一个外国人担任人民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长，这在当时来讲是仅有的，他深感总部和党组织对他的信任。虽然战争环境十分艰苦，战斗频繁，语言不通，但是他迎着困难上，日夜奔波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1947年下半年，罗荣桓政委从苏联治病回国后，因战争环境劳累过度，肾脏病复发，总部急电要罗生特回哈尔滨。经罗生特积极抢救和精心调治，罗政委的病很快康复并一直保持病情平稳，这使罗荣桓政委能在接受治疗的同时，还能坚持领导东北的解放战争，罗生特每想到此总感到无限欣慰。他想到在和罗荣桓政委共同生活的六年里，和东北野战军（后称第四野战军）的六个春秋，产生了由衷的眷恋之情，依依难舍。

不久，党中央批准了罗生特的请求，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接见了，他，赞扬和感谢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并回忆说：“当年在盐城欢迎你，那是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敌后；今天在天津欢送你，我们已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要开始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这中间有你很大的功劳。”刘少奇同志一再称赞罗生特的国际主义精神，感谢他对中国建设的关怀。罗荣桓政委和夫人林月琴同

志还亲自到天津车站为罗生特送行。相处六年多的艰苦岁月，今天分别了，罗荣桓政委无限感激罗生特同志对他健康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他以亲切的目光，伴随着缓缓远去的列车移动着。送别了亲密的同志，尊敬的罗生特。

在去上海的途中，路经南京，受到第二野战军卫生部长齐仲桓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们是分别了九年的老朋友，今天在南京相会而由衷地高兴。齐部长盛情款待了罗生特同志，并陪同他参观了南京的医院，观光了南京的名胜古迹。

罗生特到上海后，受到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的热烈欢迎。陈市长高度评价了罗生特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贡献，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是白求恩式的大夫，向他表示深切的谢意。罗生特同志与老上级、老朋友、尊敬的老师重逢和对他的高度评价而思绪万千……

1949年11月，怀着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关怀和对自己祖国奥地利的向往，带着战斗的风尘，带

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美好的祝愿，罗生特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他走了，而与我们结下的战斗友谊，我们对他的思念是永远不会断的。

罗生特回国后，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他遇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欲返回中国又办不了出国手续和签证，壮志难酬！后来他的妹妹辗转给宫乃泉部长寄来一封信，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1951年5月，罗生特同志因贫病交加，含愤去世。逝世时年仅48岁。我们深为罗生特同志不幸遭遇感到惋惜，为失去一位亲密的国际主义战友而万分悲痛！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罗生特同志的！

（责任编辑 霁 明）

本文参照即将出版的《新四军卫生志》中李磊同志所写《军中的外国大夫——罗生特》一文改写的）

通贯金陵今古 纵览名城春秋

欢迎订阅《南京史志》

《南京史志》本着“以史资政，以志育人”，宣传、介绍、研究文化名城南京为宗旨，着重为编史修志征集资料；为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搞好城市管理、建设、古都研究提供阵地；为弘扬传统文化，介绍两个文明建设成就提供窗口，是立足南京，面向全国，具有资料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刊物。

主要栏目有：古都研究、石城变迁、史海钩沉、神州风云、人物春秋、三江揽胜、南京经济、金陵文教、科技踪掠、白下艺文、史志论坛、江东文物、建康风情、白门掌故等二十多个栏目，适合各层次读者的需要。

本刊为双月刊，逢单月10日出版，国内外发行。国内订阅：本刊发行部；国外订阅：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国内统一刊号cn32—1024；国外代号BM4186。国内订价每册1.20元，全年7.20元；国外订价每册人民币外汇券7元，全年42元。地址：南京市政府大院，邮编：210008

周镐策反孙良诚

——国民党第一〇七军投诚始末

作者：周镐烈士之妻

吴雪亚



人物春秋

1948年11月6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淮海战役。在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率部在徐州东北地区起义。同月13日，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一〇七军军长孙良诚，被迫率部及二〇六师共5800余人，在江苏省睢宁县西北投诚。孙良诚之所以投诚，是处于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临城下，是由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中共秘密党员周镐的忘我工作的结果。

身在敌垒 向往光明

周镐又名治平，道隆，继文。湖北省罗田县人。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生于1909年。于1949年1月5日，周镐奉命赴敌区——蚌埠策反国民党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不幸被捕，于1949年1月21日，在南京光荣牺牲，终年40岁。

周镐为人耿直，富于爱国心和正义感，目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与不公正，内心忿忿不平已久。1943年，他任国民党军南京潜伏站少将站长时，适值好友、又是同乡同学（黄埔军校七期）徐楚光来访。当时，徐受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领导，以南京为起点，进行情报策反工作（徐于1948年10月9日在南京遇难）。两人交谈至诚，畅所欲言，交谈中，周镐对当前社会时弊，啧有烦言。对蒋介石打内战也很反感，而对共产党英勇抗战事迹，流露敬佩之情。徐楚光深知周之为人、思想及处境。希望他弃暗投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主要是搜集情报和策反任务。由于抗战时周镐与徐楚光一度曾携手抗日，也知徐的政治身份，加之周镐早年在军校时接触过左倾思想，对共产党，并非一无所知，而身居军统多年，则又屡遭磨难。经过深思，周镐接受任务，又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工作上则建议先从国民党暂编二十五师师长孙良诚部着手。徐楚光欣然同意。不久，徐楚光返苏皖解放区向华中联络部（部长杨帆、副部长陈同生），分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兼社会部长谭震林分别作了汇报。经分局书记、政委邓子恢和谭震林批准，吸收周镐为情报系统的特别党员（后为中共党员），并委任他为联络部第三工委京（宁）、沪、徐、杭特派员。从此，周镐走上了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革命道路。

1946年8月，徐楚光在上海分别召见京、沪一带秘密工作人员布置工作，并代表华中联络部向部分人员颁发委任状。13日，经徐函约周镐到了上海与徐晤谈，拟定了工作计划，并提出请上级拨给工作活动经费一十万元或盐一千担，要求以陈毅军长名义颁委周镐为京沪人民自卫军司令。

事后，周镐在日记里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与我当有同感，乃商议到解放区工作，正好徐祖芳（楚光）同志来函相约，恰到好处，得到成功。”

周镐为掩护工作，向保密局（1946年10月，由军统改名保密局）。提出到上海静安寺搞佛教训练团，经毛人凤同意，任命周镐为少将直属组长。他利用这一身份，来往于京沪之间。

周镐在革命道路中勇往直前，虽经曲折，艰难险阻，但他毫无惧色，他曾对知友说过：“为了抗战，为了革命，杀头也要背上一背！”他数次被保密局关押审查，在第二次被关押前夕，按预定计划，于1946年8月28日，周镐与谢庆云（孙良诚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中共秘密党员）前往宿迁前线孙良诚部进行策反工作。回京后即被保密局逮捕，关押在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监狱）。

几经波折，最后利用了人情关系，保密局也查不到周的任何实据，释放了周镐。

利用时机 抓紧策反

1947年夏天，周镐奉蒋介石手谕，调查孙良诚“私通共军”问题。有关当局并任命周镐为一〇七军高级参议。周赶到宿迁孙部，借机做孙良诚工作，以促其走上新路。叙谈时，周向孙出示了蒋介石手令，孙一见色变，知末日来临，遂决断求教于周。周暗示通常的求生之路已难，孙再三问计于周，周才对孙说出：“看来，只有起义投共，以避祸求福，其他似无更好活路。”孙为脱身求生，就接受了这个方案，要求周从中促成，又提出要1500两黄金，作为军官家属的转移费用。周镐表示，可设法托人向解放军方面转达此意。

7月，周镐就调查孙良诚事回京复命，一面上报孙的问题，查无实据，为之缓颊；一面即与郭润身（原三工委副主任，后改六工委）晤面，汇报策动孙的经过。后郭就带栗群（政治交通）回苏北解放区向陈丕显等领导请示，经华中工委请示华东局。9月下旬，组织上批准拨给黄金500两和棉花等物资，作孙部反正的经费（后因孙良诚的变卦而作罢）。

10月10日，周镐再次奉蒋介石之命，又到宿迁，调查孙良诚私通民革李济深的问题。周镐向孙良诚指出：“蒋介石对你十分怀疑，跟国民党走已无出路！要坚定起义的决心。”并告他至于起义的经费一事，已托人向解放军联系，一有佳音当告，起义的日期、地点可候通知。周镐返京，又以“查无实据”掩饰过去。

正值策反工作进展顺利之际，徐楚光的交通吕祥瑞（系三工委地下工作人员）联系孙殿英旧部时被捕叛变，供出周镐、栗群与徐楚光的关系。（9月份，徐楚光已在武昌不幸被捕）。

1947年12月30日，周镐再次被关进宁海路19号工监。周自知这次入狱不比前次，恐无生望。决心拚将一死，与敌人周旋到底。不久，栗群从解放区刚回南京的当天亦被捕，与徐楚光、周镐同关在宁海路监狱。敌人轮番对他们刑讯逼供，甚至押着与徐楚光对质审讯，徐楚光坚决否认与周、栗有任何政治关系，只承认与周镐系同乡、同学，在伪军委会共事，周栗二人也坚不承认彼此间和徐楚光有任何政治关系，所幸吕祥瑞并不认识周镐，也不知周所负工作，而栗群则一口咬定是做汽车生意的，几经审讯，毫无结果。1948年3月，当局以“密报不实”和诈降罪处决了吕祥瑞。周镐由黄逸公等三名处长保释，栗群亦释放。

同年4月，罗纳（真名为张铁平，随徐楚光去湘鄂地区工作人员，原三工委的秘书）在武昌被捕叛变，供出徐楚光在湘鄂组织民主联军和所领导的工作人员名单，还讲到周镐、唐生明等。此时，黄逸公去郑州、武汉视察，获悉了罗纳案之概况。黄归宁，适周前去黄家往访，闲谈中，黄向周透露了罗纳被捕并告徐楚光名单上有周和唐生明等名字，建议周要争取立功，自己上门找毛人凤把问题说说清楚。周听后暗暗吃惊，辞别回家已深夜，即把我叫醒，骑车去栗群家，嘱其来我家共商转移计划，免再一次遭难。次日傍晚，周镐以送我回娘家为名（我已怀孕）带了儿女和栗群悄悄地离开了南京，从徐州抵宿迁，先住孙良诚部。

在宿迁期间，周镐继续做孙良诚的工作，希望他速下决断率部起义。但孙答应保证周镐等人员的人身安全，反正一事，只说得考虑，意在拖延观望。

此时，六工委的地下工作人员张企中、王振华等，由郭润身率领由徐州转移至宿迁。

宿迁在解放前夕，孙良诚率部仓忙逃离时，委周镐为宿迁城防司令。周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尽力

促使该城免遭破坏；并保护了仓库和部分枪支弹药等物资。

孙良诚被迫投诚

1948年9月初，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书记陈丕显接华东局指示，嘱周镐继续做策反孙良诚的工作。29日，他抵达商作，致函陈丕显汇报，预备与孙良诚、王清瀚（镜波，一〇七军副军长兼二〇六师师长，中共秘密党员）公开洽谈起义计划。10月5日，陈丕显指示周镐：“孙部尚未成熟，起义宜缓不宜急。”周镐就致书孙良诚，晓以利害，望孙反戈。周在信中写道：“目前时局，望公洞悉。济南已下，徐州垂危。为我人民，均赖我公机先胜算，尽速决定。巨潮所至，固莫可御。去年双十危机，诚当奉为前车，万乞我公及时警觉，勿为不仁不义者所再坎。晚以忝沐知遇，故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出自至诚，绝无私念，谅为我公所垂察焉！更请速派妥人接引，俾晚面陈一切。”6日，周镐等抵宿迁，又修书给孙良诚相约在睢宁战场率部起义。

这时，蒋介石获悉周镐在前线活动，遂令国防部通令缉拿，派国防部二厅蒋振华率领约30人，散布在睢宁——商作一带，密访缉捕周镐。面对险情，周镐当然知之，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垂死的贼人，尚图最后反噬，殊堪一笑！”

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南京政府面临崩溃之际，蒋介石为笼络人心，对杂牌军将领频频封官许愿，10月蒋委孙良诚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一〇七军军长，属下军官提升一级，扩编孙部，给钱、给武器弹药。孙利欲薰心，反复无常，再不谈起义之事，并把周镐派去的联络人员打发回去。10月29日，周获悉这一情况后，在日记里忿然写道：“他（指孙良诚）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终身走狗之业，夫复何言！前以时机和时间相嘱托，今日升官发财，就有小儿得饼之乐；殊不知加官晋爵，即进坟墓之时。我的友谊立场已尽，它日如何，乃自找也。”由此，周镐折返谢河待命。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揭开战幕，为瓦解敌人，8日，陈丕显电示周镐，立即赴孙良诚部争取其起义，最低限度也得中立。11日又电示：希望能使孙部于此起义。周镐接电即率领同志，直奔睢宁，待赶到，孙部已于12日上午仓皇自睢宁向徐州逃逸，逃至睢宁城西高集附近，即被我江淮地方武装当头截住，孙部曾几度夺路，均归无效，当日仍被华野二纵五师将孙部军部和二〇六师包围于睢宁城

西北邢圩子、大王集一带。

当日下午，周镐等抵达邢圩子，包围孙部的五师已进入战斗位置，但仍未放弃争取其投诚，乃由周镐写信给孙良诚，给予最后一个机会。但周镐不顾个人安危，越过前线进入孙部，对其晓以利害，敦促孙放下武器，但孙不责己食言，反而要求按起义部队对待。周镐即严肃指出：“原谈全军集中睢宁，然后通电起义，可你却背信弃义，率部西撤徐州，这能怪谁？现你部已被解放军包围，再谈起义，为时已晚矣！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

为策反孙良诚事，周镐曾与王清瀚多次秘密联系。在10月25日，周镐派交通送给王清瀚一封密语信，写道：“现在生意一定很难做，……阿嫂甚念，……魏家的姑娘大了，催着结婚，这个年头，做父母的当然想了却一段女儿姻缘，横竖都拖不下去了……还是早到一堆的好。”王接信后，加快了工作步伐。王清瀚按照周镐指点，积极行动。他利用开会的名义，将一〇七军军部和二〇六师全体团军官加以软禁，使孙良诚陷于完全孤立。

当晚7时，周镐陪同孙良诚乘坐吉普车抵五师指挥部，与五师政委方中铎共同对孙做了细致的工作，晓以利害，孙处此形势下，才亲笔签署令其所属各部“放下武器”的命令。

13日上午12时，孙良诚留师部。周镐与方中铎政委一起前往邢圩子接收孙部，周镐将孙的手条交一〇七军参谋长杜辅廷宣布：“放下武器”。通过周镐、王清瀚等人紧张工作，将孙部一〇七军军直所部，营及工兵营，汽车大队，所属二〇六师计5800余人，接收完毕。周镐在日记中写道：“是时，千军万马忙得不可开交，两天两夜未成眠。”这次孙良诚投诚，我军接收的武器及物资：六〇炮二十七门，山炮五门，汽车二十七辆，骡马八十匹，汤姆式二十五支，轻机枪二百二十一挺，重机枪九十二挺，手枪数千支，步弹三十万发，炮弹八百发，步枪三千六百九十四支，掷弹筒五十三个，迫炮二十三门，电讯材料甚多。

华野二纵四师，在双沟西北二十公里处郭集、观音堂，追上了一〇七军的二六一师主力。交战中，在我强攻下，该师溃不成军，终于被四师歼灭，俘敌两千余人。

11月15日，在宿迁县城，陈丕显听取了周镐的汇报，同周镐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19日，陈丕显经人转告周镐，希望与孙良诚、王清瀚策动刘汝明部起义（刘为国民党八兵团司令官，该部驻徐州、

蚌埠)。

1948年11月26日,中央给华东局、华中工委发来一份电报:“指示对刘汝明部开展策反工作的重要性”。周镐亦于此日动员孙良诚和王清瀚分别写信给刘汝明、刘汝珍兄弟。次日,周镐持信径见中共江淮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曹荻秋、司令员胡希明汇报,随之由曹派人将孙、王写的信送往刘部。12月9日,周镐派祝元福(中共党员)、尹燕俊(孙良诚亲信副官。解放后,改名尹桂均,匿居老家建昌县,文革期间,经群众检举,被捕判刑。)将孙写的第二封信送往蚌埠刘汝明部。不料孙良诚佛口蛇心,行前私下对尹说,你跟我多年,我没有亏待过你,我想逃出解放区,但无法脱身。明天,你去刘司令官处送信,请他口头答应起义,并提出派人到蚌埠去接洽,直接让共军派我参加谈判,把我弄出解放区,我写的信是敷衍共产党的话,是假的,救我出去,才是真的。

刘汝明诈降 周镐牺牲

祝、尹二人赴蚌埠后,周镐亦同随军工作队自宿县北的谢庄,抵达新解放的固镇。21日,尹携刘汝明信返回。刘信中云及:“关于起义问题,愿作考虑。即请贵方派出代表来我处谈判。”周得信后,即向曹荻秋等领导汇报,要求把孙良诚、王清瀚接到前方,为磋商与刘汝明部的具体谈判问题,周镐派尹来去解放区与蚌埠之间,尹复借机为孙良诚、刘汝明双方暗传诈降密信。

1949年1月初,周镐等已前至怀远县唐圩、陈圩。周镐在新年开笔的日记中写道:“今年的中心工作,首在摧毁蒋介石,消灭军统局。这样,天下始可得到太平。”

1月4日,祝元福、尹燕俊从蚌埠回来,陪同国民党三三五团团长刘铁均(刘汝明之子)为代表到我防地,转达刘的“起义诚意”,要求起义事及早进行等,提议要孙良诚与党代表同去蚌埠,面商具体事宜。

周镐过分相信私交的感化力,失去了必要的革命警觉,毫不怀疑刘铁钧之所以来我区完全是诈降手段。5日,周镐、孙良诚、王清瀚偕祝元福等一行13人前往蚌埠。下午他们渡过淮河,一进入刘部田家庵刘铁钧团部,周镐与祝元福即被武装特务扣留,随之押解南京;同日,王清瀚及其警卫员刘彦锡被骗至蚌埠“徐州剿共”被扣,后解至南京。在南京的谢庆云也在同日被捕。他们都被关在宁海路保密

局监狱。王、谢二人后被解押上海市保密局看守所。二人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敌杀害。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被迫下野的前夕,手令将周镐裁决。保密局派其六处处长李希成在监中执行,周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被击二枪,英勇就义,他用鲜血实践了自己:“十死余生,以尽全力为革命而奋斗”的诺言。后祝元福亦光荣牺牲。

1949年1月8日,南京各报均刊出如下消息:“中央社蚌埠7日电,徐州会战被俘之孙良诚军长与王青汉师长,于5日由睢宁匪区脱险抵蚌,晋謁刘峙总司令,报告脱险经过及匪区情形,已于6日转京报告。”中央社把降共人物,吹捧为反共“英雄”,目的为蒋军打气,力图稳住阵脚。孙良诚为此起了宣传作用,他出卖了众多的共产党员,换来蒋介石赐他一顶上将参议空衔与金钱,但在国民党临到总溃逃时,却把孙良诚全家又扔在上海(解放后,孙良诚在上海被捕,后死于山东战犯管理所)。

徐楚光、周镐、王清瀚、谢庆云、祝元福,英雄人物,是英勇顽强,为国光荣牺牲的烈士!你们的功绩,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授予光荣称号。庄严肃穆的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陈列着你们的遗物、悬挂着你们的遗容,永被人们的瞻仰和吊祭。

(责任编辑 霁 明)

《方志管理学》出版发行

《方志管理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方志管理的学术专著。该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新方志理论和现代管理科学原理,以方志编纂工作管理为研究对象,针对修志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分十二章近百个条目进行理论概括。书中吸收了国内50多个修志单位的方志管理的先进经验和一批燕居谦式的方志工作者的业绩,对各级修志领导和各类志书的编者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均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该书由李明、薛兴祥著,25万字,精装,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每本6元,邮资另加10%,欲购者请将款汇至南京市中山北路101号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方志管理学》发行组。

长征途中的彭德怀

● 陈靖

编者按：红军老干部陈靖同志，历时 21 个月，重走长征路，在他的调查笔记中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长征途中的彭德怀”，即是其中之一，现节载如下。

虎口呈策

“虎口”村，属湖南郴州地区嘉禾县。据说这里是彭德怀当年勇向中央第一次呈策献计的地方。一方面军的几位同志说过：彭德怀好提意见，并且从来都是单刀直入。有时甚至说话还很不客气，因此一些很好的建议也容易让对方不悦。人们说，彭德怀这张“刀子嘴”是全军有名的。

但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彭德怀在虎口向中央军委提意见，却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冷静。他将自己的设想反复推敲之后，在笔记本上绘制了行军路线及叙说了他设想的若干理由。然后才向中央陈述。他回顾、总结了二十多天来的“西征”（即指长征，开初均称西征），仔细分析了中央红军目前不利的处境及其形势，最后提出了红军前进的方向和路线。

彭德怀的这一建议，在长征史上是不应忽视的。

因为西征已近一个月了，撤离中央苏区的红军无时不处在窘迫之中，他们事前没有准备，沿途没有补充，匆促进军，不知所往。三军团虽然拿下一个县城，也实在可怜得很。这个巴掌大的县城，便是江西崇义，实际上不如说是个小山村。当地人形容说：

山窝窝里一小县，只有三家豆腐店；衙门里头

打屁股，全城上下全听见。

据一贯搞参谋工作的彭寿生同志回忆。红军进崇义城的情景，仿佛一切都历历在目。那正是秋收时节，可是全军团连做一顿饱饭吃的粮食，也筹集不到，没有法子可想，战士们只好上山摘山葡萄充饥。

彭德怀对这种“今天不知明天事，上顿不知下顿粮”的西征处境。十分忧虑，他那一不易展开的额头，蹙得更紧了。根据他的经验，他认为必须尽快改变，也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当时面临的情况很清楚：中央红军已经突破了蒋介石设置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虽是预先设置的。但主要是为了阻止红军进入广东，并非专门为了对付红军的西征。红军原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并订有五项协议，只要红军不进攻广东，陈济棠即保证让红军全部过境。但中央领导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工作，以致耽误了时机。其他所谓防线，蒋介石同当时的红军领导人一样，心中也无数。他匆促设置而成的所谓防线，也是经不住一击的。红军过了第二道防线，蒋介石才匆忙部署第三道防线，且兵力不足，九峰圩仅驻了一个团，连一个堡垒也没有筑起来。当红军一部分进入湖南，围住宜章时，当地群众纷纷起来欢迎红军。三百余名筑路工人，自动赶来帮助红军修工事挖坑道，城内敌人遂弃城而逃。11月11日，红军大队到达，城门大开，根本未遇到任何抵抗。在彭德怀眼里，这时的敌人，只不过如他面前的“老虎口”一样，是个死家伙，可以听由红军摆布；但如果红军不能智胜敌人，随意乱

碰，也会被碰得头破血流，身陷真正的虎口。

彭德怀伫立在虎口村外的岩石上，西眺北望，冥思苦想。他的前面是湖南同广南交界的苍梧山脉，同越城岭连成屏障，山大路小，崎岖狭窄，对中央红军这样庞大的“搬家队”说来，行军极为不利。他回想起由崇义到虎口村这不过五六天的路程，红军却用了十二天的时间。这样的走法，简直无异于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让自己陷于“虎口”的被动地位！

彭德怀不幸而言中：蒋介石这时候正忙于调兵遣将，组织他的“追剿”军总司令部，下辖五路兵马：湘军为第一路，薛岳为第二路，周浑元为第三路，李云杰为第四路，李韞珩为第五路。蒋介石飞到湖南，对他的部下们说：共产党的三大赤区已悉数荡平。下一步就是把从赤区溜走的红军主力全部吃掉。……他对中央红军的前途说了十二个字：“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彭德怀从来没有把敌人说成是豆腐，一打就垮，一捏就碎。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从来就是猛虎，只是丢掉了苏区，这“猛虎”才被赶下了山。

彭德怀的忧虑有理。长征对谁来说，都是新问题。他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必须面对实际，认真总结教训，果断作出决策，在巨浪中快速拨正航向。他面对潇水湘江，坦率地谈了他的意见。彭德怀主张：西征军应在此速向北转，把矛头指向长沙、洞庭湖和武陵山，以便打乱蒋介石的计划，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具体的意见是：三军团马上北越衡山，向湘潭、宁乡和益阳方向大踏步挺进，灵活抓取战机，消灭弱小之敌，鼓舞我军士气，惊动湘中，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部署。中央纵队则率其他兵团，向其左翼挺进，争取占领溆浦、辰溪及溁陵一带，选择时机，开辟新的根据地。必要时还可以向湘西山区发展，因为那里有红二军团两年前奠定的根据地基础。他一再说明：切不可把矛头指向同蒋介石有尖锐矛盾的广西军阀。

彭德怀力主北移争取的这大片土地，有一个共同特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在那儿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群众条件不错，物资也颇为丰富，离江西、湖北和贵州、四川边界都不算远，伸展得开，也收缩得拢，对战略性的攻和防都具备良好条件。这就是有人用诗所表达：“衡岳系粤桂，洞庭扣云梦。一线串中原，指日九州同”的这片土地的战略意义。

两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总结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谈到中央红军的一个出路或去向时，同

彭德怀虎口呈策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

可惜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听了彭德怀的建议。却不以为然地说：“好吧。应当相信中央运筹全局，会有稳妥决策的！”

然后，他们把彭德怀打发走了。李德看着彭德怀逐渐远去的背影。说了一句话：难怪有人说，彭德怀是个好提意见的人。不过，他今天嘴巴还干净。

他们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作战部队仍然作为轿夫被捆在中央机关这乘“大铁轿子”上，继续磨蹭，坐失战机，待敌人合围已成，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苍梧山如同鬼怪般横在红军面前，潇、湘二水向北流淌，老虎嘴也张开了，红军处境极为险峻。1934年11月28日起，在桂林地区的湘江两岸，发生中央红军长征中最大、最激烈、最悲壮的拼杀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而都不愿提及的湘江之战。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红军，经历时七八天的湘江一战，只剩下3万余人。

宽广胸襟

枪声阵阵。夹杂着城下民房倒塌的声音。西康会理城下，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战，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也在这时召开了。

这是1935年的5月12日，在一个名叫铁厂的村子里。一阵骤雨过后，山水草木绿溶溶，空气异常清新，油菜和蚕豆开始成熟了。

会理会议，比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都开得轻松、顺利和团结。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凯丰与刘少奇（据彭德怀回忆：刘少奇未参加），还有一、三军团的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工作，确定红军北渡金沙江后的行动和任务，同时阐明中央军委机动作战以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确定了北上至川西会合四方面军的任务。会议从下午2时左右直开到晚上，时间短，却很圆满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会议之前，在攻打会理城的过程中，彭德怀同他的政委杨尚昆，根据渡江之前中央“入川建立根据地”的根本方针，以及渡江后攻打会理不下的实际情况，再次向中央建议：放弃会理，派部队迅速北进，控制大渡河要寨，以便会合四方面军。也就在这时，中央召开了铁厂会议。会议研讨的主要内容，同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是一致的。

可在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意外的问题。有一封信



“出师未捷身先死” 的 “上将军”

——辛亥革命烈士赵声事迹述略

● 许亚洲 新 芬

赵 声

在辛亥革命中，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革命烈士：如著书警世，蹈海殉国的陈天华；吹响战斗号角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被孙中山誉为“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陆皓东、“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的史坚如；惨遭剖心的徐锡麟；……在无数烈士中，有一位百折不挠、屡策起义，但却一直未有机会施展身手，最终被病魔夺去生命而死不瞑目的勇将，他就是被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为“上将军”的赵声。

赵声，原名毓声，字伯先，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大港镇人。生于1881年3月21日（清朝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即民俗中“百花生日”（阴历二月十二日）前夕，故号“百先”（注：赵声出生年、月、日，众说纷纭。本文的年份依《中国近代史词典》；月、日依照赵声《己酉初度寄友》诗。“己酉”即阴历二月十一日，恰在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前夕，

与赵声的号“百先”之含义相符。），又别号“雄愁子”，寓意忧国忧民。

赵声的父亲赵蓉曾，热心教育事业，在家乡开办“天香阁”学馆，培养出许多人才。有的贫家子弟受其资助而日后成大器。赵声的母亲善良好施，临终仍勉励赵声做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良好的家教对赵声的成长影响很大。

赵声自幼随父读书，8岁便能作文，被乡人称为神童。他在9岁时应童子试，因字体不佳而未能录取。从此他发愤习字，13岁时就以善书而闻名一方。他在课余拜圆山寺一位老僧习武。他身材魁梧，见义勇为，14岁时曾只身闯进镇上的巡检司，砸开枷锁，解救出一位无辜的乡民；他还曾于闹市中严惩一伙调戏少女的恶少；荣获“豪侠少年”的美名。赵声于17岁时考中秀才，亲友和乡邻纷纷道喜，他出言就不同凡响：“大丈夫当为国宣力，区区一秀才何

在传阅。这是林彪致中央军委的。信的内容，同彭德怀的意见一致，即迅速北进，控制大渡河渡口。不同的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整个大计，请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争取尽快同四方面军会合。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把它递给杨尚昆。杨一看很惊讶，觉得此事应在会上提出讨论，用信件的形式传阅，容易造成误会。可是彭德怀却满不在乎。彭德怀是一位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大概不会把问题想得那样复杂。而林彪建议他担任前敌指挥，也激不起他的兴奋，他或许会觉得责任更重要。总之，他没有推辞。实际上，早在江西的时候，一、三军团常协同作战，有时候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候三军团指挥一军团，这种情况是经常存在的。最

著名的二上娄山关，全歼敌人三个团，俘虏敌人两千的二次遵义之战，就是三军团指挥一军团，彭德怀指挥林彪。此役是一方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最后一个这样规模的胜仗。这种互相指挥已经成了一方面军的好作风、好传统。可是当时军委主要领导看了信后，颇不满意，认为：“林彪同志的这封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一向好发火的彭德怀，竟然十分冷静，既不申明，也不解释。事实上，林彪写的那封信，彭德怀的确事前不知道。而彭德怀的建议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彭德怀虽然被误解，但他并无怨言，事后仍然与中央保持，一如继往，有好的主张还是照常向中央提出。这种豁达的胸襟实在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 弄明）

足言。”后来他到镇江、苏北等地游历，寻找个人前途。前途未找到，却亲眼目睹了处于清政府水深火热统治下的民间疾苦，激励了他救国救民的壮怀。

约在1901年，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招生。赵声闻讯，慷慨而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吾当为班定远（汉代的班超），岂能于墨汁中求生活！”遂投笔从戎，报考这所军校。考试结果，赵声名落孙山。他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吾岂无军人资格邪？”他准备打点行装返乡。恰巧有个候补知县沈韵锵听说赵声的文才，聘请他来教家馆。赵声觉得留在南京可以增长见识，于是应聘。但沈是个顽固的旧官僚，和追求新思想的赵声格格不入；再加上沈家子弟不爱读书，不久赵声便辞去教职。他又投考江南水师学堂，以第一名录取。他入学后，“性和蔼，同学多乐亲附，与谈议，辄惊四座。”同学们遂推举赵声为代表，与校方交涉改革校规章程。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赵声一怒之下，自动退学，寄居猫儿山一小庙内自学。赵声因此举而在南京学生界赢得了声望，学生们纷纷来探望他。一次，赵声为附近的江南陆师学堂的一位学生代笔作文，被学堂监督俞明震得知。俞十分赞赏赵的才华，特许他入校插班学习。

赵声在江南陆师学堂，“文章风义冠绝于堂”。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刚传播到江南地区，赵声读了许多鼓吹革命的进步书报，激动地说：“此吾腹中所欲言，不图竟有先我而发者。”他还与同学们推心置腹地畅谈人生观：“我辈今日痛痒求学，岂为官禄富厚来耶？乃预备他日手拯神州，出之茫茫巨浸中，使复见青天白日耳！”一些同学受他的启发而觉悟。赵声在校中结交了章士钊、卢润州等进步同学。

赵声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后，于1903年赴日本留学，希望深造军事。在东渡的海轮上，他对同行的同乡好友柳诒征说：“生平最佩服孙文。”表达了自己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之情。赵声到日本后，结交了黄兴、何香凝等革命志士。当时日本当局与清政府勾结，禁止留学生私自入军校学习。赵声入学不成，便和黄兴常去观摩日本士官生的操练，还一道参加东京的射击比赛。他俩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赵声在日本期间，还努力学习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

不久，赵声抱着“革命贵实行耳，居日本何为！”的宗旨，从日本回到故乡。他“痛民智之闭塞，思有以启牖之”，利用父亲办学馆的“天香阁”老楼，

创建“阅书报社”，传播新知识和革命思想。他书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阅书报社门上：“纵环海奇观，开普通知识；藉大江流水，涤腐败心肠。”他还创办了小学堂、体育会。在受他教育和影响的进步青年中，有些后来成为革命志士，如冷遁、李竞成等人。

赵声在家乡开展了一段时期的革命活动后，应聘到南京的两江师范学堂任教。在此期间，他秘密创作了唱本《歌保国》。这是一篇类似民间小调的文艺宣传品，全文共134句，每句7字，共938字。歌词以通俗易懂、一针见血的语言，义正词严地控诉了满清王朝专制压迫和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固本亲饷年年复，大半同胞买命钱，民脂民膏吃不了，圆明园又颐和园。……苛政淫刑难尽书，九幽十八狱何如！……把吾土地媚群凶，欧美环伺恣分割，外洋又复逐华工。”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众志成城起义兵……不为奴隶为国民……野蛮政府共推倒。”主张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修明宪法参英美，共和大国长交欢。”章士钊秘密印刷了数十万份《歌保国》。有位湖北人曹工丞把这些《歌保国》装入大口袋，顺长江步行千里以远，沿途散发，起到了很大的鼓吹革命的作用：“一时长江上下游之兵若匪（指会党），人手一纸，习其词若流……”这篇以诗歌形式表达的资产阶级革命宣言书，堪与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相媲美，对唤起民众投身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直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的1911年10月5日，《民立报》还刊登了这篇战斗檄文（《民立报》一度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机关报）。

1903年秋，中国爆发了拒俄运动，以抗议沙俄军队侵占东北。赵声与从上海潜来南京的章士钊组织了南京的拒俄运动。9月的一天，两江师范学堂和江南水师、陆师学堂等校师生及人士数千人，齐集北极阁开会，为全国运动带了个头。在这次集会上，赵、章倡议组织义勇队北上抗俄，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会后，赵、章被两江师范学堂总教习缪小山举报，地方官准备逮捕他们。章、赵分别逃离南京。赵声去长沙实业学堂任教。

不久，袁世凯扩建北洋新军。赵声觉得这是打入军队、伺机策反起义的好机会，便辞去教职，赴保定投军。岂料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已掌握了赵声的底细，表面委赵声办文书，实际上形同软禁，并准备罗织罪名，下手剪除。赵声便巧妙地逃离了樊笼，到天津，进北京，出榆关，游东北，沿途察看形势，以便日后有所作为。他结识了奉行暗杀主义的革命

志士吴樾，二人在保定酒楼上痛饮，互倾英雄肝胆，谈论起暗杀和军事起义的难和易。分别后，赵声赠诗吴樾：“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临行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吴樾深受赵诗的激励，毅然于北京车站谋刺出洋考察的清朝五大臣，不幸未成功而成仁。赵声为之极度悲痛。

1905年秋，北洋新军在河北省河间县举行秋操，赵声又打入军中任教官。但这一次的努力策反又失败了。不过，这使赵声增长了军事才干。他说：“自学陆军以来，经验此一次秋操，始觉确有心得，知学校中所学不实地练习，不可尽恃也。”他回到南京，恰逢新建的南洋新军急需军事人才。赵声经友人推荐，任督练公所参谋官、江阴新军教练等职。当时有了道员郭人漳，投机钻营革命，好结交革命志士。赵声也被他迷惑，与他订交。不久，赵随同郭调任广西。赵声想在广西发难，但由于广西官吏防范严密而难以策反。不多时，在南京任参谋官的同乡好友陶骏保给赵声传去了南洋新军扩征的消息，并请赵返宁。赵声回到南京后，任暂编南洋新军第9镇17协33标2营管带（营长）。由于赵声回家乡广泛动员热血青年入伍，“故第9镇兵士，镇江人最多，而文明为全国陆军冠。”在镇江籍的子弟兵中，有赵声的昔日同窗好友、后为光复镇江和南京立下汗马功劳的李竞成，以及赵声的两个弟弟赵念伯、赵光。赵声因征兵有功，被第9镇统制（师长）徐绍桢提拔为33标标统（团长）。

1906年初（一说为1905年冬），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派安徽支部盟主吴咏谷到南京。吴先与柏文蔚、胡维栋、龚振鹏等“岳王会”（秘密革命团体）会员联络，在鸡鸣寺秘密吸收在宁的“岳王会”成员加入同盟会。以后又通过柏文蔚，发展赵声入同盟会；还推举赵声为同盟会“长江（流域）盟主”（一说为苏皖等5省的盟主），并报同盟会本部，得到孙中山的批准。同盟会“遂组织机关于鼓楼之东某宅（一说在仪凤门内）”，“使卢君镜寰与孙逸仙（孙中山）先生互通消息。”经赵声等人的努力，南京的军内外革命队伍后来发展到2万余人。

赵声推行“军事救国”的方针，“首重军人精神教育，以养成兵士革命思想为第一要义”。他在珍珠桥营部设“阅报社”，向官兵灌输进步思想和文化知识，并在三牌楼标本部建立了“俱乐部”。赵声创作了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军歌：

“散步散步江南道，一幅画图位置英雄好。钟山如龙城如虎，长江匹练西北来环绕。绿杨夹道杏满城，锦绣江山锦绣何能较！国家恩我恩无限，生此带砺以慰我怀抱。吾侪何以报国家？愿将赤血染上青青草！”赵声还以历史来启发官兵的觉醒，常于星期日率部至明孝陵，对着明太祖像，“演说有明兴亡及满族凌虐事。言至痛心处，常放声大哭，闻者无不堕泪。于是兵士皆知祖国之仇，……誓以死从烈士起义。”

正当第9镇新军官兵的革命情绪逐渐高涨之时，革命党人的死对头端方来南京接任两江总督。有的同志向赵声建议，待端方接印刚上任时立即起义，打他个措手不及，杀掉这个镇压革命党人的刽子手。赵声冷静地分析了局势，认为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此时不能轻举妄动。

端方上任后，抢先下手，一心要把南京的革命扼杀于摇篮之中。他得知赵声的部下出于义愤，放火焚烧了玄武湖神庙中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的画像，就想借此追究、兴大狱。后经第9镇统制徐绍桢劝说才罢休，但坚持令赵声退役。由于赵声平日与士卒共甘苦，深得官兵拥戴。分手时官兵相队相送，皆泣不成声。赵声安慰众人道：“丈夫胡作儿女态？将来共事之日正长。幸各自勉，勿忘我言可耳！”说完，他自己也情不自禁。赵声虽然离开第9镇，但他传播的革命“种子”已在军中“生根”、“发芽”。以后，新军第9镇在辛亥革命光复南京之役中作出了贡献。

赵声去职后，一度逗留南京。他与著名革命文人、“南社”主要成员苏曼殊结下了莫逆之交。两人常借酒抒怀。赵声酒量似海，苏曼殊则大嚼南京板鸭。醉后，两人常跨鞍绕南京城墙飞驰，一时被南京人誉为壮举。两人泛舟玄武湖上，齐唱赵声所作的那首豪迈的军歌。两人同游镇江招隐寺，凭吊寺中昭明太子读书台、增华阁。赵声乘兴口占一诗道：“二月茶花岭上红，鹧鸪路转送春风。读书台上昭明念，《文选》声声古寺中。”苏曼殊也口占一联：“景仰古贤风，此地得江山之助；熟精文选理，斯人与翰墨为缘。”他们感慨昭明太子仅有30年的人生。赵声说，我亦只要活30岁，但要留芳百世。苏曼殊也同感。结果此话不幸而言中，赵声逝世时只有30岁，他的坟墓离昭明太子读书台甚近。而苏也于34岁时去世。苏曼殊精于诗、书、画，曾为赵声作画多幅。最后一幅《饮马荒城图》尚未绘完，两人就各奔东西。赵声逝世后初葬香港。苏曼殊特地作完那幅画，

托人将画在赵墓前焚化，以寄托对故人的哀思。但此人扫墓后并未焚画。此画至今下落不明。

赵声于1907年春到广东新军任职。不久便逢上了“钦廉防城起义”。他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准备乘机倒戈起义，但由于防军统领郭人漳的背叛而失败。赵声悲伤地赋诗言志：“临风吹角九天闻，万里旌旗拂海云。八百健儿多踊跃，自惭不是岳家军。”他惭愧自己不能象岳家军那样为光复大好河山建功立业。郭人漳还向两广总督张人骏进赵声的谰言。端方也从南京密电张，称赵声“才堪大用，顾志弗可测。毋养虎肘腋，致自貽患。”于是赵声被降职。

赵声后来在广州难以立足，不得已弃职回到故乡。乡里为之震动，纷纷传言：“革命党首领赵声至。”端方得知后下令缉捕。赵声带着妹妹赵芬连夜逃走。他秘密来往于杭州、上海、南京等地，与革命党人马相伯、柳亚子等联络。

赵声离开广东后，在倪映典的领导下，于新军中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继续进展。于是胡汉民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电召赵声、黄兴、谭人凤来香港商讨起义大计。赵声被推举为起义的总指挥，倪映典为副指挥。不料一起新军士兵和警察之间发生的冲突打乱了起义的计划。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在各路人马尚未部署完毕的情况下，仓猝率军起义，与敌激战后失败。当时赵声无法与倪映典联络。事后赵声在哀悼倪映典的挽联中写道：“生平几个言能战，死后方知君不多。”

清政府悬赏5万元通缉这次“广州新军起义”的领导者赵声。赵声等人便秘密隐居香港乡间数月，靠躬耕和卖文谋生。但是赵声和黄兴毫不气馁，又向孙中山提出了再次在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的建议，得到赞许。数月后，赵声首次在日本会晤了孙中山。他高兴地说：“吾国最患无折冲樽俎之才，一旦革命军起，必难获得外人承认为交战团体。今见孙公，吾无忧矣。”

革命党人推举赵声为起义总指挥，黄兴为副指挥，于广州设立38处秘密据点；组成了一支从南洋和国内各地选拔来的“选锋”队（敢死队）。赵声派人到江苏、安徽选拔了150余名“选锋”，内有赵声的两个弟弟。新军第9镇的同盟会会员秘密在南京下关为“选锋”送行，“选锋”们宣誓，此行不论成败，誓以身殉。赵声还派人携款联络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力量，约定广州起义后，各处响应，以实现

预定的由黄兴、赵声各率一军北伐的计划。尽管这次起义夭折了，但赵声卓识远见的部署却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许多省同时响应，使得清政府无法扑灭革命的燎原烈火。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部分人马暴动，结果陷入重围而失败，牺牲了86名革命党人（一说有100余名）。其中有江苏的华经元、阮德三、徐国泰等人。事后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黄花岗，这就是有名的黄花岗之役。赵声、胡汉民率领众多“选锋”队员于4月28日晨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流产，不得已而撤退人马。赵声找到黄兴，两人抱头痛哭，赵声口吐鲜血昏倒。后赵声又想举枪自杀，被同志救下。

两次广州起义的失败，大批革命精英的损失，长久的劳累，使得赵声积劳忧愤成疾。一日，胡汉民招饮，赵声饭后腹痛剧作，医生诊断为阑尾炎。手术后，赵声病情恶化，他于昏迷中时时大呼“黄帝”、“岳武穆”；清醒时则流着泪吟诵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11年5月18日，赵声怀着壮志未酬的悲愤溘然长逝，年仅30岁。恶讯传出后，海内外革命志士无不悲哀痛惜。但由于赵声同为光复会、同盟会成员，所以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怀疑赵声是被胡汉民毒死的，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和摩擦。

赵声的遗体初葬于香港茄菲公园之侧，碑名“天香阁主人之墓”。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追赠赵声为“上将军”，并决定在赵声故乡营建烈士陵园。因赵声生前游镇江竹林寺时有“他日行人遥指道，竹林深处赵公坟”的诗句，遂择墓址于此。在墓道的石碑坊上，书有一联：“巨手劈成新世界；雄心恢复旧山河”。后来，赵声的老部下冷君倡议并主持筹建“伯先公园”。公园的设计者为著名造园专家陈植；烈士铜像系上海美专教授江小鹤所塑。1931年6月2日，举行了隆重的揭园揭幕仪式，赵声亲属及许多政界要人、友人出席。于右任还题一联：“天地有正气；园林无俗情。”

新中国成立后，赵声墓和伯先公园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现今的新塑赵声铜像高2米多，身佩军刀，英姿勃勃，焕发出革命军人的勇武气概。1979年，宋庆龄亲笔题写了“伯先公园”4个大字，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辛亥革命先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 惠 兰）

陶行知的 报刊生涯

● 浙江师大 吴奕宽

陶行知铜像

赵志荣雕塑



陶行知是世人皆知的人民教育家，但他又是一个出色的报刊活动家。他的报刊活动，尽管人们知之不多，但却和中国革命、和他毕生从事的教育实践紧密相联，是他闪光生命的组成部分；其贡献，与他在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相映成辉，是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报刊史的一笔宝贵财富。

陶行知的报刊活动始于1913年。那时，他就读于金陵大学。金大原有英文学报，虽已出三卷，但内容贫乏。陶行知倡议从第4卷第1期起增出中文版，更名为《金陵光》学报。2月，《金陵光》第4卷第1期出版。任中文编辑的陶行知，发表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增刊中文版之缘启》）、《一夫多妻制之恶果》等文章。9月，陶行知担任该刊中文主笔，发表了针砭时弊的《伪君子》等文，宣

传民主共和思想。1919年，陶行知在《新教育》杂志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一文，向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1921年，陶行知与凌冰等人一起编辑《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书。他还担任了《新教育》的编辑、主编。该杂志曾载文介绍社会主义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情况，并刊登过列宁的照片。1922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陶行知，在《新教育》第4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指出“普及女子教育，是全国人民应担负的责任。”这年8月，陶行知主编的《新教育》第5卷第1期发表了蔡元培为毛泽东所举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和说明》一文，此文随后由湖南自修大学出版的《新时代》第1卷第1期转载。年底，陶行知被聘为《教育大辞书》特约编辑。1923年，陶行知与朱其慧等人组织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又与朱径农一起“依据国情和平民的需要”，在陈鹤琴调查的《字汇》之基础上，选择了一千多个字，编写了《平民千字课》第一册（简称《千字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供平民读书识字。6月，编辑了《南京平民教育概况》及《平民教育周刊》，并发行《平民旬报》，根据《千字课》生字编辑，专供平民学生巩固与提高学习。该会还出版《平民千字课教案》，各地采用，供不应求。1924年5月24日，陶行知又与北京及全国文学、教育界知名人士钱玄同、郁达夫、赵元任、高仁山、陈鹤琴、王伯秋、庄泽宣等组织平民文学委员会，征求会员，编辑出版平民文学书刊。并与北京《晨报》商定凡会员创作均汇集为《平民教育特刊》，每周（或每10日）出版一期，为《晨报》副刊。6月，《平民周刊》创刊。得《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赞助，该刊为《申报》的副刊之一，随报发行。另印单张，使各地单独订购。这年，陶行知又与程其保合编《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之一出版。6月28日，陶行知筹办的《申报》副刊《平民周刊》创刊。1925年3月1日，《农民》小报问世。该报10天一期，每期售铜元一枚。在当时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报纸，也是中国农民报的创始。9月，《新教育评论》发布创刊预告；12月4日，该刊正式出版。主编陶行知发表了《该刊之使命》，是一篇切中教育时弊的评论。此后，陶行知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整个的校长》、《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等多篇教育论文。为扩大《新教育评论》的影响，陶行知又与《新闻报》社的

编辑约定,在报纸的教育新闻栏介绍《新教育评论》要目。从而使“《新教育评论》既得免费广告,又可使同类文字收更普遍之效果。”1927年1月,陶行知主编、赵叔愚任责任编辑的《乡教丛讯》创刊。该刊每年出24期,每月1日及16日为出版期。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等20人被军阀张作霖杀害。《新教育评论》的主要编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艺文中学校长高仁山亦同案被捕,同时壮烈牺牲。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第4卷第22期一连刊出两则重要启事、讣告天下,以悼念这位战友——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该刊不久亦被迫停刊。

二

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陶行知的报刊活动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在报刊活动中,陶行知发表了一系列的政治论文、诗歌乃至小说等既重视教育,更表现了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心,对和平民主的向往,对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持。1931年春,陶行知避难日本之后,秘密返抵上海。匿名北四川路,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世界名著。因日本人把东方图书馆烧了,故书一本也没出版。那时,他用时雨等笔名,在《师范生》、《儿童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聘,秘密担任了该报总管理处顾问。1932年12月间,陶行知介绍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积极支持黎烈文参加《自由谈》编辑工作,鲁迅、茅盾先生为《自由谈》撰写了大量杂文就是由黎主编的。陶行知还参预筹备出版《申报》丛书。约请学术界进步人士写稿。他写的长篇连载《古庙敲钟录》,运用文艺体裁,塑造了一位敲钟工人,说出人民和自己的意图,改造中国教育、团结抗日,挽救国家民族衰亡的话。在《申报》发表后,深受读者欢迎。陶行知还在史量才的资助下,组织人员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儿童科学活叶指导》。他自己也编了《儿童科学指导》、《儿童天文》、《儿童卫生》、《儿童数学》等多种书籍,交由儿童书局陆续出版。1934年2月16日,陶行知任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创刊,该刊每期封面都有他的亲笔题诗,正文有时事言论、世界大势、科学新知、教学做报告等栏目,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是一个颇具特色、深受时人欢迎的刊物。10月,他搜集此前在《生活教育》上所发表的怎样指导小先生及有关普及教育的文章,包括散文、诗

歌、章程、办法等,编为一集,自题书名为《普及教育》出版。1935年夏至1936年春,又分别出版了《普及教育续编》、《普及教育三编》。1935年12月,《老少通千字课》,全书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全部出版。课文内容大都取材于人民的生产生活。有的课文为劳动人民鸣不平,有的对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反封建反剥削的教育,有破有立,既是知识课本,又是政治常识读本,广泛流传全国,极为群众喜爱,与20年代出版的《平民千字课》先后媲美。1936年3月,陶行知等发起成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被推为理事,并参加《上海话新方案》的起草及《上海话新文字课本》的编辑工作。5月,与厦大学教授郭一岑主编《大众教育》创刊号出版。1937年,国内战时教育开始,出版《战时教育》。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民主》星期刊,主编《民主教育》,接连在该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篇论民主、民主教育的文章,还写了许多首呼吁全国人民一齐起来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诗歌,发表在《新华日报》等报纸、刊物上。

陶行知不仅自己写文章,办报纸、出刊物,还积极支持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8年,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的陶行知,大力推行《鲁迅全集》的征订预约工作。6月24日,他为《鲁迅全集》出版祝诗:“满地荆棘满天云,前路先生认得清。点起火把六百万,照人创造到天明。”并给友人写信,称赞许广平等人“在抗战一年中辛苦劳动编订出版发行鲁迅全集六百万巨著,为中国出版史之奇迹。”西安《老百姓报》为一民众刊物,宣传战时教育,文字通俗,为大众喜闻乐见。陶行知亲自写信给邹韬奋,介绍该报主持人李敷仁先生为人可靠,要求帮助代销《时胜教育》,以资推广。陶行知还十分关心成年累月在街头卖报的小报童,询问他们的冷暖,帮他们解决困难,教他们读书识字,讲怎样做人的道理,甚是难得可贵。

陶行知在报纸刊物上使用过的笔名有:斋夫、不除庭草斋夫、自由诗人、衍(陶行知自造的字)、悟影、水东、时雨、问江、何曰平、三光、韵秋、麦勒根亚都达拉图(蒙文名)、通难馆文、行知行等。他既撰写了无数阐述和指导教育实践的论文,又发表了众多的政治论文、杂文、诗歌等等,对于我们了解现代报刊的历史,研究报刊政论文体的发展,探讨陶行知思想发生的变化,都是极为生动的素材。

(责任编辑 霁明)

黄炳蔚

● 崔征



1950年5月5日，汉口大刚报第六版刊载了一篇《我对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作者黄炳蔚。编者加了按语：“黄先生为五四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文中所述史实颇富参考价值，希望读者注意。”

黄炳蔚先生曾久居南京，是我同学黄某之父。笔者谨就黄先生长女黄某所述，参照有关五四专著，介绍黄炳蔚先生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经过，及其作为“负责人”所起的作用。

1919年，黄炳蔚先生在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即后来的国立法政大学）读书。当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国内各界人士密切注视着会议进展情况。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当中，以山东籍居多，尤为关注。迨至4月，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到国内，全国群情激愤，纷纷举行集会表示抗争。5月2日，该校学生黄炳蔚等5人发起召开救援山东大会，会上推出代表70余人，分赴北京各中高等专门学校进行联络，要求各校各推举代表一名，于5月4日上午齐集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讨论救援山东计划。5月4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警官大学、医学专门、农业专门、汇文大学、铁路管理、法政专门、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代表假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商议游行示威如何演说、如何散布传单、如何经过各使馆表示

请求支持之意、如何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等住宅数其卖国之罪，商议既定，于是各校代表纷纷回校，准备旗子。下午1时，各校学生整队向天安门进发。据以上记述，5月4日上午集会系由法政专门学校“五个人”发起，而“头一名”为黄炳蔚。

下午，当游行示威学生齐赴赵家楼胡同向曹汝霖问罪之时，北京政府已派出大批军警护卫曹宅，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正当一片混乱之时，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趁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宅里去。跳进去的五个同学从里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前门打开，如鲫似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据黄先生长女黄某说，其父谈及这段史事时说，他就是首先“跳进曹宅的五个同学之一”。进入曹宅，他看到堂屋一群人当中有一身着日本和服的女人，随即避去。学生见此情景，怒斥曹汝霖亲日卖国，遂放火烧了赵家楼曹宅，痛打了章宗祥。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专门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段锡朋、黄炳蔚、闻一多、罗隆基等均是学联成员。为了把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北京学联派出代表出京到各省活动。到上海的是许德珩、陈宝镗、段锡朋、康白琴、黄日葵；到湖北的是黄炳蔚；到湖南的是张伯谦、罗发祖、罗国焯、鲁士毅；到广东的是方豪。（后来，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就是这批代表同上海学联代表发起的）。出京之前，北京政府派出大批军警监视学生，黄炳蔚等化装商人模样乘火车出京。他是穷学生，买一些馒头充作干粮，饿了就啃上几口，喝点白开水。到达武汉时，正值武汉督军王占元（此人是山东人）严禁学生示威游行，逮捕参加运动的学生。董必武、恽代英、林育南、施洋等均是这里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5月26日，武汉学联假汉口中华大学欢迎北京学联代表，商讨一致行动及组织全国学联事。会后，黄炳蔚先生多方联系，鼓动罢课罢市。5月底，武汉各校推出代表在昙华岭文华书院召开秘密会议，黄炳蔚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出席会议。会上议决翌日全市举行罢课。第二天全武汉沸腾起来，举行了总罢课。学生罢课之后，黄炳蔚又与商会董刘子骏、武昌慈善会会长项仰之等，在汉口各界联合会会长马刚侯家中开会，商请各帮帮董联合行动，促动武汉罢市。甫具端倪，督军王占元获知罢市情报，密令逮捕北京学联代表，追缉甚急，黄炳蔚住处被包围，遂从下水道潜出，逃离了武汉，免遭被捕。

离开武汉,黄炳蔚辗转至江西、安徽两省活动,运动各界人士举行罢课罢市,对推动两省爱国运动的开展起了巨大作用。

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大东旅馆6楼召开,全国各省市派出代表参加,代表一百余人,据当时上海申报登载,北京代表为段锡朋、许德珩、黄日葵、罗国焯、黄炳蔚、罗发祖、张伯谦等17人。会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此张照片,遂成为五四重要历史文献。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均有收入。1951年南京长江路伪总统府内举办的一次展览会亦曾展出。经黄先生长女黄某辨认,前二排右起第五人靠女代表旁即黄炳蔚先生。

据此,大刚报编者按称黄炳蔚为五四学生运动“负责人”,黄文自称为发起五四运动的“五个人”中“头一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段历史事实原有当时会议记录可证。后会议记录被焚。以致五四运动发起的重要文件无法找寻,实属可惜。

黄炳蔚先生既为五四爱国运动之发起人、负责人,数十年来他的一生行状鲜为世人所知,笔者就所知略作介绍,以供研究五四运动的同志参考。

黄炳蔚先生,字季青,湖北沔阳人。沔阳古为楚地,黄炳蔚先生生于此成长于此,幼年时代受乡贤屈原爱国主义的熏陶。他父亲是教师,生有四男一女,他排行居幼。教师素贫,薪俸微薄,其母务农操持家务,七口之家艰辛度日,常以菜粥充饥,冬日严寒尚着单衣单鞋。黄家家教极严,尝以“勤俭是富家资本,懒惰是贫穷的根苗”告诫子女。每晚督促子女完成规定的日课,其母在旁纳鞋底伴读,若有打盹懈怠,必以针刺醒,命其再读。黄先生幼时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诸家选文,12岁已能属文作诗,文名传于乡里,前清秀才观其诗文,大为赞赏。后来,他兄弟均已成才,长兄大学毕业为朝阳大学教授,二兄大学毕业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为武汉大学教授,他国立法政大学毕业,可谓“楚人多才”一门俊秀。

黄先生少年时代,正值民族危难之际,其父母以“立身宜早”谆谆告诫,青年时代遂有大志,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以安邦救国为己任,与董必武、李济深均有交往,受到孙中山先生器重。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经常奔走于京沪各地,从事革命活动。某次,奉召去上海,谒见孙中山先生及夫人,马超俊在旁。马询问:“彼是何人?”答:

“北京来的一位有志穷学生”。孙中山先生交给一千套《建国大纲》,嘱其运往北方,分发给同盟会员及各界人士。

黄炳蔚先生秉性耿介,疾恶洁身。在旧时代里,党人偷乐竞进,他坚守不慕荣利,见不义则直言愤斥。法政大学毕业之后,在南京立法院、教育部任职。在教育部时,同国民党权贵朱家骅对桌而坐,鄙其巧言令色钻营竞进之为人,虽朝夕相处,却寡于答言。因耿介如此,不善与人相交,虽历职场多年,终不周容同流,经常失业赋闲,生活无出。同学知友知其安贫守志,常推食解衣周济生活所需。某次卧病,医药无着三餐不继,嘱其侄婿勿送点心果品,只要粮米。侄婿遵嘱,肩扛袋米前往探病。抗战前夕,为生活所迫,屈为夫子庙一小图书馆职员,赖以糊口。黄先生岳父与原东南大学校长罗家伦为挚友,今东南大学兰园宿舍为岳家私产,抗战胜利后售予国民党空军。岳家既有资产,又与社会名人有旧,黄先生虽处于窘困之境,坚守穷不折志,终不有求。抗战胜利之后,中共代表团常驻南京。某日,董必武同志途中与之相遇,隔日,董老亲往成贤街黄先生住处探访,见其住处系一柴房,四壁萧然,以油毡遮顶,拾菜叶熬粥充饥,景况极为凄苦。

黄家虽清贫窘困,对其两女一男教育极严,谆谆告诫子女须有大志。据其长女回忆,她姊第三人幼时过着清贫生活,从未华装美食,勤俭成习。每晚老父教读子女,读完三字经、四书,及朱熹选文,读后背诵,背不出则严加训责。解放前,其长女参加南京地下党外围组织活动,老父知女有志,从不干预。其唯一男孩,1945年10月抗战胜利时,往明故宫机场欢迎蒋介石“还都”,被军车压死,年仅18岁,黄先生老年丧子极为悲痛。

解放前夕,黄先生回到武汉。1950年某日,又与董必武同志相遇。董老特向汉口市张市长介绍其经历,湖北省政府特聘黄先生为省政府首席参事,从此结束了一生坎坷潦倒之苦境。因其长期处贫,进食粗粝,多病缠身,晚年又患有鼓胀病,省市党政领导极为关心,虽经良医良药治疗,然而膏肓之症难以回天,1952年逝于汉口协和医院,终年53岁。

黄炳蔚先生一生,其忧时爱国之志可歌,其亮节高风可敬,而其郁郁颠沛则可叹。病逝之后,湖北省政府特为之举行公祭,聂省长主祭,以示哀荣。

(责任编辑 宁宁)

常败将军韩德勤

戚厚杰

“天上有颗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放着日寇他不打，专门进攻新四军”。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在苏北地区的一段歌谣。逼真地刻划了韩德勤外战外行，渔肉人民的嘴脸。

韩德勤的发迹

韩德勤，别号楚箴。江苏省泗阳县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师长、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九军军长、江苏省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要职并被授予中将军衔。韩既非黄埔学生，又不是浙江人，庸庸无能，在国民党军界、政界之所以能跻身高位、升任要职，完全是顾祝同的提携。

顾祝同是江苏涟水人，与泗阳是邻县。顾韩二人从陆军小学开始，中间经保定军校，均为同期同科同班同学，在感情上是知己。他俩在毕业时就互相约定，谁将来在前途上有发展，就互相提携。此后，韩、顾二人在政界、军界一人高升，另一人也跟着上爬。

1926年，由顾祝同保举韩德勤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副官处长。是年秋，顾祝同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保调韩德勤任该师参谋长。1927年秋，顾祝同升任第九军军长，韩随顾升任该军参谋长。1929年，蒋介石编遣军队，顾祝同与江苏同乡陈继承联名保韩任第三师旅长，于是韩抓到了实际兵权。1930年，蒋介石为了进攻冯玉祥、阎锡山，将新组编的独立旅扩编为师。在顾祝同的保举下，韩德勤调任第五十二师师长，参加中原大战。

“围剿”红军 首次被歼

1931年初，第五十二师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归南昌行营指挥，韩兼任南昌卫戍司令。同年五月间，何应钦指挥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红军粉碎，南昌行营为加强防务，调五十二师主力分驻清江、吉水等地，加强赣江防务。

同年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进剿军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进攻红军。第五十二师隶属蒋鼎文纵队。7月间，五十二师同蒋的第九师开始南进，预定先到兴国与蔡运锴部靠拢，然后一同向瑞金方向前进。走了两天，忽接蒋介石十万火急电令，要该部即刻转到兴国东北广昌方向，援救正在被红军围歼的上官云相纵队，但该部尚在半路，上官云相纵队三个师一个旅已被红军歼灭大部，上官云相等将领仅以身免。当时蒋介石错误判断围歼上官云相纵队的部队是红军主力，认为机会难得，就命令各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与红军主力决战。可是一进苏区，犹如盲人瞎马，总是摸不清路数打不着红军。白天行营，夜晚宿营都要遭到地方人民武装的袭扰。搞得精力疲惫不堪，个个心惊胆颤。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第三次“围剿”就这样被红军粉碎了。

8月下旬，韩德勤率第五十二师和蒋鼎文第九师向兴国以北的泰和方向撤退。蒋、韩两部在撤退途中遭到红军猛烈地阻击，五十二师陷入完全覆灭的厄运。绝望中，韩德勤企图自杀，但手枪早已被护兵拿下丢掉，只好化装逃跑，途中被红军俘虏。红军在查询韩的身份时，韩伪称是伙夫，并有随从作伪证，才未被识破。后韩被放回，才得以逃脱。

第五十二师被红军全歼，韩德勤逃回南昌，自请降职处分。陈诚为

扩张自己的实力，将韩降为第五十二师副师长，以他的亲信李明任五十二师师长。后韩又得力于顾祝同等人的相助，改调第二师副师长（师长汤恩伯）。1932年初，随顾祝同调任江苏省保安处长（顾祝同为省主席）。后又随顾任重庆行营办公厅主任、贵州省政府委员、西安行营办公厅厅长等职。

抗日溃败 遭蒋斥责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年秋成立第二十四集团军，顾祝同任总司令，韩德勤为副总司令。1938年初，因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韩德勤代理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并兼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3月，以江苏保安团组建第八十九军，韩德勤兼任军长。

4月，为配合徐州会战，将第二十四集团军编成苏北兵团，韩德勤为指挥官，指挥第八十九、第五十七军等在苏北作战。5月上旬，津浦路南段的各部日军开始北犯。日军佐藤支队从盐城北犯，攻陷阜宁。韩德勤率部望风而逃，此后日军又连续攻破淮阴，继而西进攻蚌埠、宿县，日军从津浦路西侧向徐州逼近。守徐州部队受到严重的威胁，为此，韩受到蒋介石严厉斥责：“密查阜宁之敌不满三千，长驱千里，如入无人之境，目下竟有窥东海遮断陇海路之趋势。该副总司令所部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

面对日军对徐州四面合围的危机形势，中国军事当局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免被优势日军一举歼灭，立即作出放弃徐州，向豫皖边区突围，第二十四集团军留在苏北。

黄桥之战 折兵损将

1939年初，鲁苏战区成立，韩德勤任副总司令。是年冬，接顾祝同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苏北，执行国民党“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图谋集中力量，消灭新四军。

1940年，新四军由江南挺进至苏北，发动群众，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抗日。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团结了李明扬、韩国钧等地方实力派和抗日民主人士。使韩德勤为首的顽固分子如芒刺在身，随时准备集中力量，与新四军决战。

当时，韩德勤以鲁苏战区副总司令的名义指挥的军队有，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省保安处所辖十个旅共二十个团，陈泰运税警总团约三个团，还有李明扬指挥的苏鲁皖游击总队（号称十一个纵

队），总共拥兵十二多万人。韩虽拥有重兵，但大都是从地方搜罗的杂牌武装，战斗力很低。加上李明扬等部与新四军交过锋，尝到新四军的厉害。韩内部矛盾重重，所想不一。但韩德勤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新四军的力量。他在对所属进行反动动员时，说新四军在苏北的人数不多，装备很差，立脚未稳等。对陈毅给其的亲笔信，要求和平协商的主张，不仅不重视反而视作软弱的表现。韩德勤于1940年10月初，不顾当时苏北各界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吁，悍然发动了对黄桥新四军的进攻。

韩德勤指挥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从海安、胡家集、曲塘集出发担任正面主攻、向黄桥攻击前进。沿途没遇上新四军强有部队的抵抗，仅仅是一些出没不定的小部队和民兵的袭扰。骄横成性的李守维认为新四军兵力不足，只能困守黄桥，没有出击决战的力量。遂无所顾忌，大胆前进。他在同韩德勤通电话时得意忘形地说：“陈毅指挥的新四军就是全部在黄桥也不过五六千人，他们弹药少，而我们有比他们多两倍以上兵力，打下黄桥不成问题。”当日下午，李守维部第三十三师六十六旅和独立第六旅，已分别接近黄桥新四军的前沿阵地。韩德勤要李守维第二天拂晓再向黄桥全面进攻，但李守维和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都想争夺抢占黄桥的头功，向韩强调离天黑的时间尚早，他们指挥的正面部队战斗力很强，能够打下黄桥，消灭新四军。并认为李明扬、陈泰运的地方游杂部队早来迟来，无关紧要。因此韩德勤同意立即进攻黄桥镇外围阵地。

新四军首先在前线阵地依托坚固工事，以大量手榴弹英勇反击，多次打退蒋军的进犯，使独立第六旅和第三十三师六十六旅先头团付出重大伤亡为代价，才得以占领前沿阵地。此时，天已黄昏，李守维为继续进攻新四军主阵地，乃调动部队，调整部署，以备再战。就在这时，第三十三师和第六十六旅指挥部首先遭到新四军突击队的突然袭击，李守维的指挥部被摧毁。同时，第六十六旅有两个团在运动时，也遭到新四军大部队的迂回出击，分割围歼，被击溃逃。第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和第六十六旅旅长苗瑞倬在指挥部被袭击摧毁后，双双做了新四军的俘虏。之后，第八十九军指挥部也遭到新四军的袭击，李守维乘马逃出重围，在黄桥以北的八尺河溺毙。独立第六旅的两个团被全歼，旅长翁达怕当俘虏而自杀。第一一七师二三四旅是进攻黄桥的预备队，在增援第三十三师六十六旅的战斗中，

先头团遭到猛袭，伤亡较大，急忙后撤。除伤亡和失散的，只剩下一千多人逃回兴化城。

韩德勤进攻黄桥，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韩的省政府和总司令部所在地由东台县城迁逃到兴化县城。韩从此失去蒋介石的信任。拟改派王懋功接替韩的江苏省主席、冷欣接任第八十九军军长职。但由于顾祝同的拖延未能实现，而韩的下台已成定局。韩的下属官员见此人心浮动，主张抗日的人都倾向新四军，韩德勤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陈道口之战 第三次被歼

1941年初，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万反共大军，向华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妄图首先“肃清”津浦路西的新四军，占领豫苏皖边区，然后再向苏北、山东深入，以实现其将新四军、八路军逐至黄河以北的目的。6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等部以九个师，约七倍于新四军四师的兵力，占领了豫苏皖边区。而新败的韩德勤也妄图东山再起。他急忙派了江苏保安第七旅旅长王光夏在泗阳县与淮阴县交界的陈道口建立了六个较大而坚固的据点，名为抗日，实际上就是以陈道口为中心，严密控制运河两岸，尔后向两边扩张，构成一条横贯淮北、淮海地区的東西走廊，以割断淮北、淮海两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鲁南于学忠、皖北汤恩伯派国民党军队到苏北，加强韩德勤反共力量作准备。陈道口等据点的守军，是韩德勤反共军的主力王光夏的保安第七旅，共三个团的兵力，约两千余人。同时据点内物资雄厚，王光夏自吹“兵精粮足，陈道口固若金汤”，王骄横跋扈。

陈道口据点，对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威胁很大。面对这一形势，陈毅军长亲临部署。集中新四军第二、第三、第四师及军独立旅各一部共六个团的兵力，于是年10月15日对盘踞在据点里保安第七旅发动了进攻。经过6天的激战，终于将敌据点彻底摧毁，保安第七旅旅长王光夏落荒而逃，仅以身免。

新四军拔除了陈道口据点，遏制了韩德勤等人的野心。由于韩的处境更为孤立，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在韩的内部产生了是固守苏北还是转移他处图谋再起的争议。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想逃出苏北另求发展，韩德勤则主张苦撑待变。他们分别电告顾祝同陈述己见，以求解决。恰好此时顾祝同去重庆开会，就将这两种意见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申报，并建议国民党中央就苏北问题早作决定。顾祝

同看到韩德勤在苏北已陷于内外交困，日益艰难的处境，出于对韩德勤的私交，本主张韩撤离苏北，但由于蒋介石看到韩德勤打内战，搞摩擦有用，就又把韩留在苏北。

山子头之战 捉放韩德勤

陈道口战斗之后，韩德勤更是每况愈下了。随着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以及韩德勤假抗日，真反共面目的暴露，其军队和地盘日益缩小。苏北敌后的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韩部仍有三万多人。韩德勤虽然不时向新四军挑起事端搞摩擦，但只要韩德勤不投降当汉奸，日寇仍要对其进行扫荡。

1943年2月，日寇在向盐城、阜宁地区的新四军扫荡扑空后，就转而集中了三个师团的兵力，围攻韩总部，兵临城下，迫其投降。韩德勤部岌岌可危。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旧恶，出动军队及时掩护，韩德勤部队才得以从车桥、曹甸地区突围，向北退入抗日根据地的淮阴、涟水一带进行休整。当时新四军并给予了粮草和经费方面的接济。新四军光明磊落的行动，不仅使韩德勤部队的广大士兵十分感动，就连韩本人也写信给陈毅军长，感谢新四军对他的支援和接济。

但是，韩德勤和蒋介石一样，从来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之徒。在2月底，他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即日率部西移，进占新四军四师彭雪枫部的驻地，与正由淮北向东进的王仲廉部东西夹击彭雪枫部于洪泽湖畔。此时，韩并没有接受已经反共失败的教训，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收集残部，重整旗鼓，亲自率领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新编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襄，以及警卫团等部，在开往津浦路西抗战的借口下，于3月14日偷渡运河，进占了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山子头一带，同时派出第八十九军赶赴灵璧县以北，接应王仲廉部东进。

陈毅军长面对这严峻形势，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决定首先消灭东线韩德勤，尔后转兵西线，阻歼王仲廉部。前敌由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统一指挥。

3月17日，大雨滂沱。新四军第二、第三、第四师各一部向韩德勤发起了猛攻，从夜间战斗到翌日中午。韩德勤所带的卫队全部被歼，韩德勤当了俘虏，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新编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襄均被击毙。韩德勤被俘后企图吞吃火柴

辛亥元勋徐绍桢

●徐家阜

辛亥元勋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晚年自称“学寿老人”，明中山靖王徐达第十四世孙。徐氏五代为幕，其父徐灏字子远，号灵洲山人。以名幕参预粤桂两省政务，擢升为道员。徐绍桢自幼耳濡目染，习刑名之学，十九岁因父丧由姐夫朱香溪推荐，先后在两广怀远、昭平、苍梧、肇庆、桂林等地游幕。光绪甲午举人（1894），随即由江西巡抚李兴锐提拔为江西常备军统领，进入仕途，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总办、苏淞镇总兵、新军第九镇统制等职，是清末创办新式陆军的主要人物。

徐绍桢在青年游幕生活中，接触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目睹清末官场的腐败。同时深切感受到民族危机的严重，转向西方寻求救世之道。他在桂林游幕时，曾组织过算学会、农学会等近代科学团体，聚集师生研讨天文、算学、农桑、历法。对维新运动的兴起，他抱着满腔热诚，竟日与师友门生进谈，主张革弊政、设银行、兴工商、开学堂，以通风气，使政局一新。面临国衰兵颓的局

面，他主张强国之道首在练兵，于是毅然投笔从戎，弃文经武，出任编练新军重任。南洋新军第九镇的编练即由他苦心经营。在编练过程中，他竭力主张征招知识青年，裁汰绿营旧兵。此时曾往北京拜见军机大臣王文韶，王以善练兵赏赞，徐绍桢却回答：在南京非练兵实裁兵也。他将原攻占南京的湘军旧营兵裁尽；新招江南朴实农家子弟中略有文化者入伍。“竟有本为廪生、秀才者”，这就大大改变了清军的素质。他曾自豪地宣称：“八千子弟知忧国”。确实在这批新兵中，有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赵声、倪映典、熊成基等人，导致清末新军的转向。他在编练新军的戎马生涯中，对国内的立宪新政呼声极为关注。他奏请清廷振兴农业、普查人口、疏浚河道，推行新法。但由于清王朝的顽固不化，徐绍桢这些希望完全落空，他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转为同情。1908年安徽新军起义失败，端方点名要他逮捕革命党人柏文蔚、赵声、熊成基、倪映典等，他曲意庇护放走。于是清廷对他也有戒意，新军第九镇从创建至起义，始终处于有械无弹处境。他对革命党人的盲动策略也略有腹诽。1910年，他赋诗暗表心迹，“欲使孤注成何益，为勉青年强自豪”，说明他的志向韬略。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徐绍桢在南京秣陵关率新军第九镇首先响应。初期起义失利后，徐绍桢离开南京，和革命党人在江浙沪的领导人陈其美、宋教仁等取得联系，由三地民军推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揭开了辛亥南京之役帷幕。辛亥南京之役，是仅次于武昌之役的举足轻重的恶战，联军苦战十余昼夜，于12月2日光复金陵，这对稳定南北革命形势，使革命重心稳向东南，及至孙中山先生回国

自杀，被及时发觉，后经交待政策，才消除了顾虑。彭雪枫师长在战斗胜利结束后，即令俘获的韩部电台以韩的口吻向蒋介石发电报，称韩已将新四军第四师消灭。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回电奖韩。这样新四军不仅捉到了韩德勤，还抓住了蒋介石打内战的证据，蒋介石赔了夫人又折兵，有苦说不出。陈毅军长同韩德勤谈话，指责韩德勤顽固地反共反人民，并指出自黄桥之战后苏北形势的变化，是国民党顽固派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韩德勤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承认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是错误的。最后陈毅军长以团

结抗日的大局为重，对韩德勤从宽处理，不仅发还了一部分人枪，还派人协助韩安全通过津浦铁路，西去皖北。韩到达皖北后，奉令去重庆，国民党将他原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撤销，改任苏皖游击总指挥，仍兼江苏省主席。

1944年冬，韩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顾祝同）。1946年，顾改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韩任副主任。1948年1月，顾任总参谋长，韩改任国防部联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3月，韩德勤去台湾。1988年去世。

（责任编辑 淑玉）

定都南京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徐绍桢在战役最紧张关头,听说汉阳失守,吐血数盂,确可称呕心沥血。同时他在玄武湖后湖楼的寓所被张勋焚劫。孙中山在自传中说:“汉阳一失,吾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一振。”并誉徐绍桢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成为孙中山深为赞许的第一人。

孙中山先生回国,徐绍桢竭诚欢迎,希望能立即北伐统一全国。孙中山对他也甚为信赖,委任他为南京卫戍总督,统辖驻宁各军。在内外反动势力压迫下,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徐绍桢随之进退。并拒绝了袁世凯给他参谋总长、仓场总督的委任。对于这事件,他事后反省是“徒著诸梦寐而已”。确实革命党人的这一举动,带有理想色彩。孙中山辞职的原因,向有多说。而孙中山曾对徐绍桢说:“吾但见欧美民主国,每届选举总统,各出竞争之术,举国若狂,殆非盛德所有。使中国永无为争总统之事,岂不美哉?”徐绍桢认为要救中国就必须行尧舜之治。实现大同之世,他认为孙中山就是尧舜,因而对孙中山钦佩不已。但实际上革命党人的美好愿望,只是让袁世凯得以售其奸。但袁帝制丑闻,张勋复辟闹剧,以及南北军阀的连年混战,使他陷于痛苦悔悟之中。孙中山护法,他又蹙蹙追随,曾以诗明志:“刑天空负舞士术,填海难为衔石劳”。“惟有此心心此志,可期结古在人间”。此后他受孙中山重托,出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陆军部练兵督办、讨桂民军总司令、大本营参军长、广东省长、内政部长等职,赞襄枢务。在孙中山被岑春煊勾结军阀政客逼离广州后,他辞职赴沪隐居;陈炯明叛变,他以自家被抄掠,几经辗转,赴上海与孙中山会合。虽两次毁家,仍不变初衷。尽管家道极其艰难,居无室,出无衣,举家食粥,但不受南北军阀利诱,坚持沪法救国、和平统一的正义立场。60高龄,还随同孙中山出师北伐,筹划军务。后体衰不堪征鞍,任广东省长、内政部长等职,他制定有关教育、卫生、侨务、出版、国籍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了南方形势发展。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对国内政局变幻困惑和年迈体衰,悄然隐退,潜心于著述活动,而忧国忧民之心仍未泯灭。蒋介石执掌政权后,数次亲临徐寓请其出山,他因年老体弱谢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他说:“虽已南北统一,而专制流毒未尽扫除,仍不可谓平等自由”,一再呼吁“孙中山先生不杀人”的主张。1932年孙科知道他为官多年,而荷包里是空无所有。因此提名徐绍桢为国民政府

委员。而他自认是“食禄委员”,“于国事无补”。1936年9月13日,他在上海寓所病逝。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国民政府委员徐绍桢,才兼文武、器识闳通。辛亥之役首率新军反正,光复金陵厥功甚伟。嗣后追随总理护法岭南,险阻弗渝,共济时难。”在#词中颂扬徐绍桢“功成不居、功高若倭”。蒋介石、林森、五院院长、各部部长等人亲自致祭并送了挽联与花圈。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送了花篮。国民政府指定安葬在南京辛亥之役,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在麒麟门小白龙山,徐绍桢日夜指挥作战之地。

十年动乱中。墓地破坏。1986年徐绍桢逝世五十周年,政府缅怀辛亥元勋,重建徐绍桢墓。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函请南京张耀华市长给予帮助,徐绍桢的曾孙徐学民赶到南京寻找墓地及墓碑。经过努力先找到当年的护墓人,白发苍苍年高八旬的王甘氏,在她的陪同下,终于找到了墓地,墓碑由部队保管完好如初。碑文是当年孙科亲笔题写的“故国民政府委员徐固卿先生之墓”,墓碑仍立放墓前。墓地焕然一新,宏伟壮观。足以使先灵安息,后人欣慰。

徐绍桢一生于游幕及戎马生涯之暇,留有大量著述,涉略历法、算学、历史、经学、诗文等领域。计有《四书质疑》、《三国志质疑》、《孝经质疑》、《学一斋算课》、《学一斋勾股代数草》、《学寿堂诗说》、《大学疏义》、《共和正解》等10余种。

1991年是徐绍桢诞辰130周年,家属出版《徐绍桢集》纪念,在辛亥革命80周年大庆时出版。台北陈立夫老先生寄来题字《徐绍桢先生集》及纪念文章《怀念徐绍桢先生》。同时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老先生题字《徐绍桢文集》。此集共计35万字,得到各地大力协助。李烈钧将军的公子李驷驹先生为集作序。

(责任编辑 霁明)



第一位到过南京的元军统帅

勋德不凡的丞相伯颜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蒙古（元）军是以嗜杀百姓、掳掠财物和女子著称的。这不足为怪，因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曾经说过，屠杀敌人、抢占他们的财物和女子“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1）。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军，在灭西夏、攻金朝以及震撼欧亚的西征中，确有若干次烧杀掳掠的惊人事例，其中“屠城”之举最烈。但作为元朝第一位到过南京（时称建康）的领军统帅伯颜，堪称是改革弊端的杰出实践家。他在元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率军进驻南京的前后数年间，不仅在战争舞台上扮演了一位雄才谋略的军事家，而且在将德上建树了许多为人垂范、令人感叹不已的业绩。史学家鉴于伯颜勋德不凡，誉称他是“四不贪”大丞相。

一、不贪杀戮

在至元九年（1272）元军取得襄樊大捷的第二年，元世祖忽必烈召集诸将共商灭亡南宋、统一全国方略。经汉将史天泽荐举，忽必烈特命“雄才大略、料敌决胜”的伯颜为左丞相、攻宋统帅，任务是从汉水入长江，沿江东下，夺取建康和宋都临安（今杭州），迫宋廷投降。伯颜出征前，去向忽必烈辞行。忽必烈因受汉文化的影响，正在力图改变成吉思汗创业以来“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局面。为此，特向伯颜谕示：“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2）

伯颜知道，曹彬是宋太祖赵匡胤麾下大将，在开宝八年（975）率军攻占金陵、灭亡南唐时，以不嗜杀、得全城而闻名于世。伯颜上任暂以曹彬为楷模，在取城时，不扰百姓，欲创造比曹彬更显赫的勋德。他于至元十一年（1274）九月率军离襄阳，至十三年（1276）三月，军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大小城邑数以百计，除常州（今江苏武进县）等个别城邑外，皆不费一矢一弹而取得。伯颜为保全城邑，大体采用七种方式：

一是绕过城池保城。宋之郢城（今湖北钟祥），夹汉水分东西

依山而筑，有重兵10万、战船数千艘把守，成为元军灭宋的第一个障碍。元将多主张先强攻、后屠城，主帅伯颜不予采纳，亲至城郊观察地势，发现城西北有个黄家湾和沟渠，由于下了一个月的大雨，水位上涨，南通藤湖，可达汉水。便对诸将说：“攻城乃兵家之下计，大兵之用，岂惟在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失矣！”（3）随之，他率军迂回绕过了郢城。此种不攻城、不伤人、又利速进之策，为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后来郢州便不攻自破了。

二是激战城外保城。鄂州（今武昌），被宋军号称“金汤重镇”，宋大将夏贵以战船万艘，阻止元军入长江东进。伯颜为避免城市遭到破坏，多次遣使向夏贵劝降，遭拒绝。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元军发起阳逻堡大战；一面派精锐乘夜冒雪以舟沿江西上，迂回青山矶（今武昌县东北），南渡长江，兵临鄂州城下；一面自率主力在江上向宋船发动火攻，烟焰涨天，使鄂州守将张晏然、程鹏飞望之胆颤心惊。随后，伯颜派汉将吕文焕持劝降书至鄂州，书曰：“今我大兵飞渡长江，如蹈平地，汝辈不降何待？若尔坚拒，大兵一举，枕尸流血，在于目前，生灵何辜？”（4）于是，张晏然在十二月十八日以城降。伯颜入鄂州后，设宴款待、升赏献城的官吏；释放被宋官府捕捉并戮其面的边民和戍卒归里；号令全军官兵不得侵暴百姓，全城吏民转恐为安，附近之汉阳、德安（今安陆）等城，皆闻风自动归附。

三是以降劝降保城。宋之黄州（今湖北黄冈），不战而降，对伯颜来说可谓一举多得。十二月二十八日，伯颜在东进途中，遣鄂州降将程鹏飞持招降书入黄州城，向守将陈奕劝降。陈奕求封爵号，伯颜说：“汝既率众归降，何必虑及名爵？”立即授以沿江大都督。十二年正月初，陈奕迎伯颜入城，绥抚居民。伯颜了解陈奕的家事后，便想给他一个再立新功的机会，便说：“听说你儿子在涟水军为官，能否招其归附？”陈奕说：“我儿名陈岩，可致书招来。”伯颜即派30精骑携带陈奕手书，潜入涟水。陈岩见父手书，立即归附，还招谕附近诸城悉降。此事传至忽必烈耳中，大为高兴，答应以后召陈氏赴京入见。伯颜还得知陈奕与蕲州守将管景模、吕师道是朋友，便向陈奕谈起此事。陈奕立即手书，言明伯颜丞相的恩德，传至蕲州。管景模、吕师道阅后，消除疑虑，自愿以城降。伯颜立授管景模为两淮宣抚使、吕师道为同知，继续镇守蕲州。不久，沿江州县闻风归附。为迅速稳定归附地区的社会秩序，伯颜特请忽必烈下诏各地归附吏民，各安其业，如

有元军官兵骚扰，可到行中书省告发，定会严惩不贷。

四是施恩对方保城。最有代表性的是建康府（今南京）。十二年二月，宋、元两军大战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宋都督贾似道见元军阵势威严，惊慌失措，自逃扬州，兵13万溃散，失船2000余艘。元军乘胜沿江东下，势如破竹，顿时，沿江州府纷纷迎降。但宋之建康留守、沿江制置使赵葵，是一个贪财胆怯之徒，闻元军到了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便偷偷地席卷公帑金帛弃城南逃。建康都统徐王荣、翁福等得知伯颜严禁杀掠，便派人去太平迎候伯颜于三月初二在建康。伯颜记起宋将曹彬取金陵时不扰民的故事，决心把建康抚治成“经营四方之根本”的名城，欲办一些曹彬不曾做过的利民好事：1、令步骑兵驻扎龙湾（今下关江边一带），水师泊于江面，严禁擅自进城，以免惊扰城民；2、将数万名投附的宋军，编为新附军，与蒙古军一样严格管理；3、信用新附官吏，对徐、翁两都统与临安宋臣来往信函，不猜不疑，还命其与元安抚使一起抚治建康城；4、在建康设行中书省，江宁、上元两县皆置蒙古官吏共同治理，使之成为进取宋都临安的基地；5、伯颜得知守建康的宋江淮招讨使汪立信不肯降元，在出逃途中悲愤而死，特将其家人请来，给予厚重抚恤，并赞称其为忠臣之家；6、调查吏民疾苦，得知江南从至元六年以来灾荒不断，流民成批，又逢大疫流行，伯颜下令开仓赈救民饥，给民医药，使吏民安居乐业。消息传开，江东2府、5州、2军、43县及淮西、滁州等地纷纷归附。

五是长期围困保城。伯颜深知名城扬州战事一开，定有毁灭；又考虑到该城一时不下并不影响元军在江南的行动，于是决定于十二年四月派兵围扬州，但不准攻城。到次年七月，趁宋朝抵抗派主将李庭芝离扬州，去泰州之机，诱扬州留守朱焕降附，元军不费一矢一弹取城。

六是遣谍施计保城。先讲一段伯颜派遣谍报人员的故事。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平江（今苏州）归降。元军入城时，一位坐银椅的元将见到承天寺的小和尚，笑嘻嘻地将他叫到跟前，询问寺院主持某某及西廊下首座皆好！小和尚莫明其妙，回寺禀报。正当众僧人惊讶不已时，那位将军已来到寺中，恭敬地向主持等人行礼，微笑着说，他便是以往在寺前看相卜的算命先生，曾在上房住了半年多，姓尤，现官宣抚。至此，众人才知道尤宣抚已在江南作了多年的谍报工作。因此，伯颜对江南、尤其是宋廷

内部谁主战、谁主和，谁贪、谁廉，皆了如指掌。伯颜料想宋主战派主将文天祥守平江城，必然会象常州那样发生血战。所以，当元军尚未到达平江时，便诱使宋廷于十一月十三日把文天祥从平江调走；次日，元军不战而取平江，保全了一座名城。当元三路大军于十二月中旬对临安形成包围时，伯颜为了保全临安名城，又设计诱使宋廷派文天祥离开临安，至元大营谈判。伯颜为了避免临安发生血战，便把文天祥扣留不放，而让其他宋臣回廷报信。这样便从宋廷内部人士的去留上，使宋都临安避免了一场战火之灾。

七是用宋诏书保城。十三年二月五日，伯颜主持了宋廷正式投降仪式。时宋帝年幼，伯颜遂取宋太皇太后诏书，派员分送至闽、赣、湘、鄂、川、两广、两淮等地，诏令宋朝官员，为免生灵涂炭，自动归附元朝。

由于伯颜忠实遵行忽必烈的文治思想，不贪杀戮，力争在各城尤其是名城、大城，兵不血刃，极大地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所以，元朝统一全国的局面很快实现。

二、不贪女色

据《蒙古秘史》、《黑鞑事略》等史籍记载，蒙古将帅及下级官兵中不乏好色之徒。凡掳得妇女，各级军官为求得升迁，宁肯忍痛割爱，也选其中漂亮女子送，尽量挑选选色最佳者送给大汗。而蒙古大汗又往往把被占之国（城）首领奉献妙龄美女，作为真心诚意和好的标志之一。可见，贪图女色是蒙古军队的一大弊端。然而，伯颜却反其道而行之。

伯颜拒绝降官选送美女。至元十二年正月十三日，驻守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宋朝兵部尚书吕师夔、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钱真孙、江州都统管如德，向伯颜请降。次日，伯颜来到江州。吕、钱、管三人带领士民夹道欢迎，又在庾公楼大设宴席款待伯颜。三人还特地从赵氏宗族中挑选两名妙龄女郎，盛妆打扮，作为礼物送给伯颜，被伯颜训斥一通。遂令人赶快护送两位女子回家，免得家人挂心。为避免再生类似麻烦事，伯颜冒着大风连夜赶回城外营地。各降附官吏都为伯颜拒绝女色之举而感叹不已；部下将士亦为主帅不贪女色的表率行为所折服。伯颜知道江南是出美女之地，所以在进军江南途中，为避免军中发生侮辱妇女事件，三令五申诸军每取一城，都要屯驻城外，不许官兵擅自入城，违者重罪。他自己宁驻郊外或寺庙，也不驻常有女子出没的亭

台楼阁。伯颜入平江登城视察，知苏州美女众多，特令诸军官兵一律不入民宅。所以，全城姑娘媳妇皆平安度日，居民安然。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伯颜移大营于皋亭山（一名高亭山，今杭州东北20里处），驻宿明因寺，就在这里接受了宋廷的投降。二十六日，伯颜登上临江城西北的狮子峰，俯视临安形势，遣军保卫宋朝宫殿，命汉将代表他去慰问宋谢太皇太后、全太后，而个人私下对宫廷后妃及宫女一个不见。由于主帅严守军纪，元军将士没有发生一起污辱宫女和民女之事。

二月二十四日，忽必烈命伯颜携宋幼帝、全太后等去京。为避免与宋朝后妃、宫女涉事，伯颜决定分道而行，互不相扰。三月十日，伯颜先行一步，于闰三月二十一日回至大都（今北京）。而宋幼帝、全太后和宫女百余人，在蒙汉将领率兵护送下，于三月十二日坐轿和游船离开杭州北行，晚于伯颜三天抵达大都。五月二日，忽必烈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正式接见宋幼帝和全太后，封宋幼帝为瀛国公。同时，盛赞伯颜之劳和将德高尚。

三、不贪财宝

伯颜在宋廷金银、珠宝、珍奇堆积如山面前，不动心，不沾手，堪称古代将帅的典范。

至元十三年正月，正当伯颜接受宋廷投降的时候，他夫人从北方来到杭州近郊的军营。夫妻长期地分南北，相会之情难以言表，伯颜多么期望妻子多住些日子，但他深知身负灭宋大任，眼下尚未全部实现，不能舍大局而顾一己。他还猜想，在宋都临安即将归元朝之时，妻子远路来到前线，会不会是受人之促，为索取金银财宝而来。于是，便直率地问妻子：“你怎生来？”妻子答：“俺自来。”伯颜想把底里说穿，便微笑道：“你来俺跟前（是）要富贵也。你吃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吧。”（6）伯颜妻子理解丈夫的心情，便按丈夫所嘱，既不去近20里的杭州城逛逛，也不伸手向丈夫索要什么宝物，依依不舍地踏上返家旅程。

伯颜还有一件因为宝物问题而遭奸臣诬陷的事。至元十三年三月，伯颜在平宋凯旋离杭州之前，早已命人将宋宫中多如山积的宝玩、图籍、乐器、法服等一一封存，不准个人染指。所以，他自己的行装，除了常用衣被之外，别无它物。其廉正之状，正如伯颜回京路过金陵时所写《过金陵梅花岭冈》诗句云：“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7）但元平章政事阿合马，却是一个嗜取富贵、善窃威福

十九个单位联合举办的长江流域 经济发展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江苏省社科联、江苏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江西省社科院、湖北省社科院、贵州省历史学会、华东师大、四川大学、西南师大、云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大、苏州大学、扬州师院、徐州师院、苏州铁道师院、《南京史志》编辑部等19个单位联合举办的“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11月5日至9日在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西南边陲、北方草原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共六十多人。其中知名学者有厦门大学韩国磐教授、华东师大简修炜教授、安徽师大万绳楠教授、西北大学周伟洲教授、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等，会议收到论文45篇。

探讨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宏大课题，时间跨度大，流域广，这次所涉及的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具体问题，是一次群贤大聚会，大协作的讨论会。特别是对六朝江南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讨论，令人注目，这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加快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颇有借鉴作用。

会议期间，江苏省教委、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社科院的负责同志到会看望了代表。

(编者注：部分论文将在本刊第三期发表) (小 宣)

的“奸巧之徒”。(8)此人深知宋廷珠宝堆积，便料想伯颜从杭州归来，定会带回不少宝物，于是先于百官出城至半路上谒见，想大捞一把。殊不知伯颜离开杭州时，一无所取。阿合马见了伯颜，装着笑脸。伯颜看透了他的心思，便解下自身佩戴的玉钩条赠送阿合马，还抱歉地说：“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您)勿以此为薄也。”(9)阿合马见此轻微物件，脸色骤变，思虑中伤伯颜之计。回到朝中，便向忽必烈诬告伯颜曾偷了他的珍宝玉桃盏，要求严治伯颜贪财之罪。忽必烈听后，半信半疑，只因查无实据，便搁置待后处理。可是此事却被许多人以讹传讹，损害了伯颜的声誉。后来，阿合马死了，其侍从献出了那座玉桃盏。忽必烈明白真相后，惊愕地说：“几陷我忠良！”不久阿合马的妻子和亲信，又供出阿合马生前贪横不法，谋结私党，暗害忠良，甚至活剥人皮等罪恶，激怒了忽必烈，下令掘墓戮尸，纵犬食其肉。聚观之百官士庶拍手称快，也皆为伯颜大丞相的清廉而感叹不已。伯颜于至元十二年五月，升为中书右丞相。后又奉命率领大军远征漠北，平定叛王昔里吉、乃颜、明理铁木儿等，连战皆捷，巩固了忽必烈的统治地位和元朝的北部防线。但伯颜在奏章中，总是讲部将之功和自己之失。这被朝

中奸臣抓住了把柄。至元二十九年(1292)，廷内奸臣乘忽必烈年迈，诬告伯颜“久无寸功”，且与叛王“勾结”，被罢职。不巧，诏令刚宣布，新帅玉昔帖木儿尚未到职接班，而叛王大军已至。伯颜尚未移交兵柄，遂挺身而出，亲督诸军大败叛军。战斗结束，临行时，正在督军的皇太孙铁穆耳对伯颜实在恋恋不舍，两眼含泪，举起酒杯为他饯行，说：“公去，将何以教我？”伯颜也举杯说：“可慎者，惟此(酒)与女色耳。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10)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病逝，铁穆耳继帝位，即为伯颜冤案平反，并委以重任。同年十二月伯颜病卒，被追封为淮安王，谥忠武。

史家称赞伯颜“于国有大功，为勋；与民有大惠，为德。勋德之盛，卓冠前古”。(11)此话虽有某些溢美成份，但也道出了伯颜为帅、为相的高尚风范。

(责任编辑 淑玉)

注：

(1)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2) (9) (10) 《元史·伯颜传》；(8) 《元史·奸臣传》；(3) (4) (6) 《平宋录》；(7) 《元诗记事》；(11) 《丞相伯颜公勋德碑》。



双烈亭 前忆曼陀

● 夏蓓

浙江富阳县的鹤山上矗立着一座“双烈亭”，亭前碑上新刻着郭沫若的一首诗：

双松挺秀意如何，仿佛眉山有二苏。
况复坝饒同殉国，天涯海角听相呼。

这是对郁华、郁达夫兄弟二人革命情操和铮铮铁骨的高度赞誉。

郁华，字曼陀，十七岁以府道试第一名入学，补博士弟子员，科举一废，入杭州中学，后来官费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后改入政法大学，返国后任天津交涉公署翻译，两年后考取法官，任职于京师高等审判厅，后又任大理院推事，大理院东北分院院长兼庭长，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上海）刑庭庭长，是郁达夫的长兄，画家郁风的父亲。

郁曼陀性格坚强，冷峻沉默，善于思考，熟悉中外刑律，对律法也有一定研究。他有忠诚的正义感，炽灼的爱国热情，见义勇为，不阿世取容的高风亮节，有人戏称他为“死人的额角头”。

郁曼陀和鲁迅颇有交往，他与鲁迅都留学日本，又是浙江大同乡，郁曼陀也是一位山水画家，诗歌也有造诣，他的诗词颇有晚唐清丽工稳的风情，再加上郁达夫的关系，他与鲁迅彼此尊敬，互相默契。由于郁曼陀在司法界工作，鲁迅和郁达夫为了援救被反动派关押的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就必然要找他设法帮忙，他必须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租界当局）的那些表面法律条文中找矛盾，靠着他的雄辩和一股正气，论定是非曲直，使反动统治者无可奈何，这样也往往使爱国有罪者达到无罪，而横行不法的特务汉奸也会落入法网。汪伪特务深知他的底蕴，对他恨得要命，他们的对策有两条，一是收买，希望郁曼陀先生能为他们所用，不惜诱以高官厚禄；一是暴力威胁，要致他以死命，曼陀先生以铮铮铁骨，不管是哪一条，他都不予理睬，终于在1939年11月23日在上海为汉奸刺客所暗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9年11月23日上午9时，郁华吃过早饭赴高院去办公，车夫将自备车拉出后，郁华就出门坐上包车，当时正下着大雨，车夫就回到车前将挡雨

布放下，不料这时候突然奔过来二十多岁的男子并对郁华说：“你竟不给脸。”遂向郁华开枪。郁夫人在房内，听到枪声遂即跑出，只见郁华受伤倒卧在车厢中。车夫死死抱住凶手，凶手奋力挣脱并向车夫开了两枪，车夫追到浦石路口只见凶手跃登车号为8741的汽车逃去，车夫立即向巡捕房报告，凶犯已无踪影，以后车夫看见8741号车停在上海伪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76号的门口。

凶手向郁曼陀先生连开5枪，郁先生中3弹，一在腰部，一在胸部，另一在心窝，穿入后背，郁曼陀被害后即送往广慈医院，因击中的都是要害部位，抢救无效，当即殒命。郁曼陀先生一生公正，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两袖清风，有青天之誉，他办案一秉至公，决无私仇。这次暗杀活动早有预谋，汪精卫政府曾要求郁曼陀先生参加“和运”，遭到郁先生的严厉拒绝，在郁先生被害后，有人问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郁庭长为何谋害？丁说：因他不参加“和运”，杀只鸡给猴子看看。这番话使暗杀真相大白于天下。

郁先生的遇刺，不仅没能吓倒有正义感的仁人志士，反而更加激起了人民对汪精卫国民政府，对所谓“和平运动”的痛恨，这也是汪伪当局所始料未及的。郁曼陀先生遇难后，各界人士纷纷举行吊唁活动，人们痛惜法律界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他的家人也十分悲哀愤怒，远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长兄被害，悲痛欲绝，撰写了《悼胞兄曼陀》刊于《星洲日报》上，还撰写挽联寄到上海：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而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1947年，郭沫若同志为地方人士筑的曼陀先生“血衣冢”撰写了铭文，由马叙伦书成刻石，以志不忘，现在富阳县委将毁于“文革”中的墓碑重新修复，并建亭子取名为“双烈亭”，为郁华、郁达夫兄弟立了一块碑石，除刻上他们的事迹外，还把郭沫若于1961年为郁曼陀遗作题写的上述诗篇刻上。郭沫若把郁曼陀、郁达夫兄弟誉之为“双松挺秀”是甚为精当的。

（责任编辑 龚明）

攻克

汤阴城



活捉东陵大盗孙殿英

● 陆军指挥学院 尹萍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被迫放弃了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我陕北、山东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豫北地区是联系陕北、山东战场的枢纽地带，是敌人打通平汉线的前沿基地。在该地区，敌人部署了王仲廉集团4个整编师，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部和孙震集团两个整编师共9万5千余人。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打破敌人联系东西两大战场的枢纽地带，策应陕北、山东战场我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心于3月下旬举行豫北反攻。基本部署是：首先以主力插入敌纵深的新乡、郑州之间地区，辗转机动，调动并力争在运动中歼灭可能由新乡等地增援之敌。相机夺取敌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尔后视情况西出道清路，或向新乡以北扩大战果。

刘邓首长决定，以4个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独立旅共10万人编为4个集团，进行豫北反攻作战。我第六纵队与第三纵队编为第三集团，经3月下旬作战，歼灭了敌人的大量兵力，解放了黄河以北、平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迫使蒋介石从山东战场抽调整编第六十六师和整编第九师增援豫北。我军为进一步歼敌，彻底摧毁平汉路安阳、

汲县段铁路，决定避敌主力，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有生力量。4月3日，六纵奉命北上，围攻汤阴。

汤阴乃历史古城，位于平汉线上，是敌人沿铁路实施战略机动的要地。由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孙殿英率所部暂编第三纵队防守。城防工事坚固，火力配系严密，副防御设施完备，孙殿英吹嘘其城防“固若金汤”。

鉴于汤阴的重要战略价值，刘邓首长决定采取“攻其必援、歼其援兵”的作战方针，1947年4月6日夜，我第六纵队和太行军区第一旅对汤阴城发起攻击，王仲廉果然亲率6个旅由新乡等地出发北援，第六纵队以18旅继续围城，主力准备打援，当敌进至汤阴以南宜沟地区时，发现我军主力，畏惧被歼，仓惶回缩。六纵主力回师，继续围攻汤阴。为痛打敌人，迫敌来援，刘邓首长增调第三纵队协同六纵加紧围攻汤阴。我攻城部队集中主力于4月15日黄昏攻击汤阴外围重镇张庄，战至午夜，将张庄守敌大部歼灭，生俘敌200余名，残敌逃回城内。张庄被我攻克，匪首孙殿英惊呼：“张庄失守，汤阴难保。”急电蒋介石求援，在顾祝同严令下，王仲廉又亲率四个半旅分三路再次北援。根据刘邓首长命令，我

第六纵队主力和第三纵队挥师南下打援，将敌第二快速纵队全歼于大湖营地区，余敌全线溃退，我军在追击中又歼灭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四十一师各一部。致使王仲廉龟缩新乡，再也不敢北援，汤阴守敌遂陷于孤立无援境地。我刘邓首长决定乘势攻取汤阴，于4月20日命我第六纵队和第三纵队北返围攻汤阴。当晚，六纵十七旅一举攻占汤阴城北关。扫清了从东关经张庄至北关敌军主要外围据点，然后从三个方向掘壕，逐步向敌城壕逼近，经10昼夜艰苦努力，掘壕11000多米，建成低堡火力点118个，炮兵阵地53个，主力直抵敌城壕外沿，形成了任我纵横的进攻出发阵地。

4月30日黄昏，我军开始攻击敌护城壕内外阵地，经一昼夜激战，与敌反复争夺，我军完全扫清城外守敌，汤阴城指日可下，匪首孙殿英急电蒋介石称：“共军正在攻城，汤阴难保！快快派兵救援！”蒋介石与孙殿英素有旧怨，又见难以解救，遂回电曰：“望兄以当年守亳州的精神顽强坚守！顽强坚守！”电文不无讥讽之意。缘由在于，当年蒋冯阎大战时，蒋军进攻西北军坚守的皖北亳州，孙殿英坚守，孤军奋战数日之久，使蒋军久攻不克，蒋介石一直怀旧怨在心。

5月1日下午，我攻城部队完成攻击准备，我第六纵队在城东城北，第三纵队在城西城南，对敌形成围攻部署。我第六纵队第十八旅第五十三团担任纵队预备队，配置在汤阴外围据点石家庄东南侧，任务是监视石家庄之敌，防敌突围逃跑，当时我在53团担任作战参谋，当时团里没有参谋长，由我直接协助团首长指挥作战。

下午6时，总攻汤阴城的战斗打响，我第六纵队和第三纵队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勇猛发起攻击，敌拼命死守，并以“奋勇队”拼死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战至翌日凌晨，我各路攻击部队攻入城内，穿插分割，与敌短兵相接，战斗胜利进展。

我们五十三团在城外待命，看到城内战斗激烈进行，都为参加不了战斗而着急。5月2日凌晨3时许，团长蔡启荣接到纵队王近山司令员电话：“纵队主力正在城内穿插分割敌人，孙殿英率其司令部已经出城向东南方向石家庄逃去，你团迅速展开包围石家庄，坚决歼灭突围逃跑之敌，不得放走一个敌人。要特别注意防敌从石家庄与城垣间暗道向南逃跑。”蔡团长和李震宇政委商量后，决定一营在石家庄东侧展开，团长亲率二营跑步到暗道南侧堵截敌人。凌晨4时许，石家庄之敌40余人向外突围，发

觉我三营部队后很快缩了回去。正在这时，第一营营长周兴华跑到团指挥所报告：城内战斗打得很激烈，石家庄内乱哄哄的，可能是城内被击溃的敌人都跑到这里来了，我们营能否乘敌混乱摸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李震宇政委说：“能摸上去倒好，若被敌人打下来，敌人从你营方向跑掉了，那可交待不了。”我在旁边接着说：“敌人已经混乱，无心防守，可以让一营两个连往上摸，留一个步兵连、机枪连、炮兵连和团特务连继续撤网堵截敌人。机枪连、炮兵连作好强攻准备，一旦摸不上去，就强攻上去。”李政委同意我的意见，一营周营长高兴地回去率领部队行动。接着我用电话向三营通报一营情况。三营营长王雨亭报告说：“九连连长杨靠山和营部书记武英带一个通信员跟着突围回缩之敌进了石家庄。我立即报告了李政委，他听完后叫我赶快到三营去看看。我跑步来到三营，问王营长部队为什么不跟上去？王营长说：“我营在这里撤网堵截敌人，是纵队确定的。部队上去，如果敌人从我营方向突围跑掉了，谁负责任？”我说：“敌人正混乱，一营马上就上去了，杨靠山也上去了，机不可失！快叫七、九连跟上去，留八连、机枪连和营直属排继续撤网，不要顾虑，出了问题我负责！”说完后，我带着七、九连迅速突向石家庄。

杨靠山、武英等三人趁着天未亮敌人看不清，跟着敌人进了石家庄，看到敌人十分混乱，很多人围在一个大低堡旁边，判定这是敌人的指挥所，他们不顾敌人众多，发扬了孤胆作战的大无畏精神，决定先发制人，争取主动。杨靠山叫武英和通信员赶快堵住低堡口，自己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拿着手榴弹跳到低堡顶上，三人大声喊道：“缴枪投降！”这一突如其来的喊声使敌人惶恐万状，不知所措，一名副官也未看清我军来了多少人，即进低堡向长官报告，不一会，一名五十多岁头戴礼帽、穿着呢大衣的高个军官举着手带着一小群人出来表示愿意投降，当他看到我军只有两三个人，立即将手插入大衣口袋掏枪。杨靠山见状大喝一声：“不准动，举起手来，再动就打死你！”遂即把枪口对准了这个为首的军官。与此同时，武英抢步上前把枪口对准他喊了一声：“不准动，举起手来！”并顺手从其大衣口袋里搜出了一支左轮手枪，这个军官不得不把手举了起来，但还在东张西望试图反抗，看到攻上来的我一营部队，才老实地说了一声：“统统放下武器！”周兴华营长跑了过来，看到这个人象孙殿英（当时营以上干部都看过孙的照片），就问他：“你是孙殿

中 惯



英吗？”他回答说：“我是孙殿英。”周营长又问：“你的枪呢？”孙说：“交给你们那一位兄弟了。”周营长不相信，叫通信员搜，结果又从孙殿英的腋下搜出一支精致的小手枪，接着又缴下了孙的两个马弁（卫士）背的一口宝剑和一把战刀。周营长用愤怒的眼睛瞪着这个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和汉奸，狠狠地斥道：“你这个大汉奸，真不老实！”孙听后急忙解释说：“我不是汉奸。”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折起来的一张硬纸一晃说：“我参加‘和平救国军’是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这是蒋委员长给我的‘手令’。”周营长要缴下这个“手令”，孙急忙说：“敌人什么东西都可以交给你，这个‘手令’我要直接交给刘伯承司令员。”

正在石家庄内的两三千敌人列队缴枪之际，从汤阴城内又逃过来两千多敌人，一看这里正缴械，调头就从暗道向南逃跑，刚出去就钻入我第二营布下的网袋，被我一网打尽。至5月2日8时许，敌暂编第三纵队被我全部歼灭，计俘虏东陵大盗、司令孙殿英，副司令刘月亭，参谋长冯养田以下3300余众。缴获迫击炮12门，轻重机枪40余挺，步枪、冲锋枪、短枪2000余支。

汤阴战斗结束后，孙殿英和其他团以上军官被押解到纵队，以后孙又被解到军区。根据团领导的决定，由我和保卫股长张汝南负责审理教育俘虏。5月2日下午，我和张汝南把孙殿英的马弁找来谈话。马弁说：“前天夜间，孙总司令说墙上挂的宝剑曾自动出鞘显灵（这口剑是孙从慈禧太后墓中盗来的），孙总司令觉得要出事，跪着向宝剑祷告。”我问马弁：“你亲眼看见宝剑自动出鞘了？”他说没看见。张汝南同志问马弁：“孙殿英身上有几支手枪？”马弁回答说：“他的手枪很多，抽屉里、枕头下都放着手枪，平时身上有两支，有时三支。”我们急忙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上级，军区保卫人员又从他的礼帽里搜出一支小手枪。

这个反共、反人民，罪行累累的东陵大盗后被关押在河北省武安县战俘劳改所。全国解放后不久病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责任编辑 淑玉）

“中统”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它和“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同是蒋介石的两大特务系统。

中统特务组织自1928年成立至1949年的20余年，其机构几经变化，但始终由CC头子陈果夫、陈立夫掌握控制。长期以来，“中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惯用阴谋和暴力镇压共产党和进步群众。制造的恐怖的特务活动，引起社会舆论强烈不满，广大人民要求取消“两统”的呼声日高。

抗战结束后，中统连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等等，受到全国舆论界的强烈谴责和抗议。

1947年，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后来又改头换面为“内政部调查局”。尽管其名称更改，但其实质不变，最后随着国民党的土崩瓦解，这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也撤退至台湾。

四面扩张 八面潜入

中统的原始组织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于1928年，开始仅十七八个人。工作重心除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和迫害镇压工农运动、革命人士外，还对国民党内的党务活动情况、派系活动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对反蒋派系进行渗透、瓦解活动。1932年在“中统”内部又秘密成立“特工总部”，人员增至三、四百人。他们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残酷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同时，又实行“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毒辣政策。据有关记载，中统在30年代上半期共“捕获”中共高级干部19人，中级干部80人，一般干部和党员1500人，由此受到蒋介石的青睐。1932年，调查科

统局的 用伎俩

● 闻起

改称为党务调查处（地址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内）。

特工人员的大量增加，在全国发展的特务及特务关系有几万人之多，上面拨下来的月经费 40 万元已不够用，特工中有人想出办法，将特务打入财政部盐务总局，一方面担负起盐务缉私督察的职责，一方面仍执行特工的使命。一经高层批准，财政部长孔祥熙马上开绿灯，200 名特工人员挂起盐务缉私督察员头衔立即上任。后来又有一批特务奉派担任税务督察。

1938 年 8 月国民党以加强对日力量为藉口，将党务调查处扩建为中统局（即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设在汉口黄坡路，后迁重庆，抗战结束后，迁至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正式成立后，中统的魔爪伸向全国各地，凡是有国民党党部的省区，都建立了特务组织，连盘踞西北的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都不得不接受中统的渗透。中统人员最多时，仅局本部就有六百人。散布全国各地的中统特务达 20 万人。

司法部门是在抗战期间接纳中统特务的，当时正值 C. C. 系洪陆东任司法行政部次长、洪兰友任法官训练所所长，他们吸收一百多名中统特务办了两届法官训练班，结业后作为战区法院检察官派往各省。这帮人后来有不少人担任地方法院首席法官、检察官、院长和特刑庭长。

中统局设立的党网科，在全国推行党员调查网工作，规定凡是加入党网的党员，必须侦察一切“危害党国”的活动，直接向中统局举报。这样，又有几万人拉进中统的特务圈子。

抗战胜利，民主、人权的呼声很高，特务变成

过街老鼠，中统局这块牌子再不能用下去了，于是中统局又改为党员通讯局，并且把中统局局本部的几个机构分散转移到行政部门。如党政调查处转移到国民政府主计处，处长王秀春带领 49 人成立新增的六、七两科，六科的公开任务是行政效率统计，七科的公开任务是施政成绩统计，而两科的秘密使命是搜集党务情报、政治情报、各派系动态和社会动乱情报。党通局的人事登记处转移到内政部第四处，由局本部秘书张国栋带领 30 人前往，公开任务是人口政策研究和搜集人口资料，秘密使命是搜集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历史情况、面貌特征、社会活动的档案，立卡登记。党通局的特种经济调查处转移到经济部，处长郑尧邦带领 30 人前往，该处的公开任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走私、黑市和囤积居奇，秘密使命是调查中共经济动态，进行经济封锁。

1949 年 5 月，中统又挂起“内政部调查局”的招牌。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前的最后一块招牌。万变不离其宗，中统特务机构的千变万化，它的反共秘密使命始终不变。

挖空心思 使出绝招

中统在特务活动中使用的阴谋手段，五花八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兹择其主要者分述如下：

以假乱真

三十年代初，张群在上海当市长，被上海学生包围在市政府内，失去自由。起因是在抗日爱国运动中有 8 名学生代表失踪，上海市学生要求立即释放，而张群一时又不知是谁抓了学生。

上海的中统机构负责人黄凯，接到南京总部的电话，限定在几小时内要把张群市长救出来，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不准打人，不准开枪。这道难题是蒋介石提出来的。

黄凯也不知道哪一部分抓了学生代表，没有一点线索，要用释放学生代表来换取市长的自由，没有可能，那末只能硬碰硬，进入包围圈，把市长救出来。黄凯急切间想出一个办法，以假乱真。他立即突击组成一支 500 人的“学生队伍”，除穿便衣的警察和特工人员外，大部分是捕房中学的学生。他们被用大卡车送到枫林桥，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释放代表”等口号。站在队伍前列的特工高声喊话，要和包围市政府的学生换班休息。不久，这批乔装改扮的“学生”就把层层包围圈打开一条通道，特务组长在市长面前说一声：“是自己人。”就把市长引出层层包围，送到

安全地点。

造谣惑众

1932年2月16日、17日两天，一向以耸人听闻的题材吸引读者的上海《时报》，连续刊登一条引人注目的广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上海的一家大报《新闻报》，以纯商业性报纸为号召，对客户送登的广告，一律“来稿照登”，在18日步《时报》的后尘，刊出这则启事。畅销全国的《申报》，不得不和《时事新报》于20日、21日同时刊出这则启事。

中统特务把这则通过四家有影响的报纸公之于世的启事，看作是一枚重磅炸弹，他们估计共产党包括伍豪（即周恩来）在内，只能挨炸，无法还手。因为处于地下的共产党人不可能站出来抗争，合法的舆论工具都不在共产党人手中。

但后来，在3月4日的《申报》刊出法国大律师为伍豪所作的声明后，读者对此事的真实性发生怀疑，黄凯和中统总干事张冲只好悲叹：“哪知道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中统热衷于造谣惑众，在抗战时期设立一个造谣科，美其名为“谣言清查科”，科长是赵毓麟。造谣的工作程序先是派出一批特工放谣，过几天后又派出一批特工去收谣，谣言的内容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口授。

抓辫子

中统奉陈果夫之命惩治政学系的辜仁发，因为政学系派辜霸占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的位置，作为省主席的陈果夫难以一统天下。中统下令由熟悉江苏官场的特务季濮先去打头阵，他对辜仁发的爱好及家庭生活研究了一番后，找到了打击辜仁发的突破口。辜仁发爱女人，在北平找了一个小老婆，现在在镇江又金屋藏娇。这个女人爱钱，见钱眼开，啥事都愿干。季濮通过小老婆的女佣送去两万元钱，请求辜厅长保荐一名无锡县警察局长。那知等到委任令一发，辜仁发就被控受贿。辜仁发大呼上当。

季濮一手导演的这幕戏获得成功，但政学系并不示弱。季濮找的是突破口，政学系找的是替罪羊，政学系把受贿罪的全部责任推到民政厅的一名科长身上，说受贿卖官是民政厅的科长和辜仁发的小老婆勾结起来干的。

辜仁发被认为无辜，依然无恙。

中统新任设计委员黄凯和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前往帮助季濮。他们把辜仁发的小老婆控制起来，并

搜罗到辜仁发和小老婆的结婚照片。然后又去山西把辜仁发的原配夫人请到南京，代她向法院控告辜仁发犯重婚罪。C. C. 在司法界有很大一部分势力，法院动了真格，开出传票。

辜仁发由于有政学系撑腰，竟抗传不到庭。于是，揭发辜仁发丑闻的传单在南京城满天飞，C. C. 动员各地有关报纸广为宣传，官场丑闻成为老百姓茶余酒后的笑料。法院一不做，二不休，因辜仁发抗传不到而发出通缉令。

政学系至此噤若寒蝉，不再吭声，丢车保帅的决策已定，让辜仁发自生自灭。辜仁发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弃官而逃，到山西五台山出家当和尚去了。政学系在这场搏斗中以失败告终。

招降纳叛

中统从1931年顾顺章的被逮捕到为蒋介石卖命，尝到了甜头，特别重视招降纳叛的工作。1940年10月成立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受到严重破坏，就是中统使用新老叛徒所起作用的一个突出事例。

中统为了扩大招降纳叛的成果，先后在南京及各省设立反省院，通过所谓感化教育转变反省人员的思想，并通过一定的评审程序释放反省人员，从接受转化的人员中发展特工。仅河南反省院一个部门，在被关押的1000名反省人员中就引诱100人参加中统。但中统头子徐恩曾对中共叛徒采取的基本方针是“用其才，不信其德”。就是用其破坏中共的才能，而不信其能始终忠诚，因此有一部分中共叛徒以后又被秘密处决。

（责任编辑 惠 兰）



司徒雷登

留在南京城的一个“谜”

● 北京 刘恩营

1949年4月20日,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构成的千里江防。4月23日午夜,大军直下钟山,解放南京古城,统治22年的蒋家王朝宣告覆灭。

在当时的南京城里,出现了没有料到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苏联驻华使馆,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与共产党人为敌的美、英等国的驻华使馆,却继续留在南京。4月24日,在南京市民迎接解放军的车队里,一辆由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派出的吉普车,正在山西路等候,当华野八兵团第35军103师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到达时,司机主动将车开向前去,沈鸿毅匆忙登上吉普还没分出究竟,开车的美国人便以熟练的汉语对他说道:“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沈鸿毅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顿感紧张。由于他没有与任何外国人联络的使命。最后作了个外交词令般的答复:“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侨民。”拒绝了美国人的要求,美国人碰了硬钉子,只好在沈鸿毅指定的地点停下车来,悻悻而去。

据了解,当时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手握30多亿美金,国民党政府多次向他伸手要美援,他既分文不发,也不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却坐等南京,并主动派人与其深恶痛绝的共产党人联系,美国的做法令人疑惑不解。

但若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至少有两点能够透视一下这个疑团。

一是蒋介石惹恼了美国总统杜鲁门。蒋杜不和,由来已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时,美国政府虽然确立了扶持一个“亲美、统一、民主”的中国的对华政策,但在具体政策上,美蒋仍有分歧。杜鲁门总统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认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共产党不仅有利,而且还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03页)。由于蒋介石内战决心已定,迫使美国只能把宝押在国民

党发动的内战上;从而将一笔笔美元仍进了无底洞。杜鲁门早对蒋氏的独裁腐败感到失望和恼火。美国人甚至把国民党集团比喻为一艘躯壳已经腐烂正在下沉的船。

事有巧合。1948年当杜鲁门与杜威竞选总统时,对杜鲁门很不感兴趣的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杜鲁门必然失败,便通过孔祥熙父子在美国花钱支持杜威。结果,杜鲁门登上总统宝座,得胜的杜鲁门对蒋介石本就没有好感,由此对蒋便更加讨厌了,尽管美蒋在反共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个人恩怨上,蒋介石得罪了美国总统,况且又是在蒋家王朝归于灭亡的情况下,美国甩掉国民党政府,似乎是不奇怪的。

二是渡江战役前夕美国对华政策转变。自从1945年4、5月间,美国确立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格局后,直到1947年上半年,美国几乎动用了除直接出兵外的各种手段,美援也几乎是随要随给。但到了1948年秋,已得到几十亿美元援助的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美国如再继续扶持国民党,必将被彻底赶出中国。这样,美国必须考虑摆脱因大力扶蒋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拉开同国民党这艘沉船的距离,重审日益走向死胡同的对华政策。为此,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文件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阐明了美国“脱身”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及同中共打交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并列出了美国对华新政策的具体方针(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面对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变,美国的决策者一时难下决心。济南解放,美国举朝震惊。10月13日,将该文正式列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并印发有关部门讨论。沈阳解放,淮海大战,使得许多美国人“清醒”起来,一度热衷于通过“换马”恢复国民党生机以保住其半壁河山的司徒雷登,此时也哀叹“现在都是空谈了”(摘自同上)。1949年2月4日,即(下转第49页)

我军占领南京



国民党“国防部”

1949年初春,有时阳光明媚,有时阴雨连绵。津浦路南段的铁道两侧,解放军的步兵、炮兵昼夜兼程,浩浩荡荡南下,离长江越来越近了。

第三野战军最末的一个军——第35军,是由鲁中南纵队和济南战役起义的吴化文部队合编的。由吴化文将军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胡大荣任副军长、张雄任副政委、孔繁彬任政治部主任(是曲阜孔夫子后代,老红军)。下辖步兵第103师、第104师、第105师和山炮团,隶属三野第7兵团建制,在渡江作战中由第8兵团指挥。

军属山炮团2个炮营、1个工兵营。团长是东北军老军人,名叫祈光甫,他自称是“保定讲武堂出身”;政委黄涛(后在上海投靠了“四人帮”)、副团长姜崑(后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王全(后任海军东海舰队工程部副政委)。

这个山炮团全是日式“41式”山炮,是骡马驮载或拖曳行军的。部队指战员走过了一个个车站,前边就是滁州车站,三野前指设在该县城。第35军奉命进抵江浦县境之乌衣、东葛、担子街一线,征集木帆船,进行渡江训练,每天牵着驮马上下船,这些驮马均是北方长大的,来到水网江河地域“水土不服”,经常拒绝上船,战士们要耐心地诱导它适应这里的环境。

三野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副政委江渭清、参谋长何以祥,负责指挥第24军、第25军、第26军、第34军参加东集团渡江作战。赋予第35军的作战任务是:攻占“三浦”(江浦、浦镇、浦口),相机渡江占领南京。准备歼灭国民党李延年兵团之第28军一部,从右翼攻取江浦县城,从正面攻取浦镇,最后占领浦口。

第35军部署在南京正面,并非是我三野第8兵团之主攻方向,而是担任战役佯动,监视和牵制南

京守敌,占领江北岸之桥头堡——浦口。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的望远镜,每天都在眺望着“三浦”据点,田野里油菜花香,柳绿桃红,一片春暖花开的气息,即将要“饮马长江”了。

4月20日,伟大的渡江战役开始了,我军百万雄师以雷霆万钧之势,西起九江的湖口,东至江阴,一夜之间摧毁了国民党军70余万人的千里江防。

据可靠情报:南京守敌和“国民政府”撤离了南京城,逃之夭夭了。于是,在23日黄昏,军部派遣了18名侦察员,驾驶了两只小船渡到江南岸,第一次设法搞来了一艘小汽船,可渡30余人;第二次又搞到一艘大汽船,可载运300多人。这时下关发电厂的工人驾驶了“京电”号小汽船也参加了航渡。

步兵第104师首先渡江,先渡过一个加强营,占领与控制了下关码头及发电厂,接着又载运该师的两个步兵团,他们迅速沿着几条马路占领了狮子山、紫金山、中山陵和孝陵卫。该师第312团政治处保卫股李股长率领该团特务连鄢连长,指挥两个排人员占领了“总统府”,降下了国民党的蓝旗,升起了一面红旗。步兵第103师位于浦口上游渡江,上岸后各步兵团向清凉山、水佐岗、五台山等制高点挺进,居高临下瞰制市区。步兵第105师向新街口、中山门挺进,并沿公路前伸至汤山,于桥头街、横岭村一线围歼了敌整编第4师,俘虏4000余人。

4月24日,吴化文军长、何克希政委率领警卫营进驻了国民党的“励志社”,担任指挥卫戍南京的任务。下午4时许,炮兵团第一营登船完毕,指战员们站立在驳船上等待开船。忽然间,东南空域传来了飞机声,两架P-51型(野马式)战斗机飞临江面上,降低高度向我船接近,似乎进入了俯冲航向。

营长杨连村当即命令司号员吹起防空号，岸上、船上的轻机枪、重机枪、卡宾枪、步枪在一瞬间都开火了，曳光弹冲上天空，密集的火光闪烁着，敌机没敢俯冲下来就调头向东北方向逃逸了。我们炮兵团平安地渡过了长江。取手们牵着驮马拖曳着山炮上了岸，欢迎的人群挥动着小红旗，高喊着口号欢迎解放军。接着第二营也抵达了码头，山炮团还有个工兵营也集结在马路广场上。这时，夕阳西沉，从中山北路驶来一辆黑色的卧车，车头的一侧竖立了“星条旗”。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专车，借机与我军领导接触，被拒绝。想继续往前开时，由于炮手们拥挤在马路上，挡住了它的去路，它在马路上原地转了一圈，无可奈何地驶离了。

6个山炮连24门“四一式”山炮和一个4门加重迫击炮连，还有军部教导团，组成了行军纵队，浩浩荡荡地进了雄伟高大的“挹江门”。

第一营政治教导员梁一新（后任海军广州基地副司令员），他给指战员们讲政治课曾说过：“1853年3月，太平天国号称50万大军，攻占了南京城，洪秀全命名它为天京，但是在1864年7月丧失了天京，遭到了覆灭，它的失败教训是惨重的，我们要引为历史的鉴戒！”如今，我们身临其境，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

宽广的中山北路，法国梧桐树整齐地排列两侧，有的马车与行军的行列同驶。马路两侧的工人、职员、学生、居民，手中挥动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我们途经热河路、山西路、鼓楼。天已黄昏，路灯亮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夜行军有电灯照明啊！

夜幕降临了市区，我们虽然没有吃晚饭、没喝水，但仍然雄赳赳、气昂昂，大踏步向新街口前进。不一会儿，见到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矗立在广场中央，他似乎在招手致意，昭示人们：我所创建的国民党腐败了，你们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人民拥护你们，你们胜利了，这是众心所向，顺乎历史之潮流……

我们队伍从新街口向左转向中山东路，走过逸仙桥，又向左转就是远近闻名的黄埔路——“国防部”了。它的大门敞开着，戒备森严的卫兵、宪兵早已逃跑了，于是我们山炮团进驻了“马标”，堂堂正正地占领了“国防部”。时间已是夜晚8时左右，指战员住进了“国防部”大楼，这些楼房多是两层楼，均是木地板，电灯耀眼，大家忘记了几天来战斗、渡江的疲劳，又说又笑。有人说：“过去在沂蒙山区环境艰苦，宿营地是山沟、是‘旅部’（驴子的棚屋），现在住上了楼”。还有人说：“济南、徐州、

蚌埠都比不上南京，从此再别走啦”。

第二天清晨，大家看到那数百匹战马、驮马拴在树干上、电线杆上，取手们正在煮黄豆、铡青草来喂马。这个大院里又成了名符其实的“马标”和“炮标”了。

早饭，大家到“国防部”大楼“参观”，营部的炮兵教员马尔龙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汤山炮校毕业生，他是鲁南战役那个“榴炮第5团”解放过来的军官，曾经参加过“缅甸远征军”作战。他说：这个作战指挥部是“白虎堂”，是军机要地，是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总参谋长陈诚、顾祝同的办公室，这里是指挥中枢。我们曾在华野特种兵纵队的特科学校学习过测绘，懂得军用地图的标绘，当大家看到墙壁上的巨大图板（可以左右移动，有三、四面），挂着大幅的军事部署图：“徐州会战部署图”、“江淮地区作战要图”、“京沪杭地区兵力部署图”……这些图不久之前都是绝密的，是黄埔军校高材生的“作品”，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实是“纸上谈兵”的无用遗迹。

有人意外地发现了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巨幅照片，是坚硬的厚纹纸，他们独出心裁地卷了回去，用剪刀剪成一双一双的鞋垫，放在山东的“老夸鞋”里。对于那些豪华的皮沙发，大家也轮流坐一坐，享受这松软的滋味。5月间，第35军奉命归建第7兵团，我们撤离南京，沿着“京杭国道”冒雨行军5天，抵达余杭县。

（责任编辑 霁 明）

（上接第47页）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了落实这份文件的行动建议。至此，经过近5个月的观望和研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基本完成。

基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1949年4月中旬，我军渡江在即，李宗仁在美国驻华使馆与美、英、法三国使节见面，乞求他们发表讲话，支持南京政府，警告中共不要渡江。但司徒雷登却一言不发。李宗仁愤然地说道：“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其实，这既是美国对李宗仁孜孜以求的“划江而治”大泼冷水。也是美国政府已经黔驴技穷，难言其苦衷了。

当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时，手握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大使竟派人派车迎接我军，并主动与我联系，这也许就是美国政府对其与中共打交道的对华政策的一次尝试吧？（责任编辑 惠 兰）



神州风云

总前委及二野指挥机关 何时进南京

● 南京军区政治部 陈广相

1949年4月20日起，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挥下，一举突破长江天险，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江南广大地区进军。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占领蒋家王朝的老巢南京，六朝古都从此喜获新生。几天后，由邓小平、陈毅率领的渡江战役总前委和由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率领机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分别由合肥瑶岗和桐城地区陆续东移古城金陵，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同志们胜利会师，在南京的革命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但是，关于总前委和二野领导机关进驻南京的具体时间，目前史学界还没有搞清楚，在一些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有悖于事实的说法。为此，笔者愿抛砖引玉，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关于总前委进驻南京的时间，现在有好几种说法。一说是4月23日（见《安徽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陈老总在瑶岗》一文），二说4月24日（见《江苏解放风云录》第235页、《安徽党史研究》1989年第18页、24页），三说4月25日（见《南京党史资料》第24—25辑第39页），四说5月的一天（见《周末》报总第453期文史版）。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说法均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首先，所谓23日、24日进南京说，都是没有根据的，4月23日总前委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是曾提出过待部署大定之后，准备离开合肥瑶岗进驻南京。但这仅仅是打算，是向军委的请示，并未付诸行动。其次，4月25日进南京说，倒是有一个根据的，这就是陈毅、邓小平于4月24日午时致军委的电报，该电中称，“我们遵命于明有（25日）夜到南京”。有人认为，既然这份电报已经明明白白地把总前委进南京的时间点出了，那么，25日说是毋庸置疑的了。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情况往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军事行动也常常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原来，当

总前委准备由合肥东行时，突然下起了连绵不断的大雨，交通受到阻塞，由此耽搁了行程。这一史实，是由一份历史文电透露的。4月26日午时，总前委就改变行期一事致电中央军委及已在南京的宋任穷等，告知：“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我们明感或后俭才能由合肥动身去南京。”这就不难看出，4月25日总前委未到南京是确实的。

那么，总前委究竟系于何日抵达南京的呢？是上述电报中所说的“感日”（27日）还是“俭日”（28日）？最近，笔者翻阅江苏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南京解放》一书，该书第104页有一则总前委致中央军委的电报，它一开头就说：“我们感夜到南京”。另外，笔者还查阅到了另一份能够佐证的原始资料，这就是4月29日总前委参谋处致粟裕、张震、谭震林等的电报，此电也提到“我们于感晚抵南京”。由此可以认定，总前委是4月27日晚上到达南京的。

关于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进驻南京的时间，有的认为是4月26日，有的则语焉不详。1949年4月24日，总前委打算东移南京时，曾与刘伯承司令员等商定，二野指挥机关于4月25日夜开始移动，26日夜进抵南京（见1949年4月24日陈毅、邓小平致中央军委电），于是，有人就认为二野指挥机关是26日到达南京的。其实，同总前委一样，二野领导机关当时也因连续大雨未能成行。4月25日傍晚，也即总前委与刘伯承等商定的“开始移动”前夕，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电告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敬（24日）有（25日）雨日，雨大水涨，交通受阻，我们决于雨止路通时遵令向南京急进。”又据4月29日总前委致中央军委电：“刘、张、李今艳日已到”，由此也可以认定，二野领导机关是于4月29日到达南京的。

（责任编辑 惠 兰）

回忆我的堂兄

卢前

卢素



卢前，字冀野（1905—1965）是我们三十多个叔伯兄弟姊妹中最年长的一个。我们都称他冀野大哥，弃世已四十年了，夜深人静，每当我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心头不禁涌起一阵莫名的惆怅与悲哀。

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早年就读于东南大学，随我国曲坛泰斗吴梅先生学研词曲，与南师大唐圭章教授、南大吴伯伦教授均是同门弟子。二十二岁时任金陵大学教授，后在成都大学、河南大学任教。1935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时，曾介绍我国当代昆曲大师俞振飞先生去暨南大学当讲师。抗日以后在中央大学文学系任教，一度当过系主任，抗日胜利后，任南京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通志馆馆长，并兼中央日报泱泱副刊主笔。平生著述甚多，有《全元曲》《金陵卢氏虹笈丛书》《中国戏曲史》《冶城话旧》等著作。

五四时期，他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军阀。大革命前后，他写过《秦淮近事》一词，以讽刺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词曰：

北正宫叨叨令秦淮近事

怪的是，秦淮河畔飞车马，几个俏娘行，逗着哥儿耍。咕噜噜才交几句知心话，忽地里唧唧铁锁

从天下，兀的不吓煞人也么哥，兀的不冤煞人也么哥。却原来他的罪犯天来大。

1934年他写下了《中秋感怀》五言诗一首：我亦辽阳鹤，山河举目非。泪流花比瘦，血染叶增肥。烽火连天碧，旌旗映日辉。故乡留不得，空见白云飞。

全诗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

抗战开始，他率领全家逃亡到武汉、重庆。为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他写下了著名的歌词《国殇》，这首洋溢着爱国激情和豪壮之气的战歌，曾鼓舞了将士们奋身杀敌的勇气。至今，听到电台广播这首歌曲，仍然引起我的振奋和亲切之感。

卢前为人拓落不羁，不拘小节。青年时代与诸友人同游牛首山，在中华门外找驴子作交通工具时，他只觅得瞎马一匹，跟在驴群后面，他骑在马上悠然自得，并诙谐地说：“我这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他常到我家来，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面颊上立时凹起两个酒窝，很讨人喜欢。穿着很简朴，甚至很“邋遢”。常见他蓬着头发，下巴上悬下来一撮两寸长的山羊胡子。很有点模仿于右任，想做一个美髯公。总是穿着一件

或蓝或灰的长布袍，脚穿一双圆口布鞋。他嗜酒如命，每天都得喝一点。来到我家，解开袖口，总能抖出一些花生米皮来。常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若不喝酒，文章就做不出来。喝了酒，就见他谈笑风生，滔滔不绝，纵论天下大事。”

抗日初期，蒋介石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南京有两个参政员名额，南京名流仇采先生提议，一定要选一人原籍南京的人士担任，卢前遂以无党无派、年轻有为而被遴选。后来他刻了一枚印章，曰“卢前参政”。参政会解散以后，仇采先生笑谑曰：“此章永久可用。可读为‘卢前、参政’，亦可读为‘卢、前参政’。”

他在《冶城话旧》一文中说：“李香君媚香楼，初不知其地。民国十三年在石坝街发现界石，始知楼亦去钞库街不远。日前如社主课，予因此命题，调寄高阳嘉台。”时有吴梅、唐圭章、吴伯伦、卢前、陈匪石、仇采等十几位文人集会，各自填词一首。诗稿现存仇采先生的公子仇良矩先生处。不失为当时的风流雅事。李香君故居陈列馆现已将吴梅、唐圭章先生的佳作装裱悬于媚香楼前堂左壁，供人欣赏。

他生平最得意的事，是结交了于右任这位辛亥革命元老。经常在一起写诗作赋。他敬佩于右任的人品，于右任也很赏识他的才华，赞誉他是江南才子。他曾向于右任学习书法，专攻草书，经过努力钻研，书艺渐精。有一次，他随于右任到了一趟新疆，在新疆还拍了一张骑马的照片，到我们家乡，谈起新疆见闻，谈起维吾尔族姑娘的歌舞，兴趣盎然。

（责任编辑 华云）

南京古代廉吏



吴福林

秦淮杂忆

(编者按:作者写了南京出生的廉吏和外籍在南京的廉吏,因受篇幅所限,本刊只选了第一部分)

自有行政建置,便有行政吏治。数千年来,南京该有多少大小官吏,南京又出了多少大小官吏,从内地至边陲,乃至异国。固然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是,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为国家和地方做出贡献的,纵然“逝者如斯夫”,青史仍然刻下了他们的名字。我们翻开历史长卷,令人触目感怀的总是那些“廉能吏”、“天下廉吏第一”的美称。然而封建时代的“廉吏”,自有他们的标准,与今天的廉洁奉公、人民的公仆当不能同日而语,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会拿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大凡是做了有益于大众的事的,人民是不会忘怀的。为了启迪后人,特撰此短文。

为官首要为民,若能为民,己必廉洁无私。否则必不能真为民。

邵清,字士廉,江宁人,明宏治壬子年(1492年)举人,后担任九江德化教谕,因为尽心教学,严格管束生员,并且拒不纳贿,被吏部尚书马文升、都御史戴珊极力推荐,擢升山西道监察御史。担任御史后,他对自己和下属要求严厉,改革旧弊,杜绝后门,官声大振。不料正德初年,却由此得罪宦官刘瑾,被矫旨逮捕,廷杖于午门,罢官回归。家人见而哭泣,邵清却坦然地说:“我非自败名节,以辱先人至此,况得失在我,何哭为?”闭门灌畦,怡然自得。直到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诛才恢复官职。任职云南、广西等地,生平所莅,皆膏腴之地,而纤毫不染。告老还乡时,家贫无屋,只得依外氏敝庐而居。督学林有孚来

拜访他,两人谈议多时,连清茶也未喝到一杯,方知他不但穷无器具,有时到日中连饭菜也无着落。礼部尚书霍韬得知此情,要把没收寺院的庵田赠送给他,做为生活来源。邵清婉言谢绝。病重之时,对其子邵应凤说:“为己谨独甚难,务保此生无过,己瞑目心始安耳!”

王以旂,字士招,号石冈,江宁人,明正德辛未年(1511年)进士,从知县一直做到按察使、兵部尚书、南京都御史。官不可谓不大。但是,家住南京聚宝门外小市口之西,距离驯象门里许,屋宇朴陋,居之安然。担任南京都御史官职时,车马每次出入,一定避开小市口,绕道而行。人问其故,他回答道:“此吾邻居父老子弟为贸易者,吾不忍以车前三马妨其务也!”邻居有一老人,同他父亲是好朋友,王以旂幼时喊他伯父,后来虽然做了达官,仍然恭敬地呼他为“伯父”。他住的地方荒僻多草,有人拍马屁拔了四名壮丁帮助芟除。王以旂急忙把他们遣退。有人劝他:郊居不便,不如另买城中房屋。并且把羊市桥北一所大宅推荐给他。他去看了一眼,即告作罢。同年赵大尹问他为何不要此宅,他说:“此府第也,门厅广大,必常得青衣数人守之,吾一老书生安能办此,况儿辈耶?”最后老死旧居之中,其家始终仅为中等人家格局。略有变化的是,他在做官之前只有矮屋三间,贵显之后,略加扩大,围了庭园。但是,三间矮屋始终保存,不加粉饰,并且亲题之曰“存本堂”,以示永不忘本之意。

清朝上元有叶氏兄弟二人。兄叶世经,字子常,号存斋,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以举人身份被挑选为知县。他办事练达,所到县境,即呈安宁,就是因为不善讨好上官,连调四地知县,二十年没有升职。其弟叶世倬,字子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举人,后选授湖北德安府同知时,兴修岳家口河工,时值盛暑,叶世倬为了早日完工,以利农田,寝处堤上,刻日蔽事,得以完成。人们感激他纪念他,称此堤为叶公堤。历署凤翔同州府事,擢补兴安知府。见汉江之水,屡为境患,修万春堤以障之。见关南书院久废不讲,为定条约,延名师,士气以振。汉南土润且宜桑,而当时民不知蚕,叶世倬导以缫帛之利,织者比户。大家感谢叶世倬的功德,将该绸取名“叶公茧”。不久,郡中旱灾,叶世倬申请由国库拨金十余万两用来赈济。上司认为所需过大,表示为难。叶世倬手捧乌纱帽坚决争取,方才获准。他根据户口册,某户某口,某口赈若干,一丝不乱,受到上司嘉奖。后因年老病弱,回归故里。他服官四十年,故里竟无一点房产。而甲戌年

(1754年)家乡旱灾,己卯年(1759年)重建府学,叶世倬毅然捐千数百金,为里人称道。

朱桂桢,字干臣,号朴庵,上元人,清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早在他八岁的时候,还跟随着外祖父居住,适逢江宁大饥,他跑到外祖父面前要求外祖父拿出家产拯救乡里。外祖父大喜,称赞他做得对。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他50岁,出为贵州镇远知府。镇远苗民杂处,素不知织,乃招他郡织妇,为之设局,教以纺绩,镇远之有苗布始于此时。不久,恰遇大旱,民将流莩,只有速赈方可救急,他来不及向上司请示,便拿出库藏,平糶施粥,使得郡无殍人。事毕,携带官印前往上司官府自请擅动库帑之罪。老百姓十分感动,第二年丰收,大家凑还了库款。后来,担任甘肃布政使时,觉察甘肃土瘠民贫,而会宁、安定两县尤苦无水,就让两县掘井以供民饮,共开五百余泉,大大便利了百姓。道光十一年(1831年)调任广东巡抚,却洋行陋规,惩不法外商;对百姓则教养兼施,深得民心。道光十三年(1833年)67岁时,因病休归,百姓送者空城。73岁时,逝于家乡。

罗凤仪,字威伯,一字亦凡,上元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授河南荣阳知县,未上,值河决开封,奉檄防护城垣。时水已薄城门,城内居民人心惶骇。他请求拨库帑十万作为救灾费用。上司认为所需过巨,他说:“省会重地,倘黄水一滴入城,仓库钱粮皆不可保,后悔何及?此非惜费之时也!”上司方才允诺。他招募千人,驰行泥淖中,不避危险,竭力堵御。在抗洪抢险中,收买百姓物资,皆优给价值,而个人无丝毫染指。故而民众一心救险,从无劫掠生事。罗凤仪也因而立功,加知州衔。后赴荣阳,办事明快,民间誉为“神君”。不久被保奏升迁直隶州知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麦歉收,贫民请借仓谷,按惯例借谷必有田之户。他考虑到众多无田户的困难,找来大户商议,建议由大户出头出具领状,然后一律均散,人皆有份。到丰年,有田者按田亩征还,无田者由大户代还,以抵捐赈。大家赞同。遂借仓谷五千石,民以无饥。一次在散赈中,操劳过度,触冒风雪,感寒生疾。百姓闻之,焚香祈祷者几及万人。他逝世时,妇女乞丐皆来哭吊。他居官常以廉勤自励,历任不带家眷,儿子长到9岁,父子尚未识面。

陈士全,字纯斋,江宁人,居孝陵卫,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举人,授直隶雄县知县,他骑驴上任,为门役所拒,直到他拿出委任状来,才让他进衙门。不久调赴望都,廉明慈惠,抽暇携仆巡历四乡,询民疾苦。该县旧有11泉,后皆湮塞,故常患旱。他自己拿

出新俸来疏浚,挖出4泉,方便县民。政声达于畿辅。因劳瘁,年未50而卒,望都人纷纷建祠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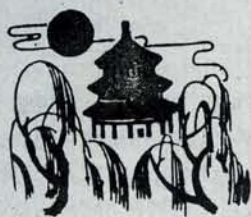
魏家骅,字梅村,晚号贞长,江宁人,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举人,戊戌年(1898年)进士。从师冯煦,在读书时即随其师办赈皖北各处。以实心行实惠,全活甚众。担任山东东昌府知府时,政绩显著。东昌所属十县,夙称腴美,可惜往昔缺乏良吏管治,渐即腐败。他一上任,倡导以农为本,首以兴修水利为急务,选择属吏中长厚爱民者共同周循河道,夜则篝灯制图,昼则计画分工。不到一年,其绩大见。过境者不由感叹:“此真循吏之治也!”年老返回故里。家本有工商业,任其弟管理,从不过问。每天只是研读佛经。有人劝他兴建寺刹。他说:“此亦功德事,可以起人信佛心,然非吾意所急也。”而认为济贫救孤才是当务之急,在上新河建孤儿院,专收贫家子弟之无怙恃者,以养以教,授以谋生之艺。几年下来,成材者几千人。

南京古代廉吏,不但声振中华,而且蜚声海外。古代南京即有4人出使过朝鲜。宋有秦梓,明有端木兄弟二人和倪谦。

秦梓,字楚材,乃是大奸贼秦桧之兄。不过其心志德操,与秦桧迥然相异。据《正德江宁县志》等记载,他于年轻时随从出使高丽。他是宋宣和甲辰年(1124年)进士。授太学录,擢枢密院编修官,兼提举湖南茶盐,除屯田郎,历知台、秀、袁、太平、常、湖六州,后以翰林知制誥出知宣州,再知湖州。每到一处,备受爱戴,离开时,民诣阙请留。弟秦桧当政,秦梓恶其所为,遂自江宁迁家溧阳以避祸。在溧阳,他广做好事,曾出资造桥,人称秦公桥(俗称夏桥)。

端木孝文和端木孝思兄弟二人,乃溧水人,同为官,明永乐中先后出使朝鲜。孝文先出使朝鲜,朝鲜重其才,在他即将离任之际,借祝寿为名要赠以厚礼,问他行李何在,他说:“吾持一节来耳,请以一节返。”坚不受礼,朝鲜人极其佩服他的清节。后来,其弟孝思又出使朝鲜,临行时,孝文赠诗勉励:“我曾持节往朝鲜,汝亦承恩下九天。手足情深当日,君臣义重报何年。云笼鸭绿江船月,风拂鸡翎土坑烟。奉使若无冰槩操,方如班马亦徒然。”后,孝思亦以一节还。弟兄二人,美名远播。朝鲜为了纪念他们,特立“双清馆”加以表彰。孝思善文,尤工书法,朝鲜人得到他的片纸翰墨,即视为珍宝。

倪谦,字克让,一字静存,上元人,明正统己未年(1439年)进士,亦曾出使朝鲜。曾官南礼部尚书。家居铁作坊,门颜“及第”二大字。铁作坊巷道狭隘,且



年羹尧轶闻三则

● 史明星

清朝著名将领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成名于康熙年间。雍正元年（1723年），奉命以抚远大将军率兵赴青海，平定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以功绩卓著被封为一等公。雍正皇帝称赞此次平叛“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后因功高骄横，滥杀无辜，又谮知雍正帝争位内情，遭劾查办，逮京严鞫，被构结罪名92款而赐死。其人轶闻趣事颇多，现列三则，以飨读者。

不谷将军

年羹尧为辩解功过是非，宣称其对粒米寸缕都爱护周至。其实他生活奢侈，日费万钱不足为惜。在军中曾谕示炊卒道：“浙米中有不去谷者，杀无赦；有隐匿不告者，罪当同论。”有一次，年羹尧的一位同乡来访，午餐时，客人将饭中的两粒稻谷拣出来放在案桌上。此时立于一旁的侍者焦急万分，对客人蹙额进行暗示，客人不知因由，更不察其意。年羹尧则以目光暗示司马官，司马官应诺而去。须臾，司马官端上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入见年羹尧，年见后仍谈笑自若。既而指所遗稻谷对客人说：“杀人者，公也！”客人大惊失措，出房询问司马官后才恍然大悟。故时人呼年羹尧为“不谷将军。”

贪夫眼眶骨

年羹尧用兵之际，声威赫然，而所至极贪黷。一日，有一老叟跪献一玉盆，内藏枯骨一片，枯骨形凹而中空，众人皆不识其物。老叟叩首进言道：“此骨乃至宝也！可将骨置于天平之左侧，右侧置黄金十镒（音yi，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或说二十四两为一

镒），必然是枯骨重于黄金。”年羹尧命依老叟之言试之，果然如此。遂命继续增加黄金，金加得越多而骨愈重。众愕然问其故。老叟不慌不忙，捏黄土一撮布于枯骨之上，骨顿轻而黄金顿重。因而问其是何物。老叟面视年羹尧说：“此物乃贪夫之眼眶骨。故金愈多，其眼愈贪，不知厌足，不见黄土而贪不休止。凡贪婪成性之人，平时堆金积玉，总以多多益善，待其死后，则身败名裂。其状如此枯骨，也是不见黄土眼不闭，心不死。”年羹尧明了老叟在以物喻人，默然不语。

闻雁即警

年羹尧征青海时，一夜扎营停当，安寝至三更时分，忽然披衣持剑出帐，传令分兵数队，离营十里埋伏，派帐前将卒带兵接应，并说四更时分将有叛军劫寨。众将士皆茫然，以其军令素严，故遵命设伏。四更后，叛军果然大至，伏兵突起应战，叛军毫无防备，大败而回，斩获无算。众将领回营入贺。一参赞恭问年羹尧：“我等同在营中，杳无所闻，不知将军是何以预知叛军将至？”年羹尧大笑说：“有给我送信的你，你们自然不会察觉。”众人愈发不解其意。年羹尧接着说：“昨夜在帐中，闻雁群从营帐上空飞过，嘹唳有声。可昨夜月黑无光，群雁早已就宿，必然是被人畜惊动之后才腾空而飞。群雁就宿多依水靠泊，其地离营帐只有百余里，为叛军来往必经之地。而雁飞快捷，雁以三更过，叛军必然四更许到。故命众将率兵设伏，大获全胜。”众将领听罢，无不佩服年大将军料敌如神。

（责任编辑 霁明）

许多铁工在两旁打铁器出售。倪谦乘轿从此出入，肆工皆起立迎送。倪谦就说：“汝吾乡人，毋为我出入，妨汝作业，第坐为之。”后仍起立，他一再婉劝，众人才安坐不起。后来有一御史，也世居巷内，往来经过，见居民安坐，便大发雷霆，还押送巡城，并想加以治罪。巡城御史诘问：“尔等小民，何敢如是？”居民曰：“小民俱为倪尚书所误。”详细说明前事，且云：“实不知御史又尊于尚书也。”巡城御史听罢，把他们全放走了。第二天，对此御史说：“闻居民言，令我亦惭！”

倪谦出使朝鲜时为正统己巳年（1449年），不但不辱使命，而且以其才华，名振朝鲜。当时朝鲜君臣见其风采凛然，曾请他命笔为文。他即席挥洒，略不经意，而妙语联珠。见者惊以为神功。据此后数十年所修《万历上元县志》记载，“至今（万历年间）（朝鲜）国内梓行其文。”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归来后曾著《朝鲜纪事》，记载出使情况，为中朝外交史的重要资料。

（责任编辑 霁明）



真实的写照

艰巨的工程

——《南京建材工业志》读后感

按：《南京史志丛书》的《建材工业志》首先出版了，值得庆贺。本刊将陆续发表评介。

建筑材料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穿、吃、住、行，人类赖以生存的四大要素，建材占了一半。它不仅是城乡居民建住宅的耐用生活资料，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农田、水利、厂房、车间、道路、桥梁、国防、军工都少不了它。

世界上各工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建材工业都是超前发展的，年增长率比其它工业要高出4%（美、德、东欧）到9%（日本）。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到本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小康水平。按照这一目标，建材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应略高于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一到二个百分点，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建筑材料工业是江苏省支柱产业之一。本人从事建材事业二十年，又长期生活、工作在南京，但我对建筑材料的来龙去脉，根本家底，只能说是一知半解。最近，有幸获得一部《南京建材工业志》，捧读之余，茅塞顿开，视野拓宽，知识增进。这部著作，帮助我弄清了许多事实，解决了不少问题，从而使我对南京地区建材工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尽管只粗略浏览一遍，但觉收获甚丰。这本书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实事求是的说，《南京建材工业志》，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好书。

一、南京地区砖、瓦、砂、石、水泥等传统建筑材料，从无到有，自古至今，如实人志，一目了然。

过去，人们通称五洋百货，说的是洋火、洋油、洋烛、洋碱（肥皂）、洋烟，都是舶来品，此外还有洋砂、洋布、洋袜。本书告诉我们，建筑材料中，也有洋字当头的货色，洋砖、洋瓦（机制红砖，平瓦）、洋灰（水泥）

● 国家建材工业局特约研究员 闻靖

曾经都是进口商品。其实，南京砖瓦发展历史并不短，东吴建石头城，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就设官窑烧砖建造宫殿。明嘉靖年间，“民众就采石出售，用于护坡。”清光绪十二年，六合红砂，就供上海铸造业使用。水泥厂始建于民国十年（1921），当时上海人姚锡舟等就集资在南京创建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距世界第一座显法小旋窑在英国诞生也不过36年。又过十二年，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建立，使我国逐步甩掉了用“洋灰”的帽子。

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生产力得到真正解放。

南京地区建筑材料工业，自建国以来，发展速度非常快，历史上哪一个朝代都不能相比。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持续发展，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南京地区，不仅传统建筑材料，在发展中不断提高，而且，建材机械，无机非金属材料，各种新型建筑材料发展都较迅猛，国营、集体、乡镇、个体，大家办建材。1987年，建材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2.1%，高于兄弟行业2%以上，明显超前发展。现在，已经是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应有尽有。不仅满足本地需要，而且还大量供应外地。近几年，又开辟了国际市场，已有12种产品，远销美、英、日本和东南亚、西亚各国，为国家创汇，为国家争光。在这期间，建材科研技术，也得到长足进步。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与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三、建材工业属经济范畴，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历来都是十分敏感，十分明显。南京地区建筑材料工

业发展历史,也不例外。

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征集天下工匠,轮番入京制造砖瓦”。“一时窑火日夜不熄。”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大兴土木,曾烧制九色琉璃砖瓦,建大报恩寺琉璃塔,曾被誉为“中世纪七大奇观”之一。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官窑渐衰。”鸦片战争后,开放商埠,洋砖、洋瓦,输入南京,兴起西洋式建筑,又掀起了仿制砖瓦的热潮,“窑户发展到200余家,居全国之冠。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建筑材料应运而生,全市机制砖瓦厂发展到30多家,轮窑数占全国五分之一。”国民党军政要员也集资办厂,现在的新宁砖瓦厂前身,就是当初的宏业砖瓦股份有限公司,顾祝同、何应钦、张学良、宋美龄等人,都是股东老板。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僚资本,无所不在。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建材顿遭厄运。抗战胜利,建材又劫后复兴。由于国民党打内战,工厂又复停产、关闭。直到解放后,才得到恢复和发展。1958年“大跃进”,造成建材产量虚假上升,质量大大下降。中国水泥厂年产46万吨水泥,有四分之一在300号以下,江南水泥厂熟料标号从453号下降到383号。“文化大革命”,建材生产又出现连年大滑坡。可见,政局稳定,社会安宁,必然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就一定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里,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安定团结是全国人民大局,必须时刻牢记。尤其是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更应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神圣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四、《南京建材工业志》中,各种资料应

有尽有,十分详细、完整。

南京地区建筑材料,从无到有,自少至多,由内而外的发展沿革,都有记载。主要产品产量,有逐年统计资料,品种、规格、质量、性能、价格、销售地点,都清楚排列成表。行业管理、新产品试制、科技成果奖励办法,职工状况、职工教育、人物传略、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以及市级管理机构变迁,领导成员更动等等,无不整理入志。打开本书一看,便能清清楚楚。

最后,还要说一下,建材志内容非常丰富、翔实。

它清楚地反映出南京地区建筑材料工业全貌。这里,表明南京市建材工业领导部门的工作状况,历史证明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南京地区基本建设,作出应有奉献的。同时,也反映出本书是全体编委主笔同志们高度负责,积极热情,辛勤劳动换来的丰硕成果。据了解,他们为了编写这部25万字的巨著,用了四年左右时间,参阅、摘抄了1840万字的文字资料,召开了百余人次的座谈会,调查研究,分析论证。为了弄清山东人开办的义和东砖瓦厂还是义合东砖瓦厂,究竟是“和”还是“合”?一字难明,追根究底。这种严谨治学,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作风,值得学习。他们为南京人增添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值得感谢。我以为,作为南京人,本书不能不读,作为南京地区从事建材工业的从业人员,更不可不读。

(责任编辑 海 鸣)

别开生面的《红楼丛话》出版

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丛话》是一部融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红学新著。

全书计30万言,134篇。内容分为:江宁织造曹家与《红楼梦》,《红楼梦》与南京,《石头记》版本谈,与《红楼梦》有关的物品,漫话大观园,名人与《红楼梦》,《红楼梦》影视剧谈,《红楼梦》杂说等八个方面。

著者严中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中国曹雪

芹研究会会员、南京古都学会会员。《红楼丛话》是他十年来研究《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家世与南京的关系相结合的结果。因此这部书不仅是供人们研读《红楼梦》和作为“《红楼梦》之旅”的开卷有益的参考书,而且也是研究南京历史和现状的别开生面的资料书。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为本书题签了书名并为之序。

(徐秀宜)

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

——读《南京建筑材料工业志》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申遇

近几年来,南京市史志工作成绩斐然,继《南京简志》问世以后,眼下正在纂修一套大型的囊括各行业门类约90部专志的《南京市志丛书》,在此基础上还将精修一部《南京通志》,这三大步,构成一个系列。是认识南京市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南京必不可少的伟大工程。

案头的《南京建筑材料工业志》,是《南京市志丛书》的第一部,也是目前国内建材专志的第一部。这两个第一,足以说明该志具有拓荒性的意义,同时在客观上对其他同类志书又存在着示范性的意义。笔者对建材工业,所知不多,纯属外行。从编史修志的角度看,该志突出的优点是:

一是脉络清楚。人们通过“建材”这一窗口,可以窥见建材工业在不同历史时代盛衰荣枯的沧桑。封建时代,当南京成为帝王都城时,为了建造城垣、宫殿、官署、陵寝,建材业就盛,反之,则“英雄一去豪华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建材业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侵华日军践踏南京期间,建材业呈现出一片衰败破落景象。新中国成立以后,带来了建材工业的新生,虽有“三起两落”的曲折,但企业数从240家,发展到了2000多家,花色品种之多,质量之高,销售之远广,是前所未有的。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由手工制作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化。

二是资料翔实。翔实者,丰富而且可靠,这是志书的生命力所在。我们常常说:“资治,教化,存史”六个字,其中“存史”是基础,有了翔实的史料,才谈得上“资治”,才能谈得上“教化”,否则是一句空话。《南京建材志》在搜集、整理、鉴别史料上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由于原始档案的残缺、矛盾,民国《首都志》记建材的只有336字,可谓挂一漏万。这就增加了工作的难度。编纂人员不辞辛劳,不仅在本市图书、资料档案部门,反复探求,而且奔赴上海、大连等地追踪寻找,共积累文字资料达1840万字。并且还召集大小座谈会11次,走访老人18位,力求使文字资料与口碑资料相互印证,去伪存真。从而弄清了过去含糊的史实,如日军侵入中国水泥厂的具体日期,江南

水泥厂如何掩护自己而免遭日军劫掠的情节。从老房子上的一块瓦片找到了义合东砖瓦厂的厂名,纠正了旧志书记为义和东之误。

志稿列表80余张,以充分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我以为这是有益的尝试。因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数据,只有掌握数据,分析数据,作定性定量研究,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现象的质量关系的复杂结构,从而使社会历史研究更趋科学化。

三是实事求是。对建国以来南京建材业的发展,既记成绩,又记曲折和失误;既展望美好前景,又看到当今的不足和问题。值得提起的是对历史人物的记述比较客观、公允。如对创办中国水泥厂的董事兼总经理的姚锡舟,叙述了他创业的动机,乃出于抵制舶来品,以谋求“挽利权而资发展”,建厂之初,由于外商倾轧等原因,以致连年亏损,资金短绌,股东纷纷要求退股。姚毅然将工厂全部资产向上海银行界作抵押,换取百万资金,从而使工厂转危为安。又如对袁心武,不因为他是袁世凯的儿子就加以否定,志稿叙述他青年时代胸怀“实业救国”志向,先后投资兴办了多种厂矿。“九·一八”事变后,来南京栖霞山创办江南水泥厂,在南京沦陷期间,他又巧妙地保护工厂。解放以后,他向国家献出了全部企业。编纂者并没有对人物发表评说,列出其生平史实,功过是非,已令人一目了然。

四是实用性强。志稿采用横排门类,纵向叙述,纵横交织,点面结合的体例,集编年、纪事本末、纪传各体于一炉。其优点是,既有历史发展的线索,又有各门类,从生产、销售到研究;既有全面性的概况,又有一个人、一个厂的事迹。其中尤其把一些代表性的工厂,介绍其厂址、规模、产品,有利于开展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总之,《南京建筑材料工业志》是成功之作。但似乎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如“概述”,是否可以再简明一些,概而述之,画龙点睛即可。特别是罗列的几张表格,是否可以移至有关章节之中。

(责任编辑 海 鸣)

关于提高政党、政权志

记述质量的几个问题。

● 沈阳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殷蔚然

志书质量是志书的生命,是研究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永恒主题。当前,城市志大都进入总纂成书阶段,志书质量问题更显得迫切和重要。1991年1月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地方志第三次协作会议,重点讨论政治部类的质量问题。根据会议期间大家的意见,分别归纳介绍如下。

关于提高政党志的记述质量涉及的问题

1、通过调整政党志的名称、卷序、篇目和字数,提高中共志的位置和份量。

关于政党志的名称。有的同志提出,“政党志”比“党派志”确切、鲜明、政治意义浓。这个意见可供考虑。

关于顺序和结构问题。有的市把中共志顺序提前,有的设专志或专篇,采取升格或单列的办法,突出中共志,有的把解放前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集中记述,这些办法也可以根据各市的实际情况,采纳吸取。

关于字数问题。各篇章的字数多少,没有固定性规定,大都是相对而言。有些市对中共地方组织志的字数进行解剖分析,发现市委志字数过少,甚至等于或少于市工会、团市委,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过去的篇目不列字数,沈阳采取在总纂篇目上标明字数的办法,不仅有利于了解和分析各部分的份量,也有利于控制各部分的字数,解决志书规模越来越膨胀的问题。

2、中共志的内容要突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决策作用。这是提高中共志内在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志不能只写机构沿革、人员更迭、历次会议,也不能只写党务工作和自身建设,如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党校工作、纪检工作等等,而应该把市委重要决策的制订,决策的贯彻,执行结果和经验教训作为重

点,突出记述。即使叫“党务纪略”、“中心工作”,也应该把重点放在决策上,而不宜放到活动和工作上。

3、充实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社会主义新方志不仅要反映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反映精神文明建设。目前,精神文明内容薄弱,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记述薄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使写精神文明,也大多写文化事业,而对思想倾向、精神面貌、道德风貌等内容记述很少。党的十二大把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部分,指出重点是思想建设。任何社会都是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如果从社会主义新方志中看不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影响、作用,那怎么能说志书姓“社”。《大庆市志》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到重要位置的做法,很值得学习。

4、如何解决对市委工作评价的依据问题。中共志的真正难点在哪里?上面三点固然是问题,但解决起来并不很难,有些问题市志办自身完全可以解决。真正难点是如何估价历届市委班子的功过是非和经验教训。不要说总体评价,往往一个重大问题都难于定论;不要说市志编辑、主编,就是现任市领导,也不好评价老班子,而且不只是评价某一届班子,而是要记述解放四十年。这就涉及分期问题,例如分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这样大分期,同各市情况结合不紧,评价的地区性依据不充分。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评价还是组织评价。任何个人评价,都很难通过。所以,解决的出路是:以历届市党代会划阶段,以党代会报告、重要全会报告和重要工作会议报告的评价为基调。因为,这是经多次起草、反复修改、班子集体讨论通过的。但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不要照抄照录党代会和其他会议的文件,形成资料

汇编；二是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党代会和其他会议的文件，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依据，经过分析研究，加以记述。

5. 执笔人问题。中共志有特殊性，有个由谁执笔的问题。执笔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熟悉市委领导工作宏观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二是在组织上隶属于市委。市志办的同志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写起来很困难，一遍又一遍，往往不合格。沈阳在这方面有教训，过去层层下放，由档案馆资料人员搞，结果失败了。哈尔滨和鞍山的经验值得重视，由前秘书长或厅主任执笔，水平较高，组织系统上也比较顺。

关于提高政权志的记述质量涉及的问题

提高政权志的记述质量，有些问题与政党志有共同性，如篇目结构、内容重点、执笔人等问题，这里不再重复，除此以外，还有两问题需要提出。

1. 如何更鲜明地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问题。许多同志的发言中都提到这个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区分得更鲜明，即在篇目结构、志书布局上也体现出来。有三种写法：第一种写法是，把新旧政权，按问题和工作横排几块，然后竖写，这种写法不能反映各个时期政权的全貌和性质，显然不行；第二种写法是，把新旧政权，按历史发展，记述更迭变化，即先分期后分类，这种写法可以避免第一种写法的重大缺陷，但把清末、民国、日伪、国民党四个时期的旧政权与人民政权排在一起，从篇目排列和结构布局上仍然难以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第三种写法是，政权沿革，只写旧政权的沿革，人民政权单列横排，例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检察，人民审判，或再加上人民公安，人民司法行政，人民军事等，这样，就在篇目设置和结构布局上把两种政权区别得更鲜明。有的同志说，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主要看内容，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在结构上也区分得更鲜明，不是更好吗！

2. 如何记述市政府。各市普遍遇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市委和市政府记述上的交叉重复；二是市政府与各委办局的交叉重复。关于第一个交叉重复，会上有的同志发言提到，过去长期党政不分，交叉重复难以解决。既然历史的实际就是党政不分，作为反映历史实际的志书，能分得开吗？我想，分不开的不就强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政逐渐分开，就反

映怎样分开的。这样既能如实反映领导体制的发展变化，也有利于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当然，市委、市政府不是一部志而是两部，所以能分的还是要分。关于市政府的记述，重点应是对市委决策的贯彻执行，而且在执行中也有决策性的，即施政方针。关于第二个交叉重复，概括说，是写政务、政事、政绩？写政务，大都是各种会议和活动，意义不大；写政事，如人事、劳动、外事、民政、信访等，容易形成部门志；写政绩，在各卷中写得很充分，而且写政绩只写果不写因，也写不清楚。写政务、政事、政绩不好写，出路何在？看来还得从高层次上写，即写执行决策。这样，解决两个交叉重复，就统一到执行决策上，其文字表述可以是：施政方针的制订和实施。这种提法，与政府志更贴切。在写施政方针上，核心是充分反映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一些市提出每年为人民办十件、二十件实事，若干年办了多少件，就是实际例子。当然作为市志，仅仅写所办的实事很不够。但无论如何写，都得特别注意反映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实质。

最后再强调一下，这里不是明确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而是明确基本思路和解决的方向。

（责任编辑 海 鸣）

欢迎订阅 《南京社会科学》杂志

《南京社会科学》是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一份有代表性的大型学术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 28—145，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1—8263，逢单月发行。

《南京社会科学》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注重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性问题，注重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注重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南京的历史文化问题。创办两年来，以其独特的风格赢得了读者的欢迎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从 1992 年起，《南京社会科学》每期将增至 128 页，内容更加丰富。全年订价 14.40 元，通过邮局订阅或直接向编辑部邮购均可，邮汇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白下路 257 号（210001）。联系电话：412647、407532。

读《楚爰金研究》

● 湖北省社科院楚史研究所所长 郭德维

最近读了黄德馨同志的新作《楚爰金研究》(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我认为是楚文化研究中一项新的收获,因为有关楚国经济方面的研究,一向是个薄弱环节。这方面研究的同志较少,论著不多,专著更是凤毛麟角。这种情况的造成,主要是因为资料少,基础差,难度大。现在《楚爰金研究》的出版,就我所知,这是第一部研究楚爰金的专著,不能不说是这方面的一个突破。

楚爰金研究之所以重要,因与楚国的经济直接有关,甚至还关系着楚国的发展乃至兴衰。爰金盛行于楚国的中后期,楚国的经济也在其中后期达到了高峰。特别是楚迁都于陈于寿春以后,楚国的军事力量看来是极大地削弱了,然而其经济还有所发展,有的甚至还有较大发展。楚国能以支撑,正和它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有关。楚国重农是无庸置疑的,东迁以后,在安徽江苏等地搞了许多水利设施,促进了农业发展,保障了粮食供给,这历代学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楚国从来不抑商,这一点也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然大量楚爰金的出土,正好说明了这一事实。愈到楚国后期,楚的上层统治阶级愈益腐化,而经济其所以还能发展,却正与重商有关。重商是楚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高层统治者更急需高档的商品,这样,更助长了商业的活跃,也就促进了商业和楚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历代的学者注重楚商业及其作用远远没有注重楚农业及其作用的程度。而这一点恰是不能忽视的《楚爰金研究》的出版,正补充了这一不足。

《楚爰金研究》的问世,正如何浩同志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作者从1980年起开始搜集资料,并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发表了一些专题论文,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增加许多内容,重新撰写”,最后才成书。

首先是该书对爰金的各个方面及其相关问题,如天平砝码、如衡制、如冥币等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而且也尽可能从爰金演变的各个不同角度去进

行研究,陈述己见。许多问题,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看法:如“爰”字,作者探其源,辨其流,认为不是重量单位,并论证“爰”应释为“易”或“换”。又如提出楚国大小不同砝码的递进比例是采用2倍与1.5倍相结合的进位原则,并论证楚国的衡制是斤、两、铢制,即1斤=16两=384铢。1两=24铢。正如我国著名的钱币学家朱活先生所肯定的:“其说颇颖”。

其次是更系统了,作者系统地阐明了爰金的孕育、诞生、发展、鼎盛与消亡的全过程;并明确提出孕育于春秋中期,诞生于春秋晚期,发展于战国前期,鼎盛于战国晚期,衰亡于西汉中期。这不仅对初学者接触爰金时,能有一个整体的全貌认识,就是对一些专门研究工作者来说,可能学术上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值得争论的地方,然而作者毕竟提出了他的理由与论据,这些都值得去深思,并促使进行深入研究。

其三是更完整了,这个完整性除前面所指的全面、系统外,我感到更突出的是资料的完整性。资料既有文献资料,又有出土的文物资料。而特别是出土文物资料:不论甲骨文、金文、简牍刻辞、侯马盟书、秦篆等各种字体的“爰”字;或解放前后历年所出土的各种形制、各种式样的爰金及与之相关连的天平砝码等,几乎都收集无余。并且在著作之后详细著录了历年所出各种爰金包括冥币的版式、字样、数量以及天平砝码的出土地点、出土情况,按出土先后整理为《爰金考古大事记》,这不仅大大丰富了该书的内容,也增进了该书的完整性。这就大大便利了青年学者和基层同志去查找有关爰金资料,也有利于学术界对爰金展开深入研究。

作者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在楚爰金研究方面取得的这些进展,确实是十分可喜的,当然也是来之不易的。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作者是历史学家,但研究的主要对象,运用的基本资料以及对爰金形制采用的分型分式等方法,却都是考古学方面的。这

些说明:考古学的成果与考古学的研究手段,已不能单纯只为考古学家所独有或“垄断”了;也说明考古学以外其它研究古代社会的行家,不论研究经济货币,还是研究农业、工业,也都时刻在关注着考古学,并与考古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因此近年来应运而生出现了诸如农业考古、音乐考古、艺术考古……现在爱金的研究实际上不也是货币考古吗?今后,随着考古资料的更丰富,各项专门学科的更深入,可以预言,将会出现更多门类的专业考古。

由《楚爱金研究》还可以得到另一个启迪,即对考古学,特别是对楚文化考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来,对楚爱金的研究,楚文化考古的行家理因肩负起来,至少从资料的获得与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判断上,有许多更方便之处。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研究者寥寥。为了楚爱金研究向更深层开拓,也为了适应一些专业考古的需要,考古学应主动向他们作些倾斜,这既是考古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促进考古学本身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楚爱金研究》在许多地方是以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为基础的,或者说,主要是采用了考古学研究的某些成果:如对墓葬或一些器物的分期断代;对一些墓主身份等级的推断等。如书中对爱金的孕育、产生和发展时代的判断,绝大多数是以考古分期为依据的。如果考古分期出现了误差,若将一座本来应属战国中晚期的墓,定为战国早期或更早;或者倒过来,将本来应属春秋阶段的墓,定成战国时代的。又如若将一个本来应属富庶平民的墓定为中下层贵族;或本来就应是中下层贵族,却定成了平民。这样引伸开来,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成问题。令人十分可喜的是,近年来,考古学本身也加强了墓葬分期分类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楚爱金研究》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若从更高的要求来说,也还有不足或有待提高之处。如对有些关键问题并未作出回答,本书虽全面论述了爱金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强调了对楚国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为什么独独在楚国获得发展,而在楚以外的其它地方就得不到发展?对这一点,作者也尽量作了一些解释:如楚国产金,其它地方不产金。单凭这一点,不足以令人信服。同样,楚国产铜,其它地方不产铜,而其它国家为什么能用铜铸造货币与兵器呢?显然,单凭出不出产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应有更深层的原因,读者期望作出回答。又如书中提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为什么?作者也作

了种种解释,都只是强调了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客观需要,却忽视了楚国一直“重商”这一基本国策,因而也就难以圆满解释爱金为什么在楚能迅猛发展。忽视楚国重商,从而也不能正确认识楚国经济的基本特点,势必将要贬低爱金在楚国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书中另一不足是对考古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注意不够,上已提到,许多考古报告、简报,特别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初的一些考古报告,因受当时条件(主要是资料)的限制,有的墓葬年代定得不太准确,这一点,俞伟超先生在《楚文化考古大事记》①序言中已讲得很明白;八十年代的一些考古科研成果②也已作了修正。书中对这一点是注意不够的。另外,也还有极个别地方论证推敲欠严密。这些,虽无伤大雅,如果改进,则更能增加光彩。

总之,《楚爱金研究》不愧为一本好书。

(责任编辑 霁 明)

注:

①《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②我这里主要所指对楚墓的分期成果,主要有:(1)拙稿:《江陵楚墓论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2)荆州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3)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我国确定 十大城市

截止1989年底,我国大陆已有城市450个(不包括港澳),其中直辖市3个,计划单列市14个,地级市171个,县级市262个。

在这众多的城市中,哪10个是最大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按可衡量城市规格的市区非农业人口、建成区面积、房屋建筑面积、工业总产值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含集市贸易成交额)这5项指标分别排列综合比较可知,我国最大的10个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哈尔滨、南京、重庆和西安。

(摘自8月24日《信息日报》)

分类指导 专题研讨

——城市志指导组天津会议述略

本刊特派记者 王能伟

根据分类指导、分区协作的精神,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批准并列入今年工作计划,1991年10月8日至13日,城市志指导组在天津市举行了城市志质量研讨会,重点研讨了政治部类的质量问题等。城市志指导组成员市、计划单列市、华北各省(区)城市及省志办的代表共30人参加了会议。30多位代表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或作专题发言,城市志指导组组长陆天虹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重要讲话,副组长梅关桦在闭幕时作了会议总结。会议还根据城市志指导组的提议,成立了华北地区城市志协作会。

陆天虹在开幕词中回顾了全国修志15年形势,就地方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及城市志质量要求等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还强调指出,地方志历史悠久,但编纂市志是新兴的事业。古代都邑志、城厢志同现代意义的城市志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一方面老城市日新月异地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新的城市在不断增加。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从1983个发展到467个。1990年我国城市国民收入已占全国国民收入的一半,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从沿海到内地星罗棋布的大中城市已成为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近几年城市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城市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多种功能显著加强。特别是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城市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外向型经济加速发展,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热点地区。因此,城市志在地方志大家族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编修好城市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为加强指导,全国专门设立城市志指导组,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曾先后在南京、鞍山、昆明、大连召开过多次城市志研讨会,还在广州举办过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地方志研讨会。由于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而每次会议容量有限,不可能吸收更多的城市参加。所以,从前两年起,指导组建议各地组织分区协作,先后有东北、西北和这次华北片城市志协

作会的诞生。分区协作,专题研讨,是城市志研讨走群众路线、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方法,应该继续提倡,越搞越好。

通过研讨,与会代表进一步认识了集中研讨政治部类记述问题的重要性。尤其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时泛滥的今天,搞好社会主义新方志政治部类的记述,反映我们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特点,十分必要。方志工作者将城市志作为专题加以研讨,切实编好志书的政治部类,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由于政治生活、政治现象错综复杂,与会代表普遍感到政治部类记述之重要和记述之难。有的代表说,如果讲在非政治部类的记述中,编者的观点还或多或少隐伏在各个篇章之中,而在政治部类的记述中,那将完全袒露出来,虚实无遮,正谬立见,所以都担心出差错,有点「如履薄冰」之感。因此,代表们都以极大的兴趣,就政治部类的许多问题,诸如政治部类记述对象的外貌与实质、新旧政权记述的联系与区别、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的评价、政治部类的综合与分析、政治部类与非政治部类的关系、如何突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何摆好共产党与其它政党的关系等共性问题,展开了热烈而认真的研讨。

会议希望继续发扬城市志研讨的优良传统和学风。既体现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生动活泼;同时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虚怀若谷,互相吸收。通过一次次的协作研讨,加强市志界的团结和协作,把城市志的质量搞上去,使方志事业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六

朝

建

康

皇

家

苑

園

綜

述

●
卢海鸣

一、苑囿的发端

我国古代皇家苑囿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据《诗经·大雅·灵台》及《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周文王在丰(今陕西户县)经营的灵囿“方七十里”,其中筑有灵台和灵沼。秦汉时期,兴造苑囿之风有增无减。秦始皇在渭南上林苑中“作长池……筑土为蓬莱山”,汉武帝在建章宫、未央宫和上林苑等宫苑中筑山掘池,多种奇树。但是,无论是秦上林苑还是汉代宫苑,布局规划都不够合理,偏重于离宫别馆的建设,较多地带有先秦时期古囿游猎的风情。三国时期,孙吴雄居江左,江南始出现皇家苑囿,然其营构因陋就简,相对来说尚较简朴。晋末永嘉乱后,帝室南迁,江南自然山水的秀美给统治者以强烈的震撼。一方面,他们沿袭从中原带来的奢靡之习,崇尚浮华,讲究排场,注重饮食之精美,考究衣着之华贵,过着放浪形骸、腐朽糜烂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受到魏晋以来玄学思潮的熏陶,把纵情山水、归隐山海林泉视为风流旷达的标志。一时间,在红尘四合的帝都建康掀起了一股开池筑山、兴造苑囿的热潮。

六朝江南的苑囿集中在帝京建康城内外,一般均由两部分构成,即专供皇帝居住和大臣朝见用的宫室,以及专供观赏游乐用的园林。宫室部分庄重华丽,雕饰精微;园林部分清新自然,活泼多变。山石、水池、花木与建筑相互衬托,相映成趣。反映在造园艺术上,表现为由秦汉时期的以建筑为主体转向以山水为主体;由轴线对称转向因形随势,从而开创了融意境、韵味和自然于一体的江南古典园林的先河。

二、苑囿的类别

六朝建康(孙吴时称建业)皇家苑囿见于史载的有西苑、桂林苑、宫苑、华林园、别苑(西园)、乐游苑(北苑)、上林苑(西苑)、南苑、芳林苑(芳林园、桃园)、娄湖苑、方山苑、新林苑、灵邱苑、博望苑、芳乐苑、建兴苑、江潭苑(王游苑)、兰亭苑、青林苑、白水苑等二十余座。这些苑囿,尤其是东晋南朝时兴建或改扩建的苑囿,受中原影响较大,名称上多仿效中原。它们主要分布在钟山、青溪、玄武湖周围以及秦淮河畔、长江之滨。换言之,帝京建康城内外景致佳丽之地都成了皇家苑囿选址的目标。

1、孙吴时期兴建的苑囿

西苑 孙权在位时设立,位于东吴皇宫太初宫西门外,是专供皇太子居住游乐用的园林。吴末帝孙皓时,传说因公元272年凤凰一度聚集在苑中,以

为吉祥嘉瑞,于是将这一年号改为“凤凰”。西苑内掘有水池,与当时都城内开凿的重要漕运水道运渎相通,因此四季无断水之虞。西苑的位置在今广州路北侧南京大学南园一带。

桂林苑 据《宫苑记》记载,桂林苑位于落星山之南,是孙吴时设立的苑囿。该苑为吴大帝孙权游娱憩息的场所。晋左思《吴都赋》说吴大帝孙权曾“飧戎旅乎落星之楼……数军实乎桂林之苑”。落星楼高三层,筑于落星山上,登高远眺,金陵胜景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桂林苑所依托的落星山的位置在神策门(今和平门)内,临近玄武湖西北滨。

宫苑 孙吴初年,在太初宫的东面和北面是皇家花园和皇宫卫队的营地,名曰苑城,又名建平园。占地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同时容纳三千贵族子弟在里面骑马和操练。吴末帝孙皓即位后,骄奢淫逸。公元267年,他在太初宫东面苑城的位置兴造了一座周长五百丈的新宫,称昭明宫。为建造这座豪华的宫殿,孙皓命令中下级官吏全部进山督促民工采伐木材。与此同时,他还缩小皇宫卫队的营地,以供兴造苑囿。因该苑囿包含在昭明宫内,故称为宫苑。宫苑中,孙皓命人垒土筑山,于山上兴建高楼,用珠玉加以装饰。在楼阁的四周,列置着嶙峋的怪石,或称弯崎,或叫临砌,试图创造出“有侔造化”的山林环境。而且,他还开凿城北渠,引后湖(今玄武湖)水进入宫内,使宫中四季清水常流,微风轻吹,泛起层层涟漪。假山、怪石、绿水与宫殿建筑融为一体。孙皓整日住在昭明宫内,沉缅酒色,不理朝政,终致亡国受辱。昭明宫内苑囿的位置在今鸡鸣寺和市人民政府大院一带。

华林园 位于今天鸡笼山和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大院一带,是六朝时期江南地区历经朝代最多、存在时间最久的一座皇家苑囿。其前身是孙吴宫苑,东晋定都建康后,沿用曹魏邺城、汉魏洛阳城华林园之名,对其进行修葺。孝武帝时,穿池引水,垒石堆土为山,极力创造富于山情野趣的山林环境,并增修清暑殿、延贤堂,高檐飞甍,备极崇丽。宋文帝时,对华林园进行大规模扩建,命将作大匠张永设计规划,于园中穿池凿山,广建殿宇。有蔬圃、景阳山、武壮山、花萼池以及听讼堂、光华殿、灵曜殿、风光殿、竹林堂、射圃、醴泉堂、一柱台、层城观等等。其中改扩建的建筑物,或为处理政务之所,如听讼堂(原名延贤堂),宋文帝、宋孝武帝等常在此召见大臣,处理政务;或为讲武骑射之所,如阅武堂,堂前建有射圃,

专供皇帝骑射之用;或为皇帝起居之所,如竹林堂、风光殿,宋废帝刘子业曾居住其间;或为皇帝拜佛之所,如灵曜殿,刘宋皇帝屢在其中求佛。齐时,又兴建了一些景致和建筑,妙绝古今。梁武帝时,于景阳山上筑通天观,观前起双层楼阁,上层叫重云殿,下层叫兴光殿,殿前两侧建有崇楼两座,左称朝日楼,右称明月楼,两楼均构筑得巧丽无比。陈后主时,奢侈荒淫,为取悦宠妾张贵妃和孔贵嫔,不惜在园内大兴土木,于光熙殿前增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每阁均高达数十丈,连绵数十间,其墙壁、窗户、栏槛等均是使用檀香木构造,经久不蛀,微风拂过,浮香暗飘,沁人心脾。三座楼阁均装饰着金玉珠翠和珠帘宝帐。楼阁附近,石山峥嵘,细流淙淙,奇花异木缘石而长,不啻人间仙境。陈后主流连忘返,与妃嫔宦人淫乐终日,制造《黄鹂留》、《金钗两臂垂》、《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亡国之音,赞美张贵妃、孔贵嫔的姿容美丽。其中有“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之句。可惜“一曲后庭歌未歇,可怜亡国恨悠悠”(清·余宾硕《金陵览古诗》)。

华林园的营构充分体现了人工美与自然美的和谐统一。以故游园者步入其中,便会领略到“会心处不必在远,脩(xiao)然林泉,便有濠濮间趣,觉鸟兽自来相亲”(《景定建康志》卷22)的情趣。

公元589年,隋军攻占建康,六朝金粉之地横遭“平荡耕垦”,华林园这一园林艺术的杰作也未能幸免于难。

2、东晋时始建的苑囿

别苑 位于今天朝天宫一带。相传春秋时期这里是吴国冶铸兵器的场所,称冶城。晋元帝大兴初年,仍有冶炼作坊。由于烟尘污染,一次丞相王导在纳凉时,大风扬尘,浓烟漫天,碎屑飘扬。王导不久卧床不起,久治不愈。方士戴洋劝说王导:“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烁,不利。”王导依其言,将冶炼作坊迁至石头城东,以冶城为西园。乾隆皇帝二下江南时,游观朝天宫,题有“西园今日姓王非”之诗句,表达了时过境迁后的一种感慨。晋太元十五年(390年),武帝为江陵沙门法新在西园中立寺,称冶城寺。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桓玄叛乱,不久攻入建康,篡权窃国,国号楚。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春,桓玄将冶城寺僧人驱赶到附近的太后寺中,废寺为别苑。在苑中广起楼台亭榭,“飞阁复道,延属宫城”,景象十分壮观。桓玄兵败后,别苑又恢复为冶城寺,直至隋灭陈后才废弃。

乐游苑 位于覆舟山(今小九华山)南一带。

孙吴时期,宣明太子在其地凿有西池。东晋时为药圃,刘裕曾于其地筑园垒以抗击卢循的义军。晋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疏浚西池(又称太子西池),并在其中筑土为台,蓄养武士。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宋文帝刘义隆以其地为北苑,兴造亭台楼阁,旋即改名乐游苑。元嘉十一年(434年),宋文帝于苑中禊饮,令与会者即兴赋诗,由颜延之作序。宋孝武帝时,以其北临玄武湖,地势凉爽,于其山中凿井以藏冰,是为南京藏冰的最早历史记载。大明年间(457—461年),又造正阳林光殿。梁中大通三年(531年),武帝幸乐游苑观武。侯景之乱时,乐游苑毁于战火。陈文帝天嘉三年(565年)重新修葺。陈宣帝即位时,北齐使者来祝贺,曾于其中宴请齐使。太建七年(575年),以甘露频降于苑内,陈宣帝于苑中采甘露,宴饮群臣,并诏令于苑内龙舟山(即覆舟山)作甘露亭。但此时的乐游苑规模、气魄已大不如前。陈亡后荒芜。

3、南朝时兴建的苑囿

上林苑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九月建。又名西苑。史载,苑中有古池,俗呼饮马塘或饮马池,池的西侧有望宫台。梁简文帝《春日想上林》诗写道:“……荇间鱼共乐,桃上鸟相窥,香车云母橐,驶马黄金鞵。”景致之美,妙不胜数。上林一名仿自中原。北宋诗人杨修之有诗为证:“秦甸荒凉汉苑深,当时白虎毙千金,江南地窄分茅少,也学中原有上林。”上林苑的位置一说在玄武湖北,一说“其苑连鸡笼山”。根据实地察看,其位置在鸡笼山北侧的西家大塘一带较为合理。

南苑 始建年代无考,但最迟应不晚于刘宋明帝之时。《宋书·明帝纪》记载,宋明帝末年,大臣张永乞借南苑以作私园,明帝答应“且给三百年,期讫更启”。北宋杨修之诗云:“张永移家入洞天,绿篁红藕旧林泉,人间满百人应少,明帝恩深三百年。”同时代的诗人马野亭也称赞道:“当时南苑最新奇,胜似其他东复西,多少园亭行不到,纵横石径动成迷。香风十里荷花荡,翠影千行柳树堤,伊被何人曾借住,端知误入武陵溪。”据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卷六记载,自宋明帝以后,南苑成为“都人游集之所”。梁诗人何逊《南苑》、何思澄《南苑逢美人》、庾肩吾《南苑看人还》等诗作,俱可反映当时南苑游人如织的盛况。南苑似乎成为类似今日公园之类的游乐场所。南苑的位置在秣陵县建兴里,即今集庆路一带。

芳林苑 一名桃花园。本是齐高帝萧道成的

故居。萧道成取代刘宋后,修旧宅为青溪宫,并在宫内筑山凿池,作为居住和饮宴游乐之所。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曾禊饮于苑中。王融《曲水诗序》记述这次禊饮情况时写道,齐武帝“载怀平浦,乃眷芳林”。梁武帝灭齐后,将芳林苑赐给南平元襄王萧伟为宅第。萧伟于苑中筑山穿池,蒔花种树,“穷极雕靡,有侔造化”,藩邸之盛,诸王侯皆望尘莫及。

芳林苑的位置,据《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引《太平寰宇记》记载“在古湘宫寺前,临近青溪中桥”。《建康实录》卷二亦云:“今湘宫寺门前巷东出度溪(青溪),东有桃花园,是齐太祖旧宅,即位后,修为园,亦名芳林园。”古湘宫寺、青溪中桥的位置据近人陈治敏《钟南淮北区域志》记载在青溪菰首桥南。菰首桥即今天的竺桥,由此可以推断,芳林苑的位置在今天竺桥东南附近一带。

娄湖苑 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正月立。据说齐武帝闻方士言娄湖有天子之气,于是修葺其父高帝的居宅青溪宫,并作娄湖苑以压王气。娄湖苑附近有宋沈庆之和梁邵陵王萧纶的宅第,景致迷人。陈时,娄湖苑备极崇丽。一说其位置在今雨花门内老虎头一带,临近秦淮河。一说其位置在新林,即今板桥镇西北江边的大胜关一带。

方山苑 据《上元县志》注引旧志说,齐武帝时设立,在今江宁县方山脚下。一说未曾立。

新林苑 齐武帝萧贲永明五年(487年)十月初立。齐明帝萧鸾建武元年(494年)十月即位后,旋即诏罢新林苑,以其地归还百姓。其位置据《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卷九记载,在新林。即今板桥镇西北江边的大胜关附近。

灵邱苑 《乾隆江宁县志》注引《宫苑记》记载,灵邱苑为齐武帝时立,位置在新林。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以其地为法王寺。另说灵邱苑即新林苑。

博望苑 齐文惠太子立,位于钟山南麓。唐朝杜伏威的部下辅公祐举兵反唐时,曾筑以为城,辅公祐兵败后被废。梁沈约在《郊居赋》中写道:“睇东嶽以流目,心悽怆而不怡,昔储皇之旧苑,实博望之余基。”北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也有“西瞻博望,北临元圃”之句,虽系感时之作,但却说明博望苑在南朝苑囿中颇负盛名。博望苑的具体位置,据《建康实录》卷二记载:“走马桥,桥东燕雀湖(今南湖),湖连齐文惠太子博望苑。”又据陈治敏《钟南淮北区域志》考证,博望苑在半山园之南,东临前湖。旁为沈约宅

之旧址。

芳乐苑 据文献记载,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三年(501年)夏,殿内失火,毁十余所宫殿。东昏侯于是大兴土木,营建芳乐、芳德等殿,并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饰以金壁。并强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外国寺的光相佛面和禅灵寺塔的宝耳作为殿内装饰。又凿金为莲花,使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也。同时又在建康宫城内的阅武堂中设芳乐苑。苑中山石,悉涂五彩,跨池水立紫阁,墙壁之上画男女猥褻之像,穷奇极丽。时值盛夏,苑中栽种花草竹木,朝种夕死,死而复种,乃至强行征求民间奇花异木,动辄毁墙折屋,百姓怨声载道。他还在芳乐苑中模仿大市,立店设肆,与宫女宦官扮作商贾做买卖。以潘妃为市令,自任市吏录事,遇到纠纷则由潘妃裁决。东昏侯常以挨潘妃杖责为乐事。不仅如此,东昏侯还命人在芳乐苑中开渠立埭,自己充当纤夫,亲自拉船,“体验”船工生活,而且在埭上设店,亲自掌刀卖肉。昏庸之状,纤毫毕现。以故当时百姓有歌讽颂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建兴苑 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二月建。梁东宫学士、秣陵人纪少瑜《游建兴苑》诗描绘该苑之美写道:“丹陵抱天色,紫渊更上林,银台悬百仞,玉树起千寻。水流冠盖影,风扬歌吹音,踟蹰怜拾翠,顾步惜遗簪,日落庭光转,方幌屡移阴,终言乐未及,不道爱黄金。”建兴苑的规模估计不是很大,梁诗人庾肩吾《送别于建兴苑相逢》诗有“相逢小苑北,停车问苑中”之语,即可作为明证。建兴苑存在约40余年,侯景之乱时,这里沦为军队临时营地,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便消声匿迹了。

该苑的位置在瓦官寺东北、秦淮河南岸的秣陵县建兴里,即今花露岗东北的集庆路一带。

江潭苑 又名王游苑。梁大同九年(543年)兴建,工程历时四年,至太清元年(547年)方告竣工。《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引《舆地志》记载:“(梁)武帝从新亭凿渠通新林浦,又为池,开大道,立殿宇,亦名王游苑。”可见江潭苑中山石、水池与殿宇齐备,无疑是帝王游憩饮居的绝好去处之一。江潭苑的位置在新林,即今板桥镇西北江边的大胜关附近。

兰亭苑 具体位置与肇建年代今已无考。但据《梁书·武帝纪》记载,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二月,侯景围攻台城时,各路大军勤王,其中“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帅江州之众,顿于兰亭苑”,据此可知,其兴建时代应不晚

于梁。梁武帝曾在此举行文酒之会,时人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描述道:“策星依夜动,銮驾总朝游。庭门临苑树,相风出凤楼。春生露泥泥,天覆云油油。桃花舒玉润,柳叶暗金沟。楔川分曲洛,帐殿掩芳洲。踊跃鲙鱼出,参差绛枣浮。百戏俱临水,千种共逐流。”

青林苑 据《上元县志》注引《宫苑记》记载,其位置“在篱门亭北,路西枕后湖”。《嘉庆重刊江宁府志》说得更明白,青林苑“在玄武湖东”。青林苑究竟建于南朝何代,因目前史料缺乏,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白水苑 据《首都志》注引《宫苑记》记载,覆舟山“又有白水苑、阊风亭、瑶台诸胜”。参照该书附录的“六朝宫城外图”,大致可以推断白水苑的位置在玄武湖东南临近太平门一带。

以上诸苑基本上在隋灭陈后遭到毁弃。实际上当时的皇家苑囿远不限于此,无奈时代久远,无从一一稽考。

三、六朝苑囿的历史地位

六朝江南建康都城内外众多美仑美奂的皇家苑囿与鳞次栉比的私家园林、佛教殿宇及衙署建筑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帝京繁华图卷。红墙碧瓦、梵宫刹宇与芳草绿树交相辉映,仿佛人间仙境。六朝建康皇家苑囿的兴起,在江南历史上尚属首次,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同时代遍布江南的贵族私家园林的建设,而且对后世江南古典园林发展也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时至今日,六朝园林遗址早已荡然无存,然而它“代表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成就,仍将散发出经久不息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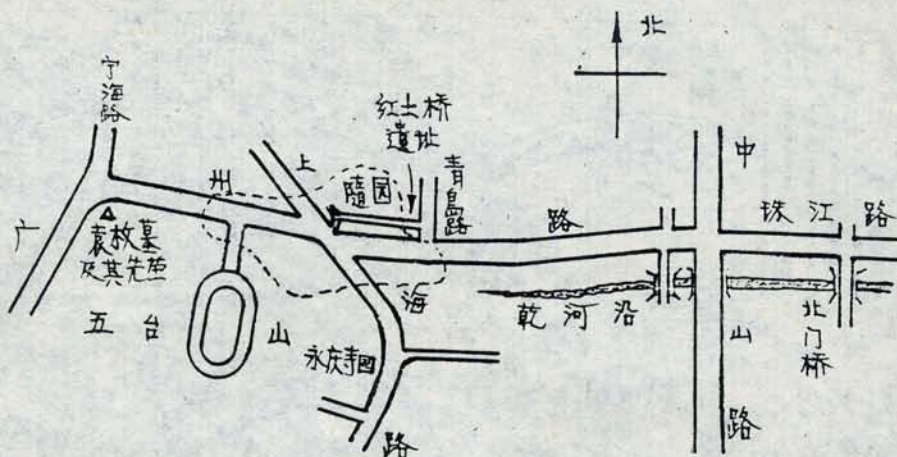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霁 明)



● 震 持

随园

及其遗迹的新发现



随园位置示意图

南京城内小仓山一角上的“随园”系清康熙时曹雪芹曾祖、祖、伯、父三代江宁织造所有，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曹家被抄，赏赐给了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是为“随园”，七年后雍正驾崩。乾隆十三年（1748）“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为江宁知县袁枚（子才，简斋）购得，次年袁辞官，锐意经营二十余载，易隋为随，优游林下，诗酒宾客中，园居五十年。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莫都金陵，为夏官丞相所居，惜毁于同治初（1852—1854）湘军围困天京之役。

相传登金陵仓山（今五台山）之巅“四座，则长干塔、雨花山、莫愁湖、冶城、钟阜之属，近者星罗棋布，遥望三山、白鹭洲，江光帆影，映带斜阳”，“凡江湖之大云烟之变，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其北小仓山（今小巷随园）面南山如翠屏，可南望梁永庆寺（今上海路29号国联纺织厂）之白塔，东“见覆舟山、鸡鸣塔、台城、孝陵诸胜景”。两山之间更夹有清流（今广州路）、稻田、芦荻（原系杨吴金陵府北城濠西段），故为历代造园者所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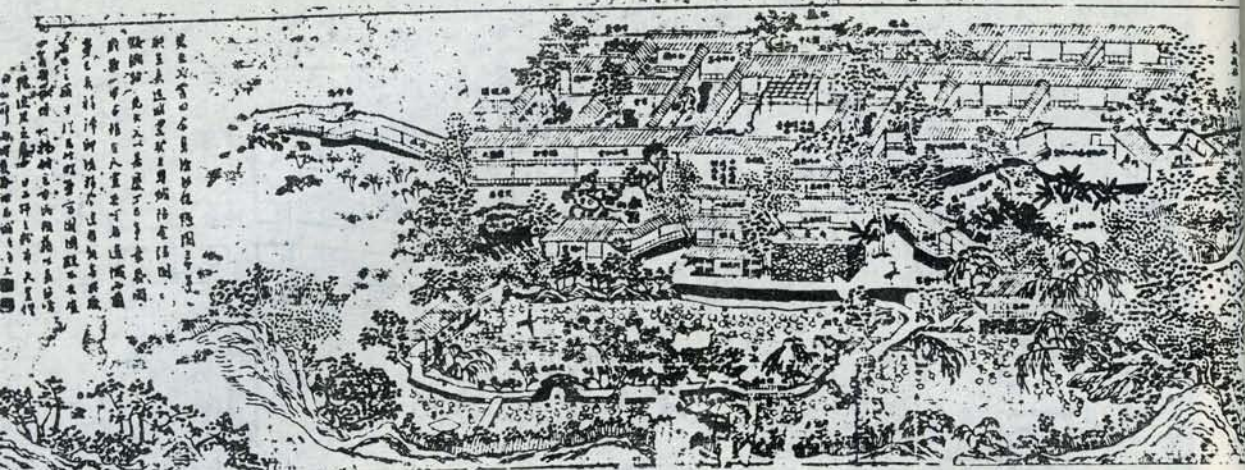
随园“有小仓山房、云舍、书仓、金石藏、小眠斋、绿晓阁、柳谷、群玉山头、竹请客、因树为屋、双湖、柏亭、奇礁石、回波闸、澄碧泉、小栖霞、南台、水精域、渡鹤桥、泛航、香界、盘之中、赚山红雪、蔚蓝天、凉室、古柏奇峰、藤花廊、芍药台、判花轩、需雅、悠然见南山、鸳鸯亭、绿净轩、芙蓉屏、琉璃世界、神清之洞、水西亭、山半亭、香雪海、诗世界、诗城、环香处、夏凉冬煖所、北麓，依山构造，皆天然形势。”水中筑桃花堤，遍植菖蒲，山上种梅百余株以及玉兰、海榴、朱樱、兰蕙、绿蕉、丹桂、西府海棠等奇花异卉，更有五鬣

松、珙珞柏、桐、银杏等参天古木，“附园有水田、菜畦百亩”，顾云《盛山志》谓之为“天下所称名园者也”。

随园是我国古典园林中唯一“不筑墙垣”可供外人自由游览的私家花园。子才原籍杭州，自谓“余离西湖三十年，不能无首丘之思，每治园戏仿其意，为堤、为井、为里外湖、为花港、为六桥、为南峰、北峰……”而园内土木工程、花树培植主要出自梓人龙武台之手，故随园实为诗人、工匠通力合作之结晶。其“有如梯田”的楼、台、亭、阁间以“长廊相续”，“虽无奇伟之观，但得曲折之妙”。这等布置以及集田、园为一体的型式在历代众多园林中并不多见。此外，随园还开了我国园林使用“引进”建筑材料的先河——以玻璃代窗纸，随园二十四景中就有三景是由白色、紫色、蓝色玻璃构成的，还有另外两处用绿色和五色玻璃装置，更凭“方丈高镜三”获得了“望去空堂疑有路”的效果。所以随园在中国建筑史中亦占有独特的一席。

除了袁枚在此写出了《小仓山房文集》、《小仓山房外集》、《小仓山诗集》、《小仓山房尺牍》、《随园随笔》、《随园食单》等大量作品外，这里还是日后曹雪芹塑造《红楼梦》中“大观园”的主要蓝本之一，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由于中国史志的一大缺憾——无精确之地图，使众多历史遗迹失传，随园也不例外，仅知其大略分布，而难觅精确位置，有说“东迄北门桥，西达清凉山”的，有说“东起乾河沿，西至随家仓、乌龙潭”的……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童寓雋老教授在其1937年所著之《江南园林志》中叹随园“惟今日已无迹可寻”！有幸四十年后又在其遗著《随园考》中进行了大量考证、研究，并收



袁起绘随园图(1865年)

集到道光三年(1823)汪英福所绘《随园览胜》图
和同治四年(1865)袁起(子才族孙)所绘《随园
图》,据此由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晏隆余同志制出了
《随园总平面布置图》,使我们能一睹当年随园风采。

笔者少年时家居小巷“随园”左近,节假、课
余常游履其间,虽已迁离该处三十五载,但于其山
形、地貌、遗物及距此不远的袁氏墓地尚记忆犹新,
家母(现年七十六岁)亦云:五十年代初青岛路、随
园巷口尚有“随园故址”木牌,故对童老以为的随
园遗址不敢苟同,近期根据童老大作特去复勘、查
访二十余次,见到一些随园遗物、听到许多宝贵的
口碑史料,并证之以袁枚《随园记》等文六篇、随
园咏景诗二十四首、袁起《随园图记》等文献,终
于找到了随园东门外的“红土桥”遗址,发现了随
园二十四景中迄今唯独留存的一景——澄碧泉,认
定了另外三景——小栖霞、神清之洞和山上草堂的
所在,从而可以准确地指出昔日全园各建筑、景观
的位置。

据记载:“园外数武有小桥,名曰红土桥,江宁
诸达官访随园者,仪仗不过此桥,以示雅慕之意。”
查武为半步,即三尺,显然红土桥为随园东界。但
该桥早已不存,原址更难寻觅。今笔者由数位老居
民口中得悉:红土桥在青岛路、广州路口西北侧,现
江苏省轻工塑料工业公司之后。原来小仓山东坡甚
平缓,雨水在其上聚成一矩形大塘(今青岛路中学
附近),并向南下泻,冲刷出一道深涧,阻断了北门
桥至清凉山的进香大路(今犹存少许),为便利通行
筑一小桥于涧上,涧两边为红砂岩,因名红土桥。由
此去北门桥二里,恰如袁枚、袁起所记“金陵自北
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金陵由小仓山过红土桥
即为随园”。

随园虽早已于一百三十年前荒废,其山、其水、
其石、其残砖碎瓦难道就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有的!
笔者重访小巷随园、广州路、上海路、五台山、永
庆寺、随家仓、南冬瓜市等地,见山形依然如随园

文、图所描绘者,惟“清池、水田”、芦荡已成大道
(广州路)矣!广州路北仍为黄土峭壁,有假山石、
建筑石、园石、古青砖、白果树……等散布其间,显
然这些都是随园遗物(随园二十四景中有“因树为
屋”,即一巨大之银杏树)。查访中结识了马、李、张
诸姓老居民,其中马老已八十九岁高龄,其曾祖系
袁枚家人,居此已四代。他们称小巷随园为随家花
园、小仓山为随山、五台山为仓山,说“山下原有
花园河和塘(在河与小仓山之间);红土桥以东、上
海路以西的广州路上有水田”;随家仓、冬瓜市这边
都是芦苇;早年在花园河“这一圈(东起红土桥,西
至上海路口偏西)河、塘边挖出了大量(护岸)木
椿”;削五台山北面陡坡和小仓山南坡一部开出上海
路,将土填入花园河和塘中,筑成这一段广州路……
从而可以肯定:当年随园的“双湖”、“菡萏池”就
在今青岛路至上海路西的广州路上。

据袁枚《随园五记》,园应有井,而与实际“毫
厘不差”的《随园图》和《随园图记》中却没有井,
只有泉。《石城山志》谓小桃园“其相近有伏挺泉,
南朝古井也。”故随园中的澄碧泉很可能也是一口古
井。不论“为井”、为泉,现在还有吗?笔者忆往昔
随园巷西、上海路坡中段路东侧总是湿漉漉的,附
近似有泉眼,但如今早已砌成了石护坡,更找不到
什么水源了。于是笔者的搜寻目标转向了井,几经
周折,终于找到了该地区唯一的一口水井,井口直
径近一米、深约七米,清澈见底,水面距井底不过
一尺多,井壁塞满了杂乱的青砖(显系园毁后填积
所致),并夹有一些巨石,石内心淡黄,表面暗红,
并有鲜红色条纹,为一般岩石所罕见。据主人介绍
该井系五十年代初所凿,水清凉微甜,水位始终保
持一定高度,不受季节和降雨多寡的影响……这正
是子才咏澄碧泉诗所谓:

山头峰百层,山下泉一尺,叶落水面清,月落
水光白,此水淡无言,冷冷终日碧。并符合袁起
《随园图记》:“再北渡平桥,穿丛林,磐折入石窦,

日神清之洞。穿洞东出，椒桂回合，莫堂于中央，日小栖霞，窈窕幽寂，可咏可觞。后临深潭，四时不涸，日澄碧泉。上有五鬣松，夭矯擎空，乃六朝故物。沿潭怪石砢砢万状，石隙杂蒔秋卉，木芙蓉尤甚，积锦蔽山，号曰芙蓉屏。”而八十六岁的马潘氏指着水井西边十几米处的上海路说：“修马路时，这里挖出个石门，像庙门样……”其长女补充：“还有许多方形银锭”。因附近全是厚厚的黄土层，根本找不到天然的岩石，从而可以推断那儿就是“神清之洞”。井南应是“小栖霞”的地方目前尚存一小台地，其西、南两面仍为“削崖”，正符合子才咏小栖霞诗中“绝壁屋前山，天香屋后花”的意境。且这些景点的位置均与《随园图》中所绘相吻合。

老居民还证实：花园河北岸现存黄土峭壁的中央，曾有砖石堆砌的高台——此即随园的中心“南台”故址。这一带过去还见过白果、桂、柳、竹、藕等分布，而这些都是《随园图》中所绘花木品种的一部分。

《随园图记》云：“陟南山，羊肠径曲……崎岖而上，筑室于高峰之巅，曰山上草堂，楼其上，曰天风阁……”果然五台山（仓山）最高处在与小巷随园最近的东北角。今登五台山东北坡北望，《随园图》所绘各景就立刻浮现在眼前了。

袁枚《随园六记》谓其先茔及生圻“距随园仅百步”。查其墓葬群七十年代初尚存，在今随家仓南五台山西北角，“前百步坡”山岗上，山脚下原有牌坊、石碑，碑正面刻“清故袁随园先生墓道”，背面刻随园地域等。按古代六尺为步，百步约合二百余米，由此可定出随园西界——今广州路、上海路口偏西百余米处，与《随园图》所绘及老居民们所述一致。

《随园图》标明全园尽在“北麓”之南，而该处恰是小仓山之麓。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随园在今广州路中段西侧，东起青岛路口，西至上海路口以西百余米处，主要建筑群座落在小仓山南坡的小巷随园上，北界不超过小仓山麓，南面包括五山顶和北坡一部。

上面仅列出了笔者初步了解的部分结果，若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相信定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收获。近悉该处将改建大厦，为抢救这一我国文化遗迹免遭覆灭厄运，笔者切望利用空闲的百年旧屋立即在此兴办一个“随园展览室”，用尚存的随园遗物、绘画、文字、图表、模型等，并配以讲解员的导游，向中外游人介绍随园沿革、当年盛况、风

土人情、轶事传说、历史意义……争取海内外的关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逐步征集资料，筹积资金，将来再扩建成“随园——大观园展览馆”，为南京市和我国开辟一组新的文化旅游热点，并达到保护历史遗迹和开发新兴建设两全其美的目的。

（责任编辑 惠 兰）

注：

本文观点、建议受到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园林学会理事、东南大学建筑系潘谷西教授的赞同和支持，对随园遗址的新发现还得到了东南大学出版社晏隆余编审的认可。

南京历史上有 两处随园

● 陶恺

随园，明清以来，南京园林以此命名者有二处。一是人们都熟知的清代著名文人袁子才在小仓山所建造的；另一处是鲜为人知的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的三儿子焦润生所营建的。焦润生，字茂慈，号随园。《金陵通传》上说他“十岁即能诗，十八岁补诸生，事亲尤孝。”他的诗写的很不错，顾起元曾赠诗称他是“谢公才”。

焦氏随园的资料，现仅存顾东桥吟咏它的一首诗：“霜松雪竹忆初归，千载犹堪诸客居。雨过泉声飞卷幔，云生岚翠拥行裾。金尊座对贤人酒，石室山藏太史书。共说高情丘壑在，苍生凝望意何如。”通过这首诗，我们对焦氏随园大致能够略窥一斑：园中有常青的松柏，有亭亭翠竹，有人造瀑布，有洞壑宛转的石叠山，山室中藏着许多珍贵的典籍，主客们在这里饮着美酒，畅谈美丽的自然风光。由于该园环境幽雅，所以朱僕把它同徐锦衣的东园（今白鹭洲公园）、西园（今愚园）、三锦衣的风台园等一起列为明代南京的公园。

焦氏随园的主人焦润生后来在云南曲靖做知府时殉难死节。焦氏随园也因清兵南下，战乱兵灾而荡然无存。它的遗址，袁子才臆测它在小仓山左右，金鳌的《金陵待征录》、陈治纲的《金陵园墅志》都指出应在东冶亭附近，即今东水关一带。

从《儒林外史》看 明清南京的城市风貌

●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 郭黎安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前期的文学巨著。作者吴敬梓，远祖吴聪曾于明初封官江宁府属六合县，于是全家迁居于此。后人失去袭爵，背迁安徽全椒，至清代中叶，曾显赫一时。到其父辈时，家境衰落。吴敬梓33岁时移家南京淮清桥附近，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因此，他对南京的城市面貌和风土人情都十分熟悉，这些生活素材自然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儒林外史》共55回，其中以南京为背景的有25回，几占全书之半。笔触所及包括街道巷陌、水陆交通、商业、手工业、饮食起居、风尚习俗等，为我们研究古都南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一、商业与手工业

明清时期的南京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五方杂处，人烟辐辏，商业、手工业都相当繁盛。《儒林外史》25回说：“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湊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这虽是小说家之言，然并非虚夸。该书提到的南京街巷名称不下数十处，有三山街的店肆酒楼，水西门、淮青桥的戏班，状元境的书坊、刻字店，江宁县署前的丝行，贡院附近的市集，利涉桥、钓鱼巷的河房，秦淮河的灯船，聚宝门外的梵刹等等。但这些地名都在城南，尤以秦淮河北岸为多，鼓楼以北只有潦倒秀才倪霜峰居住的三牌楼一处。因为在明代，鼓楼以北为京卫、仓储、教场之所，地域空旷，街市寥落。所谓“鼓楼达三牌楼，经金川、仪凤、定淮三门而南至石城，其地多旷土，其人文与客并少物力之在外者，亩民什三，而军什七”，直至清末，今乾河沿、五台山、草场门、玄武湖南岸等地尚为稻田蔬圃。而城南因靠近秦淮河，交通畅达，生活方便，自六朝以来便是居民稠密的工商闹市所在。明清时，南京的工商业主要分布在秦淮河以北，南起聚宝门（今中华门），北至内

桥，东起大虹桥，西迄三山门（即水西门）的范围内。顾起元说：“自大虹桥而西，由淮青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泊城，转而东至内桥、中正街而至，京兆赤县之所弹压也，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狙伶千百，嘈杂其中。”甘熙亦谓清时今秦淮河至内桥的周围数十里间，“闻所万千，商贾云集，最为繁盛。”《永乐大典》所载明代南京城内外13大市中，城南就占其七。《儒林外史》描写南京以城南为主，充分反映了当时南繁北芜的城市格局。

朱元璋定鼎南京后，即着手建立街巷，使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坊肆。其时，大街两旁皆设廊房，上覆以瓦，廊内按行业开设店铺，形成各种专业市场。除官廊外，还有南市，称市或行。正德时有铺户104行。万历以后，各业间虽已无严格的地域界限，但不同街区的店肆仍有其不同特色。如书坊主要分布在状元境、三山街和太学前，以状元境最为集中。“比屋而居，有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所以《儒林外史》描写状元境的书店里“贴了多少新封面”，马绳上、蓬头夫选刻的书和景兰江的诗集都陈列其中（33回）。25回则写鲍文卿为访问知府在贡院前的香蜡店买手本，42回写汤大爷兄弟赶考，一路打从淮青桥过，那赶抢摊的争着做生意，反映了贡院附近商业活动的活跃。贡院是明清时苏皖二省秋试之所。位于淮清桥以西，前有贡院街，西邻状元境，平时商业就较兴隆，出售的大抵为举子所需之物。而每当大比之年，从东牌楼沿秦淮东岸，北抵贡院，南达下江考棚，商贩云集，各县著名文玩物产，若歙、宣的文房四宝，宜兴的竹刻陶器，金陵的刻瓷乃至常州梳篦、苏州糖食、扬州香粉之类，莫不具备，人称“考市”。在上述商业区中，最繁华的当数三山街（今中华路一段），那里有绸缎廊、裱画廊、书铺廊、毡货廊、折扇店、包头店等各色铺行和著名的南市酒楼以及承恩寺、净觉寺。史称“商贾云集，市廛鳞次、四达之衢也。”吴敬梓将景兰江的头巾店、荆元

的裁缝铺、乐恬远请客的大酒楼都安排在这里，无疑是其市肆喧闹、商业繁荣的写照。

明清时期，南京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工匠最多时达十余万。他们也是按行业在一定地区内集中居住和工作。今南京城南许多与行业相关的地名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在所有行业中，丝织、刻书和制扇是南京的传统手工业，亦最兴盛。三业在《儒林外史》中均有涉及。丝织业方面，史载明代南京有神帛堂和供应机房。神帛堂属司礼监，掌织造各种祭祀用制帛，额设机40张，食粮工匠1200余名，万历时存800余名。供应机房即由民间机房从官府领受经费，织造额外加织的上供织物，包括纁丝、纱罗、缎匹及各种花样的御用袍服。民间丝织业的规模更大。《凤麓小志》云：“金陵商贾以缎业为大宗，旧制一户所领之机不得逾百张，以抑兼并，逮曹尚衣寅奏免额税，其禁遂弛。乾嘉间通城机以三万计，其后稍稍零落，然犹万七八千。”丝织业的兴隆又带动了百业发展，当时仅与丝织直接有关的行业就有20多种。吴敬梓让杜慎卿小妾家中开机房以示其富（30回），完全源于南京丝织业发达的生活实践。

南京是明清折扇的重要产地。《儒林外史》写杜慎卿在莫愁湖会演后，给优伶的奖品中皆有折扇，或亦因其是南京特产之故。南京地方文献云：“吾乡造作折纸扇骨素有盛名”，工匠来自江宁石埠桥，聚居在通济门外，店肆开在三山街绸缎廊一带，不下数十家。制作扇面的纸有二种：用杭连纸者谓之本面，用京元纸者谓之苏面。扇骨用老棕竹、樱桃红、湘妃竹、檀香木、桃丝木等为原料。经水磨模雕，上刻字画，清代中叶后有取材于红楼故事的。明弘正间画扇面名手有姚仁、王孟仁。清代以张氏庆云馆的产品为上乘，“楷磨光熟，纸料洁厚。”由于宁扇品质优良，行销之广不亚于杭州油扇，号称“南京折扇名天下”。

《儒林外史》还不止一次地写到名士们在南京刻印书籍，如马纯上、蘧駪夫合编的《历代程墨特选》、杜少卿的《诗说》即是。38回“肖金弦白下选书”，专写盱眙人诸葛天中、安庆人肖金弦、季恬逸来南京选刻文集。南京素称文物之邦，明代有国子监、府学、县学，文人学士会萃于此，著作宏富，故刻书业特别兴旺。其时有官刻机构70余处。国子监曾多次整理出版各种书籍，称为南监本，质量较北监本为优。经卷则以报恩寺所刻为精良。在官营刻书业的影响下，私人书坊也蓬勃兴起。据考，明代南京有书坊50余家，著名的如十竹斋、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大业堂等等，其中许多都延续至清。这些书坊合选

编、出版、发行为一体，工匠大都来自江西南乡。所刻书籍数量大、形式多、内容广，从儒家经典、笔记小说、科举用书到戏曲杂剧、医学、画谱、童蒙读物不一而足。明清南京刻书业的发展为保存和传播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衣食住行

在我国历史上，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总要在前代基础上制订新的服式。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明清二代因由不同的民族创建，故服式差异较大。吴敬梓虽然生活在清代前期，但《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明代为背景的小说，因而书中描绘的皆为明装。其中关于士人的服饰描述最多，在该书中，士人一般都头戴方巾，身着直裰，脚登皂靴。方巾，或称四方平定巾。隆庆、万历以后，士人的头巾名目繁多，所以《儒林外史》中又有浩然巾、恩荫巾等名称。直裰，亦称直身，是一种宽大而长的袍服。皂靴原为教坊及御前供奉者所穿，洪武十四年（1381）禁其穿着，二十五年（1392）“令儒士生员等许着靴”。此外，32回杜少卿家人王胡子谓进了学的秀才“穿戴簇新的方巾襖衫”，47回虞华轩、余明经两家秀才皆着襖衫。蓝衫疑即襖衫。《七修类稿》云：“（明）太祖以学校为国储材，而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有以别之。令工部制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缘皂、软巾垂带，谓之襖衫。”

在封建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民，其服饰皆有定制，不得逾越，以别贵贱。史载“（明）太祖立富乐院于（南京）乾道桥，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褙膊，足穿带毛猪皮靴。……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冠，自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据周锡保先生研究，明代教坊司伶人戴绿巾，乐艺人系红绿褙膊，官妓之夫着带毛猪皮靴。所以《儒林外史》24回写伶人鲍文卿见同班唱老生的钱麻子“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作士人打扮，便认为是僭制。该书中，鲍文卿及蓝义子的穿带都是青衣小帽或瓦楞帽，轿夫也着青衣，证之以《客座赘语》：“嘉靖初，脚夫着青布衫，持青布手巾，靸鞋”，可知青布衣是明代底层劳动人民的装束。小帽又称六合巾，俗称瓜皮帽，本为执役厮卒辈所戴，因其方便，后士庶亦戴之。这种帽式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

服饰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但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地方性却不明显。尤其在封建社会中，对于统治者

规定的服式，更是“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故《儒林外史》描绘的是明代通行服饰。但就衣质言，皆为缎、绸、纱之类，当是南京丝绸之乡的特色。此外，书中凤老爹所戴的网巾也与南京密切相关。相传朱元璋微行至神乐观，见道士织网巾以裹头，令万发俱齐，遂取其式颁行天下，三百年不改。至今南京尚有网巾市的地名。

南京地交南北，又为东南大邦，各地物产会聚于此，加之历代士大夫颇工口腹，因而形成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对此《儒林外史》中也有不少笔墨加以叙述，从主食到菜肴、茶酒、糕点、干果，无所不包。24回称聚宝门每日要进千猪万牛，粮食更无其数。此话固有夸张，但是却道出了南门于南京民生的重要关系。至于35回写玄武湖中“有七二十只打鱼船，南京满城每日早卖的都是这湖鱼”应是清代的情景。明代，玄武湖系黄籍库藏重地，百姓不得随意出入。清代湖禁开，玄武湖遂成南京商品鱼的主要产地。“渔人网得诸鱼，鱼贩者受之，以转鬻于市，南市在沙湾，中市在行口，北市在北门桥，夹道布列，皆鱼盆也。”除玄武湖外，长江和附近湖塘河汊也都产鱼。

《儒林外史》中罗列的南京菜肴达20余种，而写得最多的是鸭子。鸭子是南京人民偏爱的食品，烹调方法很多。“生鬻于市谓之水晶鸭。举叉炙皮红不焦，谓之烧鸭。涂酱于肤者，使味透，谓之酱鸭。而皆不及盐水鸭之为上品也。淡而旨，肥而不浓。至冬，则盐渍日久，呼为板鸭，远方人喜购之以为馈赠。”鱼品则以鲥鱼为美。鲥鱼只产于长江下游，四月方出，他时皆无，因其产量少而称名贵。明时作为贡品用冰船运抵北京，谓之冰鲜。44回庄濯江送杜少卿的端五节礼中有鲥鱼一尾、烧鸭二只，堪称南京风味。

明清南京的饮茶风气很盛。城内外茶馆遍布，“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里面坐满了吃茶的人。”（24回）由于秦淮河水为染丝漂洗污染，旧时城内主要饮用井水和雨水。雨水含矿物质少，宜煮茶。平时茶馆和民户皆用大缸储存，“判分昼夜，让过梅天，炭火煅之，叠换缸瓮，留待三年，芳甘清冽。”清嘉道间土街口茶肆即以陈年雨水烹煮而闻名。所以《儒林外史》中凡写到饮茶，都要用上好雨水煨煮，这不失为南京茶文化的一个特点。

住的方面，该书描写了南京最富有地方色彩的建筑河房。河房，又称河厅，是一种水阁式建筑。分

布在城内秦淮河两岸，悬桩拓架，轩窗临河，雕梁画槛，南北相望。也有个别的在房前留出空地，杂植花卉，周以短垣，建成临水花圃。北向的河房称作倒座。42回汤大爷兄弟租住的便是“三间倒座的河厅”。河房外一般都有石级通河。因此，当杜少卿邀武书泛舟秦淮时，便“在河房里吃了饭，开了水门，同下了船”。（41回）而当他无意出仕京师时，又可以从河房栏杆上上去，到内屋装病，以避过在家等候的邓知县（34回）。

河房大抵为外籍官员、流寓文人、会试举子以及青楼女子居住，里人居此者极少。由于河房位于最繁华的秦淮河沿岸，房舍精致、景色优美，且邻近贡院和市场，故举子租赁者最多。于是“遇科举年则益为涂饰，以取举子厚赁。”《儒林外史》写杜少卿找房，恰逢“是乡试年，河房最贵”。（33回）汤大爷兄弟见“河对面一带河房，也有朱红的栏杆，也有绿油的窗樑，也有斑竹的帘子，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念文章”（42回）皆为写实。

妓女的河房大都位于秦淮河东段，明末名妓李香君的媚香楼就座落在文德桥附近。《秦淮志》云：“金陵临河人家，虽小小水阁，布置亦皆精雅。夕阳即下，湘帘齐卷，盆花茗碗，处处宜人。新月东升，羊灯不跃，围人浴罢，凭栏照影，鬓边襟上，香雾四溢，游船过之，疑为天上清都”。《儒林外史》的刻画更生动：“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吟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这就是所谓的秦淮风月。河房不但是具有浓郁的南京地方风格的建筑，而且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

明清南京的街道颇值得称道。时人云：“街道以金陵最为宽洁。”南京“前明都会所在，街衢洞达，洵为壮观，官街极其宽廓，可容九轨。”平时官绅富家出门大都以轿代步。城北和城外旷野之地亦可乘驴，如从水西门至上新河、鼓楼至下关都有随时待雇的脚夫等候在那里，甚为便利。水道是南京交通不可忽略的方面，对此，《儒林外史》亦有所涉。如杜少卿和迟衡山到北门桥拜访庄绍光就是坐船去的（34回）。杜少卿为武书贺生辰，也是“叫了一只小凉篷船，在河里游游，”“叫船家一路荡到进香河。又

荡了回来。”(41回)南京地处江南水乡,又是我国著名的古都,除了城南、城北、城东有秦淮、金川、青溪三条自然河外,每次建都,统治者都要开凿护城河和小运河,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水道系统。

三、文化娱乐

明清时期,除随岁时风俗和宗教节日的娱乐活动外,南京市民主要的文化生活为观剧和观灯。关于这二点,《儒林外史》均有极精彩的描写。其书称明时全城有130多个戏班,分布在淮清桥和水西门,“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总寓内都挂着一班一班的戏子牌,凡要定戏先几日要在牌上写一日子。”(24回)昆剧专家认为这段文字基本符合明末清初南京戏曲界的事实。当时,南京是江南戏曲中心,戏班云集,盛况空前,优秀艺人辈出。侯朝宗《马伶传》云:“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梨园以技鸣者无虑数十辈。”

由于官僚士大夫崇尚奢华,好声色之娱,明代以来,公侯缙绅富家凡有宴会,都要传优伶唱戏助兴,成为一种风气。《儒林外史》中的鲍文卿便时常带领戏班到各处演出。如25回天长县杜府祝寿,“定了二十本戏,做了四十多天才回来”。46回庄绍光饯别虞博士,将著名的梨园子弟传来做了一天戏,都是这一社会习俗的反映。就剧种而论,史官南都万历以前,小宴“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箏、箫、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午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等舞蹈杂技。万历以后南戏兴起,始有弋阳、海盐二腔,后又出现了昆山腔。乐器也改用洞箫、月琴等。声调清柔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十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后好。”30回王留歌所唱的长亭饯别,“音韵悠扬,足唱了三顿饭时候才完”,应即是南戏昆腔。昆腔曲美词雅,深得士大夫喜爱,他们把度曲填词视作风雅之事。公侯戚畹、宗室王孙、乌衣子弟“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髥送客。”吴敬梓写杜慎卿集合南京所有戏班进行会演,排定名次,并题为“遛风流高会莫愁湖”就是对上述素材进行的匠心独到的创作。这一情节固属虚构,但是,如果没有明清南京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没有文人学士对昆剧的嗜爱和推进,作者断不可能作此奇妙精彩的描绘。

观剧之外,泛舟秦淮、观赏灯火是南京市民生

活中的又一赏心乐事。清代,南京城内外有三处灯市:“簃桥灯市,由来已久。正月初,鱼龙杂沓,有银花火树之观。然皆剪纸为之,若彩帛灯则在评事街迤南一带,五色十光,尤为冠绝。”“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毛之属,剪纸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巧。阖城士庶往观,车马填阗,灯火达旦,昇平景象不数簃桥。”秦淮灯火起自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因四海统一,下令于元宵节在河上燃放水灯万盏,以示欢庆。后相沿成俗,历明清五六百年不竭,尤以明季和清乾嘉间为最盛。《板桥杂记》云:“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槳击鼓,踏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闹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

秦淮灯船不仅限于新春元宵,而如吴敬梓所说:“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清时,南京风俗凡富厚人家,夏日须请学馆教席和新婚女婿泛舟秦淮,消暑纳凉,称为“凭水”。遇到宗教节日或丧亲等事,亦可雇船做佛事。楼船歌舫集中在利涉桥以东,“金碧辉煌,外施步障,中流屹立,不费推移。”其余的有边港、乌篷、漆板、藤棚、走仓等大小不同的船只可供租借游览。“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明角灯,一来一往,映著河里,上下明亮。自文德桥至利涉桥、东水关,夜夜笙歌不绝。”迨至清秋时节,“那秦淮河另有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蒙蒙。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到晚,做的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41回)这些描写既真实又形象,展现了明清时秦淮河灯船的盛况和南京市民的生活情趣。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南京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风貌的城市。然而今天的南京,作为我国著名古都之一,却缺乏应有的特色。我认为研究古都,当立足于古为今用,不但要从古代的城市设计、管理、保护等方面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而且还应当筛选历史的文化积淀,再现昔日有益健康的民俗风情,以丰富人民生活,开拓旅游资源,为改革开放服务。

(责任编辑 海 鸥)



清 的 代 南 末 京 年

作者：南京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杨长春

本文的“清末”主要指清亡之前的一二十年，或说是晚清末期。今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就说是距今100年的光景吧，那是1891年即清光绪十七年，那时稍前和以后的南京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时有位著名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江苏江阴人缪荃孙（1844~1919），晚年号叫艺风的，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住过14年多，从事教育文化工作，任钟山书院山长、江楚编译书局总纂，创办江南高等学堂、中小学堂，又任江南图书馆总办、江苏通志局总纂等职，先住

在书院，后搬到今秦淮区颜料坊。他留下了一本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到1919年，即从45岁到76岁逝世前的日记，附印自编年谱，书名《艺风老人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年谱》，1986年北大出版社影印出版），共10厚册。这部书主要记载了他后半生的交游和学术活动，也简略地记载了清末南京的一些情况。现就根据这部书，并参考其他资料，介绍一下清末南京的情况吧。

历史名城南京，经历了繁荣和劫难的多次反复。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在几年激烈的攻守战火后，真是满目疮痍。战后25年的光绪十五年（1889），城北一带，极目四望，仍是野树萧疏，人烟稀少。《年谱》中那年说：“初至金陵，游清凉山、北极阁、孝陵、玄武湖、莫愁湖，乱后荒凉，结构草草，而龙盘虎踞，江山如故也。”繁盛多时的城南丝织业和商业，这时也还没有完全恢复从前的规模。

再过11年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城遭受了严重破坏，东南地方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洋人立约，代为保护，得以无事。次年签订了《辛丑条约》，南京于是继续向前发展。

二

此后，在全国，清政府一面用“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编练新军和警察以镇压各地人民，其目的在挽救清政府的垂危统治。但在此期间，各地也获得一些进步。

南京由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传统，经过战后近30多年的休养生息，原在咸丰八年（1858）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实际上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在下关正式开埠，因为离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开埠的上海很近，事事也得在风气之先。在当时改革开放的新的形势下，经过短短的过程，到辛亥革命前夕，已一跃而发展为在全国走在近代化初期前列的几个城市之一。

近代化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其特征表现在新技术、新产品的发明、引进和仿制，机器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新的金融机构的设立，新式交通的设施，新教育的推广，人口集中，城镇增加，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变革等。这在初期还呈现在表面上，新生事物和旧的遗留并存，表现

出一种处在新旧时代转折点上的过渡时期的景象。在我国并不是从社会内部发生的，而是在西方侵略下，由民族自强的意识，向西方学习。洋务派只着重军事、交通、工业技术，如兵器、铁路、电讯等方面，进而至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带有半殖民地的色彩，打上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印记。以下就先从交通说起吧。

南京城市交通主要的是马路，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修筑马路，十多年后，已四通八达，路幅不宽，如今下关过惠民桥到江边的大马路和城北的模范马路就是当时修的，沥青路面则是后来铺的。代步工具还没有汽车，马路上通行的是人力车和马车。人力车又叫东洋车。马车有两种，一种是橡皮轮轿式的，一种是皮篷的，一般一匹马，也有两匹的。自行车也叫脚踏车，出租行在宣统二年（1910），还只有一家。

铁路有沪宁铁路，光绪三十四年（1908）筑成，次年筑成了支线，称宁省铁路，自下关江边经下关、三牌楼、无量庵、督署（今省政协所在地）至中正街。（今白下路）每天往来各十四次。至于出雨花门到中华门火车站是1936年通车的。解放后全线拆除了。津浦铁路是宣统三年（1911）筑成的，因此，东去上海和北上天津、北京，都很便捷。

旧式交通工具仍有人力抬的轿子，依路程的远近，分三人抬、四人抬；另有一种二人抬的，人坐在竹、藤编成的躺椅上，和现在西南山区山路上抬着的滑竿差不多，是少量的，游玄武湖可雇用。

再就是动物的马、驴了，到处有之，价也便宜。城里和城外的大路、山间的小径都可以骑。光绪十五年（1889）《日记》中就记有：“骑驴访明故宫……出朝阳门（今中山门）寻山径，谒明孝陵。”“骑驴出聚宝门，访志公雨花台。”“赁驴出太平门，寄柳阴十余里，度长桥三四，始至湖神祠，轩亭两三，纵横水际，清风瑟瑟，荷香幽幽，非软红中人所能知也。……仍至太平门，观龙脖子官军入城处，再登北极阁，全城在目矣。”（软红中人指热衷于城市的繁华热闹，物质享受的人）这种骑着小毛驴行于山径的诗人般的情趣，现在只有在东郊风景区明孝陵和石象路二处可以领略了。

水上交通，长江上下水有大小轮在下关江边码头停靠，官督商办后改为官办的招商局有江新、江孚、江裕、江宽、江永五艘大轮，外商经营的有英商“怡和”、“太古”和日商“日清”三家公司。另有美最时洋行的。内河有秦淮河，从通济门东水关

入城，西水关出城，在淮清桥北会青溪，都可以通航。《日记》记：“唤小艇，打桨至三山门（即水西门），出城游莫愁湖。”并且“河水清涟，垂杨两岸，钟山在望，苍翠满目。”自大中桥、淮清桥、利涉桥、文德桥到武定桥一段，每值夏令，画舫往来，笙歌盈耳；入夜，船灯如萤火虫之飞翔，若明若灭，达旦不绝，迤邐十余里之外。游青溪，北可至毗卢寺、太平桥。游船大小不一，有从岸上可望见平敞甲板上乘客的，有房间分隔，珠帘锦帐，施以屏障的；有的船上还可以供应午、晚两餐酒席和消夜的。民国以后，河水混浊淤浅，并有异味，逐渐难以通航，乘船游览了。

其他交通设施如邮政、电报、电话这时都已经有了，电话局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设立，由于光绪八年（1882）外商在上海外滩设立电话交换所，而南京是我国自办的第一个呢。据宣统二年（1910）上半年的统计，南京共装电话225部，其中个人用户38部。

南京的近代工业是曾国藩、李鸿章兴办洋务时开始的。同治三年（1864）安庆军械所迁到南京。次年造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由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艘汽轮船“黄鹄号”。这一年还在南门外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它是现在晨光机器厂的前身。宣统二年（1910）在南洋劝业会上陈列的江宁制造局所制的后膛劈山炮、子母炮等也可能就是他家生产的。这个南洋劝业会那年在丁家桥以北和劝业路（又呼模范马路）以东的地方开幕，外国来宾和各地华侨都来参观，实际上相当于一次全国性的初步振兴的实业大检阅。另外官办的有下浮桥的造币厂，俗称银元局，铸造银元和铜钱，厂内另有南洋印刷官厂，通济门外的火药局，还有笆斗山船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浦口设浦镇机厂。民用工业中最盛的丝织业还是用的明代定型的木机。商业和金融等方面有洋货店、五金号、西药房、照相馆等，近代商品称之为五洋（洋火、洋油、洋蜡烛、洋胰子、洋烟）的以外，洋灯、洋伞、洋纱、洋布以及进口和仿造的牙粉、香水、粉笔、墨水、汽水、啤酒、饼干、罐头等都可以买到。银行（同时有钱庄、票号）、金陵关、人寿保险公司、消防队、巡警局、医院、模范监狱等也都有了。英美日德等国在城里都设了领事馆。为与本国固有的区别，外来的，新式的，一般都加上“洋”字或“番”字，“西”字，如洋商、洋行、洋葱、番茄（西红柿）、香菜（西餐）、洋房、洋楼、洋服（西服、西装）、洋袜子等等。有的音译或

以来源称之，如德律风（电话机）、咖啡馆、荷兰水（汽水）等。

文化方面，光绪二十七年（1901）设立了江楚编译书局，至宣统二年（1910）出版教育类书籍七十种以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立了南洋官报局，宣统二年（1910）八月开放了江南图书馆阅览室，是我省第一所近代图书馆。

近代教育在南京兴办更是可观。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一次甲辰科殿试，次年废除科举。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南京就由缪荃孙筹备，先开了中小学堂，第二年四月办了江南高等学堂，总督、藩司、道台都到学堂行开校礼，教习（今称教师）聚饮开校酒，大中小学都归缪氏兼管了一个时期，那年也举行了癸卯科乡试。10年中，下起幼稚园（今称幼儿园），上至大学全办起来了。有政府办的，当时称之为官立的，分省的、府的、县的；有民办的，如外县、外省同乡会办的，有外国人参加的，如教会办的金陵大学、金陵中学。普通的以外，有专科的，如三江师范学堂（后改称两江师范学堂、附属贫民学校）、两江法政学堂、江南监狱学堂、江南农业学堂、江南蚕桑学堂、江南实业学堂、江南中等、高等商业学堂、艺徒学堂、南洋方言学堂、半日简字学堂。全日、半日之外，有日余夜学堂。武的有军队的、巡警的，如陆军讲武堂、陆军小学、中学，江南海军学堂（初名水师学堂）、宪兵学堂、高等军医学堂、陆军卫生学堂、陆军测绘学堂、江南高等巡警学堂等。全收女生的有江南公立女子学堂、女子初级师范学堂、女子正淑实业学堂、惠宁女学、萃敏女学、毓秀女学、美淑女学、妇女道学馆、汇文女书院、基督女书院、培珍女书院、明德女书院、来复女书院，这几所女书院都是教会办的。共计中学以上四十多所，小学为数就更多了。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公费派东文六人，西文一人出东西洋留学，两江总督设宴敬酒饯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各校举办了运动会。

当时南京的官署衙门也够多的，钦差大臣有管辖江浙闽粤等沿海各省通商的南洋通商大臣和巡防长江的江防大臣的行辕，有管辖江苏、安徽（清初二省合称江南省，康熙后分开）、江西三省军民要政的两江总督署，有江宁布政使署，（布政使亦称藩司，为总督、巡抚属官，衙门亦称藩署，专管一省的财政和人事，江苏分设江宁、苏州二处，并为省会。巡抚专管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等，略次于总督，驻在苏州。）江宁提学使署、（苏州也设有）江

安粮道署、江宁劝业道署、江宁巡警道署、江南盐巡道署、江宁府署、江宁县署、上元县署。武的有江宁将军署、都统署等。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十日逢慈禧太后70岁生日，在八日那天，文武官员朝服排班，举行庆贺万寿礼，盛开预宴，钦差大臣、总督、将军们百二十人同席。

为向西方学习地方自治、设立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江南自治总局于七家湾，次年（1908）设江苏咨议局于丁家桥东头（今湖南路路段江苏省军区大院内尚有欧式建筑遗址，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亦在此）。另有江苏商务总会、教育总会、元宁教育会。

当时南京人口密集，从事工矿生产者并不算多，但由于衙署、营房、学堂林立，商店栉比，四方杂处，官僚、幕客、军人、学子众多，连家带着，加以过往客商，考生、僧尼、信众的流动人口颇多。每逢乡试，江苏、安徽二省考生一时云集，多达二万余人。临时住在城南贡院附近的奇望街（今建康路）、东牌楼一带客栈里。大的寺庙，逢到宗教节日，香客络绎不绝于途。为满足这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口腹、服用、娱乐的需要，必须提供丰盛的物质资料，因此产生了畸形的城市经济繁荣。

首先是旅馆业、饮食业兴旺发达。当时除旅馆名称外，多用××栈、××楼名称。饮食店铺大者有酒楼、菜馆、饭店，小的有小吃、点心的店铺茶社、瓜摊所在多有。除本地和淮扬风味外，有京苏大菜、鲁湘菜系。西餐也有供应。全市知名的菜馆在10家以上，夫子庙有金陵春、柳春园、问柳，下关有江南第一楼。一般鱼翅席八至十二元，海参席三四元，添菜、茶点、水果及酒另计，小费加一。

缪荃孙是当年夫子庙得月台的常客，《日记》里记下了店中楹联及评语：“……同往得月台茶叙，楼五间，正对钟山之阴，秦淮绕流其下，有联云：‘啜茗话沧桑，祇淮水长流，钟山无恙；卷帘问鸥鹭，看夕阳西下，明月东升。’颇清隽。”

当时文化娱乐场所不多，在今逸仙桥南复成桥北有商品陈列所，陈列各省土特产，每人一票，票价当10文铜元一枚。夫子庙附近市场，有售旧书、文具、金石古玩店铺，选购观赏者不绝。戏台演京剧、地方戏，也演改良新戏，又称文明戏，即早期的话剧。电影称之为电景，无声黑白片，在南洋劝业会场曾有放映。散布各处的名胜古迹，足资游览，如不入茶座，不取分文。缪氏将南京长江以南的各处，如南郊牛首山、祖堂山，东境的栖霞寺、六朝

1947年10月8日，家住南京太平门街34号的郑梦严（系联勤部机械装训处股长）在自家院子里打井时挖掘出一块古铜器，呈长方形，上铸有精美的花纹，重约两千余斤，一时街邻都来看。太平门警察所立即报告东区警察局，东区警察局又报告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令派警察看管并分别致函教育部及中央博物院派员勘定决定处置办法。10月25日，教育部及中央博物院的专家学者们来到郑宅，看到古物连声称赞说“实为国内罕见”，认为系明代所铸，且与水闸有关，很可能是闸门，这对研究我国水利史具有很大价值，商议后一致认为送水利部研究为宜。水利部迅速派人会同警方接收，但郑梦严已将古物移入22号屋内，用铁链锁门，拒绝政府接收。后水利部告诉郑欲以重金收买，可郑却说“现在国家正值战乱，不愿将此项古物贡献国家。打算做一个铁架子，把古物放在上面，暂存于住宅内，并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如果官方再逼我，增加本人烦恼，我就敲碎它，愿做破坏文物的罪人”。官方只好作罢，派专警看管以保古物。

1949年3月，我人民解放军陈兵千里江线，南京城内的达官贵人惶恐至极。警方忙于戒严、镇压群众革命，郑梦严乘局势混乱之际将古物劈成四块，秘密运至上海。首都警察厅得知后函告上海警察局缉拿。不久上海解放，郑梦严及那件已分成四半的古铜器亦不知去向，这件文物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责任编辑 淑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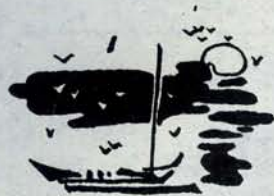
陵墓都游览殆遍。现摘录所记可遇而不可求的游览昔日道教胜地的一则如后：“设席于飞霞阁，为城中最高敞地，东北山势，历历如绘，忽逢大雨，烟霞吞吐，尽没诸山。雨过云开，红日杲杲，画笔所不能到。”

清末南京官场腐败，打麻将牌，抽鸦片烟，宴饮酬酢，几无虚夕。名流文士中亦多章台走马，出入歌场，视为偶悦风流之韵事。缪氏置身于此种场合，聚河厅，坐画舫，唤妓侑酒，听歌女唱曲，逢场作戏，也在所不免。他在62岁时曾记下一则云：“……招饮，……同席，打牌叫局，大约非三更不散，雨又大下，不入座而回。”

当时南京物价，以最低者言之，剃头5分，梳辫3分。洗澡客盆6分，普通官盆1角（或100文），洋盆3角。洗衣则小挂、裤袜每件1分，长衫2至3分。旅馆客房2角至8角，（贵者1元至3元

不等）伙食每餐2角至3角。茶社每壶5分。板鸭每只4角至5角，香肚每只1角至2角，大头菜每斤4分至5分。上海到南京火车三等2元，船价1元8角。房舱加半，官舱加倍，头等舱银15两。宁省铁路江边至中正街三等2角。马车由下关至鼓楼5角，人力车为1角5分。如遇雨雪及深夜，与夫偏街小巷，均应酌加，如车破旧价较便宜。轿费每名8分，路远或午前雇到午后加倍，并加给误餐酒钱。当时支付的是铜钱、铜板或银元、银两。当时南京的特产只有贡缎、宁绸、板鸭、香肚等少数传统的名优产品，市民享受的只有天然产品中的蔬菜类水八鲜、早八鲜和果品类上八鲜、下八鲜的份儿，基本上还是一座封建统治将解体下政治、文教、旅游性质的消费城市。经济上工业生产的比重是不大的。

（责任编辑 霁明）



千年之前的

长江浮桥

● 刘晓梵

距今 1017 年前的闰十月十五日(12 月 1 日),浩浩荡荡的扬子江上,一条黄黑相间的巨龙横跃大江南北,数十万北宋大军及车马、粮草从上滚滚而过,吞并南唐国的战争全面开始了。

这天堑通途,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首创。

唐末五代,强权割踞,战乱不断,而南唐国继承了杨吴的江山,偏安于东南,七十多年国内没有发生战争,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曾“富庶甲天下”。但自中主以后,政治上已极端腐朽,已是“国势日削,用事者充位而无所为”,成了北宋垂涎的肥肉。

宋太祖赵匡胤以兵变篡夺了北周的江山社稷后,十年左右就先后灭掉了荆南国、湖南周氏、后蜀、南汉。南唐虽然政治上腐朽,军事上软弱,但间隔长江天险,都城江宁府(今南京)城守坚固“高坚甲天下”,北方军士虽然强悍,却不适应水战。昔日赵匡胤跟随周太祖柴荣夺取南唐江北,打了两年半仗,几经反复,最后南唐中主李璟拱手相让,才取得江北十四州。据密探来报:南唐采用陈乔、张洎的谋策,已经坚壁清野。大战即将开始,北宋军员、輜重、给养补充很是困难,宋太祖正为此事发愁。忽闻来报:江南进士樊若水前来献渡江之策。

这个叫樊若水的秀才,聪明而有才干。南唐国自中主保大年间始开贡举,已经十几榜,樊若水考了几次,却屡试不第。有一年由张仪知贡举,考试的题目竟叫做《天鸡弄和风赋》。这张仪只知从《文选》中选句为题,但连自己也从未深究过这天鸡是何物。樊若水只知天鸡是神话中的仙鸟。中国东南有座桃都山,上有叫桃都的大树,栖有天鸡。日出太阳照到此树,天鸡就打鸣了,天下的鸡皆随之而鸣。但别的考生又说《尔雅》中有“雉鸣天鸡”,天鸡有两种,一种竟叫做莎鸡的虫子。他真不知道这种学识与国与民有何益何利?而屡次失败,使 he 不想再考了。且南唐国也从未重用过进士举人,当朝权贵大都是旧时勋臣的子弟和皇亲国戚。无奈,他只好写信上书给后主李

煜,谈论国是,望自己的才干能有所用。却又如黄鹤西去,杳无音讯。自知南唐已腐朽难救,而北宋正新兴崛起,重用贤材,精图励治。樊若水决心投奔北宋。

叛唐投宋,有些好友担心令人不齿。樊若水却大笑:“南唐早日灭亡,民众少受煎难,于民与己均为有利。只是李煜蠢才失去了家天下而已。何所珍惜?”

樊若水于江宁府境内长江上游(南唐江宁府辖十县,上游的芜湖、铜陵、繁昌、青阳均隶江宁府)今采石矶至马鞍山一带,用钓鱼船载丝线,一头拴在南岸,迅速划到江北岸,测量长江的宽度。他测量了不同地段、潮汐涨落不同时间的宽度,这样往返竟达数十次,选择了水流平缓,易于架桥的地点,确定了方案。

宋太祖赵匡胤听了樊若水的过江之策,大喜过望,立即送他到学士院破格面试,赐他及第,又任命他为舒州最高军事长官的副手(舒州团练推官)。樊若水启奏赵匡胤:自己老母及亲属都在南唐,恐怕会被李煜所害,希望能接到自己的身边。宋太祖立即写诏书给江南国主李煜,让他护送其父母亲属。李煜虽不情愿,但怕惹恼了赵匡胤,只得乖乖地派人把樊若水的亲属送过江去。

开宝七年七月戊辰(974 年 8 月 12 日),赵匡胤下诏任命樊若水为赞善大夫,派遣高品、石全振按照樊若水的方案,去荆南(今湖北江陵)用竹子编成巨大的竹缆,并特造了巨大的舰船专用于装载巨竹缆;又在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带制造了大量的龙船,并涂刷成黄黑两种颜色。巨舰和黄黑龙船的数量多达数千艘。

南唐后主李煜,喜声好色,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治理国家却昏庸无能,把功夫都放在诗词、佛事上。他听不得反对意见,任用的大多是些擅长诸伎的人物。他仅在宫中就造了佛寺十多所,并以重金募民众及道士为僧。一座金陵城中竟有数以万计的和尚、尼姑。

这时从北宋来了个和尚,自号小长老,称是沿途

宋代建康驿站

● 于江

南宋时,临安与留都建康之间诏谕奏章频繁,当时建康城附近建有驿站多达11处,驿馆有7处。^①驿馆之设,以保证军务、政务和外交官员往来之需;驿站之设,既便于朝廷邮传急递,也便于商旅。当时建康驿道,按东、南、西、北分设,分别与镇江、广德、太平、滁州相接。其中东路驿道抵镇江府界,驿铺有东门铺、东十里铺(元改为双牌铺)、蛇盘铺、麒麟铺、西流铺、东流铺等13铺;驿站主要有:金陵驿,往东四十五里为东阳驿,又往东十五里为柴沟驿,再往东十五里为下蜀驿。^②当年文天祥就是从金陵驿启程,经过这条当时的“国道”,在东阳驿附近渡江北上的。这条古驿道与今宁镇公路旧线走向有相合之处,其中蛇盘、麒麟铺、西流铺、东流、东阳、下蜀等地名沿用至今。

蛇盘铺因在蛇盘市而得名,而金陵驿位处蛇盘铺附近,故亦名蛇盘驿。曾极有题为《蛇盘驿》诗:“枳篱华屋半凋残,列肆屠羊容卸鞍。霸气销沉形胜歇,龙盘何事作蛇盘”。可见蛇盘市是因在钟山下而得名。蛇盘俗呼“余婆”,盖为音讹所致,王安石曾写过《重过余婆风市》诗二首。淳熙十二年(1185年),建

康留守钱良臣建金陵驿馆,李纲、夏竦等均曾登驿楼,凭栏眺望金陵山河,两人都留下诗作。李诗有“高楼上尽穷双目,千里江山在槛前”句,夏诗有“四望分江海,星躔次牛斗”句,可见当时金陵驿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及驿馆建筑的宏伟壮观。

据《景定建康志》载,金陵驿在上元县开宁乡蛇盘市,去城二十里。而蛇盘市则在上元县长乐乡,去城二十五里。元《至正金陵新志》沿袭了这种前后矛盾的记载,只不过金陵驿已不是宋代的金陵驿,元朝的金陵驿是水、马站的总名,建在城中青溪坊;长乐乡亦改名为兴贤乡,明、清沿称。据志载,长乐、开宁一在建康城东,一在城东北,两乡接邻;开宁乡另有一麒麟市、麒麟铺,距城三十里。^③疑《景定志》记载有误,蛇盘市当在开宁乡偏近长乐乡处,而蛇盘铺、蛇盘驿(金陵驿)则在长乐乡,因近蛇盘市而得名。或者,“开宁乡”为“长乐乡”之误。明清时,两乡地域内因养马成群,遂有今“马群”之名。但“蛇盘”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现有东蛇盘、中蛇盘、西蛇盘三个自然村,属马群乡。

宋时建康城,东至今大中桥,当时辟有东门,东

募化而来。用珍宝怪物贿赂朝廷的显贵们,混入宫中,朝夕讲论天宫、地狱、因果报应之说。很得李后主的欢心,称为一佛出世。然而看他来时的服饰都是缕金绛绡,颇有些怀疑。小长老说:“陛下不读《华严经》,怎么能知道我佛富贵?”怱怱后主多造佛塔,以消耗国力;又请在牛首山造寺庙建筑千余间。又有一伙北方僧人于采石附近北宋军准备架桥过江的地方,以巨石作桩,造成佛塔模样,李后主等竞相施赞助。

黄黑龙船和竹制巨大缆绳及大舰均已造成了。冬十月中旬,赵匡胤派遣八作使郝守清率领工匠,把黄黑龙船和用大舰装着巨竹缆,分别从荆南、朗州沿江而下,至石碑镇(今安徽怀宁)附近的长江上,预先试验架设浮桥。试架成功后,命令前汝州防御使灵丘、陆万友领兵前往守护。

北宋预制跨江浮桥的事传到了南唐李后主那里。李煜虽为国主,却优柔寡断,一刻也离不开谋臣

张洎,张洎答道:“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作浮桥过江的事情,长江流急浪高,这绝不可能做到。”后主也说:“吾也想这简直是一场儿戏!”竟一笑了之。

万事俱备,赵匡胤即以“诏召李煜入朝,不从”为名,以曹彬为统帅,发兵江南。曹彬亲率小部兵力先从上游而下,先后取得了池州、铜陵、芜湖、当涂,直至架桥预定的江南地址——采石矶附近。十月二十九日(11月15日),于此击败了南唐的两万兵马,控制了南岸架桥点。

闰十月十五(12月1日)宋太祖赵匡胤下诏从石碑镇把预制的浮桥移架采石。巨缆的一端系在预造好的石塔之上。浮桥的预制尺寸准确,虽然风大浪急,从开始系缆到架设成功仅用了三日。大军的兵马车辆通过,如履平地,创造了有史以来成功地在长江上架设浮桥一大奇迹。

(责任编辑 霁 明)

1927—1937 年的南京人口

● 张生 陈国强

二十年代初,南京因战争影响,工商业衰落,人口减少,早已不见六朝繁盛景色。可是,不过几年,南京又成了有百万之众的国际大都市,商贾云集,人烟茂密,秦淮河、夫子庙又成了四方风雅之士把酒问柳、倚红拥翠之地。这一切的变化,都与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的地位有关。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南京的人口为 360500 人,1928 年,政局初步稳定下来,人口马上增加了 137026 人,增长率达 38.0%,此后,连续三年保持 10% 左右的增长率。1932 年,因受上海战事的影响,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人口增长的势头立即降了下来,仅为 0.9%。1933 年后,南京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到 1936 年,人口终于增长到 1019145 人的高峰。

人口的增加,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出生率高于死亡率,形成自然增加;另一个是外来人口的大量移入。

而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后者,因为从 1928 年到 1932 年,南京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都是负数,进入 1933 年以后,才出现有限的正数增长。

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所以南京人口中,客籍的比例非常高,其中江苏籍占 35.54%,安徽籍占 11.79%,浙江籍占 4.24%,山东籍占 3.62%,湖北籍占 3.21%,湖南籍占 2.62%,河北籍占 1.71%,上海籍占 1.69%,而南京籍的不过占 28.10%。

南京人口激增是因为,(1)南京作为首都,政府机关不断增加和扩大,许多官员及其眷属迁入南京

居住;(2)卫戍南京有大量的军队,1936 年时,城里和城郊有军队 65414 人;(3)南京作为首都后,学校众多,文化机构增加,求学、任职、参加考试的人增多;(4)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力建设,公共设施在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生活品位优良吸引了许多人;(5)南京周围农村地区经济破产,大批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求生路;(6)围绕南京的铁路、公路建设,为大批人迅速涌入创造了条件。

南京人口中外籍人也迅速增加,1928 年仅有 222 人,1934 年就增加到 625 人,其中:日本 114 人、英国 59 人、美国 186 人、德国 153 人、法国 13 人、奥地利 4 人、印度 17 人、俄国 42 人、土耳其 1 人、比利时 1 人、瑞典 2 人、荷兰 6 人、加拿大 1 人、丹麦 10 人、意大利 1 人、捷克 5 人、朝鲜 8 人,共有 16 个国家的人居住南京。其中,主要是外交人员、海关人员、传教士和教师。众多的外国人,为南京增添了不少“国际化”都市的色彩。

外地人口移入南京以青壮年农民为主,他们主要是因为饥荒而流入城市,此类人口占 43.3%,其次是因为水灾,此类移民占 30.1%。他们从事的工作,男子主要是小贩,占 46.7%,其次是车夫,占 20.1%;女子以家庭手工业和佣人为主。当时江北的女人以勤劳著称,报纸都戏称她们“腌菜鬼”(南京人冬天喜欢腌白菜当小菜吃),又因为她们多不缠足,所以又称“大脚仙”。

当时南京人的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据 1930 年的统计,1—20 岁的共有 200741 人,占人口的

路驿道的首站“东门铺”即设在东门附近。第二站为东十里铺,即距城“十里”;蛇盘铺为第三站,按宋时“十里一铺”设置,蛇盘铺距城应为二十里。宋里略小于今里(宋 1 尺合 30.72 厘米),宋二十里约合今 18.43 里。今马群乡蛇盘村距大中桥差不多九公里,与东阳等地距离亦与志载一致,当为昔日蛇盘铺所在,金陵驿亦当在此。

为缅怀文天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于 1991 年初,在南京东郊马群乡蛇盘村金陵驿故址,兴建了一座“文天祥纪念诗碑亭”。亭呈正方形,庄重典雅。亭中央立碑,碑身正面

镌刻文天祥画像,背刻文天祥《金陵驿》诗。画像出自古人手笔(中国历史博物馆有藏),线条简洁、丰满。文天祥头戴朝冠,身着官服,双目圆睁,眉角上翘,一副凛然不可凌犯之貌,望之令人肃然起敬。邓光荐有《像赞诗》曰:“目煌煌兮疎寒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呜呼!孰谓斯人不在人间!”一亭一碑,一诗一画,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将长存天地间。

(责任编辑 惠 兰)

注:①《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

②③《景定建康志》卷十六。

明代市民文学的一朵鲜花

——陈铎及其《滑稽余韵》

● 钱文华



“自金元迄我国家(明—引者注),以南北曲名者亡虑千百辈。乃今三星逸客,按拍花前,两京教坊,弹丝搏前,才一开口,便度陈大声诸曲,直令听者神动色飞。……何元朗取其稳协,王元美服其当行,真知言哉!”

(汤有光,《精订陈大声乐府全集序》)

这段话,是明万历年间汤有光对陈铎(大声)——明代散曲大家的一个定评。陈铎究竟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作品能使“听者神动色飞”,而“何元朗取其稳协,王元美服其当行”呢?这正是本文所要介绍的问题。

陈铎的身世

陈铎,字大声,号秋碧,江苏下邳人,世居南京。他出身于世袭的将家门第,父亲死后便承袭了指挥使的职位。但他却用心于戏曲,精通南北曲律,并且不断创作散曲,自己运腔高唱。《金陵锁事》云:指挥陈铎,以词曲驰名。偶因王事谒魏国公于本府,徐公问:“可是能词曲之陈铎乎?”陈应之曰:“是!”又问:“能唱乎?”陈遂从袖中取出牙板,高歌一曲。徐公挥之去,乃曰:“陈铎金带指挥,不与朝廷作事,牙板随身,何其卑也!”从这段话,我们可见陈铎对散曲的热

爱,就是在谒见上司时,他也“牙板随身”,而置朝廷公事于不顾。

陈铎生活在明成化、正德年间(1465—1521),正当明王朝“盛世”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城市商业和手工作坊蓬勃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兴旺,而与此同时,封建制度日趋腐朽,而反映在社会风气上,便是“近日人情,奢侈公行,不尚清白,俱是妆成。”(陈铎《颜料铺》)这样的时代产生了陈铎这样的市民作家。他整日串街头、走教坊,与市人、乐师、歌女为伍,他能写会唱,教坊子弟称他为“乐王”。

他的前期作品,主要有散曲《月香亭稿》、《可雪斋稿》、《秋碧轩稿》、《梨云寄傲》、《可雪遗编》、《公余漫兴》等。这些集子中的作品大多系描写谈情说爱、风花雪月之事,概承袭元人散曲的旧套。到了后期,陈铎醉心词曲,整天混迹于街坊市民之中,对生活方式不同的下层人民的思想、人情、事态已非常熟悉,奋发图进,运用市民语言,写成了反映市民阶层生活、开创散曲新意境的代表作——《滑稽余韵》。

《滑稽余韵》——开创散曲新境界

陈铎编写的《滑稽余韵》共收散曲136首。按作品描写的内容与人物身份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类

35.2%, 21—50岁的共有272684人,占总人口的47.8%,而50岁以上的只有35779人,只占人口的10.7%(其它尚有不明人口6.3%)。

由于到南京来谋生的多为男性,导致南京人口男女比例十分失调,1928年,男女比例是165.61:100,1930年是157.8:100,1934年是158.1:100,1936年是143.0:100。之所以后来会出现下降的趋势,是因为随着第一批男性移民逐渐立住脚,他们从乡下把自己的妻子也接到了城里。

南京成为首都以后,进行了各种建设,尤其是教育建设。1936年,已有大学生23567人,中学生54680人,小学生97886人,分别占到总人口的2.5%、5.8%和10.4%,另外还有大致认识字的人154468人,占总人口的16.3%,合计识字者占总人口的35%,这和当时全国平均80%—90%的文盲率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责任编辑 惠 兰)

型：一为手工业劳动者，如《瓦匠》、《铁匠》、《银匠》、《机匠》等；二为农业劳动者，如《佃户》、《猎户》、《园户》等；三为手工作坊与商户，如《书铺》、《酒坊》、《绒线铺》、《颜料铺》等；四为服务性的个体劳动者，如《修脚》、《稳婆》、《磨镜》、《钉缸》、《医人》等；五为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如《挑夫》、《推车》、《划船》等；六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雇佣，如《牢子》、《皂隶》、《门子》等；七为地主阶级所利用的《道士》、《尼姑》、《和尚》、《巫师》等。作品描写的内容都是陈铎所熟悉的下层社会，对象大都是当时城市的下层人民。题材十分广阔，包罗了当时城市的各行各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汤有光《精订陈大声乐府全集序》），这是自元朝以来没有人用散曲描绘过的广阔的题材。作品选材大胆新颖，开创了散曲创作的新境界。

陈铎的《滑稽余韵》不但选择了前人没有写过的题材，而且作品表达的思想也达到了前人未能达到的境地，从而使作品产生了新意。如《瓦匠》篇：

“东家壁土恰涂交，西舍厅堂初窬了，南邻屋宇重修造。弄泥浆直到老，数十年用尽勤劳。金张第游康鹿，王谢宅长野蒿，都不如手馒坚牢。”作者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歌颂了“数十年用尽勤劳”的瓦匠，通过“金张第”、“王谢宅”的荒废，肯定了瓦匠的“手馒坚牢”，揭示出劳动创造一切的伟大意义。这样的思想认识，使作品增添了一丝新鲜的气息。而在肯定劳动的作用时，陈铎又指出劳动的意义是为大多数人服务、为贫苦人服务，请听《弹棉花》：

“无絮袄贫人怎过？拥貂裘富汉无多，值严寒凭你助温和。休笑我弓儿慢，则为你子儿多，你要舒摊频用我。”给贫人以温暖，这是弹棉花劳动的意义。他希望贫人不要笑弹棉花人弹得慢，因为棉花要“舒摊”，还得靠弹棉花人。这种描写贫人与弹棉花匠的关系，也给人以亲切的感觉。

从陈铎《滑稽余韵》中也可看出，作者对个体劳动者的体贴和关心。这些作品与唐代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卖炭翁》有所不同，他真正认识了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困难与艰苦，因此“能发前人所未发”。如《机匠》：

“双臀坐不安，两脚登不办（败）。半身入地牢，问口味掌饭。违节暂松闲，折耗要倍还。络纬常通夜，执梭直到晚。糲一痒花板，出一阵馊酸汗。熬一盞油

干，闲一回瞌睡眼。”

如果不熟悉机匠的劳动，不体会机匠的疾苦，不了解机匠所受的剥削，这样的作品是写不出来的。在这里陈铎真实、细致地刻划了机匠的生动形象，读着这首短曲，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机匠在泣诉他的痛苦的画面。

明末，城市手工业迅速发展，独立的手工作坊大量出现，使南京成为一座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陈铎的《冠帽铺》、《生药铺》、《纸马铺》、《颜料铺》、《香蜡铺》、《茶食铺》、《剪裁铺》、《表背铺》、《棺材铺》、《书铺》、《笔铺》、《墨铺》、《纸铺》、《香铺》、《米铺》、《花铺》、《古董》、《盐商》、《胭脂铺》、《冥衣铺》、《梳篦铺》、《针铺》、《绒线铺》等，勾勒出南京这座新兴商业城市的繁华景象及其个体商业者的辛酸。陈铎的《磨房》、《油坊》、《酒坊》等勾勒出当时南京手工作坊的情景。可以说，这些作品，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明代南京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在陈铎的作品里，除了对新兴手工作坊及商业店铺的描绘外，还对封建行会也有所揭露。

《滑稽余韵》的问世及其影响

陈铎的《滑稽余韵》，原书题为《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坐隐先生”是指明代安徽戏剧作家汪廷讷的别号，此书是经他精订过的。书名下题：“新都环翠堂藏板”，新都即今安徽歙县，环翠堂乃汪氏学号。所以此书当为汪氏家刻本，是明万历刊本。

《滑稽余韵》问世后，立即为时人所赞扬，当时便被传唱开来，使“里人闻之，亦且心醉”（汪廷讷《刻陈大声全集自序》）。曹学佺《汪昌朝精订陈大声全集序》云：“而《滑稽余韵》、《太平乐事》，则又妙极俳谐，令人绝倒。大都流丽清圆，半藻绵密，事尽而思不乏，趣，言浅而情弥刺骨。以彼作乎，岂独为昭代白眉哉，前无古人矣！”曹学佺对《滑稽余韵》的高度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附注：陈铎《滑稽余韵》，仅流传万历刊本，“文革”期间为傅惜华收藏，后下落不明。所幸1960年版《明代歌曲选》有辑录〕

（责任编辑 霁明）

旅游活动开幕仪式剪彩。

朱平 摄

市领导包生华、李英俊为“91金秋恳谈会贸易、



南京文化艺术节 暨 '91 金秋恳谈联谊会

● 余安民

'91金陵之秋，一场文贸结合的大戏，给南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硕果，外贸成交额 2069 万美元，内贸成交额 32.37 亿元，批准利用外资项目 147 个，投资总额达 1.9 亿美元。

早在今年 3 月，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就研究决定：为充分利用南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秦淮风光带的优势，组织富有南京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系列活动，以吸引国内外游客和各界人士，促进南京经贸、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将于 9、10 月间举办南京首届文化艺术节暨'91 金秋恳谈联谊会。4、5 月份，就进行筹备，虽然在 6、7 月间遭受连续暴雨，但为了弘扬抗洪精神，鼓舞全市人民的士气，把南京建设得更美好，市委、市政府决定艺术节与恳谈会照常举办！

浓郁风情引来中外嘉宾

9 月 25 日，首届南京文化艺术节暨'91 金秋恳谈联谊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台湾、香港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多位境外嘉宾，和来自国内 30 多个兄弟地市的 2300 多位友好使者，与省市领导欢聚一堂。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王荣炳市长专程赶回南京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上，颇有名气的“四小”演出，是文化艺术

活动的首场戏。“四小”是指南京的“小红花”、小杂技、小书画家、小武术。“小红花”艺术团建团 30 多年来，曾多次为来访的各国国家元首和代表团表演，并出国访问演出。目前这支年龄最大 12 岁、最小只有 7 岁的小演员队伍，曾多次在全国少儿歌舞比赛中夺魁。仅去年以来，“小红花”就进军亚运会，献演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荣获春节电视晚会最佳节目一等奖。他（她）们在开幕式上感情真挚的演出，台上台下激情涌动，浑然一体，达到理想演出效果。

十里秦淮名扬天下，这里民族、民间文化大放异彩。在艺术节喜庆日子里，首次推出的“秦淮夜泊”，将画舫游览、戏曲演唱、乐曲弹奏、船点品尝融为一体。入夜，从平江桥到来燕桥，河厅河房宫灯通明，两岸轻歌曼舞，琴声不绝，海内外嘉宾尽情领略当年“秦淮画舫甲天下”的景观和“桨声灯影秦淮河”的意境。给人以无限的遐思，留下美好的回忆。一位从台北来的“老南京”乘画舫游，游兴十足，感慨颇多：“‘秦淮夜泊’是南京一大特色，自古有之，今有新意，确实名不虚传，很有吸引力。”

夫子庙仿古婚俗，更是一番民情、民俗奇观。一对金童玉女提着灯笼缓缓走在前面，两名手捧托盘的丫环和 8 个吹吹打打的乐手紧紧相随，其后，身着大红喜袍、踱着方步的新郎引着一顶四抬花轿。这支明清时的婚礼队伍一踏上夫子庙贡院街，即刻引起

人群如堵,笑声如潮,人们争相欲睹新娘子的风采,只可惜看见的只是从轿口露出的红盖头。新郎叫王天俊,年27,是本市某医院的医生;新娘姓殷名文霞,芳龄25,是本市某单位的职工。他们情投意合,正分享着仿古风俗的乐趣。目睹这一民俗景观的外国朋友和港台同胞,无不交口称绝。

秦淮风光带的韵味,不单观赏,还有品尝。“秦淮人家”的小吃,色、香、味俱全。大成殿的小庙会,民情浓郁,人声鼎沸;魁光阁的茶道,别有一番情趣;翠园小公园长廊的名家楹联,集诗词、书法于一体,回味无穷。有位来自台湾、儿时生长在南京的老人从上午9点进入魁光阁,一直吃到下午3点。热心的服务员劝他不要撑坏了肚子,老人却动情地说:“这里的小吃我想了几十年了,今天总算如愿以偿。”台胞杜一飞先生一行3人,在“秦淮人家”边吃边谈,歌兴大发,给满堂食客唱起了“阿里山的姑娘”,引得满堂喝彩。

艺术节期间的南京文化舞台,似鲜花盛开的百花园。在典雅别致的仿古小剧场“金陵乐府”,久负盛名的南京民乐团推出了一台风格独特的民族音乐会。

在玄武湖公园,“神秘的光纤世界”一展风采。光纤彩灯是南京的特产,它是当今最先进的光纤工艺制作技术与民族传统灯彩技艺相结合,孕育出的一朵艺术奇葩。

在莫愁湖公园,南京——自贡金秋灯会盛况空前。38组大中型彩灯占地8498平方米,其中水上灯组占地2500平方米,汇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于一体,熔“形、色、光、动、声”为一炉,500余盏精巧别致、绚丽多姿的工艺彩灯,把满园湖光山色笼罩在灯海里,真可谓“满园灯火夜如昼,疑是银河落莫愁”。每日前来观灯的市民和外地客人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企贸唱“戏”成果喜人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并非南京人首创,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却是南京文化艺术节暨'91金秋恳谈联谊会的显著特色。

南京的工业,已经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大体合理的综合性城市工业体系。拥有采掘、冶金、造船、汽车、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化学、石油加工、建材制品、食品、包装等36个工业行业,200多个门类,可生产2000多大类产品。现有工业企业3800多家,其中大中型企业160多家。全市拥有48所高校,



外国朋友参加今秋恳谈会 朱平 摄

470个科研机构,30.75万科研人员,是我国华东地区一个综合性产业基地,也是科技力量比较集中的地区。

本次金秋恳谈联谊会设在市科技中心的“南京出口展览会”,和设在市工贸中心的“南京第20届工业品交易会暨新产品展览会”,为企业施展才华,让更多的南京产品去占领国内市场、“飞”向世界各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9月25日,市科技中心却花团锦簇,一派喜庆气氛。下午3点,'91金秋恳谈联谊会经贸旅游活动剪彩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包生华、副市长李英俊剪彩后,陪同1000余名中外客商参观出口商品展览。由13个市属工业局(公司、集团),5个部、省属企业集团和12个国防工业企业提供的310个种类近5000件展品,把800平方米的展厅装点得色彩斑斓。来自香港飞时马丝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马维英,参观后即刻到纺织品展室,洽谈地产丝织品出口生意。香港中华商会副会长张永珍女士,看了宏泰旅游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的旅行帐篷后说:“这种产品国外很流行,出口前景很好。”至于展出的南京电(电子)、汽(汽车)、化(化工)、特(特色产品)名优产品,更引起众多客商关注。短短10天,这个系列服务组接待客商122批、240人次,赢得了中外嘉宾的赞誉。

外贸活动中的发照仪式,特别引人注目。在一间约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不时传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爽朗的笑声。艺术节期间,全市共批准利用外资项目147个,投资总额19384.3万美元,合同外资金10302.98万美元,占投资总额的53.2%。其中批准立项的项目76个,批准可行性项目30个,颁发营业执照41个。9月26日,举行首批发照仪式,参加发照仪式的南京虹海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南京台海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南京黄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华发化纤制品有限公司和南京雄峰服装有限公司等

南京自贡金秋灯展组灯“荷花仙子”



5家合资企业,是前一天通过会审会办当场取得执照的,投资总额为1095万美元,合同外资390余万美元。9月30日上午10点30分,投资1000万美元的南京第一农副业开发公司举行发照仪式。香港百杰登有限公司董事长巫光明,从市工商局负责人手中接过营业执照后,紧紧握住钟裕辉副市长的手,动情地说:“我在南京无亲无友,全靠各方支持,我是被你们开放的诚意感动而来的。这次从立项、批准证书到拿到执照,前后只有5天,可见速度之快!”

谈到对南京的投资环境和印象,美国共和党亚裔总部共同主席朱伯舜,这位集政治家、实业家、学者于一身的“国际性人物”,联系他在南京浦口投资2000万美元兴建一座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的过程,深有感触:“我在中国不少地方投资,审批手续太慢了,管的‘婆婆’也太多。相比之下,南京比其他城市来得快,办手续也比较灵活。”他还说:“我是应王市长的邀请来参加艺术节和恳谈会的。南京民风淳朴,为人厚道,重感情,这是吸引外资不可少的条件。”艺术节开幕前夕,台湾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会长张平沼一行应邀来宁,王荣炳市长会见了他们。这位祖籍福建的炎黄子孙风趣地说,“我在大陆已无亲可探,但有根可寻,台湾和大陆民族相溶,语言相通,血脉相连,习俗相近,这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经商所不可比的优势。”他第一次来到南京,印象极佳,对南京的港口码头和电子产品等,兴趣浓厚,表示下次将率团正式来宁考察。

在出口商品展览会的分会场,来自10个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单位的72名代表,参加了国内横向协作洽谈,签订经济协作联合项目49项,投资总额



南京金秋艺术节

为3213.5万元。签订物资协作协议53项,总金额1.43亿元。协助销售地产品1617万元,从而大大超额完成预定的经协计划。

外贸洽谈捷报频传,内贸成交同样硕果累累。订货额高达5.1亿元,位居榜首。

有人说,这次艺术节政府“搭台”精心,企业“唱戏”诚心。取得了丰硕成果。

(责任编辑 舜明)



张一戈 刻画

● 叶雷

馨香四溢的 花朵



——记蜚声中外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

在南京市中心鼓楼广场附近的峨嵋岭上，有一所被誉为少年儿童艺术摇篮的艺校——南京市艺术小学。由这所学校的孩子们组成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不仅在国内艺坛熠熠闪光，而且漂洋过海，在世界舞台大放光彩。那浓郁的民族特色节目和充满活泼、清新的儿童情趣的演出风格给海内外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因此与南京长江大桥、中山陵齐名，被中外人士冠以南京的“大、中、小”而名扬天下。

打开小红花艺术团的艺术档案，是一串辉煌的纪录：“小红花”曾先后多次为来南京的柬埔寨、朝鲜等国的国家元首和许多外国代表团作专场演出，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邓小平同志也多次观看过“小红花”的演出。“小红花”还作南京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东欧、日本等地，赢得了“萝卜头文化大使”和“文化小天使”的美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还多次拍摄了“小红花”的演出实况和专题介绍的新闻纪录影片。由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纪录影片《娃娃天使》还被译成8国文字向国外发行。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艺术片《南京小红花》还被送往台湾，促进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1990年，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更被北京亚运会大型活动文展部在全国众多艺术团体的精彩节目角逐中选中，指定参加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大型演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参加亚运会演出的演出团体，也是唯一的参演少儿艺术团体。“小红花”在京的演出受到了中央首长和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小红花”又连续进入“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又参加了1990年国庆晚会的演出。11月，“小红花”又应邀参加深圳特区建立10

周年庆祝演出，给特区观众带去了崭新的节目。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电视联欢晚会上，“小红花”的一组少儿戏曲联唱更是倍受全国亿万电视观众的欢迎，后被全国观众投票评为该次晚会最佳节目一等奖，并获得最佳戏曲杯。“小红花”更加家喻户晓。

“小红花”为何能在全中国众多的少儿艺术表演团体中独树一帜，且多年花开不败，新蓓蕾不断绽放？她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带着观众们好奇的询问和进一步了解“小红花”成长历程的愿望，记者不久前来到了这所人们慕名已久的艺术摇篮。

“是啊，全国各地不少来参观的人都这样问：‘你们为什么能培养出这么好的孩子？’我们的体会是，因为有党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与关怀，有全体老师高度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有家长的配合和孩子们好学上进的素质，才使我们的‘小红花’开放得这样鲜艳。”在深秋温暖阳光的照耀下，在峨嵋路12号艺小那简朴的办公室里，艺小党支部书记周如英、校长吴联良和副校长梁全仁不无自豪地对记者说。

“小红花”艺术团始建于1957年8月，当时是由共青团南京市委少年之家组织全市中、小学生中的文艺骨干建立的业余艺术团体，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话剧、音乐、舞蹈、杂技等文艺培训和演出。“文革”初期解散。1968年，南京市玄武、白下、秦淮三个区又集中小学生中的文艺骨干组成了“红小兵”文艺宣传队，发展到1970年，全市共组建了12个区、县“红小兵”宣传队。当时，市里组织两个区以上的“红小兵”宣传队联合演出，就沿用“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称号。1979年底，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考虑为进一步加强艺术团建设，使艺术团的孩子们在文化学习和身心健康、演出水平上更上一层楼，于是决定由南



小红花访问日本名古屋演出

京市文化局创建艺术小学，对外演出则称“南京小红花艺术团”。

“我们最难忘的是周总理对小红花艺术团的关怀”，艺小有数十年教龄的声乐老师徐明华深情地回忆周总理当年观看“小红花”演出后的谆谆嘱咐：小红花以演出民族节目为主，很好，要坚持，节目不宜过长，不要超过1个半小时，报幕的孩子刚下台，又上舞蹈，负担是不是太重，不要“激情有余，抒情不足”。器乐老师凌成也激动地回忆起叶剑英元帅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来宁在中山陵宾馆和玄武湖友谊厅观看演出后接见老师们的情景，叶剑英元帅紧紧握着老师们的手说：“有你们这些好老师才培养出这么好的孩子！”1975年，邓小平同志也陪同金日成元帅来宁观看了“小红花”的演出，对孩子们的成长十分关心。

南京市的领导同志对“小红花”也十分重视。市长王荣炳一次陪同外宾观看演出后到后台看望老师和小演员们，发现演出服很皱，一了解是缺乏制作存放衣服的活动箱子的资金，当即表示要想方设法解决，他在百忙之中具体指示市政府办公厅文卫处负责同志落实拨款1.2万人民币，并三次叫人打电话了解落实情况；当得悉艺小办学条件较差，他又指示计经委具体帮助解决。原副市长、现省政协副主席徐英锐在90年亚运会“小红花”赴京时，亲自到艺小10多次，为筹集演出资金、印制节目单等奔波，老师们每忆及此，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有党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更有老师们一颗颗赤诚的奉献之心。艺术小学的老师大多并非名牌艺术院校或著名艺术团体毕业、退役的，而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普通的小学音乐教师、普通的演员，有的是志愿军老战士，但她们却创造了一流的编导水平，因为她们有真正的事业心。“我们既做指导老师，又做化妆师、搬运工，孩子小，还当保姆，一天没有8小时的概念，常常把自己孩子扔在家里，忙得过年过节

回不了家，但大家有事业心，离不开‘小红花’”舞蹈老师刘英姿、张若敏由衷地说。许多老师如在普通小学任教，享受教龄补贴等待遇，要比现在每月多收入三四十元，但她们不计较。她们潜在少儿世界里，捕捉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生活里那些最为打动人心的言行举止，积累创作素材。她们自费到高等艺术院校进修，不断更新、拓展艺术视野。

“我们的节目坚持民族特色为主，强调富于儿童情趣，重视艺术性，基本功训练，完好的艺术整体表演效果，清新明快。”“我们注重独辟蹊径，从题材到形式，尽量找别人没有的，讲究高质量，别人看了也不易学。”老师们毫无保留地向记者炫耀她们栽花的秘诀。“小红花”的“吉它弹唱”节目一进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导演们便一阵哗然，一曲下来，掌声不息。“蓝天白云”那首歌别的团孩子也唱，但比起“小红花”来就差一截，因为“小红花”的孩子手弹吉它，融声乐、舞蹈、表演、器乐为一体，显得特别活跃。

近年来，国内少儿艺术教育中出现了“电子琴热”、“钢琴热”，有人也建议“小红花”买架子鼓、电贝司搞电声乐队，“赶潮流”。“小红花”不为所动，坚持民乐教育。她们的民族打击乐合奏《哪吒闹海》，是孩子们熟悉的故事，过去电影、木偶片、美术片都有过，但用器乐且全用打击乐的形式在全国没有，“小红花”一排演，马上引起轰动，小演员铃凯民族排鼓的演奏，排山倒海，使爵士鼓手也为之倾倒。“小红花”到日本爱知县名古屋等7个城市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受热烈欢迎。在全国首届少儿民族器乐邀请赛上，参赛者中有广东演奏了100场《十面埋伏》的琵琶少年高手，有济南7代祖传的唢呐神童，有四川8位二胡英才，但“小红花”去的扬琴、二胡却夺了魁。我国著名民乐指挥彭修文评说，因为“小红花”的孩子不仅注重技巧上的表现，更注重音乐的理解与表现，因而与其它小选手相比就显得更加完美了。

正是由于老师们的辛勤浇灌，“小红花”才不断产生出一批批经久不衰的保留节目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节目。富于民族民间音乐歌舞节目和江苏地方特色的二胡演奏、童声小组唱、《跳皮筋》舞蹈，演了几十年，观众看不厌。为亚运会和九一南京艺术节排演的新节目《喜迎宾》融少儿歌舞、杂技于一体，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浓浓烈烈，小红花艺术团刚进团的二年级孩子们的舞蹈《看秧歌》，动作夸张，活泼可爱，羊角辫、红肚兜，蹒跚的大人步，一出场就受到热

烈欢迎。充满浓郁民族民间特色的打花棍舞蹈令人眼花缭乱。获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最佳节目评选一等奖的《戏曲联唱》，将著名京、豫、越、锡剧选段连为一体，四组少儿身着古装，有板有眼，韵味十足的演唱既逼真又充满童趣，唱做身段都给观众很强的新鲜感，富有另一种神韵。民乐小合奏《夜深沉》、《步步高》中拉高胡、京胡的小演奏员技艺不凡，观众掌声如潮。小小书画家的表演唱，孩子们在欢快的歌舞声中，几分钟内便在舞台上画出栩栩如生的国画，写出气势不凡的大字，令观众叫好。“小红花”的演出往往是自始至终，台下镁光灯闪个不停。

可见，“小红花”誉满海内外是因为其艺术表演实力雄厚。近年来，“小红花”在全国各类舞蹈、器乐、声乐比赛中成绩显著，名列前茅。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少儿舞蹈电视录像比赛中，该团参赛节目共有四个获一等奖，四个获二等奖，三个获三等奖。“小红花”参加全国第一、二届少儿民乐比赛，又获得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并荣获全国首届少儿民族器乐演奏邀请赛的第一、二名。还荣获全国少儿音乐智力比赛和全国“小百灵”歌赛的一等奖和二等奖。

多年来，在“小红花”这块艺术园地里，老师们前后送走了一批批总计 200 多位得意门生，全国许多专业艺术院校和专业文艺团体迎来了许多“小红花”的艺术好苗苗。当年的“小红花”中，走出了现任江苏省歌舞团副团长的著名青年二胡演奏家朱昌耀，有全国第一位二胡硕士研究生、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民乐教研室副主任的欧景星，他当年曾为周总理演奏。目前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打击乐专业深造的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李飏、青年演员薛白都是当年的“小红花”。此外，在总政、战友、前线歌舞团、北京人艺等许多中央、国家及部队、省市艺术团体中，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高等艺术学府中，都有昔日“小红花”的身影，夏春菊、储燕、王菁菁、沈小凤、吴慧珠、严艳丽等都是老师们念念不忘，聊以自慰的“掌上明珠”。

南京艺术小学是每年从二年级的小学生中选拔新苗，经过严格考试录取，目前在校学生为 54 位同学。根据专长分为器乐、声乐、舞蹈三个队分别上专业课。“小红花”54 位同学文化课却要分为二至六年

级 5 个班，为了保证小演员们文化课与其他孩子一样能上好，艺小的梁淑珍、梁玉华、刘颖等花了不少心血，艺小还聘请了外校富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教师陈萍、逯建燕、赵承游、鲍修淑来任教。她们按照全日制 6 年制小学课程开课。由于是半天上课，她们便采取保证语文、数学主课时，适当压缩史地自然等副课，突出重点讲授的办法，努力保证教学质量。在园丁的辛勤浇灌下，“小红花”的孩子们在智力、文化课成绩上也令人翘指。艺小首届毕业生李律，是拉二胡的，现在南京大学攻读外语系的博士研究生，并任校研究生会主席，沈晓蕾同学参加全国数学华罗庚金杯赛荣获二等奖。周亚雄和贺丁丁都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著名重点中学南师大附属中学，并在中考高中的中考中又以优异成绩分获第一名和第三名。肖晓也以优异成绩考上南京外国语学校。最近，设在美国的世界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专家们一行访问了艺小，对老师们开发少儿艺术潜能和早期智力的做法与成果表示赞赏。

因此，如果说，音乐、舞蹈的美育教育是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和智力开发极为重要的一环的话，被选中进入“小红花”的孩子们是十分幸运的，因而她们的父母也全身心地支持和关心孩子的一切，接送配合从来不误。孩子们从音乐舞蹈中获得的心灵陶冶与艺术技能的掌握，对她们未来的人生旅程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小红花”的孩子们显得更成熟。因此她们深深地感谢老师们，每逢节假日，总会见到历届毕业生们前来母校探望，那时老师们从眼里、心里总是荡漾起幸福的涟漪。

这些年来，“小红花”不仅在家乡南京的舞台上，而且到苏北革命老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和西南美丽的春城及各地应邀巡演，更加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艺术素养。但老师们也感到，“小红花”节目要再出新十分不易，当前各类艺术表演形式竞争激烈，“小红花”要经历春夏秋冬的考验。但对有事业心、有童心、有追求的园丁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代代少年儿童来说，美的创造潜能是永不会枯竭的。我们相信“小红花”一定会开放得更艳丽！

（责任编辑 霁 明）



南京电力工业八十年

南京电力工业源于清末,至今已逾 80 年;它留下了南京电业职工艰难创业的足迹,记载了他们为发展南京电力工业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光辉成就。纵观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五个阶段。

创建、发展。清宣统元年(1909 年)春,两江总督易人,由张人骏接任端方(满族)职务。同年五月,江南财政局提调许星璧向新任总督建议,由政府拨款在城内开办电灯厂,供总督官署晚间照明用。张人骏批准后,从地方财政中拨银 20 万两作筹建电灯厂经费,并委许星璧为金陵电灯官厂总办。厂址选在明皇城西华门附近。同年八月破土动工,并向德商在上海开办的西门子洋行订购 3 台 100 千瓦单相交流 50 周波发电机,各用 165 马力直立复胀蒸汽机为动力。1910 年 8 月(宣统二年七月),第一台 100 千瓦发电机组安装竣工,试运转情况良好,首先向总督官署(今长江路江苏省政协会址)送电,并以九月初一(1910 年 10 月 3 日)为金陵电灯官厂成立日期。据 1933 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记载:这是我国官办电气事业的开端。

1912 年(中华民国元年),金陵电灯官厂由江苏省实业厅接管,更名“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1914 年春,电灯厂购置一台 216 千瓦三相交流 50 周波发电机,又于 1918 年购置安装一台 100 千瓦单相交流 60 周波发电机。至 1920 年初,供电范围东至西华门、西到水西门内、南抵中华门内、北达下关江边,有输电线路 32 公里,电线杆木 1178 根,在三山街、中正街、三元巷、鼓楼及下关,设有 2.3 千伏配电所 5 处,共装 9 台总容量为 645 千伏安的变压器。

同时,又在下关江边建立分厂,安装大容量机组,并与美商在上海开办的慎昌洋行签订合同,由该洋行承包安装一台美国奇异公司产 1000 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920 年秋工程竣工,10 月正式发电,定其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下关发电所”,原电灯厂定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西华门发电所”,形成“一厂两所”的电力机构;总办事处设在西华门。至 1927 年的 7 年间,两发电所虽未增装发电设备,但配电所增至 7 个,用户已达 3000 余户,装灯约 5 万盏。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6 月将原电灯厂交由南京特别市直接管理,更名“南京市电灯厂”,1928 年 4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35 次会议决定,又将南京市电灯厂交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接管,4 月 17 日更厂名为“建设委员会首都电厂”,此后 10 年南京电力工业一度兴旺。

增加发电设备——1929 年 3 月,建设委员会决定在下关江边筹建新发电所,经过 4 年的建设,于 1933 年 4 月两台 5000 千瓦汽轮发电机组正式投产。西华门发电所机组随之全部停役,分别拆往安徽省馒头山和淮北两煤矿,自此改所名为“首都电厂西华门营业所”。

鉴于新发电所建设工程被德国人为首操纵,电厂不能自主,因此在二期工程扩建时,首都电厂总工程师陆法曾集中全厂技术力量承担起该工程所有设计任务,并进行设备订货的国际招标。这是我国电力工业史上的一个创举。新所二期工程安装两台各为 1 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第一台于 1936 年 11 月正式发电,第二台因日军侵华战争而延至 1938 年秋发电。

为筹集下关新发电所建设资金,建设委员会发行电气公债,为国币 250 万元,分 8 年还清;同时,建设委员会又向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借国币 50 万元,共筹资 300 万元。

1937 年,下关发电所发电量为 8755 万千瓦时,与 1929 年的 725.6 万

● 谭恩容

千瓦时相比增加了 12.56 倍。

建设供电设施——首都电厂从 1931 年起,对全市供电设施进行整修改造。1933 年将全市近 500 公里的 110/220 伏低压线全部改为符合全国标准的 220/380 伏。

30 年代前期,在市区输配电网络初步形成的同时,各郊县电力线路建设相继跟上,供电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 66 千伏京龙线的建成,是南京电力工业兴旺的重要标志之一。该线路是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国内最高电压输电线路,1935 年开始筹建,1936 年 4 月建成,同年 6 月 18 日送电;主线从中央门配电所起,全长 39.6 公里,直达中国水泥厂(龙潭)。至 1935 年,全市共有各种电压线路 997 公里,配电所 15 个,主变压器 24 台,容量 3.9 万千瓦安,供电范围达江宁、句容、六合等 4 县。

30 年代初,首都电厂即建成 15 千伏横过长江的水底电缆,从浦口电厂以 6.6 千伏向下关发电所输电。1936 年元月敷设从下关到浦口的 2 条 15 千伏过江电缆和一条过江通信电缆,将电力送往永利铔厂。

提高用电水平——至 1937 年 7 月,用电水平已达最高峰,用户增至 47739 户,最高负荷达 1.88 万千瓦,用电量 7122.6 万千瓦时,平均每人年用电量 71.22 千瓦时。

30 年代初,电力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在此之前南京地区农村全以人力、畜力或用木制龙骨水车及转轮式水车浇灌农田。1935 年 5 月,首都电厂在江宁自治实验县建设的 29 个电站陆续投入使用,至 9 月 20 日,各站共用电量 70 万千瓦时,受益农田近 5 万亩。30 年代中期,电力有如此规模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在全国实属先进。

衰落、萧条。1937 年,日军侵华,南京沦陷,首都电厂由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实际上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电力工业遭受严重破坏,曾有“全国模范电厂”、“首都的眼睛”等美誉的首都电厂就此衰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打内战,南京电力工业并无起色。仅举下例,窥其一斑:1948 年首都电厂连续 6 次向空军总司令部发函催交电费,虽有“……否则歉难继续供电”之语,但仍无结果,所列私人多次欠交电费的名单中,卫戍司令等人名字也列在纸上。直至南京解放前夕,电力工业依然萧条,终不及“抗战”前最高水平:首都电厂装机容量 3.6 万千瓦,实发能力只有 2.4 万千瓦左右,全市公用配电所减至 10 个;且电网运行可靠性差,事故频发,电价

也多次暴涨等。

恢复、振兴。南京解放后,电业职工以主人翁责任感开展护厂和反轰炸斗争,以兢兢业业的精神为南京电力工业恢复、振兴注入了活力,使其以新的姿态向前发展。

1949~1966 年,就发电而言,下关发电厂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对发电设备进行恢复性大修,先后进行了三期扩建工程,装机容量由解放初期的 3 万千瓦增至 1960 年的 11.5 万千瓦;南京热电厂于 1960 年 1 月建成全省第一台 2.5 万千瓦高压高温发电机组,同年 4 月第二台 2.5 万千瓦发电机组投产发电。这是发电建设速度较快的时期。就供电网络而言,南京建设了一批 35 千伏、66 千伏和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并为电网的恢复和完善进行了升压改造工程。1950 年建成的 66 千伏宁栖线和栖龙线,为江南、中国两水泥厂恢复生产提供了电力保障;1951 年建成的 6.6 千伏过江水底电缆首次将电力输向八卦洲,改善其 5 万亩农田排水抗灾条件,使其当年就获得粮食大丰收;1958 年建成投运的南京第一座 110 千伏城南变电所,是南京供电网络新的转折点。50 年代末期,南京市 110 千伏线路已成为华东电网的组成部分,35 千伏单环网和 10 千伏标准电压的配电网络形成;各县建设了一批 35 千伏输变电工程和电站,电力开始为农业生产服务,也是各县电力工业形成的重要标志。其间,用电最高负荷和用电量分别保持在百分之十以上的发展速度,基本能够自给,或有余量输出;至 1965 年,全市最高负荷达 15.63 万千瓦,年用电量达 83481 万千瓦时,其中农村用电量 3640 万千瓦时、工业用电量 70262 万千瓦时、交通运输用电量 479 万千瓦时、市政生活用电量 9100 万千瓦时,年人均用电量 288.9 千瓦时。50 年代前期,供用电业务范围除南京地区外,曾扩大到本省无锡、常州和安徽省马鞍山、皖南部分地区。

在南京电力工业恢复、振兴时期,人们自然想起李士海的名字。1950 年春,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工农业生产对电力需求十分迫切,为减少发电煤耗、降低发电成本,南京电厂决定对 1 万千瓦汽轮发电机进行恢复性大修。大修的关键是车制“迷宫板”,车制重达 10 吨、长 4.6 米、直径 1.5 米的转子,不仅技术难度大且无修理设备,按常规必须交付外商承包,不仅加工费用很高,而且影响整个大修进度。下关发电所车工班长李士海主动承担车制“迷宫板”这项攻关任务,运用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制造专用工具代替落地车床,解决了汽轮

机上不了车床的难题。同年4月,他与郭允龙等全班工人经过12个昼夜的努力工作,终于创造出车制“迷宫板”新技术,提前38天完成机组大修,为国家节省新人民币86万元。电力工业翻开了新的一页。

曲折、徘徊。“文革”10年,南京电力工业一方面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另一方面,电业职工排除阻力和干扰,在动荡年代中坚持建设和生产,为南京电力工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期间,南京热电厂完成两期扩建工程,装机容量由5万千瓦猛增至38.5万千瓦,这10年是电厂建设的重要时期。电网建设有很大突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第一条110千伏高压充油过江电缆、南京第一个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均在此间建成;1976年建成闻名全国的220千伏热燕双回路跨江线,长江南江和北江跨越长度分别为1933米和1107米,南江跨越塔高195.5米。这期间,南京110千伏电网形成,220千伏线路并入华东电网。但就总体而言,电力工业仍处于曲折、徘徊时期。1974年和1975年连续两年发生全市重大停电事故,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电力再次出现供不应求,用电量有所回落,1968年总用电量比1966年下降28.53%,1972年农业用电量比1969年下降49.34%。

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南京电力工业迅速走出低谷,进入大发展时期。在南京电网建设方面,1979~1982年,建成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有:尧化门、六合、大定坊三个变电所及燕尧1号线、马六线、官尧线、热滁线、龙大线、燕尧2号线和尧大线等7条线路,从而形成了市区220千伏环形电网的东半环网以及110千伏南京外围的环形电网,南京电网已成为华东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以来,电力电缆建设速度很快,1981~1985年新建10~110千伏电缆252条、长79公里,占南京解放以来电缆总长度的60%。1985年,110千伏西华门变电所在全省首次采用引进六氟化硫组合电器。1989年4月,南京供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在全国率先通过能源部验收,这标志着我国地区电网调度已进入自动化实用阶段。

近几年,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各行各业用电量日增,为解决电力紧张状况,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等有关部门积极采取综合平衡和开源节流等措施,电业部门改变几十年来独家经营办电的传统做法,广开门路,实行多渠道、多形式的集资办电。南京市政府在建设了南京市自备电厂(4.6万千瓦)、地下发电站基础上,又集资建设南京第二热电厂,1988

年该厂已有1台5万千瓦发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使南京电力工业增添了新的活力。有条件的单位则办自备电厂,1987年末,全市用户自备发电机组总容量21.58万千瓦。为加强电力生产及其管理,在宁部属企业的南京热电厂、南京供电局、下关发电厂从1985年起先后实行厂(局)长负责制,各项工作多次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1989年,南京供电局在全省电力系统中率先被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命名为国家二级企业。

南京电力工业成就显著。1988年末与解放初期相比,地区发电量、供电量和用电量分别增加70倍、117倍、167倍;35千伏以上输电线路和主变压器容量分别增加30倍和106倍。1989年,南京电力工业再上新台阶,同年末南京地区有220千伏变电所6座,110千伏和35千伏变电所81座;10~220千伏线路658条,长8696公里,主变压器容量146台273万千瓦安,10千伏配电变压器容量5721台89万千瓦安;全市年用电量57.24亿千瓦时,最高负荷78.9万千瓦;全市用户14.06万户;全年上交电费4.52亿元。目前,装机容量60万千瓦的华能南京电厂已完成基础建设,可望于今年投产发电,这必将对振兴南京地区经济繁荣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文化名城的南京人民用电自由度将有很大提高。

(责任编辑 华云)



猴年奋进

张一戈 刻画



乐为古都添新绿

——改革中发展的建邺区园林绿化所

● 南京市建邺区园林绿化管理所

建邺区地处古都南京西南侧,面积 7.2 平方公里,区域内街巷狭窄,人口密居,大型机关企事业单位较少。1980 年前,除几条干道绿化和莫愁湖公园外,全区几乎没有大块绿地,绿化覆盖率只有 6.97%,人均绿地 1.20 平方米,是市绿化比较落后的老城区之一。改革十年来,随着旧城改造、新区开发迅猛发展,全区园林绿化事业兴旺崛起,各类绿化总面积由 9.53 万平方米增加到 59.28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和人均绿地已分别达到 17.9% 和 3.1 平方米,已初步形成以道路滨河绿化为框架,新建小区绿化为重点,街头花坛绿地小游园散布其中的点线面相结合的大环境绿化格局。

成立于 1958 年的建邺区园林绿化管理所是为这片大地添新绿的主力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特别是 1987 年全面实行企业化管理改革后,我所逐步扭转了全民事业单位完全依赖国家拨款度日,设施简陋、工作单一、发展迟缓的被动局面,初步形成三个转变:一是多方集资和自筹资金发展园林绿化事业的主动性增强;二是为社会提供园林规划设计、施工、养护综合服务的功能增强;三是自我改造发展的经济实力增强。因而多次受到市园林局和市绿委的表彰,被区政府评为“文明单位”。

近几年,为了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需要,我所制定了“保重点、创特色、抓管护、上水平”的工作方针,改造充实了新街口广场和中山南路、汉中路、莫愁路等干道窗口地区的绿化面貌。新建扩建花坛绿岛,着重植物材料的配置和植物造景手法的运用,广泛采用乔、灌、花、草多层次植物配置群落,形成上有荫、下有彩,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绿化景观。新街口广场中心花园每逢“五一”、国庆两大节日,还摆放盆花 4 万余盆,以其新颖艳丽的造型图案烘托出节日气氛。同时我所注重公共绿地的日常管护,适时修剪、施肥、除草、保洁,基本做到无裸露土面,达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我所近年自筹资金大力扩展公共绿地,在莫愁路新建花坛 29 座及街头绿地 3 处;在汉西路、北圩路、俞家巷等地栽植行道树和街头绿地;在南湖小区建设盆景园等;长度近 1.2 公里的建邺路滨河绿地建设工程也开工在即,这些都较好的提高了环境效益。

在促进社会效益,提高绿化园艺水平前提下,我们积极承接各类园林绿化工程。我区近年新建的十多个居住小区和一些单位的庭院绿化工程,均由我所从设计、施工到养护综合承包实施。绿化面积达 9.7 万平方米的南湖小区和 1990 年设计建成的莫愁新寓绿化,在风格上以植物为主,进行因势造景;在布局上线面结合,突出游园景点;在植物配置中讲求多品种复层次绿化结构;在面积上见缝插绿,扩大绿化空间;尽量使建筑与绿化达到自然美的和谐统一,这些各具特色的小区绿化在全市引起较大反响,被居民誉为花园住宅区。我们还利用石城花圃及管子桥苗圃年产数万盆花卉和各类苗木的优势,为社会提供花木和厅堂会场绿化布置;南湖盆景园培育的盆景不仅在省市展评中屡获殊荣,还在全国盆景展评中获二等奖及第二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一等奖,而且批量销往意大利、荷兰等国,在金陵盆景中独树一帜;我们设计堆制的多处假山工程及山石盆景,以其浑厚自然的艺术风格令人称道。

对社会提供的各类有偿服务,缓解了我所事业经费不足的困难,增强了自我改造发展的实力。我们近年来大力培养和引进人才,注重职工素质的提高,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1 人,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总人数 20% 以上;我们积极采用先进技术,购置各种园林机具 20 多台,固定资产较 10 年前翻了 4 番,保证了事业持续发展的需要。改革十年来,我所全体职工勤奋工作,锐意进取,为美化古都作出了应有贡献。

(责任编辑 吴纪岫)

振兴微利行业

乐为人民服务

● 鼓楼区商业网点办公室主任 胡淑贞

鼓楼区商业网点办公室、商业网点开发公司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直奉行的宗旨是“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近几年来,我们网点办对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微利行业,如早点、小吃、浴室、理发、洗染、煤店、豆制品厂、菜场、粮站、冷库等给予大力扶持,资金采取贷款、贴息、拨款等形式,帮助其改造改善,装潢门面,扩大生产间、经营间,增添设备。基本上解决了群众的洗澡难、洗衣难、吃早点难等问题。

● (一)重点改造改善微利行业

1. 对鼓楼区的6家浴室全部进行改造

乐天池浴室原来是一个破旧的山西路浴室,改造前,面积只有560m²,炕位116张,盆浴10个,女子淋浴16个。改造后面积1100m²,炕位150张,男子淋浴27个,女子淋浴26个,存衣箱138个。该浴室原来只有洗浴,现发展为集洗浴、健身、疗体、理发、餐厅、娱乐室、会议室为一体的多功能配套服务。洗浴上采取4种人工矿泉浴种就浴,并配有擦背、按摩、捏脚、修脚、捶腿、捶背等服务项目。另外还有代客刷衣尘、擦皮鞋,使顾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身清爽,并实行对公专场服务。拆零和配套灵活服务相结合,体现了我区浴室业的经营特色,获得了同行们的好评和顾客的普遍赞扬。其它如宁海路、鼓楼、汉中门、龙泉、紫竹林等浴室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修缮,缓解了群众多年的洗澡难问题。

2. 大修鼓楼豆制品厂

由于豆制品生产中的水蒸气,使该厂常年处于高温高湿的环境,厂房年久失修,钢木构件锈蚀,屋架腐烂,经有关部门鉴定属危房,随时存在屋盖坍塌的可能。经过改造,翻修了屋面,新做了屋架。水泥地,电线全部更换,增添了卤干机两台。环境改善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扩大了生产力,提高了经济效益。改造前销售额每月15万元,改造后销售额

每月20万元,增加了25%,品种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6个。

3. 支持帮助改造改善早点店18个,饭店4个

这些早点小吃店,原来的房屋都破旧,卫生状况极差,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经过翻修,卫生面貌大大改变,店堂整洁明亮,经济效益亦明显提高。如永兴村早点店,原来每月销售额5000元,现在每月15000元。

4. 理发店目前已被个体发廊包围,如何发挥国营主渠道作用,我们决定今年改造改善理发店7家装修门面,增添设施,增加美容室,硬件软件一起上,使其上档次上水平。

(二)对微利行业政策优惠

上述的改造改善微利行业除一部分拨款外,贷款全部贴息(即不收息或低息)。近几年来贷款总额(包括银行贷款)1743万,贷款贴息129万,贷款488次。我们除了对微利行业支持扶持外,对我区的几个大骨干商场——招商市场、湖南路商场、扬子食品商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都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贷款数额大,时间长,利息低。

(三)拾遗补缺,促使商业网点布局配套

住宅小区的改造,使我区的人口密度急剧增长,原有的网点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我们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拾遗补缺,配备网点。近几年来,新增了虎踞北路粮站、归云堂粮站、水佐岗粮油食品商店。翻建扩建了扬州路粮站、狮子桥粮站,新增了钟阜门菜场、扬州路菜场、水佐岗副食品供应点。翻建扩大了丁家桥菜场,新增了上海路牛奶分发站、工人新村牛奶分发站。

今后,我们将继续奉行“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的宗旨,每年将网点建设列入目标任务,积极主动地与有关部门一道深入基层,现场办公,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办实事。

(责任编辑 吴纪岫)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南京组成了临时政府,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军事十分重视,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即任命革命勋臣黄兴为陆军部总长兼参谋总长,具体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当时,南京的革命军队虽然人数不少,但大多缺乏训练,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明显不如袁世凯的北洋军,尤其是合格的中、下级军官严重不足。因此,为补充一批合格的初级军官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陆军部决定在南京建立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1912年1月15日,陆军部颁发了《陆军军官学校章程》,共二章十一条,对学校隶属关系、办学宗旨、学制、开设课程等都作出了规定。

章程中规定陆军军官学校直属于陆军部,“为战时补充军官起见,招选中华民国全国有军

人气质优秀人员,速行训练,以期养成军官资格为宗旨”。对学生生源的文化程度要求是“先行招选入伍生、陆军中小学堂学生以及各种陆军学堂学生有志向者,按其程度,分别教授。如此项人员不足额数,再行招选合格之学生,以谋补充。”(1)学生人数暂定为三百人,学习期限为三个月。

1月24日,陆军部又颁布了《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对前颁章程加以修订和补充。它强调“教育课目仍遵照部章分为教授、训育二科”,即学科和术科。学科以战术学、筑城学、兵器学、地形学、马学、卫生等课为主;术科则以传授技术(马术、剑术、体操)、战地服务等为主。教材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程为蓝本,但必须“避开深远之理论及复杂之事项,以简易而能实行适合于养成初级指挥官之本领为主旨”。从急需人才的现状出发,《方针》规定“教育当以术科为主要,学科从之”,教学时要考虑“如何切以实用”,“尤当注意于时间之利用及节约,务求于仅少时间而收绝大之效力为要”。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养成其遇事有随机应变之能力”;教学方法上要求教官根据学生的素质和才能,“用启发及注入之方法,善为训导”,并且还强调由于我国学生大多不喜欢体育运动

而体质较弱,以至于缺乏活泼勇敢的气概,因此在训练中尤要注意“发达学生之体育”。此外《方针》还要求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以期培养出“忠爱民国”(2)的优秀军官。3月4日,陆军部在制定《陆军军官学校暂行条例》时,在教授课目中增加了外国语学(英、俄、德、日、法),并将学习期限延长至一年半。(3)

1月16日,根据陆军总长黄兴的命令,陆军部军学局代理局长郑开文于当日上午九时到校主持了

开学典礼。从同日宣布的任职命令看,学校配备的师资力量较强,除机关枪教官陈康时为德国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外,其他军事教官乃至校长金永炎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4)

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培

养一批具有“爱国之精神”(5)和较高军事素质的军官,建立一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军队的愿望。在颁布的一系列条例规章中,要求对学员的培养教育“不徒在其学识才能,尤重在其精神品性”,(6)即培养成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又具有“坚定军人之志操”的优秀指挥官,这些都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色彩。但是,这所学校开办后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2月13日,孙中山被迫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玩弄阴谋手段继任了临时大总统,并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已失去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临时政府北迁后不久,经南北协商,将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学生连同陆军入伍生团并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存在了不到半年便夭折了。

(责任编辑 淑玉)

注释:

(1)[南京临时政府档案]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5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2)(6)同上,第167—169页。(3)(5)同上,第191页。(4)同上,第194—195页。

民国元年的南京 陆军军官学校



虞晓波



● 周济宾

南京善堂兴亡录

善堂是旧社会以施舍为主要业务的民间慈善组织,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南京善堂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现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了解一下它存在的历史,对我们今天发挥社会力量做好群众生活保障工作,无可资借鉴之处。爰就有关资料加以记述。

清嘉庆二年(1797),江宁府学教授金襄偕邑绅倡募创办恤嫠局于龙王庙,以济助贫苦寡妇为目的,是为南京最早的善堂。道光年间,地方士绅复设盖善堂于双塘观音庵,亦以贫苦寡妇为恤养对象。两堂局共收寡妇440名。太平天国时两堂局被毁,同治四年(1865)恢复,合为一堂,改称崇善堂。其后,邑人相继举办此类慈善机构,至光绪六年(1880),江宁府城有善堂二十,即:崇善、继善、兴善、普安、崇仁、乐善、广善、同善、恒善、永善、济善、众善、劝善、修善、积善、公善计十六堂,另有施药、长兴施材(材即棺材,下同)、生生堂施材、金陵救生四局。这些善堂大部系绅办或官绅合办,以“行善修福”为宗旨,有的信奉神佛,带有迷信色彩。所办慈善有恤嫠、保婴、义学、惜字、放生、救生、施药、施材、掩埋等。每一善堂根据财力办理一项或数项慈善,受惠者多为城乡贫民和孤寡老弱者。部分为商办。济善堂、积善堂由丝商创办,崇仁堂、同善堂由缎商创办。这些行会性的善堂,原为市场竞争而设,系行业的福利组织,最初均以本业人员(包括业主和雇用人员)为济助对象,帮助解决生老病死的困难,以利行业发展。后逐渐将济助范围扩大到一般贫民。

光绪后期,部分善堂经营规模渐大,形式也有发展。荫惜善堂由湘皖宁三省、府官绅合办,拥有地产467亩,房屋497间,“洋房”4幢,房地产之多,仅次于崇善堂。仁育堂(原名金陵仁育医院)由绸、缎、布、米、酱园、钱庄、典当七业联办,有地产199亩,房屋

128间,渡船2只。每月仅租米一项,即收入一百数十石。

民国时期,善堂仍甚昌盛。元年(1912)至十五年(1926)不完全统计,新办善堂即有11所,并出现“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南京分会”这样的国际性宗教慈善组织。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市新老善堂有39所,其中绅办、官办、官绅合办25所,商办7所,宗教团体或教徒办6所,帮会(清洪帮)办1所。

许多善堂结合各自业务,赈济贫病人民。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仅广利慈善会、崇善堂、南京市慈善会、宗贤救济会、明德慈善堂、仁育堂、下关乐善堂等七单位,就救助109081人,支出慈善费银币28246元。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期间,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南京分会(下简称红卍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同善堂四慈善团体,不畏艰难险阻,分别派出人员,掩埋遇难同胞尸体达194999具。红卍字会、崇善堂及广利慈善会还在难民区发放赈米,开办粥厂、诊所。红卍字会有粥厂两处,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至次年五月三十一日,来厂就餐者有1743056人次,平均每日一万余人;施诊所两处,民国二十七年(1938)一至六月(其中第一所至三月末),共治疗46960人。日伪统治时期,善堂事业多遭破坏。不少单位入不敷出,慈善停顿。一部分单位克服困难,勉力维持慈善。据伪南京特别市社会福利局调查资料统计,民国三十二年(1943),济善、积善、普善、兴善、下关乐善、崇善、崇道、仁育、明德、公善南堂、佛教往生莲社、地方公会、金陵北城送诊给药所等13个单位,以施米、施钱、施诊、施药、施材等方式,救助难胞贫民92000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土虽复,国难未已。各善堂面临物贵财缺困境,仍设

太平天国



第三方 旨准金玺印鉴 摄影：吴晓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曾镌刻过三种印玺，有金玺、玉玺和木玺。在《南京史志》与其它报刊杂志上对天王玉玺（即太平玉玺）和幼天王玉玺（即太平天国玉玺）及洪秀全的“旨准”木玺都有过较详细的介绍，唯独洪秀全的金玺印鉴少有披露，以至引起一些猜测、误传。为此，本文就太平天国金玺印鉴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述。

太平天国不但有金玺印鉴，而且不止一方。迄今为止发现的已达五方。1959年，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罗文起、王淑慎同志就曾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太平天国文件上所盖玺印一一辑录下来编成《太平天国印谱》，原准备附录在罗尔纲先生编纂的《太平天国文物》后出版，由于这些铃盖的玺印图案复杂，印刷技术上有一定难度，故未能出版。

从时间上看，这五方金玺中除第一方“上帝圣旨”小金玺是定都天京前制作的外，其它四方金玺均为定都天京后镌刻的。下面将五方金玺的尺寸与玺文分述如下，并将玺印文字部分画出简图附录于后以供参阅。

第一方为“上帝圣旨”印鉴，体积较小，长宽只有三寸弱。玺文为“上帝圣旨天生真全坐山河”。此金玺印鉴是从戊午八年（1858年）天王《命薛之元镇守天浦省诏》上录下。从内容上看，“上帝圣旨”仅仅说了上帝命洪秀全下凡作主一层，不是代表国家的国玺，在《天父下凡诏书》·《太平天国印书》下册中有壬子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入汉阳时铸造过金龙头金玺一方的记载，当时太平军正在行军打仗，戎马倥偬中无法精雕细刻，故图案简洁，形体较小。

第二方大金玺印鉴亦从戊午八年天王《命薛之

法维持，开展慈善。崇善堂自民国三十四年（1945）九月至三十六年二月，共施米 8113 人，帮助戒烟毒 234 人，施材 15 具。同一时期，积善堂赈济 1188 人。

善堂财源，主要靠房地产收入，少量来自捐募。组织形式，一般采取董事制或理、监事制。不少单位实权操于董、理事长及少数管事的董、理事之手，监事会往往徒有其名。因缺乏监督，天长日久，挥霍浪费、挪用贪污等弊案便常有发生，而济贫恤嫠等善举，渐成形式。崇善堂在江宁县七区有田地 1672.85 亩，另有洲地 13028.06 亩，房屋 264 间。每年收取大量地租和房租，仅麦子一项即收 600 石。而所办慈善则每况愈下。民国三十七年，每四个月发放恤嫠钱一次，受恤者领得 500 元“金元券”，只能买一块烧饼，但董事及办事职员则借机聚会吃喝，花费之钱几与恤嫠费总额相等。平时也常办酒席招待保甲长或地方士绅。湘皖宁荫惜善堂解放前二三年每年仅房租收入即有 360 余万元，而用于恤嫠者只有 7 万余元，

仅占房租收入的百分之二左右。该堂主要慈善为恤嫠及夏季施茶，施茶所费无多，堂中大部财产收入，均被董事秦铁梅等人挪用侵吞。

南京解放后，据市民政局调查，全市善堂约 54 所。由于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各善堂的主要收入——房地租大大减少；加上部分单位无人负责，致使各项慈善基本上处于萎缩停顿状态。不少单位要求政府代管或接管。

人民政府对善堂采取整理、利用的方针。1952 年 1 月至 1955 年 3 月，市民政局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市分会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整理各善堂的财产，重点整理房地产。整理基本完成后，于 1955 年 4 月全部移交市房地局管理，使之成为全民财产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至此，延续一百四十多年的南京善堂，因完成其历史作用而在社会上消失。

（责任编辑 淑玉）

元镇守天浦省诏》上录下。据清方《贼情汇纂》卷六《伪印》记载：“伪天王印八寸见方，四面云龙，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首角上镌一金字，右首角上镌一玺字，左首边上刻‘奉天诛妖’四字，右首上刻‘斩邪留正’四字，然非紧要诏旨不用此印。”其内容明确表达了洪秀全奉天命要与清朝封建统治者誓死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可见太平天国于建都天京不久，天王大金玺已经铸成使用，后人确定这是唯一代表天王权威的“昭信实而壮观瞻”的国玺。太平天国出版的四十多册官书中有一本癸好三年（1853年）刻印的《诏书盖玺颁行论》，是一部专门阐述诏书必须盖玺才能颁行大道的论文集。时人黄际世著文说：“兹蒙天父鸿恩，命我天王为太平真主，所颁诏书，概加金玺。从此天威丕振，四方共仰其声灵；真道大行，万郭（万国之意）咸钦其赫濯，使该诏书者有修好炼正之心，观金玺者有服教谕诫之志。”至于在天王《命薛之元镇守天浦省诏》上同时出现大小两方金玺印鉴，显然是由于小金玺系定都天京前正规制度未制定时制作，才与大金玺配合使用。

第三方是“旨准”金玺印鉴，现散见于太平天国部分印书。据《贼情汇纂》卷六《伪印》载天王另有“三寸六分见方一印，四面龙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答伪奏章及各伪书皆钤之。”此玺铸成并使用于癸好三年（1853年）。宋溶生在《诏书盖玺颁行论》中著文说，如诏书不加盖金玺“则书传天下，或致真伪难分，诏到军中，转恐信疑参半，妖魔或还入计”。太平天国之所以对书籍部分改为加盖“旨准”小金玺，一因书籍颁行量大；二因八寸的大金玺不适宜盖在面积较小的书籍上；三、作为随时要用的国玺——大金玺，不可能长时间离开天朝宫殿搁置在诏书衙里使用，故而促使太平天国加铸了一方三寸六分见方小金玺去代替（为了简便易行，后将金印改成木印）。

第四方天王大金玺。八寸见方，四面云龙。中部上端单行“天父皇上帝”，下端双行，左为“救世主天兄基督□□太平”，右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天下福”；左首上方镌一金字，右首上方镌一“玺”字；左首边上刻“天下太平日”，右首边上刻“万方来朝天”；紧靠云龙图案的最左边上刻“天父主张天兄担当”，最右边上刻“天国久长天堂荣光”。玺文录制于天王《手批艾约瑟撰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艾约瑟系英国的一个传教士，曾到苏州与洪仁玕谈宗教问题，时值1860年夏，天王大约即在此时批示钤盖的文件。这方玺文还见于辛酉十一年（1861年）二月二十四日天王《同天同日事永活诏》，这是反映太

平天国九年十年体制的一方金玺。自1861年以后，太平天国的体制有了一些大的改变，我国著名的太史专家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辛酉十一年三月条目中提到天王曾表示今后“勿再自理庶政”，此后太平天国又换了一方“救世幼主真王福”的新国玺了。

第五方幼主金玺（见示意图）。八寸见方，四面云龙，中部上端单行“天父皇上帝”，中端双行，左为“救世主天兄基督”，右为“天王大道君王全”，下端单行“救世幼主”，最下端为“真王福”；与“世”平行之左刻一金字，右刻一玺字等。玺文见于五处，首次见于辛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天王《眼见天日主乾坤诏》，后两次见于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幼主《父子公孙永作主诏》以及《朝天朝主图》上。自启用幼主金玺后，天王诏旨颁给的人员由原二月二十四日前诏旨所颁的12人扩大到25人，他们是洪仁发、洪仁达、洪仁玕之子和天王女婿，从而可以看出天王正着眼安排一个由其子侄、女婿等为核心组成的新一代的年轻班子。天王在这段时间的诏旨中，极力树立幼主的权威，这是天王借宗教的方法加紧将权力移交给幼主洪天贵福，这方幼主金玺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铸制出来的。

这五方金玺原物都未保留下来，只知其中有一方金玺被清方所获，今人史式在《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中曾引用曾国藩的奏稿，说天王玉玺、幼主玉玺、还有一方金印，都是攻破南京时从天王宫中缴获的，后来金玺被军机处章京刑部郎中萨隆阿窃走熔成金条，一部分被其挥霍。太平天国史学界大多认为指的是刻有“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第二方八寸见方的大金玺。但迄今仍未发现有关萨隆阿窃走熔掉金玺的确切文字记载，故金玺的下落还有待同仁们继续探寻。

（本文参考罗文起《太平天国的印谱》一文，特致感谢。）

（责任编辑 淑玉）

金陵古刹鹭峰寺

鹭峰寺



王明发

南京白鹭洲公园的东北角，有一处不起眼的两进平房，门侧墙上悬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白鹭洲鹭峰寺。时代，明代。”不少游客驻足之余，对该寺知之甚少，本文拟为此作一大略介绍。

关于鹭峰寺名的来历，清代方志学家陈作霖认为，

“系取自唐代的一个僧名。”据明代葛寅亮所纂《金陵梵刹志》记载：当时金陵有大刹三，次大刹五，小刹一百二十。鹭峰寺属中刹之列。该书卷之六记载道：“在都城內，中城钞库街南，青溪地西南，去所统天界寺五里。齐为东府城，梁为江总宅。唐乾元中，刺史颜鲁公置放生池东接青溪。宋淳熙间，待制史正志移于清溪之曲，建阁其上，岁久湮没。国朝天顺间即其地建寺，赐额鹭峰寺……所领小刹曰回光寺、千佛庵、大中正觉庵。”

明礼部尚书杭郡邹干在鹭峰寺碑记中详细记载了该寺的规模：“都城秦淮之南有地曰青溪，旧有法光禅寺，建自梁武帝天监年，历唐宋以来，岁久废毁，遗址犹存。国朝天顺间，进公保开拓旧址，重新构造，佛殿之间，翼然严正，簷牙栋宇，远近相望。殿之前有四天王殿，殿之后有毗卢阁，左庑之半建观音殿，簇以画廊二十余间，右庑之半建藏经殿，亦簇以画廊二十余间，俱彩绘其壁。东廊之前为钟楼，西廊之前为鼓楼，树以碑铭，又于正殿之东辟地数亩建佛堂，方丈以为讲经之所。饭僧有堂，庖湆有所，栖僧有寮，退居有舍，池塘绕其后，金城抱其左，岁戊子工克告成，

特赐鹭峰禅寺。”从以上文字的记载，我们可以粗略知道鹭峰寺的建造年代、地点及规模。

鹭峰寺历经兴废，据我所接触到的史料，大的修缮主要有清朝乾隆和道光年间二次。乾隆末，湖南湘潭僧人达宗至金陵，诸刹敦请住锡，皆不就，鹭峰虽久经颓圯，而地占东园，有城市山林之胜，达宗欣然乐处。以兴复为己任，乡绅大夫闻之，檀施日众，十余年间，规模具备，殿阁一新。另据《白下琐言》记载：“毗卢阁上下五楹，为达宗所建，正殿年久就圯，道光乙未，静斋叔父暨道库大使冯君耀先捐资重建，于殿前台基缭以石栏，工极坚固。太仆蔡友石先生撰记，学使祁春浦先生书碑，寺占东园之胜，为城中游览名区。”又据《同治》续纂江宁府志记载：“鹭峰寺，道光中郡人甘氏修之，极宏壮，今毁，才建数椽。”再据《民国》《首都志》记载，太平天国期间，诸寺毁灭殆尽。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是在公元1856年，而续纂江宁府志是在同治（1862—1874）年间。这样看来，现在鹭峰寺仅存的两排房屋，最早也只能是光绪年间的遗物了。我曾两次走访了三代世居东花园的老人。他们对我说，鹭峰寺现存的房屋根基尚未动，但屋顶上的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已被全部换走了。该寺的菩萨在破四旧的浪潮中，被全部抛入寺后的池塘中，寺中的最后一位老和尚遭红卫兵冲击，自尽于200米处的城墙脚下。至此，沿袭了近500余年的鹭峰寺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宋代曾知建康府的马光祖对青溪一带的自然景观作了如下记叙：“江家宅畔成花圃，东府门前作菜园。”明代葛寅亮在《复颜鲁公放生碑》中说：“邑志称，鹭峰即古东府城处，今寺后有陂塘数亩，菜莖千畦，与莲地兰扁分青映绿，仿佛光祖当时所见，而塘亦相传放生遗迹，即数百年来陵谷迁变未遽。”清代诗画家周宝侯“为寻秋色”曾来过鹭峰寺，题诗中有这样两句“竹篱菊艳争新雨，古寺钟声度远风。”可见鹭峰寺一带宁静的自然景观历明经清，基本未变。民国年间，鹭峰寺为第三警察局的一个分驻所，加之

千古之谜

说淹城

距离常州市区 18 华里，在武进县境内的湖塘桥西南，有一处古城遗址，相传名叫淹城。

淹城是座奇特的古城。如今，关于它的名称来历、建造者、独特的形制和说不清的历史遗迹，给人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谜。

淹城原先是一座土城。“城周三重，壕堑深阔，天险绝越。”奇特的形状，“曲山环围”，明人陈常道描述为“山藏孤岛围千嶂，堑挟重汤控一坪，两河吞吐双环带，百里句萦四结限”。当地有首民谣：“里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罗城，三套环河四套城。”把古城的形状说得非常形象。的确，从现在仍然保存比较完整的遗址来看，淹城原有三道城墙，外加一道外城廓，所有城墙都是由泥土夯筑而成，现在，一般的城墙高 3 米，最高的地方有 10 米，基部宽约 30 米，分内、中、外三城。外城，形似椭圆，周长 2500 米，听老人讲，从前外城墙上长满着枸橘，密密实实，连野鸡都飞不进，兔子也钻不过，这种长满刺的植物，是城内的一道天然屏障。外城墙外还有一道外城廓，周长约 3500 米，中城，亦称里城，略呈方形，周长约 1500 米。内城，亦称子城，王城、紫金城、内罗城，方形，城墙近 500 米。整个城的地势外低内高呈阶梯形，城外低，外城略高，中城高于外城，内城高于中城，体现了王者在上的思想。据说，这城筑于春秋晚期。每道城墙外面都有一道护城河，民间传说，这三道河是该城的主人淹王，他有一只白玉神龟，筑城时，那只神龟

在三个晚上扒出了三道河，后来这只神龟被野心的女婿偷了去，淹城就破掉了。如今，城河的河水依然常年清澈，三道河，一般都有 50 米阔，最阔的地方有 60 多米。据调查考察，从前有 10 条河浜与外城河相通，这些河浜又大多数与大河相接而可通向太湖和长江。如今，内城河已被填没作农田，剩下中城河、外城河依然如故，只是外城河周围的河浜也已经隔断不通。令人奇怪的是矗立在城里城外的那些土墩。当地有首民谣：“内高墩，外高墩，四周林立百余墩，城中兀立女王墩。”在中城内的西南方，由南北向排列着三座高约 10 米的土墩，当地人称之为“头墩”、“肚墩”、“脚墩”，传说里面埋葬着淹王女儿的头、肚、脚三段尸身。为什么一个人要三段分葬呢？民间有个美妙动人的故事：传说淹王有个女儿，名叫百灵公主，长得如花似玉，而且心地善良，能歌善舞，淹王没有儿子，因此更加钟爱她。后来，离此不远有个留王的儿子被招赘为驸马，驸马有野心，想吞并淹城。有一天，他乘淹王外出之机，盗用公主的名义，骗得后花园的钥匙，偷走了淹王的镇国之宝，那只神奇的白玉龟。淹王回来，发觉玉龟被盗，一怒之下拔出宝剑，把公主斩成三段，后来淹王明白错杀了女儿，痛悔万分，只好命令为女儿破例分三处厚葬，于是留下了头、肚、脚三座高大的坟墓。传说是美丽动人的，却并没有能够解开淹城周围还有林立着的“百余墩”之谜！这些土墩，究竟是当年留下来的坟墓呢？还是当

1936 年南京小火车全线通车后，每日穿行于鹭峰和城垣之间，“秋景绝佳”的佛门净土，气氛为之一变。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在白鹭洲南侧的莲子营小学上学，当时从现在的西大门至鹭峰寺一线以北，北大门至南大门一线以东，均不在公园范围内，这一大片地域破塘映辉，沟溪交错，菜畦片片，民居散布其间，每逢秋季，芦花簇簇，鸟鸣声声，远望鹭峰，黄墙黑瓦。石龟守寺门，镇石观音来水，城垣环其左，呈一天然屏障。好一个幽静的去所，依然与光祖所见仿佛。

今日的鹭峰寺原址，扼公园北大门和西大门的要冲，早纳入公园怀抱。寺后北大门出去，是新建的

白鹭洲住宅小区，一幢又一幢的楼房，令昔日鹭峰寺望尘莫及，寺址周围，儿童乐园、露天舞台、溜冰场等娱乐设施日趋完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遗憾的是现存寺房至今仍被居民占用，未能得到修缮恢复。我想，即便该寺不修复，也应竖一木牌，上面略述鹭峰寺的兴衰故实，岂不可增长游客访幽探古之雅趣？倘若将该寺院的房屋稍加修缮，辟一茶室棋座，亦可免去许多退休老人无休憩场所之苦。如果将沿城墙脚的一片肥沃菜地由公园牵头，或是划归寺院管理，种上南京时令蔬菜，由寺院素餐馆烹调上市，供游人品尝，岂不美哉！

（责任编辑 惠 兰）

年作为守卫用的“烽火台”或者是“瞭望台”呢？历来有很多猜测，说它是“烽火台”吧，有些墩与墩之间的距离很近，声音高点就能听见，哪里还用升火放烟传递信息？说它是“瞭望台”，也不象，墩与墩，大的大，小的小，远的远，近的近，零星散落，看不出一些有规则的迹象，况且淹城周围一马平川，只需一两个高墩，便可一览无余，哪里用得这么多“瞭望台”？说它是“墓葬”，更加难以说清爽。直到如今，大多数高墩已被平掉，难得有土墩中发现有几何印纹的陶器或碎片，但又从未发现过有人类的骨骼残骸。所以，“墓葬”之说也不可靠。不过，据笔者几番去淹城观察，淹城原是个河网交错的地方，筑城时原来一些弯曲的河段被利用凿通，构成三道环形的护城河，挖出的土垒作城墙，并且又为了与外界沟通联系和不使城河枯竭，又凿通了通向大河的多条河浜，这些挖出的土堆在一起，成了大大小小的土墩。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土撒开而要堆成堆呢？笔者猜想，还是出于地理上的需要，古时候，江南易发大水，在这平川之地，大水来了，一片汪洋，这土垒起来，可以让人有个立足之地，以备一时之需。另外，东南西北，哪边大水过来，也可用以断流。至于城内之墩，倒象是用来观察城外景物和作为瞭望或祭祀之用的。种种猜测和传说，孰是孰非，至今仍然是个谜！

从前，淹城是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城内又有不少名胜古迹，清朝的常州人庄佳干曾记述淹城的“东西北三面，长松数万，郁郁苍苍如云环拱，下与明泉缭绕相笼罩”，远远望去，“长松离离水潋潋，古阜回环势不止”，城里“珍禽奇兽，咸萃于此”，狐兔相逐，獐鹿出没，树上雀巢栖禽，遍地野花芬芳。据《重建古刹》碑文记载，从前内城里有座淹君殿，曾经有过“花寺钟清传夹谷”的盛况，可惜随着岁月的流迁，淹君殿逐渐荒圯，只剩下“石幢松暝淡屋台”的苍凉景色，又因交通阻塞，世事变迁，当年车马喧嚣和独木舟楫往来穿梭的繁盛景况渐渐消失了，只落得人迹罕至，偌大一座显赫一时的古城，竟成了“颇类空山无尘绝俗之境”。如今，只留下了这座古城的完整的形骸。

前面讲到，淹城有三道城墙三道城河，但是，通向城里的道路却只有一条，而城门又开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城外通外城的门在西北方，外城通中城的门在西南方，中城进内城的门开在正南方，从平面上看，很有点象摆的八卦图，看来这是古城的建造者，出于防御上的需要而精心设计的吧。城内除三个高墩外，还有传说中的玉龟井、龙泉、淹君跑马岗、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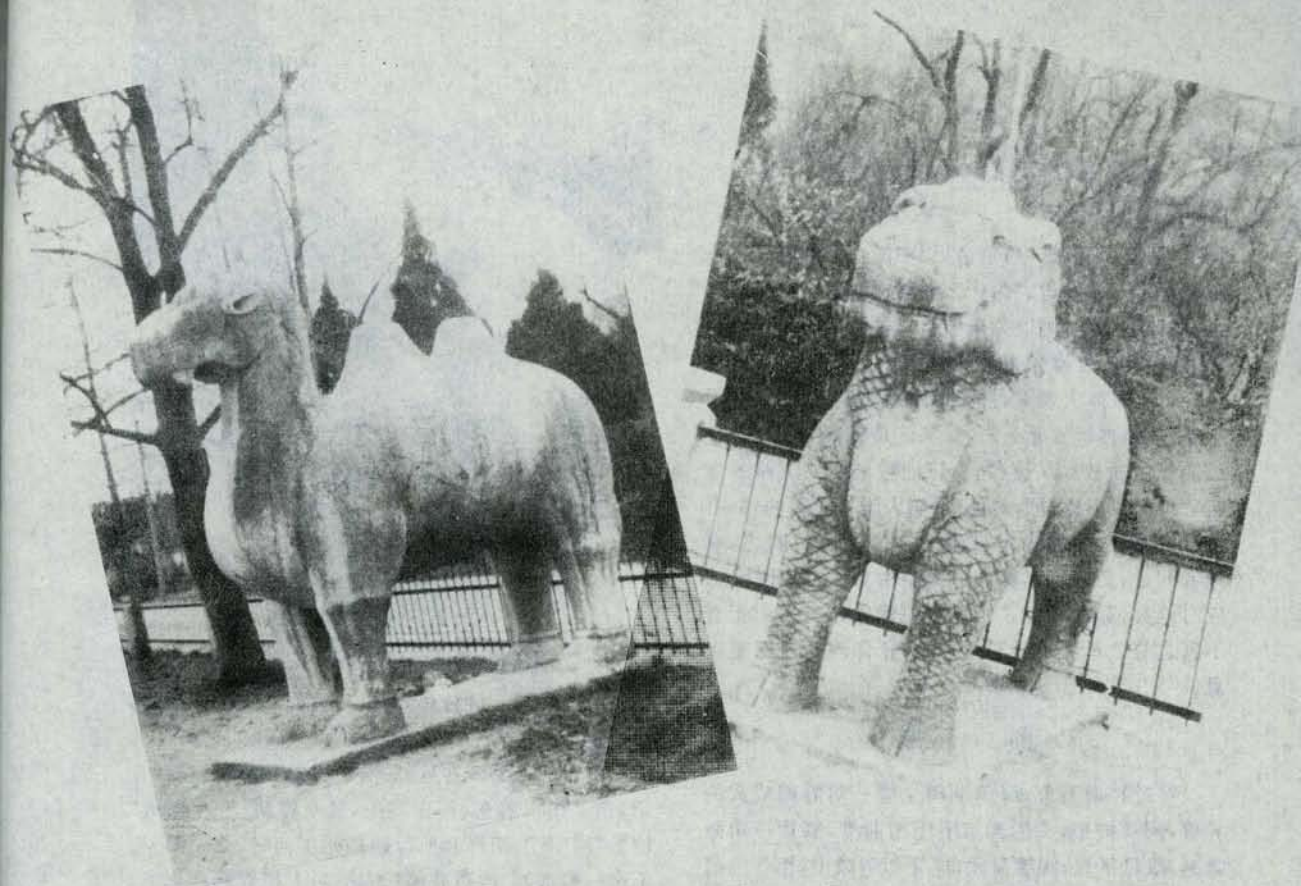
划船处以及抗金名将岳飞驻扎的遗址和独木舟出土遗址，其中1958年出土的独木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条，被国家收藏，陈列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内，成了稀世珍宝！直到今天，在淹城内已发现了4条独木舟，出土了2条，还有两条还深埋地下。从出土的来看，有两种形状，一种是梭子形，另一种是散尾形，有的用楠木，有的用柏木，把整段木料凿空而成，经考古碳¹⁴测定，这是2890(±9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遗物，从独木舟上，虽可看出累累凿痕，但如此参天大树竟是如何砍伐下来，又是从何处运来，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

说到淹城之谜，最使人难解的是它的名称和来历。

淹城的“淹”，辞书中说“淹”通“奄”，但中国最早一部史书《尚书》中只有“奄”而无“淹”，而且说得非常明白，那“奄”在今天的山东曲阜，有人说是山东那“奄”被周公旦讨伐灭掉后，奄族的后裔逃到江南后重新立国的，这是揣测，并无确据。而历代史书中对“奄”国被灭后的下场说得很清楚，是逃到海隅薄姑（即今山东半岛）而“被践”的。假如真是奄族后裔逃来立国的话，那他为何不逃得更远些呢？在当时，常州已是吴国的天下，而吴国的国君正是周王室泰伯、仲雍的后代，仍是周王室的势力范围，难道他不怕再伐吗？何不越过吴地入“越”，岂不更安全些吗？这当然是今人的想法，难以代替古人，猜想只是猜想，何况又无实据。那么，这“淹”又从何而来呢？近来有人从“淹”与“留”的字义上来求诠释，提出“淹”出于“淹留”，说是延陵季札不肯返吴，在此“淹留”，于是筑城以自固。此说似乎有点道理，但也难成其圆，道理很简单，从那两条独木舟上就作了答案，那独木舟建造的年代，比季札出生要早得多，当吴王夫差兴兵伐越时，那战船已是艘艘大船了，所以此论也难使人信服。如今，见之于史书记载的，唯有东汉袁康所编的《越绝书》，该书的“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中，有“毗陵城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家，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这里虽然言词凿凿，但“淹君”究竟是谁？仍然含糊不清。那些民间传说，虽然也能为人提供一些历史线索，但毕竟还是传说，“传闻之言，无以佐证”。直到今天，尽管淹城以它的古和保存完好的形制，成为举世无双的遗迹，为世所瞩目，并被国家列为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对它的建造者及其来历，仍然是个猜不透的谜！

淹城是座奇特的城。何时能解开这千古之谜？！

（责任编辑 淑玉）



明孝陵前神道石刻

● 俞允尧

骆驼

神道獬豸后的石兽是骆驼，卧驼高 2.88 米，立驼高 3.68 米，体形硕大，形象逼真。陵前置骆驼是孝陵的首创。为什么孝陵前要安置骆驼呢？这要追溯到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

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为我国同西亚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加上骆驼的耐劳饥，所以很为中国人喜爱。唐三彩骆驼，曾在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时风靡一时，驼背上的各色西域人，是中外交往的有力见证，显示着唐朝的国力强盛，所以唐三彩骆驼曾是唐代墓葬中常见的明器之一。明代承继了汉唐以来的传统，将骆驼置于陵前，并把它塑成神道石刻中最巨大的石象生，是有炫耀国力强盛，并象征着四域安宁，国家繁盛之意。

石象

神道骆驼之后是二对卧象和立象，卧象双腿趴

端，高达 2.93 米，立象腿粗肉丰，高达 3.47 米。立象神道中间树一云纹柱，似为拴象石。石象造型简洁高大，圆浑粗犷，形态逼真。石象的耳朵雕刻得维妙维肖，耳轮鼓起，筋脉突露；象的双目采用了我国特有的民族艺术形式之一的“石刻线画”，浅刻几刀，十分传神，可谓点睛之笔；象鼻垂地微曲，象牙如巨钩包鼻，象蹄五趾清晰，形态稳重自然，显得格外庄重肃穆，使人深深体会到它的实体感和造型美。

陵前置石象，据史载自秦汉以来就有了，但实物最早见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宋代帝陵前石象的形态基本一致：象侧有驯象人，象身披饰锦绣，背置莲花座。明虽承宋制，但象侧没有驯象人，象身也无披饰，采用了写实的手法。但孝陵石象雕琢的功力，是远胜宋代的。

陵前为什么要置石象呢？据说是君主生前大驾卤簿的象征。明代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在仪仗中设有“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大驾卤簿由御林军“锦衣卫”掌管，“凡朝会、巡幸，别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 150 员）等侍从扈行。”大驾卤簿中有

驯象，起于汉朝。据《西京杂记》中说：“汉朝舆驾有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为什么大驾卤簿要有驯象？据《晋书》载：“帝行则以象车导引以试桥梁。”《宋会要》中也说：“汉卤簿象最在前，晋作大车驾之以试桥梁。”可见象体大量重，桥梁道路经象走过，说明稳固牢靠，皇帝再行万无一失。看来这是皇帝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所故。又据载，象还能辨别桥梁道路的虚实，“稍虚辄不肯过”。另外，据唐人张鷟所著的《朝野金载》中说：“象能知人曲直，有斗讼者行立嗅之，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所以陵前置象还有表彰正直不阿之意。孝陵神道布置石象，正体现了这双重含意。

麒麟

穿过神道石象，绿荫下蹲坐着一对静穆威武的异兽，周身披甲，头后部棕毛团团曲卷，额顶一角微隆起，双目平视，阔嘴微闭，虎牙似剑龇出，粗壮的前肢直立，后肢曲跪，长尾护身，这就是似狮非狮、似虎非虎的麒麟，高1.67米。它前面伫立的一对昂首怒目，雄骏强悍。

麒麟，自然界并不存在这种动物，它是人们意识中的一种瑞兽，融虎、狮、牛、鹿等动物形态于一体。《尔雅》中说麟是“麀身，牛尾，一角。”麒麟始于何时？据《左传》载，鲁哀公于十四年春（公元前484年）率随从到西郊野外去狩猎，随行大夫叔孙氏的部下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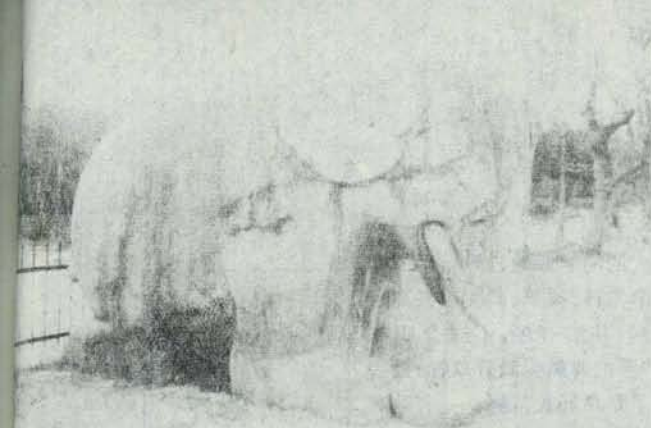
子钅商捕获了一种独角异兽，鲁哀公以为不吉祥，赐给了庖国人。孔子看到这种动物说“麟也”，麒麟之名由此产生。但《吴越春秋》曾载：“禹时麒麟游苑”；《礼记》曰：“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薮”（“薮”同“菽”，沼泽），所以麒麟始于何时，众说不一。不过一般都以“西狩获麟”为始。后人把麒麟神化了，谓“麟、凤、龟、龙”为四灵，亦借喻杰出的人，并把麟说成是“王者至仁，则出”。所以后来各朝代几乎都有获麟的记载，以标榜自己仁德。如汉武帝因获麟而改年号为“元狩”，并在宫内建麒麟阁。麒麟这一意想中的动物，被尊为祥瑞的象征，成为统治者标榜自己、粉饰太平的工具了。

陵墓前置麒麟，史见于六朝。帝陵前置麒麟，臣将墓前放辟邪，这是帝陵与臣将墓的严格等级区别。南京近郊和丹阳附近目前尚存十二处六朝陵前的麒麟。这些六朝陵前的麒麟都有短翼，神态强悍，矫捷异常，似有飞腾之姿。六朝以后的神道石刻种类繁多，但没有用麒麟来表饰陵寝，多用石狮护卫。唯独明孝陵突破唐、宋以来的帝制，陵前不仅置石狮，更沿用了六朝风行的麒麟。为什么孝陵置麒麟？有人认为因孝陵位于南京，与六朝陵墓的布局有关，兼取南北各陵之长，以更加突出孝陵的地位。实际上是朱元璋出于为维护“君权神授”的封建统治思想，也标榜自己和马皇后的仁德，用以粉饰太平的象征。

石马

神道石兽的最后二对是石马。跪卧的一对高1.92米，神态自然，玲珑俊俏；腹部贴地，马蹄形象逼真，生动有力，颈部鬃毛自然披挂，刻工细润，堪称写实之作。立马高2.25米，雄健粗壮，长尾拖地，虚实相间；虽线条粗犷，但粗中有细，连马蹄后一撮





鬃毛也逼真地刻出了。立马双目有神，神情动态刻划得气旺神完，好象在炫耀主人生前显赫的功绩。后有诗人曰：“社稷戎衣起，梯航玉帛朝。石马嘶空翠，御气满层霄。”立马间竖一云纹石柱，似拴马柱，更显得活龙活现，完美逼真。

陵墓前或附近设置石马，早已有之。如驰名中外的秦始皇陵巨大的兵马俑坑，汉代霍去病墓前的英姿勃发、气宇轩昂的马踏侵略者石雕，还有那蜚声域外的唐代李世民的“昭陵六骏”。古代还有用活马殉葬的事，如在齐国故城淄博的淄河之滨，就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殉马墓，葬马达六百匹，前所未见。

马用在大驾卤簿约在秦汉时代就有了；陵前置马成定制则是自唐代开始的。当时陵前石马有二类：一是在陵的北门置六马，因为天子的车驾（名金根车）是用六匹马拉的。唐代诗人杜牧在《长安晴望》一诗中曾写道：“回识太龙巡幸处，飞烟闲绕望春台。”间接道出了皇帝车驾的气派。二是在神道两侧置石马和牵马人，作为大驾卤簿的象征。按唐制，凡是大朝会和朔日、望日（夏历每月初一、十五）上朝时均设仗马，这并非为了乘骑，纯属是仪容而已。宋时大驾卤簿亦有“御马”，宋陵前都设有石马和控马官。酒洪明祖陵神道与巩县宋陵基本一致，是仿宋制的。明孝陵神道两侧立石马也是承袭了唐、宋旧制，但孝陵取消了控马官和马身上的鞍鞴、带饰等，这是明孝陵仪上的又一改革。同时也取意于《易经》上所说天子死后，是乘着六龙（六马）上天了。明代功臣墓前仍用旧制，置鞍马和马夫，也说明了孝陵神道不置马鞍和马夫的含意。那为什么神道不置六马呢？可能是为了保持与其他石兽的对称和仪仗的阵容。由此可见，孝陵神道每种石兽都有其创新和含意的。

石望柱

神道石兽看完后，即折向正北，只见排列整齐的松柏前傲立着一对白石望柱，高达6.52米，成锥形，

下粗上细，采用整块白玉石雕成，望柱东西相距5.2米。柱与柱础均呈六棱形；柱础雕琢成筒式三层，底层饰如玉形挂落，础下有巨青石盘托，显得素雅稳重；柱顶端成圆柱形冠，镶嵌进柱身；六面柱体雕饰着回转的云气纹，柱头雕琢云龙纹，自上而下连成一气，显得格外雍容挺拔！柱表线条细腻活泼，华丽悦目。象这样高耸雄伟、别具一格的石望柱造型，是少见的。而且位置和唐宋以来诸陵不同，不列于石兽之前，而置于石兽和石人之间，为特例。

望柱也称石柱，又称碣或表、标、华表等。李贤在《后汉书·中山简王传》中说：“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可见它的作用主要是标明墓葬的位置。神道置石柱，可追溯到汉代。在汉代祠庙、坟墓前，排列着阙、兽、华表之类，这是汉代建筑群布局的普遍方式。阙是什么？阙是我国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高大建筑物，一般以木结构或石叠砌而成，作为记官爵、功绩和装饰之用，通常左右各一，故名阙或双阙。阙始建于春秋时期，汉朝以后陵墓省去不用，故六朝陵墓没有石阙，多在石柱上题曰某某阙，所以石柱就起着石阙和神道望柱的双重作用了。

朱元璋建造的明皇陵和明祖陵的望柱均立了二对，明初王侯功臣墓只立一对，且多为守式。祖陵望柱一对是仿宋八棱柱，宝珠头，精细生动，与明皇陵及常遇春墓、李文忠墓等石柱均相近；另一对望柱则是仿唐八棱石榴柱头，精雅挺拔，是皇祖陵所特有。这种配置不仅明清各帝陵没有，早至汉唐宋时也绝无，它是明初神道石刻创新的开始，是形成明代帝陵神道规制的过渡阶段。今孝陵望柱疤痕斑驳，并留有多处枪炮痕迹，使人足见它的劫难和沧桑。

明代帝陵除了有望柱外，还应有擎天柱。按《大明会典》载，昌平天寿山陵有擎天柱四，石望柱二；而孝陵有望柱，似无擎天柱，有人认为这不太可能，估计为清初所毁。然遗址在何处？已难考证。

（责任编辑 霁明）

抗战前的南京贫儿院

李清华

读了《南京史志》第41期周济宾同志写的“黄兴创办的南京第一所贫儿教养院”后,使我联想翩翩,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孩童时代,那是在抗战前1934年,我8岁时的一个夏天,由于家境贫寒,生活无着,母亲送我去贫儿院的情景,真是令人深思,铭感五中。

为了丰富史志,回忆童年经历和感受,写真写实,敬请审阅。

贫儿院创办于1912年,是收养、教养贫、孤儿的场所,全称是“开国纪念贫儿第一教养院”。地址在南京白下路,靠近市立第三中学(战前是昇平桥小学),后门在娃娃桥。记得一进贫儿院大门,竹篱笆后是个大花园,每到春秋季节,四面柳树成荫,园内花香宜人,花园正中建有凉亭,亭内石几上镶有黄克强(即黄兴)先生大理石遗像,其手指明显残缺,据史载这是1910年黄克强先生在领导黄花冈起义战役中不幸受伤的,我们这些贫儿对黄先生非常尊敬,进亭必先礼拜,向遗像鞠躬。当时黄先生的爱人徐宗汉是院长,她经常来院,不时到宿舍向贫儿问寒送暖,给人印象之深,至今犹存。徐院长又名佩萱,是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县)人,生于1876年,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是同盟会会员。

贫儿院是所育才学校,当时有贫、孤儿300余人,其教学宗旨是以工读教育,培养贫、孤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院内外墙上到处可见“半工半读”和“勤工俭学”等字样,记得老师曾说过:苦能励志,穷孩子一样可以成才,并举例讲孟轲“三迁成才”、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夜读”等历史人物故事激励贫儿。院内治学严谨,日常授课设有小学到初中各班,每班均配有级任教师,各教室讲台正中都高悬院训“诚朴”二字,词深意切,教导贫儿既要诚实办事、诚恳待人,又要简朴,勤俭自立。饭厅两侧墙面写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遇有撒饭等浪费现象,重罚严教,勤俭朴实,蔚然成风。

1934年至1937年,院内还开设了四个专业技能班,同学们上午学习文化课程,下午则分配到各专业学习工艺技能。四个专业技能班是:1、乐队班。学习大、小号鼓等乐器伴奏,该班对外营业,收取费用;2、无线电技术班。教以收发报技能;3、织毛巾班;4、织袜子班。三四两班不仅对外加工,而且也为院内教师、同学们提供了生活用品。

此外,多余同学下午则组织到临市立三中附近的一块荒地上进行开垦,以种植蔬菜,改善伙食,

大的同学锄地、修塘,小的同学拾砖、拔草。同学们兴高采烈,井然有序,不时合唱起“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啊!……”歌声此起彼伏,彼伏此起,既鼓舞了开荒、种地的干劲,又振奋起以苦为乐的精神世界。

贫儿院对儿童身心健康非常重视,除设有医务室外,每年定期为贫儿注射防疫针,同时从防范未然入手采取:1、经常检查个人卫生,从衣、被、碗、筷到饭前便后洗手,在检查中并教导从己做起、从小做起,要求自己铺床叠被,注意内务整洁,要求自己洗澡、洗衣服,自己缝补、剪指甲等。记得一次班会上,教工艺的鲁老师就讲过,剪指甲还求人,能叫自立吗?当时我才入院,剪指甲左手拗不过来,既感吃力,又觉不便,在听了鲁老师讲话后,我就坚持练习,不多时也学会与同学们一样做到了剪指甲不再求人了,这是我适应集体生活的开始。2、提供锻炼身心的场地,贫儿院操场很大,中间是足球场,场地东边

墙上写有“锻炼身体,增强健康”八个大字,醒目壮观,西边则是儿童健身活动的浪船、秋千、滑梯,巧板、单双杠等设施,南边是俱乐部,里面有棋室、图书室、乒乓球室,每天下午四时至五时半课外活动时间开放,星期天全天开放,北边是教室,同学们一下课就可以步入操场活动。3、作息时间安排严实,贯彻工读结合、劳逸结合,具体说来,每天早晨五时半起身,六时到六时半为早操时间,迟到者罚站场外观看操练,六时半至七时,洗脸刷牙,整理内务,七时一刻到七时半是早餐时间,八时上课,上午四节课,每节课45分钟,午餐后为午睡时间,下午二时至四时为劳动学艺时间,四时至五时半是课外活动时间,这时间可以去俱乐部下棋、看书、打乒乓,也可以去操场锻炼身体,踢皮球、玩浪船、秋千等,也可以去澡堂洗

《三绝碑》前 话古今

● 徐畅

三 绝 碑



南京钟山南麓，灵谷寺松风阁西侧的栢树丛林中有一座白塔顶砖石冢——宝志墓(上图)，冢前有墓碑，为唐代吴道子画的宝志像和李白创作、颜真卿书写的像赞。李、颜、吴三人是唐代著名诗人、书画家，他们珠连璧合的创作表现了高超的绝技，故后人称之为“三绝碑”。因碑上镌有志公著、赵孟頫书写的《十二时歌》，明代周晖《金陵琐事》说，世谓“四绝碑”。到灵谷寺观光游览的国内外游客没有不来这里一睹它的风采的。墓道南端有法堂一座，坐北朝南，北墙上嵌有两块碑石，最早的一块是明洪武十五年(1382)礼部尚书刘仲质撰写的碑文，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读起来颇可助寻古探幽之兴。

《高僧传》说：“宝志(保志)本姓朱，金城(今南京)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尚，修习禅业。……至天监十三年(514)冬无疾而终。”梁武帝厚加殓送，以二十万钱葬于钟山独龙冈(即今明孝陵址)，并造佛塔以藏舍利(遗骨)。天监十四年在志公塔前建开善寺。志公塔高五级，崇丽可登临，历代名臣骚客都有诗文歌咏它，王安石、李纲、曾极、陆游、苏东坡等人都曾登临揽胜。

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看上了独龙阜这块风水宝地，窃意为自己营造身后墓圻，授意臣

工，臣民心领神会，蒋山寺住持仲羲遂以“为见寺居高峻，下临宫阙”为由，请迁新址。于是洪武帝准奏，把开善寺及志公墓迁到今址，改名灵谷禅寺。

历史上画过宝志的画家很多。《米海岳画史》记：“叶助字天祐，收蜀范琼画《梁武帝写志公图》一幅。范琼是唐代四川籍名画家，善画人物佛像，他是追述史实而作画。与志公同时代的名画家张僧繇也画过志公，《贞观公私画史》就记载他画有“宝洁(系志之误)像一卷”。宫廷画师吴道子不仅画过志公像，而且真迹在宋代还流传于民间。“苏轼子瞻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人，破碎甚，当面一手，精彩动人，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米芾画史》)我们在《东坡全集》卷七十六的一首诗及小序中证实了米芾的记载。“仆曩于长安陈汉卿家见吴道子画佛，碎烂可惜，其后十余年复见之于鲜于子骏家，则已装褙完好，子骏以见遗，作诗谢之。”从诗中可知此画卷为绢本玉轴，画主对此画非常珍爱，同时对吴道子的画技及画卷的艺术价值大加赞赏。《三绝碑》的志公像有可能据这幅真迹摒弃旁衬人物及场面，只取志公像单独摹刻上面，流传后世。据《历代名画记·两京外洲寺观画壁》载浙西甘露寺有顾恺之等人画三十六壁，其中有吴道子两壁，故吴道子有很大

澡、洗衣服，同学们称之为自由活动时间，六时晚餐(冬季则提前半小时)，晚上七至九时是集体自习时间，在课堂复习功课或做作业，九时半熄灯睡觉。每周末下午为各班级会时间，也是同学们欢聚时间，可以演节目、讲故事、说笑话、作游戏。星期天除值班外，全院休息，这既是生活时间的安排，也是贫儿们在院的活动规律。

贫儿教养院自1912年创办以来，历经军阀割据，磨难重重，在徐宗汉、周其永等人不懈余力支持下，虽几经波折，拯救了一批又一批贫、孤儿，把他们培育成才，造福社会，但当时国民党统治，社会上关心贫儿好义者不多，终于在1937年10月被迫停办。

据知道战前贫儿院经费来源，主要靠当地政府补贴和贫儿院安徽农场收入，以及同学们工艺劳动所得，记得在1937年夏7月抗日军兴，南京市马超俊市长就借口压缩经费，减少了对贫儿院的应有补贴，致使贫儿由每日三餐改为两餐，上午10时一餐，下午4时一餐，迨至10月，国民党政府西迁，贫儿院迫于无法大肆疏散在宁有家、有亲友可投儿童，撤入安徽，南京沦陷后，贫儿院遭日寇劫难，礼堂、宿舍大楼全部被毁之一炬，汪伪政府稍加修理(教室尚存)，改为市立第一中学，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竟改作伪市法院。

(责任编辑 淑玉)

可能曾到过江浙一带写生作画,路过江宁时,参考佛寺收藏的志公遗像、遗物和法器进行创作,也是极有可能的。

颜真卿平生屡至江宁,但时间都不太长。较长的有两次,一次是至德元年(756)去平原太守改任丹阳县尹,另一次是乾元二年(759)由饶州刺史迁昇州刺史,颜真卿书赞当在这两年任中,以前一次的可能性较大。颜曾为吴的弟子卢楞伽《行道高僧》壁画题识,时称“二绝”(见《益州名画记》卷上),可见颜与吴道子师徒的关系相当密切。

像、赞、书三者为先后之作。李白为像作赞当于画成或摹刻之后,而在颜书之前。据郭沫若《李白杜甫年表》,李白除26岁曾东下金陵而外,还多次来南京,47至50岁曾游江宁,其间寓居江宁二年;53至56岁(753—756)每岁必往来(或经)江宁。作赞很可能在47—56岁之间,而以756年旅居江宁的可能为大,因为这年颜正在丹阳县尹位中。

《三绝碑》几经翻刻。唐代原碑刻于何时,未见著录。旧碑毁于宋末兵燹,元代重泐,有赵孟頫跋语:“颜鲁公尝书李谪仙赞,宝公圣师小相,辞既刻石,又于碑阴小篆师《十二时歌》,妙绝当世。缘兵燹久毁,今觉义诸师重命工摹镌,但失所篆歌,委余著笔,手拙心愧,岂敢媲美前贤耶!”明宣德壬子(1432)后毁,成化丙申(1476)僧性嘉二泐其碑。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刘琚述经过:“本初,嘉上人,一日持宝公圣师石刻小象见示,乃唐吴道子画,李太白作赞,颜真卿书,诚为三绝。先是石刻毁于宣德间,将泐所传,上人披缁南都灵谷寺,闻老僧言此,真切慨叹。耳摹本最妙,上人访求数年,得之如拱壁,拟命工重摹,心图永传,因索识其颠舛,……”(《灵谷禅林志》)。《三绝碑》第三次受到破坏是“清顺治间寺毁,惟无量殿、宝公塔存,性嘉重泐之碑盖失于此时,王渔洋游灵谷记载之。”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僧法守之泐碑,有乾隆帝题额:“净土指南”,去刘琚跋而刻法守跋曰:“灵谷寺宝志像为吴道子手笔,唐时勒石,元代重刊,明宣德间寺毁碑亦遂亡。乾隆丁丑(1757)春,翠华重幸。臣僧法守觅得旧藏本,敬谨装潢,恭呈御览,奏允重勒。蒙恩赐题‘净土指南’四字于额,真禅林千载盛事,岂特宝志面目增辉已哉。住持臣僧法守恭纪。”乾隆帝确曾巡幸灵谷,且有《丁丑暮春月下浣游灵谷寺作》诗一首(见《灵谷禅林志·卷首》)。今存《三绝碑》高204厘米,宽107厘米。碑上方有乾隆题“净土指南”行书四字于额。“普济一真”四篆字、颜书李白像赞九行55字及一梵文排列在碑额下。正中是志公

像。两侧刻赵孟頫书《宝公菩萨十二时歌》十三行620字及跋语三行89字。左侧有法守跋语四行98字。刻工精良,为吴县周梅谷的杰作。此碑几经翻刻,皆出自高手,摹刻技术精湛。明代建文初翰林杨士奇说:“旧刻已坏,此重刻者,不复见书法之妙。”(见《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八《志公画赞》)但一般研究者认为颜书在50岁前是创作初期,这是向民间手书学习阶段,亦即探索、变化阶段。《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金天王神祠题名》与《志公象赞》风格各异,虽后三碑横划细、竖划粗的形态已初具,但是此时颜的书体特征尚未形成。《志公象赞》可能是他47岁时(756年)的作品,因此与晚年的作品《颜家庙碑》、《自书告身帖》等有较大的差距,确有“不见书法之妙”之叹。此碑为我们提供了颜真卿早期书风的资料。

张彦远称吴道子是“古今独步”的“画圣”;张怀瓘说他“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画断》),不是没有道理的。观其画像,志公为左半侧立象,右肩扛一禅杖,杖端挂有铜环四,悬刀、尺、扇等。脚穿僧鞋,右脚前行,左脚跟抬起欲向前举步跟进。腰带及后襟向后摆动,飘飘然有逶迤前行之感。描绘腰带及后襟褶纹仅寥寥数笔便勾出了人体的动态和体态感,令人不能不赞叹画家笔下单线勾勒的无比精练的效果。整个人物神态,使我们想到“恒以铜镜剪刀镊属挂杖负之而趋”(见《南史卷七十六》)的宝志,所画与史实相合。这是一幅白描肖象画,并无宏大的场面和丰富的配景衬托,仅以勾勒准确、劲挺流畅、转折自然的线条,使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志公象显示了我国六朝以来人物画“传神”的高超水平。南齐谢赫总结了汉魏两晋以来的艺术成就和创作经验,在《六法论》中提出“气韵生动”作为评价和创作人物画的首要标准,也就肯定了“神似”的重要性。吴道子在志公象中抓住志公“常跣行街巷”(《高僧传》)的形象特征,运用线描这一表现形式着意刻划,不仅志公的外在形态维妙维肖,而且还把握住志公的内在性格特征、精神气质、思想感情,使志公的形象生动逼真,正是“合造化之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1964年夏,我曾在灵谷寺惟拓《三绝碑》,时有日本旅游者欲高价购买,未允。志公像在文革中被迫上交,已不知去向,各名家题书尚存。现《三绝碑》在文革中受到破坏,志公像被刮损,仅存线痕,模糊不清。灵谷寺公园拟觅拓本重新勒石,未获。海内外有识之士献出志公像拓本,将使《三绝碑》重放异彩。

(责任编辑 淑玉)

江宁的婚丧喜庆旧俗

建康风情



● 彭年德

江宁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条件和历史变革等多方面的因素，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俗民情，而每经社会变革，风俗民情必随之改变。其中婚、丧、喜、庆的礼节习俗，更是各具特色，其中虽有不少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作为地情之一，也有其研究价值。

一、婚

旧时，男女婚姻均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首先由媒人介绍，将女方生辰八字帖（称“庚帖”或“八字”）送男方。男方请算命瞎子掐算，若谓相克，即退回另聘；若相配，男方以新衣鞋袜、金银首饰及茶叶果品等馈送女方“下小礼”，以示压定，不得反悔，故有“四两黄茶压千金（斤）”之说，是为订婚。定婚后，男方再送金银首饰、衣物、糕点等“下大礼”。若女方拒收，男方需增添彩礼，媒人反复说合，从中吃喝受礼。女方收下彩礼后即筹办嫁妆。

双方商定婚庆吉日。男方用花轿迎娶，宜早，寓意“早发”。新娘沐浴更衣后，由兄长或其他亲人背上花轿。然后由媒人领路，鞭炮点放，彩灯高举，锣鼓喇叭吹吹打打。送嫁的亲友随行。花轿到达，新郎向花轿行三拜礼“退轿神”。新娘下轿，由丈夫健在、子孙满堂的妇女搀扶，从连接的布袋上走进新房，寓意“代代相传”。新郎新娘在新房同吃红鸡蛋，叫“子孙蛋”，寓意后世子孙兴旺发达，同吃面条，喝“和气汤”，寓意夫妻好合偕老。然后在厅堂“拜堂”，新郎新娘行一跪三叩头的大礼，拜天地、父母、长亲。凡受拜的亲友都要给红纸包喜钱祝贺。

晚间酒筵后即闹新房。选父母健在的童男童女各一人，手捧花烛陪侍新郎新娘；由青少年八至十人护送新郎新娘进入新房，由其中能即席编词的一人领唱吉祥词，众人随着应和“好！”先唱“手捧花烛一台台，我把新人请进来”。进入新房即向新郎新娘轮

番敬酒，并领唱祝酒词：“手捧银壶亮堂堂，一杯喜酒敬新郎，新郎喝了这杯酒，阖家幸福喜洋洋；……手捧银壶亮堂堂，十杯喜酒敬新娘，新娘喝了这杯酒，十全十美齐欢畅”。（其间单数敬新郎，双数敬新娘，依次更换；而末句要不断更换吉祥词。）唱罢，鞭炮轰响。再唱：“爆竹鸣放喜洋洋，恭喜新郎与新娘。”领唱人又手拿一把筷子往上抛撒，唱曰：“筷子筷子，早生贵子；筷子飞扬，子孙满堂；筷子落地，状元及第。”接着开始闹新房，不拘长幼尊卑，均可对新娘打趣、戏谑，引得哄堂大笑。然后众人退出新房，新郎新娘关门守候花烛点完，寓意夫妻百年偕老。这就是“洞房花烛夜”。

新婚第二天（也有有的在第三天），新郎陪新娘回娘家，叫“回门”。女家宴请亲友陪新女婿。新婚夫妻必须赶在当天日落前回到男家，方为吉利。去时，女行前，男随后；回时男行前，女随后。

民国时期，江宁城镇已有自由恋爱，举行文明婚礼的，礼仪简单，设筵欢庆。

以上是一般的婚嫁礼节。而民间旧时还有“养亲”、“招亲”、“裹亲”、“抢亲”的习俗。

“养亲”即带童养媳。因童养媳在男家长大，故称“养亲”。多因家境贫苦，或男方弟兄多，怕日后娶不起老婆；或女方儿女多，生活困难，怕以后赔嫁不起。因此，在女孩年幼时（或出生不久、或三五岁、或十多岁不等），即由男家收养为媳妇，故叫“童养媳”。接亲时给女孩头上顶块红布，用土车或小毛驴接到男家，等长大成人后再举行简单婚礼成亲。

“招亲”即“入赘”，又叫“招女婿”。一般是女方无子承嗣，要招女婿进门撑顶门户，传宗接代，承袭家业。而男方则多因弟兄多，娶亲难，愿做过门女婿。经媒人说合，并完成定亲等程序后，用毛驴把新郎接到女家成亲，共同生活。新郎或随女姓，或用原姓，由双

方商定,但所生子女则必须随女姓,儿子为女家承宗接代。

“裹亲”,一般是富家女儿娇惯,男女定亲后,娇女不愿到男家完婚,改由男方到女家举行婚礼,然后再在男家生活。

“抢亲”,这里所说的“抢亲”,同恶霸地主官僚土匪等强抢民女为妻妾者不是一回事。农民“抢亲”,多因家贫无力娶妻,乃邀请数人于夜间偷抢寡妇为妻。也有男女定亲之后,男方因遭天灾人祸,家境突变,无力办酒筵迎娶未婚妻,亦邀数人乘女方逛庙会不备时,抛撒红纸屑,强抢新娘成亲。被抢女方虽哭闹不从,但生米煮成熟饭,经人劝解,也只好依顺。

解放后,废除了旧婚姻制度,抢亲已根绝,裹亲极少见,招亲也寥寥,童养媳得解放。

二、丧

旧时,民间称丧事为“白喜事”,丧礼很繁琐,木棺土葬(回民用白布缠身土葬),请僧尼做斋事,以超度死者灵魂早升天界。至于延请僧尼的多少和使用棺木的厚薄,以及停柩时间的长短,富家与穷人有显著差别,富家请的僧尼多、使用的棺木厚、停柩的时间长,而穷人则相反。若是老人病死,亲属都要在旁送终,撤去蚊帐,谓阴魂可免罹天罗地网之苦。再移至厅堂,谓之“寿终正寝”,穿寿衣,一般要五领(五件衣)、三腰(三条裤),嘴含银钱、米谷,脚缚白线。然后入殓,亲属子女要跪拜,尸身覆盖女儿或侄女做的盖被。如是妇女,需经娘家人验看后才能入殓。入殓完毕再封棺,男的由近亲长辈执斧“封钉”,女的由娘家兄弟执斧“封钉”。设灵堂,燃香烛,点长明灯,供三牲(猪头、鸡、鱼)、五谷(稻、麦、菽、黍、稷)祭奠,以表哀思和追悼,由长子守灵。第二天由次子至亲友家跪于门外报丧。亲友们前往吊唁,并赠送挽联、祭幛、花圈,备办七样菜祭奠。每至一亲友祭奠,子女要跪于旁陪祭,吹鼓手奏哀曲。丧家要设四样素食款待亲友,谓之“豆腐饭”。

安葬之前,请阴阳先生选坟地,择葬日。一般停柩三天(有的择吉日)出殡,破土安葬,吹唢呐,放爆竹,鸣锣开道,僧尼举铭旌、鬼舆旗幡前行,沿途撒纸钱。儿子持“哭丧棒”行棺前,家属亲友随棺后。一般的八人抬棺,年长的死者或富家的需“八抬八持”(即十六人抬棺)。至坟地,送葬者先投钱于墓穴“烘坑”,抬棺者将钱收取后落葬,由子女先撮土(谓“丢土”),而后众人挑土做墓。送葬者回至丧家门口时,均须跨三堆火而过。丧家对送葬亲友先敬糖茶、糕点,再办

荤筵款待送殡亲友。三天后,子女去“圆坟”(做成“坟山”)。出嫁女儿要回来烧“五七”,挑来酒、菜、饭、粢粢在坟前祭奠。家属要戴孝七七四十九天,每七天祭奠一次。服孝两年后,择吉日除孝,叫“脱孝”。戴孝期内,子孙不得理发。如死者是高龄,丧家要送小花碗和红黄线给亲戚友邻,意为给小孩“套(讨)寿”。

三、喜

“喜”指生育儿女。旧社会重男轻女,生了男孩,向亲戚报喜,赠送红蛋,宜单数,但忌“五”。三天后请左邻右舍吃面条,意为“长命百岁”。亲朋好友馈赠鸡、肉、鱼、蛋、馓子、红糖等营养品,谓之“送月子”。长辈为小孩取乳名。煮糯米粥请四邻,叫“毛米粥”,吃者越多,预示小孩将越长得结实。产妇未满月不得进别人家(有的地方要过四十天方可串门、干活)。满月之日要宴请亲友。亲友则赠送婴儿衣、帽、鞋、袜等礼物及鸡、肉、面、糕点等食品,名为“满月”;为婴儿剃头,将头发同狗毛、猫毛搓成小团挂在床上,谓可保小孩平安。过了四十天,产妇带婴儿回娘家,叫“换尿窝子”。回来时带炒米花、糖豆,以备在路上遇熟人散发。亦有小孩满一百天时亲友送礼庆贺的,叫“做百日”。到一周岁时,又要请客送礼,还备物品及玩具等让孩子抓取,以预测这孩子未来的志向或爱好,叫“抓周”。旧时穷人儿女多,无力抚养,故有弃女婴、溺女婴的悲惨现象。

四、庆

“庆”指庆贺寿辰。江宁民间有整生日(逢十生日)和零生日(每年生日)之分,一般只做整生日。孩子十岁、二十岁通常都做生日,摆酒设筵,外婆家要给外孙送衣“换季”。江宁县丹阳县、秣陵镇一带有男不做三(三十岁)、女不做四(四十岁)和东山镇一带不做五(五十岁)之俗。生日都吃面条、鸡蛋庆贺,亲友送礼祝贺。至于耄耋之年的老人庆生日称“祝寿”,家属要为之做新衣,亲友赠送寿幛、寿联、衣物、挂面、鸡蛋、糕点等。这时大摆筵席宴请宾客,放鞭炮,供寿桃,吃寿面,喝寿酒,晚辈要跪拜祝寿,鼓乐齐奏,宾客盈庭,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也有老人超前一年做寿的,说是“紧前不紧后”,名为“劝九”。

解放后,旧的婚姻制度废除了,男女婚姻自主了,婚礼也日趋简单朴素。丧礼破除迷信,逐渐改木棺土葬为火化。唯生育儿女、祝贺寿辰的习俗,则至今还基本承袭不衰。

(责任编辑 霁 明)



南京栖霞山下 一所特异学校

——栖霞寺内的宗仰中学

● 胡汉林

四十年前，在南京栖霞山下，有所特异学校。

当年，这所特异学校，对在校就读的青少年，尤其对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使其成为有用之才，走上正确人生之路，起到了导向和奠基的作用。这真是：“中华历史多帐惘，独夫不仁更荒唐；多有贤士行善举，盛结桃李留芳香”。为使今人和后代，能知其事、解其然、明其意。兹将与有关的事实，陈述于后；其中，如有不妥或疏漏，请知情者，给予指正、补充。

栖霞寺内的宗仰中学，是由栖霞寺内的住持，志开法师主导创办的。《中国佛教史年表》（台湾佛光出版社）载：“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笔者注），南京栖霞寺志开法师，就寺内创办宗仰中学，邵力子任董事长。”

这所中学创办的起因和概况是：

原来，栖霞寺内办有佛教律学院。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又因青少僧徒不多，就将律学院停办，改办招收僧俗共同就读的文化中学。该校1947年筹备，1948年开课；校内设有董事会，特约当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后称和平老人的邵力子先生，为董事长；志开法师任副董事长，专职校长由江浦县人，汤礼志担任，还设教导处和总务处。一年分为春季班、秋季班两期招生，少数是僧徒，多数为俗家子女，全校共有七名女生。当时的校舍，就是沿用原寺内律学院的教室和寺内空余房屋，分别设高中一、二年级各一个班，初中的甲、乙、丙三个班，共有学生二百多名。教授课程是：国语、数学、物理、化学、音乐、美术等。另外，每周由寺内用三天，专门对僧徒学员，讲授佛学课。讲课教师，少数由寺内高僧担任，多数课是从校外聘来的教师担任。如今仍记得名的校外教师是：秦克夫教音乐、美术，此人在解放后参加军政干校，到西南地区工作；朱立三，

教数学，解放后调龙潭中学工作，已病故。

该校的名称，是为纪念本寺著名方丈宗仰大师，而命名的。

宗仰大师，是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对中国佛教事业和国家进步，有卓越建树的高僧。香港出版的《栖霞寺志》，台湾出版的《佛光山志》上，对这位高僧的历史和功业，均有如下的记述：

宗仰上人，字中央，别号乌目山僧；原籍江苏常熟人，俗姓黄。他在镇江金山的江天寺受戒，博才多艺，深谙英、法、日、梵等文字，还精通诗词、书画、金石等学问，并卓然成家。宗仰大师，虽然虔诚信佛，其思想开明进步，对孙中山先生从事的革命，热情支持，厥功至伟。孙中山革命成功后，宗仰大师淡泊自甘，不想复回政治，立志专事宏扬佛教。1919年，栖霞寺的法意大和尚，不忍寺内遭受战乱和破坏，任其继续荒落，亲赴镇江江天寺，礼请宗仰大师来栖霞寺任方丈，指导重建这座寺院。他以振兴佛教事业为重，慷慨应允，到栖霞寺后，亲自到处奔波，化缘求助。孙中山先生闻此讯后，也热诚资助，捐献银币一万块。宗仰大师经过筹划，很快修复了寺内大殿；后来，他由于年事已高，又积劳成疾，在民国十年七月（1921年），不幸圆寂，葬于栖霞山上，成为历史上一位重建栖霞寺的著名高僧。

宗仰中学，在志开法师主导下，从1947年春开学，到1949年春停办，历经二年多，共培育僧俗青少年二百多名；其中有不少人，成了杰出人才，如总会计师、中国古文物高级研究员、军政干部，有的成为省或市的劳动模范等，有的至今还在工作岗位上，为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

（责任编辑 淑玉）

南京正南百余里处，有座“双峰对峙，一水分流”的山，名青山，它北临姑溪河，左带丹阳湖，右与龙山隔青山河相望。旧志载：“青山穹窿盘薄，绵延数十里，鸟道纡曲，林木幽美。”素以山峻、林青、石奇、水秀而闻名遐迩。六朝南齐诗人宣城太守谢朓，酷爱其胜，常来青山遨游吟咏，写有《游青山》绝句，诗中称其山为“山水都”。因谢朓曾筑室山南，后人称青山为谢家山或谢公山。东晋大司马恒温镇守姑孰（今当涂县）时，常游青山。宋陆游在《入蜀记》

中写到“恒温墓亦在近郊，有石兽、石马，制作精妙，又有碑、悉刻当时车马衣冠之类，极可观”。恒温墓在青山北麓，故青山又别称恒墓山。

青山最享有盛名的是太白祠、太白墓。唐代大诗人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生前既爱青山景色，又慕谢公人品诗格，曾多次来青山凭吊谢朓故宅，有“宅近青山、同谢朓公之蛻骨”之夙愿，一心想同谢公结为异代芳邻。唐肃宗宝应元年（762），贫病交加的李白，投靠叔父当涂县令李阳冰，同年病逝，享年 62 岁。李白病逝后，原葬龙山东南麓，55 年后，李白生前好友范伦之子，宣歙观察使范传正访得已流落民间的李白两个孙女，从她们口中获悉“先祖志悦青山”。元和十二年（817），范传正会同当涂县令诸葛纵将李白墓从龙山迁至青山西南麓，即今太白乡谷家村。墓址座北朝南，枕山面水，南距公路约 300 米。沿石板小道，过小石桥，跃入眼帘的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群，即太白祠、太白墓陵园。整个陵园是仿清徽派古园林建筑，斗脊飞檐、黑瓦白墙，相映成趣，端庄肃穆。太白祠始建于宋绍兴年间（1131~1162），自唐迄今，近 1200 年来，太白祠、太白墓曾修葺 13 次。现今太白祠、太白墓为 1979 年重新修饰，并扩建成占地 50 亩的陵园。

步入太白祠、太白墓陵园，园内左侧有口池塘，名“青莲池”，池旁垂柳依依，池中秀水泱泱，拱形“化鹤”桥横跨池上，连着新辟建的“十咏亭”，亭飞檐翘角，古朴典雅，上镌刻有李白晚年游踪当涂佳作《姑

青山太白祠 · 太白墓

● 赵家云



孰十咏》诗十首。亭旁有假山、修竹、松柏，景色宜人。

一座象征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花坛，两株樱花亭立于坛中，旁竖“日本关西吟诗社”木牌。十咏亭左侧有一冬青石道直通太白祠。太白祠为前后两进，素白粉墙，黑灰瓦顶。祠内青砖地面，雕梁画栋，宽敞明亮。正厅门楣上悬著名书法家林散之手书的“太白祠”横匾，两旁有舒同题书的楹联。祠厅迎面立有一尊汉白玉李白塑像，高 2.47 米，重约 3 吨，塑像侧身而立，左手握剑，右手后垂，双眸含慧，胡须飘逸，

气度非凡，再现了诗人晚年抱病姑孰，饱经风霜，郁郁而不得志的愤懑哀怨之神态。塑像背阴有一巨幅墨绿色徽派版画，以李白游踪青山为写意，版画上为著名书法家舒同所题“李白高踪”四字，厅堂正中高悬“诗无敌”三个大字，系著名书法家司徒越手书。两壁镶嵌有六块石碑：一块《李白捋须漫步图》是从故宫南熏殿旧藏圣贤画册上临摹而制成的，栩栩如生；一块为张翰草书李白的《临路歌》。另三块重刻唐李华、刘全白、裴敬撰写的墓志铭；最珍贵的一块为幸存的宋碑，该碑是宋淳祐二年（1242），兼权太平州事、节制军马孟点，根据唐范传正所撰写的墓志铭“重书刻石，立于墓左”的碑文。此碑高五尺七寸，广二尺九寸，共 30 行，行字 63，正楷，字径六分，碑额题有“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9 字，分 3 行，字径二寸一分，字迹清晰。此碑距今已有 743 年历史，是太白祠内仅存较早的历史文物，为今人研究李白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佐证。

太白祠后即为太白墓，墓呈圆形，墓圈高 1 米多，周长 20 米，由 170 多块青石垒筑而成，墓顶芳草萋萋，艾菊尤盛，墓前方嵌立石碑一块，上刻有“唐名贤李太白之墓”，碑的边沿刻有简单的花纹图案。据传，碑文字体系杜甫手迹，石碑为清代所立。墓的四周新植有翠竹、冬青，青翠欲滴，长青肃穆。1954 年，太白墓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责任编辑 惠 兰）

孙中山的治学精神

谈嘉祐

白门掌故



孙中山先生博览中西典籍,绕行地球五周,交游极其广泛,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历史人物和伟大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出身贫寒,自幼酷爱学习,同书结下不解之缘。他“幼读儒书”,读的都是《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入私塾仅一个月,他就直言不讳地向私塾先生提出质疑:“我一点不懂,尽是这样唱,有什么意思,我读他做什么?”幼时在私塾读书时,孙中山最大的收获是聆听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的老师讲述当年光荣的斗争历史。而使他最感兴趣的是,倾听常来私塾伴读的太平军老战士冯爽观介绍的战事和

洪秀全的为人。太平天国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异常崇敬天王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命。

孙中山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从小就深恶痛绝。十多岁时,他开始对蓄奴、缠足、崇拜偶像等恶俗进行猛烈抨击,使封建绅士们“惊骇不已”。他经常想:“一定有别的真理,可以在兰谷之外寻求到的。我总有一天要去寻求真理,于是就可以不再闷在黑暗中了。”13岁那年,孙中山随母亲赴夏威夷仁岛。“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当时被称为“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在所撰《兴

中会革命文要》中说:“孙中山到了檀香山,因为没有中国学堂,所以白天就进一个教会学堂,学习英语,晚上回家温习功课,他还是勤读中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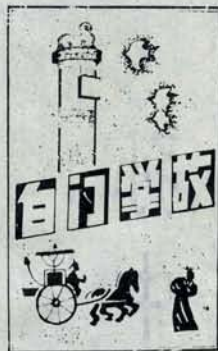
1882年,17岁的孙中山毕业于伊奥兰尼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冠于全校,夏威夷国王特地选择英系中国之书籍亲行赐奖。在夏威夷的几年刻苦勤奋学习,对青年孙中山思想发展影响很大。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吾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章,政治礼俗,与夫天称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窍奥。”由于孙中山不断接触西方政治制度和物质文明,逐渐产生了向西方寻求革命真理,矢志改造祖国的伟大抱负。

1897年春,孙中山来到英国伦敦后,白天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读书,对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农业、矿业、畜牧、工程等,“潜心研读和从事著述,探求救国真理”。晚上读书疲倦了,他就伏案假寐片刻,醒来又继续埋头攻读。学习中,他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认真钻研书本知识,而且积极深入到德、比、法国实际考察,研究欧洲社会政治制度。从这时起,他便决心“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在长期流亡生活中,经常穷得身无分文,有时连吃饭都发生困难。同他在一起的中国留学生慷慨解囊相助,可没数日;他又囊中如洗,把钱全部用来购书了。卢骚的《民约论》、富兰克林的《自传》,以及其它关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是孙中山最爱读的书籍。当时,有些中国留学生好奇地问孙中山为什么买那么多书,他总是笑着回答说:“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一刻不能缺少。”他常引以自豪地对同学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就不能够生活。”

怎样才能读好书,掌握好书中的真谛?孙中山深有体会地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由于他勤读诸子百家的著述,涉猎中外名家的群书,所以知识广博,同学们亲切地称他“通天晓”。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广东岭南大学即以《非学问无以建设》为题作了演讲。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先生同宋庆龄女士结秦晋之好。在他东京的寓所里,到处堆放着各种中外书籍,仿佛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书的世界。

(责任编辑 霁 明)

康熙夜读 燕子矶



● 南京军区 陆正明

清康熙帝于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初一日南巡抵达江宁(今南京),初四下午,康熙的御舟及随行官员船只徐徐航行至燕子矶时,已近傍晚,就决定停舟驻蹕。康熙站立船头,仰视屹立于长江边上、山石三面凌空,似燕子振翅欲飞样子的燕子矶雄姿,感叹不已。因夜幕将临,不便登及观光,便面对滔滔的江水,挑灯苦心夜读起来。康熙这种读书习惯是自小养成的。

康熙是清顺治皇帝福临的第四子,长相端庄,聪颖过人,是孝庄皇太后最喜爱和寄予厚望的一个皇孙,从他5岁起,就作为皇帝的接班人进行培养,进入书房读书。开始将乾清宫西庑之懋勤宫殿作为康熙读书的地方,后来建了南书房,就专门作为他读书和听侍讲的场所。由于孝庄皇太后望孙成龙心切,使年幼的康熙学习负担过重,以致一度身体衰弱多病,经常要进行针灸治疗。而康熙良好的读书习惯,在其祖母严格的要求下培养成了。康熙这次南巡的随从侍讲学士高士奇是浙江人,比康熙大10岁。康熙即位时年仅8岁,14岁亲政。由于他接受教育早,加上他自己勤奋努力,到即位时,对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已颇领悟。亲政后不久,就下谕礼部仿效明朝“举经筵”,建立为皇帝讲习《四书》、《五经》的制度,专设了经筵讲官进行侍讲。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康熙觉得侍讲官中缺乏博学善书者。因此,在康熙十六年下令于翰林院内选两名学士充侍讲官,高士奇就是这样选来的。高士奇这人学问渊博,文才出众,能诗,善书法,精鉴赏,深得康熙宠幸,特居住在內廷供奉。

高士奇从康熙十六年进宫后,经过和康熙七八年的接触,对其学习的习惯和特点比较了解,所以对他燕子矶挑灯夜读的事也就不以为然,只是在一旁小心侍奉。但高士奇见时已至三鼓(即三更),康熙

仍孜孜不倦,犹不废读,就奏请说:“皇上南巡以来,行殿读书写字,每至夜分,诚恐圣躬过劳,宜少自节养。”康熙听高士奇这么一说,就放下书本,若有所思地讲:“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即位),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康熙读书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至若史、汉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康熙这次在燕子矶夜读的书,从他和高士奇的讲话内容看,可能主要是读的《尚书》。清朝皇帝研究儒家经典是从康熙开始的,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第一人,他尊孔崇儒,笃信儒家思想。康熙八年,在他16岁的时候,就“幸大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康熙九年所颁行的《圣谕16条》,其首条即为“敦孝悌以重人伦”。因此,康熙积极推崇《尚书》。他说此书“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朕留心研究,……著将《尚书讲议》刊刻颁行”。

高士奇见机就对康熙读书的成就进行极力的颂扬,他说:“皇上天纵之姿,好学不倦,非独儒臣经生无此纯一夫工,即自古帝王实未闻有专志笃好若此者。盖圣心原极虚明,不为外物所蔽。又时勤学问,于古今治乱之理,看得了然。故凡用行政,独出乾纲,尽合至道,迨来部院臣工莫不砥砺名节,思欲仰佐高深。吏治、人心渐加变易,唐、虞三代之隆,将复见矣。”康熙听了高士奇对自己的一番颂扬,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便得意洋洋地自我表白:“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草率。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画于胸中。简任督、抚之时,又必详加察访,盖一方大吏贤能自足,表率僚属。今贪墨之风,未必除尽,然激劝澄清,正欲使之潜移默化也。”康熙和高士奇交谈结束时,天已东方发白。是日,康熙抵仪征驻蹕。

(责任编辑 霁 明)

南京民俗馆民俗展品精选介绍



郭金海 供稿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南京市鼓楼区商业网点建设办公室



改造后的丁家桥菜场



市、区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验收天府阁工程
区及有关部门领导



复兴园饭店新貌

永兴村早点店



中华理发店

乐天池多功能浴室

